

朱洪 著

二十五年才肯，我在上海...

由知... 陈独秀

陈独秀与 中国名人

不能忘的是陈君在每朝与... 支持了几个月，我全体报他的毅力与责任心。



Vertical text on the far left edge of the cover.

出版社

K222

129

97730

陈独秀与中国名人

· 朱洪 著

中央编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陈独秀与中国名人/朱洪著. -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7.3

ISBN 7-80109-142-6

I. 陈…

II. 朱…

III. 陈独秀 - 生平事迹

IV. K827.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6)第 22211 号

陈独秀与中国名人

朱 洪

出版: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址:北京西单西斜街 36 号(100032)

电话:66171396 66163377-618、617

经销:全国新华书店

照排:北京京鲁排印部(63044503)

印刷:河北丰润印刷厂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字数:320 千字 印张:13.25

版次:1997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0 册

定价:16.80 元



200257239

陳獨秀與中國名人

趙傑初題



目 录

第一章 从“楷模”到“反面教员”

——毛泽东眼里的陈独秀…………… (1)

- 陈独秀“魄力雄大”…………… (2)
- “陈独秀给我的影响超过了其他任何人”…… (3)
- “我祝陈君万岁”…………… (5)
- 在我的转变时期,陈独秀
对我印象是极其深刻的…………… (9)
- 《共产党》月刊“颇不愧‘旗帜鲜明’”…………… (12)
- 共同主持中央局…………… (16)
- 阴影…………… (18)
- 谁主沉浮…………… (23)
- 分道扬镳…………… (28)
- 是“好得很”还是“幼稚”…………… (30)
- 烟雨莽苍苍…………… (33)
- 枪杆子里出政权…………… (37)

- 仲甫真岂有此理 (39)
- 将来“要讲一讲他的功劳” (42)
- “太着重了个人的责任” (43)
- 类似俄国的普列汉诺夫 (45)

第二章 前清翰林与秀才

——蔡元培与陈独秀 (49)

- 暗杀团 (49)
- 受聘文科学长 (52)
- 兼收并蓄 (61)
- “田必美”与“元绪公” (63)
- “八年之事” (66)
- 离开北大 (69)
- “不解西文” (71)
- 《评蔡校长宣言》 (73)
- 酷暑中续求 (75)
- 营救陈独秀 (77)
- 心中无数伤疤又多一伤痕 (80)

第三章 回头“浪子”与哲学博士

——陈独秀与胡适 (82)

- 文学界的雷声 (82)
- 以为吾友之声援 (86)

- 自古成功在尝试 (91)
- 头巾见解 (97)
- 问题与主义的论战 (101)
- 《新青年》风波 (108)
- 攻击孔教的健将 (114)
- 法国人真不要脸 (116)
- 仲甫老爱标新立异 (118)
- 爱国君子要慎重一点 (121)
- 十二个大人物 (124)
- 病废的胡适与奋斗的陈独秀 (126)
- 三个杂志代表三个时代 (128)
- 冒犯老兄 (132)
- “家庭革命”失败 (137)
- 讼棍行为 (139)
- 难道我是谋私利吗 (141)
- 简直要做仇敌了 (144)
- 帮倒忙 (145)
- 请蔡元培就近营救陈独秀 (146)
- 旧朋友中又失了一个 (148)
- 不用去美国 (150)
- 回头“浪子” (152)

第四章 南陈北李

——陈独秀与李大钊 (155)

- 扬木铎之声 (155)

- 青春之气, 万古长青…………… (160)
- 文科学长与图书馆主任…………… (161)
- 性格与众不同…………… (163)
- 团结千万不可不顾…………… (166)
- 站在时代的风口浪尖…………… (169)
- 小监狱与大监狱…………… (172)
- 对社会的告白…………… (177)
- 中国没有主义不行…………… (179)
- 北京脱险, 相约建党…………… (183)
- 南陈北李遥相呼应…………… (187)
- 两种不同的主张…………… (191)
- 帮助孙中山…………… (195)
- 白色恐怖下的南陈北李…………… (197)
- 我又要回到战场上去了…………… (200)
- 树北进之声威…………… (204)
- 南陈徒有虚名, 北李确如北斗…………… (206)

第五章 “旗手”与“主将”

——陈独秀与鲁迅…………… (209)

- 寻找友军…………… (209)
- 鲁迅是谁…………… (214)
- 俟机出击…………… (218)
- 省出纸墨, 移作别用…………… (221)
- 为《新青年》撑面子…………… (223)
- 新世纪的曙光…………… (227)

- 五体投地佩服 (233)
- 不必争《新青年》名目 (236)
- 内皆武器,来者小心 (242)
- 我对于鲁迅之认识 (243)

第六章 友谊与分歧

——陈独秀与瞿秋白 (246)

- 莫斯科相逢 (247)
- 初次合作 (252)
- 分歧开始 (254)
- 为街春色上云梢 (256)
- 心系“热血” (260)
- 留下后患 (263)
- 头脑千万要冷静 (265)
- 中国革命之争论 (268)
- 党已有病 (270)
- 真正要出一身冷汗 (273)
- “进攻”与“退让” (276)
- 不尽长江滚滚流 (278)
- “撒翁”与《布尔塞维克》 (281)
- 似为瞿秋白说句公道话 (283)
- 应有香如故 (286)

第七章 党团书记之间

——陈独秀与任弼时 (288)

- 上海外国语学社的任培国 (288)
- 中国的布林斯基 (290)
- 上海大学俄语教师 (291)
- 团中央总书记 (293)
- 这样下去,会出事的 (295)
- 当选中央委员 (296)
- 真理最终会胜利的 (297)
- 面对面的斗争 (300)
- 老头子可去莫斯科 (302)
- 在历史的转折关头 (304)

第八章 总书记与大总统参议

——陈独秀与林伯渠 (306)

- 与君携手共芳辰 (306)
- 运筹合作 (310)
- 入党:秘密的与公开的 (313)
- 妥协退让的后果 (315)
- 密议组建工农军 (317)
- 倔脾气断送前程 (320)

第九章 同流不合污

——陈独秀与张国焘 (324)

- 最初的印象 (324)
- 一大前后 (327)
- 陈家遇险 (330)
- 观点相左 (332)
- 搞宗派初露端倪 (333)
- 临阵脱逃 (335)
- 栽了个大筋斗 (336)
- 叛变 (338)
- 右倾投降政策的代表 (340)
- 结束工作关系 (342)
- 图谋再立山头 (344)
- 我没有这个能耐 (346)
- 黔驴技穷 (347)

第十章 著作家与出版者

——陈独秀与汪孟邹 (349)

- 凶耗传来忍泪看 (349)
- 脾气真古怪 (351)
- 穷得丁当响 (354)
- 引荐胡适 (356)

- 一定要上马路 (360)
- 奖掖后进 (362)
- 想什么就写什么 (364)
- 好爵未做丧失人格的事 (366)
- 我的东西没有文学价值 (368)
- 一辈子不服输 (370)
- 不能写自传 (372)
- 望勿告他人 (373)
- 社会每迫害天才 (375)
- “实庵”与“耕野” (378)

第十一章 “畏友仲子”与“风流和尚”

——陈独秀与苏曼殊 (381)

- 由己不由人 (381)
- 赭山弥月 (386)
- 魂附东舟夕夕还 (388)
- 千年绝学从今起 (393)
- “风流和尚” (394)
- 无量春愁无量恨 (396)
- 南国投荒期皓首 (404)
- 乍合仍离倍可哀 (406)
- 老死缘于生，生缘于爱 (410)
- 于人情世故十分透彻 (412)

第一章

从“楷模”到“反面教员”

——毛泽东眼里的陈独秀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迄今为止只有两位领袖连任过五届党的领袖,他们便是陈独秀(一大至五大)和毛泽东(六大后期至十大)。在他们相互交往的10年里(1917-1927),他们是怎样由师生、朋友的关系一步步发展到上下级、战友、同志的关系,又怎样由上下级、战友、同志的关系一步步分道扬镳?在其后的半个世纪(1927-1976)里,毛泽东在不同时期不同场合又是怎样评价走向反对派的陈独秀、举棋不定的陈独秀和去世了的陈独秀的?在这两位世纪名人都已作古的今天,回顾他们的交往史,不禁使人联想到“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的诗句。是啊!逝去的已成为历史,留下的除了怀旧,还有思索……

◎陈独秀“魄力雄大”

1917年夏日的一天傍晚,明月初升,和风习习,毛泽东和张昆弟在湘江游泳后到蔡和森家造访。闲谈中,毛泽东感慨道:“前之谭嗣同,今之陈独秀,其人者魄力雄大,诚非今日俗学所可比拟。”以前毛泽东常提到湖南人谭嗣同,却很少提到安徽人陈独秀。

听见毛泽东称赞陈独秀,张昆弟笑着说:“以前润之是言必称康、梁的,陈独秀办了一个《新青年》,又言必称陈、胡了。”

这年春天,毛泽东将自己写的《体育之研究》一文给了不久前去北大任教的杨昌济先生。在长沙一师,蔡和森、毛泽东都是高材生。在老师杨昌济眼里,成绩数第一的是肖瑜,第二是蔡和森,第三是毛泽东。肖瑜、蔡和森、毛泽东三人是好朋友。1916年夏天,毛泽东和蔡和森游历浏阳、湘阴、岳阳等地作社会调查;这年暑假,毛泽东又和肖瑜结伴游历了宁乡、安化、益阳等地。

毛泽东写《体育之研究》抨击孔子只讲德智,不讲身体,原因之一是他在长沙一师读书的好朋友易咏畦因埋头读书早逝了。他认为颜子短命,贾生早夭,就是恶果。毛泽东和易咏畦有很深的感情,1915年暮春,毛泽东在城南角独自徘徊,听着衡山之巅南飞的大雁凄切鸣叫,看着春水碧透的湘江年复一年的流去,毛泽东触景生情,含泪写了悼亡诗:“去去思君深,思君君不来。愁杀芳年友,悲叹有余哀。”

当时陈独秀刚将《新青年》编辑部搬到北京。杨昌济便将毛泽东的文章转给了陈独秀。陈独秀很喜欢这位“自信人生二百

年，会当水击三千里”的年轻人的文章，毛泽东写道：“体育者，养生之道也。东西是所明者不一：庄子效法于庖丁，仲尼取资于射御；现今文明诸国，德为最盛，其斗剑之风播于全国；日本则有武士道……”陈独秀正致力于引进西方文化，便将化名“二十八画生”的文章在《新青年》三卷二号上刊出了。这是毛泽东第一次与陈独秀的神交。在好友张昆弟、蔡和森面前称陈独秀“魄力雄大”，也就成了毛泽东对陈独秀的最初印象。

这一夜，三位年轻人乘兴而谈，从长沙谈到北京，从陈独秀谈到胡适，海阔天空，痛快淋漓地畅谈湖南的未来，畅谈中国的未来。毛泽东后来说，我的朋友和我只愿意谈论大事——人的天性、人类社会、中国、世界、宇宙！

◎“陈独秀给我的影响超过了其他任何人”

1918年8月19日，毛泽东、张昆弟、罗学瓚、李维汉等24人到京。蔡和森打前站，已先期到京。罗章龙没有来，他已于年初到日本去了。临行前，毛泽东和新民学会会员在长沙北门外的平浪宫为他饯行。望着南岳衡山雨后飘浮的白云和天马山、凤凰山郁郁葱葱的树木，毛泽东写下了《送纵宇一郎东行》的七绝：“君行吾为发浩歌，鲲鹏击浪从兹始。”纵宇一郎是罗章龙的化名。

毛泽东到京后，杨怀中给李大钊写了一封信，请他为一位出国勤工俭学的外地来京学生找一份临时工作，补助一点生活。李大钊同意他到北大图书馆任助理员，打扫卫生，登记每天读报人数，月薪8元。这个外地学生就是毛泽东。

在北大图书馆,经李大钊介绍,毛泽东认识了陈独秀。

第一次见到大名鼎鼎的陈独秀,毛泽东格外兴奋。他操着浓重的湖南口音告诉陈独秀,在《新青年》的影响下,湖南成立了新民学会,这次来了20多人,打算出国留学。见毛泽东五官匀称,讲话时目光炯炯有神,陈独秀很有兴趣地听他介绍新民学会的情况。只是毛泽东的湖南口音重,陈独秀似懂非懂听了一会,听到讲《新青年》三个字,高兴地点点头。听到毛泽东提到《体育之研究》一文,陈独秀眯着眼笑了:“对了,对了,毛泽东,正好二十八画呀。”当时陈独秀对北大的辜鸿铭公开吹捧东方文明,抵制西洋文明很反感,正写文章质问《东方杂志》记者,他觉得湖南一下来这么多人要出国,比自己写文章还有力。

陈独秀听说他们来的人多,问他们住在什么地方,生活有没有困难。

毛泽东说大家分散着住。他本人临时住在豆腐池9号杨怀中家中,和看门人挤住在一起。当时他正和杨开慧谈恋爱,能和热恋中的杨开慧天天见面,毛泽东感到非常幸福。在长沙时,杨开慧就爱上了父亲的高足毛泽东,用她自己的话说,看了他的文章和日记,听了他讲的话,她就爱上了他。

临别时,陈独秀握着毛泽东的手,愉快地说:湖南人我接触很少,你的那篇写体育的文章写得很好,以后和我多讲讲湖南的情况。

回到豆腐池9号杨怀中住宅,穿着白色毛衣、留着秀发的杨开慧正在院子里观赏海棠和秋菊。见毛泽东回来,杨开慧忙端上一杯茶。毛泽东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和杨开慧兴致勃勃地说:“我今天见到陈独秀了。”

杨开慧见毛泽东一脸喜气,情绪受了感染:“这次到北京来,

你是大有收获啊！”毛泽东听出杨开慧话里有话，除了见到新派人物，毛泽东的另一个收获就是和她的关系又有了发展。杨开慧笑着抿了抿嘴，没有把话讲出来。毛泽东连连点头：“陈先生见解精湛，敢作敢为，正是国家所需要的栋梁之才。这几天，我在北京接触了不少人，他给我的影响恐怕是最大的了。”

在北大图书馆，毛泽东和李大钊接触最多，在李大钊的影响下，毛泽东参加了许多社会活动。此外，还拜访了蔡元培、胡适、陶孟和等新派人物，并与傅斯年、罗家伦、张国焘、康白情、段锡朋、陈公博、谭平山等北大学生交往。胡适晚年写过《非留学篇》，同意毛泽东不去外国读书，还盛赞“我的学生毛泽东”在“共产党里白话文写得最好”，但给毛泽东影响最大的莫过于陈独秀。18年后，毛泽东和斯诺谈话时回忆起第一次和陈独秀的交往说，当时“陈独秀给我的影响超过了其他任何人”。

◎“我祝陈君万岁”

1920年1月初的一天，天空中飘着雪花。北京箭杆胡同人迹稀疏，这时一位手拿红色纸伞的青年人快步走到20号门前，门前的一对小石狮上已蒙上了一层薄薄的白雪。敲门时，年轻人发现，不远处一双陌生的眼睛正狐疑地盯着他。

“啊，是润之呀！快请进。”开门的陈独秀一眼就认出了毛泽东下巴上的那颗大痣。五四运动时，陈独秀因散发传单被捕，直到9月才放出，现在保释在家养病。毛泽东微笑着看着陈独秀，他发现，狱中生活使陈独秀憔悴了许多，头发又落了不少，前额更加突出。但凹在眉骨下的两眼还是很有神气，乌黑发亮。

“什么时候来的？”陈独秀示意毛泽东坐在写字桌旁的木椅上。陈独秀的卧室不大，一张床、一张写字桌、两架书就把房间挤得满满的。

“才来几天。”两人差不多有一年没有见面了。1919年春天，毛泽东送新民学会会员出国留学，经天津、上海回长沙。在天津大沽口，毛泽东赠诗蔡和森等人：“苍山辞祖国，弱水望邻封。”

“家里都还好吧？”

“母亲几个月前去世了。”毛泽东的母亲文七妹于1919年10月5日患淋巴腺炎病逝。“呜呼吾母，遽然而死。寿五十有三，生有七子……”家奠时，毛泽东含泪写下了《奠母文》。听说毛泽东的母亲53岁就去世了，陈独秀沉默了半晌。

“先生关在监狱时，我在湖南办了《湘江评论》，这次带一班湖南人进京请愿，要求驱走张敬尧。”沉默了一会，毛泽东欠身将《湘江评论》创刊号递给陈独秀。“哦！”陈独秀接过《湘江评论》翻了翻，抬起头想了一下，说：“适之在《每周评论》上夸奖你的文字写得好，就是讲这个吧？”

“那是胡先生客气。”毛泽东觉得有点耳热舌干，刚才在雪地里走路，急了点。听毛泽东喉咙有些沙哑，陈独秀示意他喝水。

《湘江评论》创刊于1919年7月14日，在二、三、四期上连载了毛泽东的《民众大联合》长文。胡适在《每周评论》8月24日第三十六号上推荐说，这篇文章“眼光很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确是现今的重要文字”。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举旗人之一，胡适能这样评价一个外地年轻人，确是不多。

趁毛泽东品茶的时候，陈独秀低头看《湘江评论》的目录。窗外的雪发出耀眼的光，将平时昏暗的房间照得通亮。《湘江评

论》创刊号上有一篇署名“泽东”的《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的文章，引起了陈独秀的注意。快速浏览这篇文章时，他的两眼闪现出愉悦的光芒。毛泽东在文章中称赞陈独秀是思想界的明星：“陈君曾自说过，出试验室，即入监狱。出监狱，即入试验室。又说，死是不怕的。陈君可以实验其言了。我祝陈君万岁！我祝陈君至坚至高的精神万岁！”

文章很短，约两三千字。陈独秀很认真地读了一遍，有几处，他还停下来多看了几眼。

“啊，谢谢你。”他抬起头时满面笑容：“适之讲你们出这个刊物不容易，我也这样看。”因为提到自己，陈独秀不好说什么，便换了一个话题。

“只出了五期，就被他们封掉了。”提到《湘江评论》被查封，毛泽东余恨未消。

“张敬尧是个军阀，他不封才怪呢，《每周评论》不也查封了吗？”

“知道了。”说话时毛泽东缓缓地转过身，下意识地望了望窗外。

“其实，《新青年》也是这样，他们放我回家，天天派人来看我在干什么事，和什么人接触，这样不民主，我哪能办好《新青年》呢？”因为提到不愉快的话题，陈独秀的笑容消失了，两眼淡然无神，陷入了思索。

“原来是这样。”毛泽东恍然大悟，想不到刚才敲门时见到的那个人是奉命来监视陈独秀的。“我们这次驱张，先生认为前景如何？”现在毛泽东和陈独秀同命相连了，他在湖南就是被张敬尧撵出来的。到京后，毛泽东到处活动驱张，前日在前门外湖南会馆发起旅京各界公民大会，有千余人参加。

“啊，”陈独秀从沉思中回过神来，才发觉自己沉默已久了。“我觉得你们湖南人的精神十分可贵，懂得生命的价值。个人的生命最长不过百年，真生命是个人在社会上留下的永远生命。”陈独秀被人送进了监狱，虎口脱身不仅未泯灭他的斗志，反而增添了他豁出去的愿望。说来奇怪，都40出头的人了，这几日常想到人生的价值、人生的意义这个年轻人的话题，真正是四十而不惑了。毛泽东默默地听着，他感到这些话不是一个人信口能说出来的，是陈先生坐牢体会出来的。

“先生下一步怎么办？”

“行严来电要我去粤。”陈独秀坐牢时被免去北大文科学长职务，出狱后处于保释之中，人身不自由，很想离开北京。恰好这时广东省长陈炯明支持办西南大学，委托章士钊、汪精卫操办，汪精卫想到了陈独秀。

两人又探讨了毛泽东“改造湖南联盟”的计划，见天色不早，毛泽东起身告辞。陈独秀问有什么事要他办，毛泽东犹豫一下说：“这次驱张，本来希望能得到先生的支持。”说话时，毛泽东看着窗外，“但现在已不敢难为先生了。”

陈独秀知道毛泽东指保释的事，沉吟了一下说：“我很赞赏你们驱张，也赞成你们打算组织‘改造湖南联盟’的计划，我作一篇‘欢迎湖南人底精神’如何？”丁未年，陈独秀在日本《民报》馆讲湖北不出人得罪了黄季刚，这回他想夸一夸湖南人。

“那太好了！”毛泽东喜出望外，脸上放出了红光。

临别时，陈独秀躬身拱手揖谢：“这次坐牢，惊动了这么多人，说明我们反对旧势力是得人心的。”陈独秀想起孙中山为了营救他出狱对许世英讲的话：“你们做的好事，很足以使国民相信，我反对你们是不错的。”许世英是安徽东至人，与陈独秀的老

家怀宁一江之隔。门外的陌生人不知什么时候已经离去，毛泽东伸手与送他出门的陈独秀握别。雪地里留下了一串清晰深沉的脚印，渐渐地消失在胡同的尽头……

毛泽东走后，陈独秀闭上眼睛休息了一会。窗外的雪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停了，雪后初霁，空气格外清新，陈独秀精神为之一振，禁不住睁开了眼睛。毛泽东的到来，像雪后初晴的阳光，给陈独秀沉闷的生活带来了生机。这次见面使他增添了对湖南青年人的极好的印象，趁着余兴未了，他研墨挥毫，写道：“我听了这类声音，欢喜极了，几乎落下泪来！”

◎在我的转变时期，陈独秀 对我印象是极其深刻的

1920年年初，杨昌济逝世，毛泽东协助杨开慧料理了后事。值得欣慰的是，这次毛泽东到北京，公开了与杨开慧的恋爱关系，使杨先生瞑目之前了却了一件心事。杨昌济逝世后，毛泽东与蔡元培、范源濂、章士钊等人发了讣告。陈独秀没有参加发讣告事宜，春节前，他因躲避北京军阀政府的再次搜捕，在李大钊护送下到了上海。

杨开慧和母亲扶灵柩回湖南时，她已深深地爱上了毛泽东，这时她是多么希望毛泽东能和她一道回去啊！用她自己的话说，我觉得为母亲而生之外，是为他而生的。可惜毛泽东被张敬尧通缉，不能回湖南。杨开慧走后，毛泽东陷入了对热恋中的杨开慧的苦苦思念，常常使他彻夜难眠，有时只好披衣在寒冷的夜里无所事事地坐着，有时，甚至到了万念俱灰的地步。“一钩残

月向西流,对此不抛眼泪也无由。”初春时节,毛泽东含泪写下了这首《虞美人》。

春末夏初,驱张运动取得胜利后,毛泽东取道上海回长沙。在上海,毛泽东去拜访了陈独秀。这是他们俩的第三次见面,也是两人在上海的第一次见面。

陈独秀从北京逃到上海,住到了法租界环龙路渔阳里2号。在新居见到毛泽东,陈独秀格外高兴,忙叫高君曼沏了一杯茶。

“先生上次离开北京,我们都替先生捏了把汗。”陈独秀到上海,毛泽东当时并不知道,是事后听李大钊说的。

“幸亏守常护送,不然还不知是什么结果呢。”提到上次脱险,陈独秀感慨不已。沉默了一会,陈独秀突然想起了什么:“杨先生去世,我没有参加悼念活动,十分遗憾。”

驱张的胜利、杨昌济的逝世和与杨开慧离别,这一喜一悲一愁,使毛泽东思绪万端。见毛泽东不语,陈独秀起身给毛泽东斟茶:“驱张胜利了,这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至少你可以回湖南了。下一步有什么打算?”

提到回湖南,毛泽东的嘴角向上扬了扬:“上次和你谈过组织一个‘改造湖南联盟’的计划,类似工读互助团。这次还想听听你的意见。”为了组织“改造湖南联盟”,4月7日,毛泽东在北京拜访了周作人,当时周作人是“中国新村运动”的倡导人。不过鲁迅对此兴趣不大,1919年8月13日,鲁迅给钱玄同去信说,周作人关于新村运动的文章“不是什么大文章,不必各处登载”。

“记得,记得。”陈独秀在北京时就是北京工读互助团的热心人之一。提到这个熟悉的话题,陈独秀又来了精神,他从茶几上拿过烟袋点上锅烟,一边抽一边说:“中国的出路在改造,改造的出路在教育,中国的教育是穷教育,所以王光祈等人提出办工读

互助团,我和子民、守常、适之等人都赞成。”说到这里,陈独秀叩了叩烟锅笑着说,“当时我还捐大洋三十元呢。”

这笔捐款不是小数,相当于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当助理员四个月的工薪。“听说你们意见不一致?”

“适之、守常、季陶、光祈都认为工读互助团办不下去,我认为办得下去。工读互助团不需养家,不需还利息,不被资本家夺去剩余价值,有这么多好处。所以我来上海,极力主张在上海也办一个工读互助团。”提到剩余价值,陈独秀注意到毛泽东眨了眨眼睛,他解释说:“改造中国,要读一点马克思的书。上海有一位青年叫陈望道,比你大几岁,刚从日本回来,他最近在翻译日文本的《共产党宣言》,译完,你可以看看。马克思说,劳动者和资产阶级战斗,不能不用革命的手段去占领权力阶级的地位。我们要干出点明堂,光讲民主和科学不够,我讲民主和科学讲了这么多年,他们说抓你就把你抓起来了,你一点办法也没有,最后还是被人撵出北京。光赶走张敬尧不够,张敬尧走了,还会来李敬尧王敬尧,你今天能回湖南了,说不定明天又被别人撵出湖南。归根到底,我们还要走马克思的路,去占领权力阶级的地位。”说着,陈独秀攥紧拳头在眼前比划了一下。

见毛泽东兴趣很浓地听自己侃侃而谈,陈独秀呷了一口茶,又将自己刚刚读毕的《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史》的感受大大地畅叙了一番。

在毛泽东出门时,陈独秀问可有什么事要他办,毛泽东犹豫了一下,陈独秀在上海的社会主义宣传对他很有启发,他突然想到要回湖南创办一家文化书社,介绍俄罗斯和马克思主义著作。“好啊,如在资金上有困难,我想办法请亚东、群益书社周转。”亚东图书馆汪孟邹是陈独秀的老朋友,周转少量的钱不成问题。

1920年夏天,毛泽东从沪返回长沙。从这时起,毛泽东转变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1936年毛泽东和斯诺谈话时,还提到这次与陈独秀见面对自己的影响:“陈氏的坚决信仰深刻印在我的脑中,成为我一生转变的原因。”“在我的生活中,这一个转变时期,可以说陈独秀对我的印象是极其深刻的。”

◎《共产党》月刊“颇不愧‘旗帜鲜明’”

陈独秀与毛泽东的第三次见面,加深了对毛泽东的印象。他感到见到毛泽东,就有畅谈一番的愿望,内心里就洋溢着一种兴奋和激情。和这位湖南年轻人的交谈,既扩大了社会主义的宣传,又增添了陈独秀对在中国成立共产党的信心。现在,他心目中的毛泽东不仅仅是一个称他为文科学长的学生,而是一个朋友了。

毛泽东一回到湖南,就以新民学会为基础发起成立了长沙文化书社、俄罗斯研究会。上海成立了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后,秋末冬初,陈独秀请毛泽东酝酿成立长沙共产主义小组。

1920年12月2日,已是隆冬时节,但长沙的天气仍很暖和。毛泽东兴冲冲地来到湖南一师附属学校学生张文亮住处:“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仲甫要来长沙参加青年团成立大会。”

“陈先生要来长沙?”张文亮有点不相信。

毛泽东扬了扬手中的信:“陈先生自己讲的。”停顿了一下,毛泽东说,“你把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团章和《共产党》月刊准备好,开成立会时用得上。”

张文亮点头答应了。陈独秀寄给毛泽东的《共产党》月刊和青年团团章，毛泽东临时请张文亮保管。

“我们成立青年团，和森知道了一定高兴。”张文亮知道蔡和森一直关心在国内成立政党的事。1919年8月13日蔡和森给毛泽东写信说：“我意中国于二年内须成立一主义明确，方法得当，和俄一致的党，这事关系不小，望你注意。”

“我想等青年团成立后，再写信告诉他。”

过了两个星期，气候转冷，天空中飘起了雪花。张文亮见陈独秀还没有来，正在着急，这时毛泽东来了。他对张文亮说：“你担心陈先生来不了长沙，真给你猜着了。”说话时，毛泽东拿出一封信递给张文亮，信是陈独秀从上海写来的，只有几句话，大意是说，近日要去广州，不能来长沙参加湖南青年团成立大会了。

“怎么办呢？”张文亮将信还给毛泽东。

“陈先生叫我们自己开成立大会，我想下周就开吧。”毛泽东说。

这一时期，毛泽东心情特别好，除了成立共产主义小组，另一件事是他和杨开慧有情人终成眷属。人逢喜事精神爽，事业的开创和幸福家庭的建立，使毛泽东干劲倍增。在毛泽东努力下，湖南共产主义小组先后发展了何叔衡、彭璜、贺民范等90人参加。1921年1月20日，即旧历腊月十二，毛泽东给蔡和森去信报喜说：“党一层陈仲甫先生等已在进行组织，出版一层，上海出版的《共产党》……颇不愧‘旗帜鲜明’四字（宣言即仲甫所为）。”

1921年6月，毛泽东接到上海共产主义小组通知，约长沙共产主义小组派两位代表出席中国共产党一大。6月29日，毛泽东和不久前被湖南教育厅开除的何叔衡离开长沙赴沪。因到

上海早了些，他们又到南京、杭州去了一趟。

在上海，毛泽东和代表们住在法租界蒲柏路博文女校。天气太热，毛泽东经常在住所内走来走去，一边摇扇一边思考问题，别的代表从窗前经过和他打招呼，他也未注意到。有人告诉李达：“毛泽东是个书呆子，会不会有神经质？”

李达不悦，说：“毛泽东爱动脑筋，他是考虑回湖南如何推动工作。”

陈独秀没有参加一大，他请陈公博、包惠僧带来了自己的意见。听说陈公博、包惠僧是陈独秀派来的广州代表，毛泽东忙问了些陈独秀在广州的情况。

开会时，刘仁静注意到，毛泽东“很少发言，但他十分注意听取别人发言”。选举时，毛泽东和其他代表一样，选举陈独秀为中央局成员。

1922年春天，燕子呢喃着衔泥筑窠，绿柳在春风中飞丝吐絮。毛泽东为了发起反赵恒惕运动，再次来到上海，这次他见到了陈独秀。

“上次你前脚走，我后脚就到上海了。”在渔阳里2号，陈独秀高兴地与毛泽东握手。1921年夏天，毛泽东参加一大后就离开了上海，陈独秀初秋回到上海，两人没有见上。

“当时只知道包惠僧去接你，也不知道你能不能回来，什么时候回来，我也等不及了。”毛泽东笑了笑说。他发现几年不见，穿着黑色对襟夹袄的陈独秀富态多了，向后梳理的头发油光光的，就是同从前不一样。

“一晃有三年没有见面了。你还是老样子。”陈独秀递了一支烟给毛泽东，自己也点了一支，满意地说，“你们湖南的工作开展得不错。”

见陈独秀问湖南工作，毛泽东犹豫了一下。陈独秀回到上海后，因与马林斗气，加上被捕，直到11月才开展工作。但毛泽东一直与陈独秀保持通信联系。1921年秋天，屈子建到上海有事，毛泽东请他给陈独秀捎信，提出派一人到湖南工作。陈独秀接到信后，派张秋人到湘工作。他对屈子建说：“你回湖南时，我再给润之写封信。”初冬，毛泽东又收到陈独秀签发的《中央通告》，要求上海、北京、广州、武汉、长沙发展党、团员若干名。当时数字提得很具体，这次见陈独秀问，毛泽东想大约问的就是这件事。他说：“今年7月前，长沙发展党员30人，发展青年团员2000人没有问题，可惜黄爱、庞人铨被敌人杀害了。”

提到黄、庞之死，毛泽东脸色陡然暗了下来。去年初冬以来，毛泽东多次到安源、衡阳领导建党和工人运动。其中最大的收获是争取到了拥有7000名会员的湖南总工会负责人黄爱、庞人铨加入共青团。1922年1月17日，赵恒惕在布告中说，黄爱、庞人铨“盛倡无政府主义，借总工会名义，煽惑人心……”将他们杀害。

对于足不出湖南的庞人铨，陈独秀并不熟悉，但对参加过北京工读互助团的黄爱，陈独秀是太熟悉了。陈独秀到上海后，还请他帮助誊抄《新青年》要发表的文章。黄爱回湖南后，一直与陈独秀保持通信联系。1920年10月27日，黄爱给陈独秀来信说：“我们小组组织一个劳工团体——湖南总工会——现在已经实现了。寄来两篇新闻，请先生一阅。”几天后，陈独秀将这封信刊在《劳动界》第十三册上了。此事想来，依稀就在眼前。沉默了一会，陈独秀说：“黄、庞是为劳工运动牺牲的。反赵恒惕不光是湖南的事，我很赞成你们的做法，在全国造成反赵恒惕运动。我们要发挥各地党团组织的作用，这次反赵和上次驱张一

样,会胜利的。”毛泽东坚信地点了点头。陈独秀不仅是一个在国内有影响的新文化运动的领导人,而且是共产党的总书记,这次反赵和上次驱张的确不同了。

◎共同主持中央局

1923年6月12日,广东东山恤和院后街一寓所被夏日的阳光笼罩着,到处洋溢着愉快祥和的气息。中共三大正在这里举行。毛泽东因被赵恒惕通缉,于4月底动身前往上海,和马林先期到粤。

陈独秀穿了一件白色无领褂子,脸上洋溢着微笑。因为情绪好,作工作报告时,他常常丢下手中的稿子发挥一通:“上海的同志为党做的工作太少了;北京的同志由于不了解党组织,造成了很多困难;湖北的同志没有及时防止冲突,因而工人的力量未能增加。只有湖南的同志,可以说工作得很好。”批评上海的同志当然包括批评自己;北京的同志涉及守常,想到这位老朋友,他情愿多找些客观原因;批评湖北实际是批评张国焘,二七罢工的失败,主要责任在张国焘;至于湖南,陈独秀对毛泽东的工作十分满意。自春天和毛泽东交谈后,陈独秀在很多场合提到反赵恒惕问题。近日,陈独秀在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还说:“因反对太平洋会议,鼓吹承认苏维埃俄罗斯的示威游行及参加纱厂罢工,青年团团员黄爱、庞人铨二人被督军所杀。”在其他场合,陈独秀还说过,除上海外,全国各地在反对太平洋会议运动中,数湖南工人最猛烈。

一大后,毛泽东在湖南发展党员40余人,成立了中共湘区

委员会。陈独秀尤其赞赏的是，“湖南几乎所有三万人以上的工会，都在我们的控制之下。”说这话时，陈独秀注意了一下毛泽东，他正凝神听陈独秀作报告。坐在他身边的是新民学会的老朋友、去年初冬刚回国的蔡和森。蔡和森当时负责《向导》杂志。

“党内存在着严重的个人主义倾向，党员往往不完全依赖党，对党有意见，即退党，党员自己很爱怀疑。”说这段话时，陈独秀口气变得十分严肃。会场的空气也变得紧张起来。

蔡和森对毛泽东轻声地说：“这是讲李汉俊、李达。”毛泽东点点头。尽管蔡和森回国不久，因为在上海工作，比毛泽东更了解中央局的情况。西湖会议后，李达与陈独秀发生争论，李达骂陈独秀草莽。1922年12月，李达、王会吾夫妇带着刚出生的女儿到长沙，毛泽东请李达任湖南自修大学学长。

二七惨案后，陈独秀对到湖北去指导工作的张国焘十分不满。陈独秀说，张国焘“思想非常狭隘，所以犯了很多的错误，他在党内组织小集团，是一个大错误”。

张国焘不服陈独秀的批评，在李大钊面前嘀咕，不承认搞小集团。大会讨论时，张国焘坚持认为他是对的。

毛泽东发言说：“我原是赞同国焘同志意见的，现在我改变了这一想法，同意接受国际的意见，加入到国民党中去开展工作。”毛泽东列举粤汉铁路、安源煤矿、长沙泥木工人罢工情况，证明加入统一战线的必要性。

选举中央执委时，陈独秀获40票，毛泽东居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之后，得34票。

三大结束后，中央执委在广州东山新河浦“路春园”开会，确定分工，毛泽东被推荐为秘书。

新任委员长陈独秀情绪很好，满面春风：“润之负责党内外

文书、通信,包括开会记录、管理文件,党的一切文件须由我和润之签字。执委会会议也由我们两人召集。”

根据三大制定的《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法》,毛泽东须留在中央局工作,陈独秀说:“你抓紧起草一份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介绍一下三大情况。另外,湖北工运情况要多谈谈目前恢复的情况。”

◎ 阴影

1923年7月18日,广州天气闷热,太阳晒在干巴巴的马路上,像烤烧饼似的,散发着灼热呛人的气味。在通往陈独秀东山寓所的路上,戴着草帽的毛泽东不顾酷热,急匆匆地走着。他刚收到一封迟到的信,这封《对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指示》是共产国际在三大前作出的。信上说,“全部政策的中心问题乃是农民问题”,“只有把中国人民的基本群众,即占有小块土地的农民吸引到运动中来,中国革命才能取得胜利。”

毛泽东接到信后,心里非常高兴,他是一向主张以农民问题为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的。两个星期前,陈独秀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前锋》月刊创刊号上发表了《中国农民问题》的文章,提出中国农民“不容易发生社会革命的运动”,对此,毛泽东是不赞成的,但陈独秀是党的领袖,毛泽东不好驳斥他。现在好了,共产国际的态度和自己一样,他想,仲甫听不进自己的意见,大概共产国际的意见是听得进去的。

见到满头大汗、兴冲冲而来的毛泽东,陈独秀似乎预感到了什么。他知道自己对农民的看法和眼前这位朝气蓬勃的年轻人

是有距离的。果然，他皱着眉头读完共产国际的信后，对毛泽东说：“你也要承认，这派势力目前很乱，特别是乡村的农民，混乱、散漫、软弱，我们要把他们集中起来，通过他们管理国家，确实有许多事情要做。”

陈独秀没有直接否定共产国际的意见，但毛泽东听出了总书记对农民问题的冷淡。陈独秀的这次谈话在毛泽东心目中留下了阴影。突然间他产生了一种回湖南去做点实际工作的愿望。一个月后，毛泽东回湘的机会来了。

1923年9月初，陈独秀在广州东山寓所召集毛泽东、蔡和森、罗章龙、谭平山等人开中央局会议。陈独秀说：“陈炯明企图进攻广州，湘战又起，中央机关在广州已不安全，我主张迁回上海。”

蔡和森说：“谭延闿和赵恒惕争夺湖南，我建议派一位同志去湖南一趟。”蔡和森知道毛泽东希望回湖南。陈独秀转身问毛泽东：“润之的意见呢？”

“我正想利用中央机关迁沪的机会回湘一趟，一则以国民党中央党部派湘筹备员名义协助湘区委筹组湖南国民党组织，一则去看看谭、赵的战况。”毛泽东与赵恒惕是老对手了，1922年春天，为赵恒惕杀害黄爱、庞人铨事件，毛泽东专程到上海和陈独秀交谈过。

陈独秀点点头，对罗章龙说：“润之去湘后，他的秘书工作请你代替。”

罗章龙笑着看了一眼毛泽东，说：“我暂时代替，你快去快回。”蔡和森看了一眼罗章成，说：“不要这样急嘛，润之回一趟湖南不容易，我看上海可不急着来，至少过完春节再来。”陈独秀这才注意到，这届中央局成员，除了他和谭平山外，都是新民学会

会员。

1923年9月16日,毛泽东回到长沙。儿子毛岸英才一岁,毛岸青刚刚出生,但他到底没有能在家里过年。年底,他又赶到广州参加国民党“一大”。

一个寒冷的早晨,毛泽东踏上了东门的路。和杨开慧分手时,妻子眼角眉梢都是忧愁,热泪盈眶。一钩斜月照在门前的横塘上,远处汽笛声声,令毛泽东百感交集。是啊!这汽笛声就要割断他们的绵绵相思的愁绪了。“挥手从兹去。更哪堪凄然相向,苦情重诉。”坐在火车上,毛泽东赋《贺新郎》词一首,抒发与亲人离别时的心情。

1924年早春二月,毛泽东经广州到上海。这次他的身份稍稍有改变,在刚结束的国民党“一大”上,他当上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毛泽东来后,陈独秀立即召开会议,专门讨论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内工作问题。

会议地点定在上海闸北象山路山曾里3号,这里是中央局机关住地,也是蔡和森、罗章龙、毛泽东的寓所。开会时,蔡和森请向警予帮助布置会场和准备茶水。

陈独秀点燃了一支烟,用手拢了拢光亮的头发,清了清嗓子开始发言。看得出,他对刚刚结束的国民党“一大”很满意,胸襟也显得很大度:“刚刚结束的国民党‘一大’虽然有一些意见分歧,但有些问题是微枝末叶,我们的同志须尽力避免不必要的冲突。”见毛泽东在偏头沉思,他接着说,“有些人讲话偏激,对C.P有戒心,我们切不可动不动就认为这些人是所谓‘右派’。”

“如果和国民党中的那些人发生了冲突怎么办?”

毛泽东提到“那些人”之时,思考了一下,他原想用“右派”,

但陈独秀显然接受不了。现在他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又是国民党上海执行部文书科主任。他不可能像陈独秀那样，仍然呆在书斋里看书作文章，遇到国共冲突，他必须拿出主张。

“是啊，润之的话很有道理，我们要有一个明确的态度。”蔡和森赞成毛泽东的意见。

向警予当时也在国民党上海党部工作，她坚决地认为国共冲突避免不了，国民党内存在着右派。

罗章龙无所适从地注视着陈独秀，等他讲话。

“对那些人，我们可以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陈独秀显然听出了毛泽东话里有和自己意见不相一致的东西，但国共两党合作是共产国际的意见，共产国际代表甚至提出“一切归国民党”的方针。他主张和为贵，目的很明确，就是维持国共合作，这总不会违背共产国际的意见吧。

毛泽东深深地吸了一口烟，他觉得事情没有那么简单。可到底怎么发展，自己也没有把握。

随着烟雾的弥漫，毛泽东内心里渐渐升腾起一种困惑。

5月上旬，维金斯基从苏联到上海，带来了明确的意见，共产国际提出：“共产党员要积极支持左派，反对右派。”

陈独秀心情压抑了一阵，便豁然想开了，既然是共产国际的意见，无条件执行就是，何况他内心深处就是反对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想到这里，他问脸色早已是多云转晴的毛泽东：“国际提出积极支持左派，反对右派，你怎么看？”

听到这个令人兴奋的消息，毛泽东终于吐出了心中的闷气。见陈独秀明知故问，便笑着说：“我认为国际的指示是不错的，现在看来国民党内部确实存在着反对 C.P 的右派，如果我们不支

持左派去打击右派,右派会骑到我们脖子上来,最终要把C.P挤出国民党。”“嗯!”这次陈独秀毫不犹豫地点了点头:“5月10日我们开一个中央执委扩大会议,重新统一大家的思想。”他本想用“纠正”二字,但中途改了口,用了“重新”统一大家思想这个词。他是一个要面子的人,除了个人的面子,还有总书记的权威问题,他不想那么快就承认自己错了。他宁可让事实冲淡自己过去的失误,何况有些东西不一定是自己错。

随着天气的转暖,国民党右派也加快了进攻的节奏。中共中央五月扩大会议刚结束,国民党右派就嗅出了C.P工作方针有重大变化。作为回应,6月1日,孙科等人提出“制裁共产党分子案”,6月18日,张继、谢持、邹鲁、邓泽如等人又提出反对共产党所谓“弹劾案”。

7月上旬,毛泽东建议中央发一个通告,表明中央的态度。在国民党上海党部,毛泽东和叶楚傖的矛盾很大。支持毛泽东的有恽代英、施存统、沈泽民、邓中夏、王荷波、向警予等人。

对于右派的进攻,陈独秀也很反感,不久前他给维金斯基去信提出:“我们不能无条件无限度地支持国民党,而必须支持左派的各种活动,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我们等于支持了敌人。”另一方面,国共合作才开始,他担心把事态闹大。

得到陈独秀同意后,毛泽东连夜起草中共中央第十五号通告,他写道:“巩固我们在国民党左翼之力量,尽力排除右派势力侵入这些团体。”

看毛泽东交来的初稿时,陈独秀说:“这不像你的字。”字是小楷毛笔工工整整誊抄的,小巧清秀,不像毛泽东的字龙飞凤舞。

“是开慧抄的。”毛泽东笑着说。一个月前,杨开慧携两岁的

毛岸英和不满周岁的毛岸青从长沙到上海，帮助毛泽东做些收发、誊抄工作。杨开慧来后，尽管生活负担加重了，但毛泽东的精神愉快多了，缓解了与右派斗争造成的精神紧张。

“好哇。”陈独秀一边笑着说，一边看文稿。文稿不长，陈独秀抽出毛笔修改了几个地方。陈独秀写到，“为国民党革命的使命计”，对于国民党右派的分裂政策，“不可隐忍不加以纠正”。毛泽东发现，陈独秀是在缓和语气。

陈独秀想缓和同右派的矛盾，但毛泽东却缓和不了。不久，毛泽东与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右派叶楚傖斗争公开化。在叶楚傖的打击下，共产党人在上海执行部处于被动的地位，许多共产党员离开了上海执行部。

12月底，毛泽东对陈独秀说：“近来身体虚弱，睡眠不好，想请假回湖南养病。”陈独秀见毛泽东劳累过度，已很瘦弱，说：“和森身体已大不好，你也需要注意身体，等身体好了，即回沪工作。”

毛泽东走后不久，中共中央于1925年1月11日召开四大，新的中央局成员是陈独秀、彭述之、张国焘、蔡和森、瞿秋白，陈独秀为总书记。毛泽东没有进中央局，陈独秀与毛泽东工作联系最密切的时期结束了。

◎谁主沉浮

1925年秋天，已是深秋季节，毛泽东独自来到橘子洲头。就要离开长沙去广州了，远处层层叠叠的枫林将群山染成火红一片，大大小小的船只在碧绿的江水中竞渡，雄鹰在高空中展

翅,鱼群在水底畅游,望着这片熟悉的土地上万物竞自由的图画,毛泽东心潮起伏,浮想联翩。

在湖南工作的近10个月里,他对陈独秀关于农民的态度意见加深了。1923年,陈独秀写了《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和《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两文,将国民革命看成是资产阶级革命,领导阶级是资产阶级,胜利也是资产阶级的胜利,他顶多只注意了工人运动,而忘记了农民。当时毛泽东总觉得不对头,但问题出在哪里,他需要一个认真的思索过程。陈独秀是中央局领袖,否定领袖的观点,涉及到陈的威信,而且问题重大,涉及中国革命的发展方向、动力和方针等一系列基本问题。将来的道路怎么走,现在他感到清楚多了,即不能离开工人特别是农民,为此他专门写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寄给了上海的中央局。陈独秀会怎么看呢?“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毛泽东带着这个疑问到了广州。

接到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陈独秀不高兴了。毛泽东写道:“中国革命亘30年而成效甚少,并不是目的错,完全是策略错。所谓策略错,就是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陈独秀用毛笔在这些地方画了杠杠,旁边还加上一个个问号。毛泽东认为我们的策略错了,忘记了农民,什么时候我们忘记了农民呢?总要有个分寸嘛!搞资产阶级革命,你要大力组织农民,这不是激进又是什么呢?

一年前邓中夏在《我们的力量》一文中提出了工人阶级是当前革命的领导阶级,毛泽东现在又提出农民是革命的基本力量。这两篇文章从根本上推翻了自己《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和《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两篇文章的核心观点,差不多两年来,自己就是按这两篇文章的思路在分析问题、处理

问题,如果这两篇文章被否定了,意味着什么呢?

当时自己拒绝在中央机关刊物《向导》上刊登邓中夏的文章,现在,他相信毛泽东的文章和邓中夏的文章一样,观点有严重的问题,发表出来容易引起我们的同志的思想混乱,也会引起国民党的误解。戴季陶正在找机会赶我们出来。我们现在发表这样的文章,搞激进的土地政策,这不是找话给人家讲吗?陈独秀用力吸了一口烟,他不想深想下去。

很快,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在12月1日出版的《革命》上发表了。《革命》是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司令部办的刊物。陈独秀见到《革命》月刊第四期时,半天没有言语。在和陈独秀短暂无言的对视中,蔡和森发现,陈独秀、毛泽东之间的裂隙形成了。

毛泽东对这件事也有难忘的印象,因为这不光是发表一篇文章的小事,而是关系到两人在重大问题上观点的分歧和相互之间的排斥。10年后,毛泽东于1936年对斯诺说:“大致在这个时候,我开始不同意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政策。我们逐渐分道扬镳了,虽然我们之间的斗争直到1927年才达到高潮。”

12月下旬,张国焘受陈独秀和中央局委托从上海赶到广州,参加国民党“二大”。临行前,陈独秀关照张国焘去广州,要多做些说服代表的工作,说现在是革命处于低潮时期,因此在统一战线上应采取让步政策。

张国焘到广州后临时召开党的会议,他拿出陈独秀的信说,仲甫的意见,要把国民党的各方面人物都包括进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中去,这样才能团结国民党。

出席张国焘召集的临时会议的都是党的著名活动家,有毛泽东、周恩来、吴玉章、陈延年、聂荣臻、萧楚女、董必武、林伯渠、

恽代英、张太雷等人。陈独秀的意见引起了大家的不满，会上一时议论纷纷。

毛泽东是国民党代理宣传部长，又是国民党“二大”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5个成员之一。他说：出席“二大”的代表278人，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有168人，中派有65人，占了绝大多数，右派仅45人，这是大家努力的结果，如果我们现在不利用这个好形势，孤立右派，而是将各方面人物选进来，将来只会给我们的工作带来损失。

陈延年对父亲陈独秀的让步也不满，他说：“这是要不得的安抚政策。”

听了一会，张国焘见气氛不对，四方脸绷得紧紧的说：在革命低潮的时候，要团结国民党中的各种人，包括右派进国民党中央委员会。这不只是仲甫的个人意见，也是我们中央局的意见，执行这个意见事关党的纪律。

在陈独秀、张国焘干预下，国民党“二大”选举的36名中央委员中，仅7人是共产党的代表。毛泽东没有买陈独秀的账，在大会上没有投国民党右派的票，并以173票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毛泽东担心让步会带来工作的损失，不久就被中山舰事件验证了。事件发生时，在广州继续任国民党代理宣传部长的毛泽东向苏联军事代表团的季山嘉建议：“应动员所有在广州的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到叶挺独立团驻地肇庆开会，通电讨蒋，削其军权，开除其党籍。”

季山嘉问陈延年是什么意思，陈延年表示赞同毛泽东的意见：“现在反蒋对我们有利，虽然一军首脑不反蒋，但一军中的政治骨干大都是共产党员，是反蒋的，其他军首脑是反蒋的。”季山嘉知道，当时在广东除了一军还有另外五个军。

季山嘉和苏联军事代表团其他成员商量，不同意毛泽东、陈延年反蒋的建议，他说：反击蒋介石是件大事，并不好使国共统一战线破裂，需要由上海的中央局做出决定。而且此事重大，要听取共产国际的指示。

在上海的陈独秀也不敢同意反蒋，他想等待莫斯科的意见。因此，毛泽东、陈延年、周恩来向陈独秀的上海中央局请示时，遭到了冷遇。当时毛泽东和周恩来在第二军副党代表李富春家商量，将第一军被迫退出的共产党员派到其他军队中去，建立叶挺独立团式的军队，也被陈独秀否决了。

周恩来等共产党员从一军中退出来后，毛泽东知道，自己在国民党宣传部的时间也不会太长了。1926年5月，蒋介石提出“整理党务案”，矛头直接对准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中的共产党员，鲍罗廷、陈独秀、张国焘却主张接受“整理党务案”。5月中旬，鲍罗廷、张国焘召集彭述之、陈延年、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开会，鲍罗廷说：“广州有可能发生右派政变，此时应该支持蒋介石的革命独裁。”

毛泽东极力反对：我们不能怕右派政变而去迁就他们，蒋搞的不是革命独裁，这样下去，我担心蒋介石会越走越远。

陈延年、周恩来支持毛泽东的主张，张国焘见状说：“我赞成苏联顾问的意见，这也是仲甫的意见。”说着他和彭述之对视了一下。

彭述之忙说：“我赞成特立的意见。这是国民党的会议，C·P应尽可能站在从属的地位，不可反客为主。”

张国焘对彭述之的讲话很满意。他见没有人吭声，说：“如果大家没有意见，我看大家签字表态，这样就是一致意见了。”毛泽东对张国焘用签字来统一大家意见的做法不满，他认为这不

光明磊落。

张国焘发现个性倔犟的毛泽东没有签字。

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在讨论“整理党务案”时，毛泽东没有举手。既然顶了，那就顶到底。邓颖超清楚地记得，当时除毛泽东没有举手外，还有何香凝、柳亚子没有举手。

会议结束后，毛泽东的国民党宣传部代理部长一职由顾孟余代替。毛泽东从内心里感到，这不是个人的损失，而是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已经形成，革命危机加深了。

◎分道扬镳

1926年12月上旬，陈独秀从上海到汉口，主持中共中央汉口特别会议。毛泽东以中共中央农委书记身份也从上海到汉口，出席了这次会议。

毛泽东是在上月到上海就任中央农委书记的。这个组织机构一直未健全，陈独秀同意毛泽东就任这个职务，是经过多种考虑的。

前年底，毛泽东以“养病”为名，回韶山组织发动农民运动。中山舰事件前一天，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开会确定毛泽东出任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使这位擅长农民运动的专家有机会多接触农民问题。毛泽东带头讲授长达23小时的《中国农民问题》这门课。并在5月召开的广东省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上演讲。陈独秀同意毛泽东出任中共农委书记的另一个原因是，自己因病没有参加的中共中央北京特别会议强调要注意农民运动。

汉口中央特别会议并没有弥合陈独秀与毛泽东的分歧，相

反两人在农民问题上的矛盾更加突出了。陈独秀在《政治报告》中说：“蒋介石军事政权由于害怕民众运动逐渐右倾，而民众运动逐渐左倾。因此，我们要把反对这种倾向作为党面临的中心任务。”

李维汉是中央委员，又是湖南省委书记，他和毛泽东主张在湖南进行土地革命。

陈独秀听不进去，湖南工农运动已经“过火”，再继续下去，会妨碍统一战线，动摇北伐军心。

这时鲍罗廷昂着头说：“中国没有土地问题。搞土地革命，缺乏干部。”

会议室里烟雾缭绕，一片窃窃私语。毛泽东知道，鲍罗廷讲话有一个背景。不久前，共产国际给中共中央拍来电报，指示“在占领上海以后，暂时不应加强土地运动”。但那是讲占领上海以后的上海，并不是讲现在的湖南呀！毛泽东想申辩，这时维金斯基又发言了，他也支持陈独秀、鲍罗廷。

毛泽东和李维汉关于土地革命的建议被视为激进，被大会否决了。

最使毛泽东不能接受的是，会议根据陈独秀对形势的分析，提出反对“耕地农有”以换取蒋介石由右向左，同时扶持汪精卫取得国民党中央、国民政府和民众运动的领导地位，用以制约蒋介石。

毛泽东不断地吸烟，脸色因苍白显得更加瘦削了，但黑白分明的双眼依然光亮有神。本来是反右的会议，现在成了纠左的会议了。他不能接受陈独秀和汉口会议关于农民问题的分析。特别是陈独秀对湖南工农运动“过火”的分析，他想回一趟湖南，作为农委书记，他需要尽快掌握农民运动的第一手材料。

凑巧得很,这时湖南省农民协会给毛泽东拍来电报,请他回湘指导工作。电报上面写着18个字:“先生对于农运富有经验,盼即回湘,指导一切。”陈独秀同意毛泽东回湘一趟,他想,到处都讲湖南农运“过火”,毛泽东是不见黄河不死心的,让他实地检查一下也好。

元旦前,陈独秀赶回上海,当他看完谭平山从苏联带回共产国际第七次扩大会议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时,不禁大吃一惊。斯大林批评了那份暂不加强土地革命的电报,提出土地问题是当前工作的中心问题。原来毛泽东并没有错,共产国际的指导像天上的云彩变幻莫测,使陈独秀大伤脑筋。一个月后,陈独秀不得不签发了《中央政治局对于国际第七次扩大会议中国问题决议案的解释》,承认“在今日以前,我们有一个根本错误”。

◎是“好得很”还是“幼稚”

12月17日,毛泽东和杨开慧一起回到长沙,他不知道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已传到中国,汉口特别会议关于农民问题的决议使他窝了一肚子火。湖南农民运动到底过不过火,这不仅仅是他个人的左倾问题,而是关系到中国革命的发展方向问题,他下决心实地考察一番,用事实回答陈独秀等人的责难。

元旦一过,毛泽东即以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身份,冒着严寒视察了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农民运动,直到2月5日即农历正月初四才结束考察。一个多月的考察,使毛泽东对中国农民运动的认识有了一个飞跃。

陈独秀缩手缩脚，使人窝火。相反，湖南农民运动如火如荼，让人扬眉吐气。指导机关与下层民众的这种反差，使毛泽东十分忧虑。春节刚过，他便匆匆从长沙赶到汉口，着手写《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毛泽东不仅急着赶写这份考察报告，而且极希望早日影响全党。所以他到汉口后就给在上海的中央局写了一封信，说：“详细情形，当从明日起三、四日内写出一个报告送兄处察核，并登导报。”看得出，和《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相比，毛泽东更看重这篇文章。他明确希望在《向导》上发表。

正月十五日晚上，汉口的大街小巷零零落落地响起了爆竹声，窗前屋后升腾起一堆堆烧纸钱的烟雾。望着冉冉升起的一轮如盘的明月，毛泽东这才知道，今天是完年的日子。熬了几个通宵，《视察湖南农民运动的报告》终于写完了。在报告里，他高度赞扬了湖南农民运动“好得很”，而不是“糟得很”，“贫农乃革命先锋”，“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毛泽东写这些话时，眼前跳跃着湖南农民革命一幕幕动人的场景，心中激荡着一种对革命必胜的豪情，他预感到建立在中国农民革命基础上的社会主义事业一定能够胜利，而成就中国革命事业则离不开中国农民的力量。另一方面，他对攻击农民运动为“痞子运动”、“惰农运动”深感气愤，特别令他气愤的是，这些攻击得到了党内一部分人的赞同。而且，陈独秀、张国焘、彭述之等人高高在上，他们能否接受自己的意见呢？

毛泽东的担心并不是多余的。陈独秀见到毛泽东这篇满腔热情支持农民广泛地重新分配土地的文章，一种不悦之情隐隐在心中升腾，这不是针对自己的“幼稚”说又是什么呢？平心而论，陈独秀不愿意在《向导》上刊登这篇火药味十足的文章，因为

这样做会妨碍国共合作,而且共产国际常常叫人捉摸不透,说不定什么时候又来了一个新的指示,完全推翻以前的看法呢。

但不刊登这篇文章,又说不过去。共产国际新近指示主张土地革命,这说明在湖南乡村作考察的毛泽东并没有错,毕竟毛泽东的考察报告与共产国际的指示得出了完全相同的结论。思考再三,陈独秀同意刊出其中的部分章节。

1927年3月,桃红柳绿,万木竞秀,是江南春色最浓的季节。但刚到汉口任中宣部部长的瞿秋白心情不好,感到更多的却是春寒料峭和乍暖还寒,在很多问题上他与陈独秀已形成了根本分歧。值得高兴的是,在武汉,他与毛泽东有着共同的一致看法:革命已经到了危急关头。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的想法:对陈独秀的错误不能再迁就了。这使他在最苦闷的时候增添了一份力量。

瞿秋白一口气读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后,因为兴奋,苍白的脸颊微微泛红。这份报告是中国当前最急需的材料之一。仲甫不同意在《向导》上全文刊出,是错误的。他指示长江书局将《考察报告》印成单行本。

瞿秋白正忙着写《第三国际还是第零国际》的小册子,百忙中,他连夜作了一篇序,说:毛泽东的这个小册子和彭湃的《海丰农民运动》一样,中国的革命者个个都应该读一读。中国革命家都要为三万万九千万农民说话做事,这样做才是开始,我们做得还远远不够。真正的革命家是不应该反对刊印这个小册子的。瞿秋白一边写一边咳嗽,近一个时期,他的肺病又加重了。

毛泽东的这篇文章的单行本不久就传到俄国,刊登在莫斯科出版的《共产国际》上。

◎烟雨莽苍苍

1927年4月27日,正是雨水盈盈的暮春时节。“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大革命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为挽救革命,中共中央在武昌举行五大。

每天都传来党的活动分子被杀的消息,白色恐怖笼罩着上海、广州等地,与会的代表们对陈独秀的右倾政策怨声载道。毛泽东向大会提交了立即普遍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方案,这是毛泽东、彭湃、方志敏等人在大会前联合制定的。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夕,陈独秀仓促和汪精卫同船由沪到汉。现在,他最担心汪精卫右倾。因此,见到毛泽东等人的提案,陈独秀连连摇头:此时解决土地问题,必然引起国民党左派内部新的纠纷。

会议空隙,毛泽东在校园里散步。他感到和陈独秀的差距越来越大,老头子根本不懂农民在革命中的地位,看不起农民运动,我说农民运动好得很,他说过火了。向西北去不是逃避土地革命又是什么呢?想到这里,毛泽东伸脚踢了一下鹅卵石路面上的碎石。

陈独秀认为毛泽东推动了湖南农民运动,加剧了武汉的困难形势。大会选举结果,毛泽东只当上了中央候补委员。

使毛泽东一再失望的陈独秀仍然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心情苍凉,一时不知如何是好。一个烟雨苍茫的日子,毛泽东来到龟山蛇山紧锁的长江岸边,昔日的黄鹤已杳然无迹,如今这里只有游客过往,联想到近来发生的一连串的

事,毛泽东禁不住自点了几碟小菜,乘着酒兴,吟诗一首:

茫茫九派流中国,
沉沉一线穿南北。
烟雨莽苍苍,
龟蛇锁大江。

黄鹤知何去?
剩有游人处。
把酒酹滔滔,
心潮逐浪高。

5月6日,即五大闭幕当天,土地委员会举行最后一次扩大会议^①,讨论《解决土地问题决议案》。这次陈独秀、鲍罗廷也参加了。

天气已很燥热,陈独秀说话时解开了对襟:“小地主还是划入小资产阶级左派的好,应提及小地主及革命军人的土地不在没收之列,使他们放心,若不提及,他们会不安的。”看上去他很疲劳,脸色也不好看。

顾孟余听了微微地点点头,当年他们曾共同执鞭北大,多少有些故旧感。1926年,他和徐谦到苏联考察,因此,和陈独秀又多了些共同语言。

毛泽东见顾孟余、徐谦洋洋自得,皱了一下眉头。他们赞赏

^① 据《毛泽东年谱》记载,毛泽东未出席本次会议。另据《陈独秀年谱》记载,毛泽东出席了这次会议。本书依据《陈独秀年谱》。

陈独秀的话,是因为陈独秀企图以农民利益为代价,拉住汪精卫集团右倾。

“我还是主张政治没收、军事没收同时并举。”毛泽东发言时没有看陈独秀、鲍罗廷的脸色。国民党中央土地委员会是4月2日在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上决议成立的。毛泽东在此之前已参加过几次会议,他说土豪劣绅军阀等的土地要没收,这属于政治没收;自己不耕种而出租给他人种的田,也要没收,这叫经济没收。

陈独秀用心听别人发言,默默地吸着烟,他已习惯听不同的意见。毛泽东的意见明显和自己唱反调。当时谭延闿主张以“逆产处分委员会”名义分配土地,陈独秀赞成谭延闿的意见:土地革命应由国民党农政部督促实施,土地革命一切法规,要呈请国民党中央党部批准。徐谦的脸上露出了宽慰的笑容。他和顾孟余低头咬了一会耳朵,看得出他们很满意陈独秀的话。谭延闿的目的是限制土地革命,毛泽东则主张土地革命的办事机构是“分配土地委员会”。

谭平山和邓演达在小声交谈,鲍罗廷支持陈独秀的意见,说小地主及革命军人的土地均应加以保障。

徐谦欠了欠身,说:“润之讲政治没收,我是同意的,但经济没收是不是打击面太大,我怕不少人难以接受。”在坐的人中,他的年龄偏大,又是前清进士,汪精卫回国前,他任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临时联席会议主席。

结果,政治没收汪精卫也不愿意接受。

7月4日,毛泽东在汉口参加了中共中央常委扩大会议。陈独秀、李维汉、邓中夏、蔡和森、柳直荀、周恩来、戴述人、张国焘等人出席了会议。

不久前,陈独秀和毛泽东之间又有一次不愉快。许克祥在长沙叛变革命后,陈独秀劝毛泽东去四川,但毛泽东希望回湖南工作。陈独秀便同意他去湖南任临时省委书记。

毛泽东回湖南后,从郑州开分共会议归来的唐生智企图加害毛泽东。毛泽东立即组织了农民武装,准备推翻唐生智在湖南的统治。唐生智见来头不对,急电汪精卫,说毛泽东要武力推翻他。陈独秀知道后发了一通火,说“这一手来不得”,又把毛泽东从湖南调回汉口。这次开中央常委扩大会议,陈独秀和毛泽东还是谈不到一块。陈独秀说:“湖南农协要改组,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可派人去改组。”

毛泽东是农民协会会长,说:“派一左派同志为好。”

讨论工农武装出路时,陈独秀说,省党部应特别注意已经叛变革命或即将叛变革命的“各军招兵问题,我们可以不客气的多将群众送给他们,国民革命军招兵时,农民协会会员和自卫武装可应征加入”。

毛泽东不同意,“这样不行!工农武装改成安抚军合法保存,此项实难办到。应该上山,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不保存武力,则将来一到事变,我们即无办法。”见大家对此有兴趣,毛泽东提出办军事训练班。

蔡和森发言支持毛泽东的意见:“农民自卫军上山更好些,同时我们要迅速发展乡村中党。”

再问到陈独秀,陈答:“同意上山。”

◎枪杆子里出政权

1927年8月7日，正是汉口一年中最热的日子之一。上午，一所苏式公寓的会客厅里满满当当地坐着21个人，中共中央正在这里举行紧急会议。与以往不同的是，没有邀请陈独秀参加会议。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不久，即汪精卫“七·一五”政变前夕，鲍罗廷根据共产国际指示改组了中共中央政治局，解除了陈独秀中共中央总书记职务，完成了他在中国的最后使命。

大革命失败后，武汉处于白色恐怖之中，到处是枪杀共产党人的枪声。出席会议的代表脸色凝重，会议笼罩着紧张的气氛。在共产国际代表罗米那兹发言后，代表们休息半小时吃饭，然后又接着开会。

这时，毛泽东发言。毛泽东是乐观派，他感到会场的空气太压抑了，因此他讲话时用了诙谐的语言：“大家的根本观念都以国民党是人家的，不知它是一架空房子等人去住。其后像新姑娘上花轿一样勉强挪到此空房子去了，但始终无当此空房子主人的决心。我认为这是一大错误。其后有一部分人主张产业工人也加入，闻湖北亦有此决定，但仅是纸上空文，未能执行。过去群众中有偶然不听中央命令的和住了国民党的下级党部，当了此房子的主人翁，但这是违反中央意思的。直到现在，才改变了策略，使工人群众进国民党去当主人。”

大家都被毛泽东的连珠妙语惹笑了，会场的紧张气氛顿时松弛下来。见大家兴致很高，毛泽东又接着讲农民问题。“农民要革命，接近农民的党也要革命，但上层的党部则不同了。当我

未到长沙之先,对党完全站在地主方面的决议无由反对,及到长沙后仍无法答复此问题。直到在湖南住了三十多天,才完全改变了我的态度。我曾将我的意见在湖南作了一个报告,同时向中央也作了一个报告,但此报告在湖南生了影响,对中央则毫无影响。广大的党内党外群众要革命,党的指导却不革命,实在有点反革命的嫌疑。这个意见是农民指挥着我成立的。我素以为领袖同志的意见是对的,所以结果我未十分坚持我的意见。”

坐在罗明那兹身边的瞿秋白不住地点头,他知道毛泽东讲的是《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台下出现了一阵窃窃私语,瞿秋白用俄语和罗明那兹小声地说着什么。

接下来毛泽东开始谈武装斗争问题。对此,毛泽东对陈独秀的意见更大。一个月前,陈独秀将毛泽东从湖南调回汉口,就是怕他搞武装斗争。倘若不是陈独秀抵制,“七·一五”政变给革命带来的损失也许要小得多。“从前我们骂中山专做军事运动,我们则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蒋唐都是拿枪杆子起家的,我们独不管,现在虽已注意,但仍无坚决的概念。比如秋收暴动非军事不可,此次会议应重视此问题,新政治局的常委要更加坚强起来注意此问题。湖南这次失败,可说完全由于书生主观的错误,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提出枪杆子里出政权的话题,他自己和在坐的人都没有意识到,这句十分平常的话对中国前途的意义。

八七会议后,瞿秋白建议毛泽东去上海中央机关工作。但毛泽东说:“我要跟绿林交朋友,我定上山下湖,在山湖中跟绿林交朋友。”

8月12日,毛泽东离开汉口去长沙,筹备湘赣边界秋收起

义。9月10日,陈独秀离开武汉去上海隐蔽。两人从此各奔东西,再未见面。

◎仲甫真岂有此理

1937年9月上旬,毛泽东在延安收到林伯渠从西安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拍来的电报,说陈独秀出狱后想回延安,因事关重大特给中央请示。

接到电报后,毛泽东点燃一支烟陷入了沉思。陈独秀三个字引起了他对往事的回忆。中东路事件前后,陈独秀陷入了托派活动。1929年11月15日,中央作出开除陈独秀党籍的决定,当时和朱德、陈毅在井冈山根据地的毛泽东,对陈独秀走到这一步大吃一惊:仲甫真岂有此理!他没有想到陈独秀会公开走向反对共产国际和六大路线。记得他给当时的中央负责人李立三拍电报说:“中央的决议文件已经到此,我们当普遍地宣传。”李立三是当年毛泽东以二十八画生名义募友认识的,因为李立三态度含糊,毛泽东称他为三个半朋友中的半个朋友。

1930年4月,即陈独秀被开除党籍的第二年,陈独秀在《关于所谓“红军”问题》一文中,骂部分红军为“土匪”与“溃兵”,唯独在讲朱德、毛泽东的第四军时,陈独秀用了“略”字。这件事给毛泽东的印象很深。红四军的家底是南昌起义部队和秋收起义的农民军,陈独秀当时是赞成“上山”的,他不说他们是“匪”、“溃兵”,思想深处多少还有一点“恻隐”之心。

但陈独秀搞托派的错误是原则性的,他必须承认错误,如果还是当年搞家长制那个脾气,他还是不到延安来的好。如果承

认了错误,为什么不能和他合作呢?现在和蒋介石都合作了,还有什么人不能合作呢?毛泽东对陈独秀在大革命后期给革命带来的损失仍记忆犹新。1936年斯诺曾问他:“谁应该对1927年共产党失败和南京当局的胜利承担主要责任?”他毫不犹豫地回答:“罪魁祸首是陈独秀,他的‘动摇不定的机会主义’使党丧失了果断的领导,他的指导路线显然在一个时期之内造成很大灾难。”

总的来看,陈独秀这个人,前半截是好的,后来的路没有走好,走到反对派那里去了,这就成了敌我矛盾。毛泽东刚刚写了《矛盾论》,在谈非对抗形式转化为对抗性矛盾时,他是把陈独秀作为一个典型例子的:“我们党内许多同志的正确思想和陈独秀、张国焘等人的错误思想的矛盾,在开始的时候也没有表现为对抗的形式,但随后就发展为对抗的了。”

陈独秀会不会又成为对抗性矛盾转化为非对抗性矛盾的例子?毛泽东想,这就要看陈独秀本人的态度了。对抗性也是相对的,不能套用。

毛泽东和张闻天商量了一会,给林伯渠发了一个电报,提出陈独秀回党工作的三个条件:一、公开放弃并坚决反对托派的全部理论和行动。并公开声明同托派组织脱离关系,承认自己过去加入托派之错误。二、公开表示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三、在实际行动中表示这种拥护的诚意。

张闻天是留苏“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曾经是王明、博古的好朋友,但没有和陈独秀共过事。

毛泽东知道,叫陈独秀公开承认自己的错误是困难的。这也是给他出了个难题,也叫因果循环,当初他在党内倚老卖老搞托派不也给我们出了难题吗?而且,这不只是陈独秀一个人的

事，党不是菜园子，不能想走就走，想来就来。

博古在南京傅厚岗八路军办事处也接到毛泽东、张闻天的电报，他劝从西安回到南京的罗汉多做陈独秀的工作，“本想和陈独秀谈一次，但因为自己党龄太浅，与独秀个人没有私人接触，恐难于谈到任何具体结果。”

罗汉问：“由毛泽东和陈独秀谈可否？”

博古连连摇头：“如果由润之来谈也不适宜，因为他们两人的个性都很强，都有闹翻的危险。不如候周恩来南下后，约他一同去谈，成绩或者会圆满些。”

1938年4月，张国焘叛逃到汉口后，拜访了陈独秀。张国焘离间说：他们是不成心要你回去的。再说回去了你也不好受，今天写检查，明天作交待，永无宁日。

张国焘在长征途中另立中央，陈独秀知道了一些，这使他想起张国焘在二大前后搞小组织的事，自己在三大上还正儿八经地点名批评了他。现在想想已无话可说。

“写检查是扯不上的，但不要搞无中生有。”陈独秀心里想。年初，王明、康生在报上指名道姓说他是拿日本人津贴的汉奸，这就从根本上打消了他回延安的念头。

张国焘见时机成熟，激动地说：先生何不成立第三党，另立大旗？

陈独秀听了，望着张国焘淡淡地说：“我们再搞，能搞得比毛泽东现在还要好？”

张国焘碰了软钉子，又扯了一会不痛不痒的话，便扫兴地告辞了。

◎将来“要讲一讲他的功劳”

陈独秀拒绝了中央提出的三个条件后，毛泽东尝试将其对抗性矛盾转化为非对抗性矛盾的努力也付诸东流，陈独秀的事也渐渐为抗日战争的炮火所冲淡。1939年5月4日，延安报纸请毛泽东写一篇文章纪念五四运动20周年，这使毛泽东又一次记起了陈独秀。20年前，他在岳麓山下，著文盛赞狱中的陈独秀是思想界的明星。20年过去了，大浪淘沙，许多事情发生了变化，陈独秀当初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现在却走到了革命的对立面，这真是没有想到的事。想到这里，毛泽东提笔写道：“陈独秀不是也‘信仰’过马克思主义吗？他后来干了什么呢？他跑到反革命那里去了。”

秋天，中央决定出版《共产党人》刊物，毛泽东答应亲自写发刊词。《共产党人》与《共产党》月刊只差一个字，这件事又唤起毛泽东对陈独秀的记忆。当年他给在法国勤工俭学的蔡和森写信，称赞《共产党》月刊旗帜鲜明，并告诉他宣言是陈独秀所写，也不过才18年时间，当年写《共产党》宣言的陈独秀在中国发起成立了共产党，但又是他给中国革命带来了巨大损失。这是一个多么深刻的教训啊！毛泽东写道：“过去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特点，就是引导无产阶级适合资产阶级一群一党的私利，这也就是第一次大革命失败的主观原因。”

1942年，是抗日战争最困难时期，为了适应抗日战争形势，提高高级干部的素质，延安开展了整风运动。毛泽东这一段时间也特别繁忙，经常被请到中央党校去讲话或参加中央组织的

各种活动。延安整风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总结中国共产党 20 多年的经验教训。因此这一段时间，毛泽东谈到陈独秀的话题也特别多。

2 月的一天，延安中央党校举行开学典礼，毛泽东作关于《整顿党的作风》的演讲。抗日战争需要全国一盘棋，统一各级干部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的思想是延安整风运动的目的之一，因此还是毛泽东当年在井冈山进军路上提出的“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的老话题。在党的历史上，陈独秀闹过独立性，拒绝赴莫斯科参加六大，搞一帮人签名写《我们的意见书》；张国焘闹过独立性，二大前后闹过，长征路上闹过，因此毛泽东把这两个人作为反面例子点了出来：“托洛茨基、布哈林、陈独秀、张国焘是大不老实的人，为个人利益为局部利益闹独立性的人也是不老实的人。”台下的人更熟悉的是张国焘，他们不难听出，毛泽东讲张国焘时话要重得多。

在毛泽东心目中，陈独秀和张国焘是大有区别的。这次讲话一个月后，毛泽东于 3 月 30 日在中共中央学习组作《如何研究中共党史》的讲话时说：“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现在还不是我们宣传陈独秀历史的时候，将来我们修中国历史，要讲一讲他的功劳。”当时抗日战争还处于相持阶段，此时讲陈独秀的历史功绩，是不合时宜的。

◎“太着重了个人的责任”

在陈去世前几个月，即 1942 年 1 月 6 日，陈独秀在给友人

信中提到毛泽东：“以前毛和我私人无恶感，我认为他是一个农运中实际工作人员……”陈独秀最后一次提毛泽东，是和何之瑜于同年4月26日的一次谈话，讲“润之起初总做过几天党的工作”。一个月后，即1942年5月27日，陈独秀在江津鹤山坪去世了。

在此后的差不多两年时间，毛泽东很少提及陈独秀，直到1944年春天，抗日战争已胜利在望，中国面临着两种前途两个命运的决战，毛泽东又从总结国共两党关系的教训角度多次谈到陈独秀。

4月12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又谈到了总结党内斗争教训问题。陈独秀生前毕竟和毛泽东有过一段非常密切的交往，甚至产生了个人友谊。随着战局形势的好转，心胸变得越来越豁达的毛泽东回首往事时，也曾意识到如果我们在斗争方法上有所改变，陈独秀本可以不是这样的结局。他说：“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反对陈独秀错误路线和李立三错误路线的大斗争，这些斗争是完全应该的。但其方法有缺点：一方面，没有使干部在思想上彻底了解当时错误的原因、环境和改正此种错误的详细办法，以致后来又可能重犯同类性质的错误；另一方面，太着重了个人的责任，未能团结更多的人共同工作。这两个缺点，我们应引为鉴戒。”两年前，毛泽东曾讲过，将来要讲一讲陈独秀的功劳，现在他又进了一步，提出以前“太着重了个人的责任”，这是以前所没有过的。

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和陈独秀的斗争并没有错。当年毛泽东本人就是坚决和陈独秀斗争的，特别是陈独秀的工作方法，仍使毛泽东记忆犹新。4月12日是一个令人不愉快的日子，17年前的这一天，蒋介石在上海举起了屠刀，毛泽东怎么可能忘记陈

独秀的错误给中国革命带来的损害呢？抗日战争胜利在望，毛泽东担心有人会因此骄傲起来。在同一次谈话中，毛泽东提醒大家说：“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第一次是在一九二七年上半年。那时北伐军到了武汉，一些同志骄傲起来，自以为了不得，忘记了国民党将要袭击我们。结果犯了陈独秀路线的错误。”毛泽东讲“一些同志”骄傲起来，没有提陈独秀个人的责任，这也是他以前讲话中所没有的。

◎类似俄国的普列汉诺夫

1953年2月，沿江城市安庆正是春暖花开季节，毛泽东沿江视察首次来到安庆。以前他虽没有登上这块土地，但“安庆”这两个字他是太熟悉了。卅年前，他往来于上海、武汉之间，曾多次默默注视过迎江伫立的明朝遗迹万佛塔，这座七层高的古塔雄伟挺拔，给他映象很深。他对安庆印象深刻的另一个原因，因为这儿是陈独秀的家乡。第一次大革命失败的教训是太深刻了，所以每到一个历史转折关头，毛泽东总是以陈独秀所犯的错误为借鉴，告诫全党少犯错误。抗日战争刚刚胜利，毛泽东于1945年8月13日在延安干部会议上就提到陈独秀不搞调查研究，所以他不懂拿刀可以杀人。两年后，毛泽东在杨家岭作报告，这次他把“机会主义者”陈独秀视为“党领导机关的投降主义分子”，是他导致了大革命的失败。

全国解放后，毛泽东只要是回顾党史和新民主主义的历史，他都会联想到陈独秀这个反面教员。只不过不同时期，他所谈的事和联系的人都稍有变化。现在到了陈独秀的家乡，按往常

习惯，毛泽东喜欢问问他家中的一些情况。

21日上午，安庆地委书记傅大章和市委书记赵瑾山一起上了洛阳号军舰。罗瑞卿说：你们先坐一下，我去看看主席起来没有。

过了一会，毛主席来了。他说：“我们上岸走走。”

傅大章带了许多材料随军舰到南京，准备一路上向毛主席汇报。他估计毛主席会提一些问题，他在厚厚的笔记簿上，记满了有关安庆经济的数据。

“今天不用你们汇报工作，你们想有什么问题，可以提出来，随便谈谈。”毛主席亲切地说。

毛主席吸了一口烟，微笑地看着这位年轻的地委书记，突然问：“陈独秀家在安庆什么地方？”

傅大章吃了一惊，他没有想到毛主席会问他一向讳莫如深的话题。好在陈独秀的家在哪里是嘴边的话，他顺口答道：“在独秀山下。”

“安庆有个独秀山？”毛泽东一向喜对人名诠释，以前他没有听说过安庆有独秀山。

“独秀山是怀宁县内的一座小山，离这里有三四十里地。”因为谈人文话题，傅大章内心的紧张已缓解了许多。

毛泽东点了点头。“是独秀山以陈独秀得名，还是陈独秀因山而得名？”毛泽东在延安时就反对以人名命名城市，当然也包括以人名为山川河流命名。

“原来就有独秀山。先有独秀山，后有陈独秀。”傅大章肯定地说。

“噢。”毛泽东释然地应了一声，他没有想到陈独秀这个人还很念家乡。谈了一会陈独秀本人的情况，毛泽东问：“陈独秀家

里还有些什么人？”

傅大章对陈独秀与高君曼生的一儿一女情况不清楚，说：“还有个老母亲。他后来和一个姓潘的女工结了婚，那个女工现在不知下落。”见毛主席有兴趣，傅大章接着说，“陈独秀有个儿子叫陈松年，现在安庆市窑厂工作，当技师。生活有些困难，把北京的一所房子卖了。”

毛泽东当时心情很好，不以为然地说：“何必卖房子呢？”毛泽东知道，陈松年是陈延年、陈乔年的同胞弟弟。

“陈松年人老实，当过教师。”

“陈独秀后人生活困难，可以照顾嘛！”毛泽东说。他想，无论是作为陈独秀后人还是作为陈延年、陈乔年的弟弟，都该给点补助。

傅大章连忙点头：“我们马上给他们补助。”

这时毛泽东饶有兴趣地谈起陈独秀的功过，说：“陈独秀早期对传播马列主义是有贡献的，后期犯了错误，类似俄国的普列汉诺夫。陈独秀出狱后，中央派人做他的工作，希望他发表个声明承认错误，但陈独秀拒绝了。”

这次毛泽东和傅大章谈话以后，傅大章同地委其他人研究，由地委统战部每月发30元给陈松年作生活补贴，此款一直发到1990年陈松年去世。

后来傅大章才搞清楚，毛泽东最初讲陈独秀类似俄国的普列汉诺夫是1945年在《“七大”工作方针》一文中。毛泽东说：“陈独秀在某几点上好像俄国的普列汉诺夫，作了启蒙运动的工作，创造了党，但他在思想上不如普列汉诺夫。普列汉诺夫在俄国做过很好的马克思主义的宣传。陈独秀则不然，甚至有些很不正确的言论。”陈独秀和普列汉诺夫一生前半段有贡献，后半

段都出了问题,陈独秀走到陈托取消派立场,普列汉诺夫 1903 年成为孟什维克、第二国际机会主义首领。

1957 年前后,是毛泽东抓阶级斗争最专心的时期之一,陈独秀这个反面教员也就常常进入毛泽东的话题。在接见拉丁美洲的客人和访苏期间,毛泽东都提到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问题,并一再强调,他是一个不可救药的人。直到 1962 年他开始注意纠正反右扩大化问题时,他对陈独秀以少数压多数的家长制作作风仍记忆犹新。

陈独秀在毛泽东心目中的反派角色位置,自 1937 年陈拒绝写检讨后,便没有改变过,这个意识到“文革”期间达到顶峰。“文革”期间,即 1967 年 11 月 1 日出版的《毛选》四卷合订本 153 页注上,经康生润笔,陈独秀被视为“叛徒”、“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反对人民的卑污的工具”,这个评价一直持续到 1979 年十一届三中全会。

1979 年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年份,时间倒推 100 年,正是陈独秀诞生的年份。就在这一年,另一个世纪伟人领导了一场新的思想解放运动。

第二章

前清翰林与秀才

——蔡元培与陈独秀

◎暗杀团

1904年夏末，陈独秀冒着酷暑从安庆到芜湖继续办《安徽俗话报》。一天，汪孟邹拿来几封信，其中一封是章士钊从上海寄来的。信上说有要事相商，望陈独秀速到上海。陈独秀去年秋冬与章士钊在一起办了3个月的《国民日报》，两人已成莫逆之交。接到章士钊来信，陈独秀急忙来到上海。

见到满头冒汗的陈独秀，章士钊一边给他倒开水一边说，7月31日，上海成立了暗杀团，蔡元培、刘光汉及章士钊本人都参加了。提到蔡元培、刘光汉，陈独秀并不陌生。1903年初秋办

《国民日日报》时，陈独秀就认识了刘申叔。至于蔡元培，陈独秀早已知其人。蔡元培是爱国学社总理，《苏报》停办前，每周在《苏报》上写一篇评论。当时受俄国民粹派影响，热衷暗杀活动。

陈独秀到上海，住在蔡元培安排的英租界新闸路余庆里，这里已成了暗杀团的秘密机关。陈独秀未来之前，章士钊已将陈独秀与邹容、张继被遣送回国、在安庆效仿蔡元培办安徽爱国会被通缉，以及办《国民日日报》《安徽俗话报》的事告诉了他们。

“光汉常提到你，说你一人在办一份报纸，不容易啊。”见到陈独秀，蔡元培双手作揖，点头问候。蔡元培长陈独秀一属，同属兔，三十五六岁，理了个平头，颧骨稍突出，给人以谦逊敦厚的感觉。

陈独秀忙还了礼，说：“原有几个人，都有事离开了。我那是半月报，不像《警钟》，兵强马壮。”见蔡元培问《安徽俗话报》，陈独秀兴趣大增。蔡元培是中国教育会会长。去年底在《国民日日报》停刊后，办起了《俄事警闻》，今年初受俄国赫尔岑《钟声》影响改为《警钟》日报。陈独秀在报上看到《警钟》招股启事，一次就募集资金十万银元，十分羡慕。“所以，你一个人办报不容易啊。”蔡元培说，“今年上半年，你在《警钟》上发了一首诗，我还记得呢。有没有新作？”

这年正月初一，和陈独秀办《国民日日报》的朋友何梅士因患病在东京去世。陈独秀春天做梦，梦见了亡友，梦醒后写了《夜梦亡友何梅士觉而赋此》，刊在5月7日《警钟》日报上。陈独秀笑着说：“没有什么新作。一位朋友去日本，近日作了一首诗赠他。”“好啊，走时一定留下来。”蔡元培说。

隔日，章士钊带陈独秀见杨笃生、钟宪萼等人。杨笃生是暗杀团发起人，1904年上半年在日本与何海樵等人成立暗杀团。

原计划在北京刺杀西太后,没有找到机会,回到上海后发展了蔡元培加入暗杀团。蔡元培当时任爱国女校校长,于是又发展了爱国女校懂化学的教员钟宪鼐、俞子夷。

杨笃生等人和陈独秀进行了一次密谈,当即决定发展陈独秀为暗杀团成员。

陈独秀随杨笃生等人来到一个窗帘高挂的房间,房间正面上临时挂着一幅黄帝神位,神位下面是一张八仙桌,桌下摆着两个草垫子,一束香余烟缭绕。陈独秀一进门便被一股神秘肃穆的气氛笼罩着。盛着酒的白瓷器皿已滴入刚杀的鸡血,陈独秀随杨笃生跪在草垫上,拿着事先给的纸条,照着宣读誓词。读毕,又随杨君将血酒一饮而尽。

以后的一段时间,陈独秀常到这里来学习制造炸弹。因为地点偏僻,弄里连着的几间房子都是空屋,万一炸弹爆炸,也不致误伤无辜。这次学制造炸弹,与蔡元培、刘师培、章士钊、杨笃生、钟宪鼐、俞子夷等人常见面。但炸弹制出来后,效果如何并不知道。一次,孙少候密送用黄兴从日本东京带来的弹壳装药后的炸弹到南京,于隐僻处引掷之,炸弹竟不炸。

临走,陈独秀将《赠王徽伯东游》诗交蔡元培。见“近别远离同一散,我心惻惻没来由”句,蔡元培笑道:“不是‘没来由’,而是不愿道出罢?”

陈独秀也笑,说:“随便划划,不好就不用。”

“用,用,即日就刊在《警钟》上。”蔡元培一边将诗笺放入上衣口袋,一边问“为何叫‘由己’?”

“由己不由人,也是随便取的。”陈独秀说。

“申叔改名‘光汉’,仲甫改名‘由己’,都有同一个意思。”蔡元培会意地点点头。

陈独秀回芜湖不久,上海发生万福华枪杀前广西巡抚王之春未遂事件。此时蔡元培正在将暗杀团改为光复会。陈独秀、章士钊没有加入光复会,但原来的暗杀团组织没有取消,仍在继续活动。

1905年9月,发生了吴越炸清廷出洋考察宪政五大臣事件。吴越牺牲前,曾留下话:若遇难,将其两部著作《暗杀时代自序》和《意见书》转交杨笃生或陈仲甫。

吴越死后,陈独秀写信问张啸岑情况,张将烈士遗物转给陈独秀,其中有西式外套一件,系吴越赠杨笃生纪念物。陈独秀在烈士赴难前与之于芜湖聚谈过,知道杨笃生曾写信给蔡元培,介绍认识吴越,陈独秀便将烈士遗物寄往上海。

开吴越追悼会时,蔡元培还提到此事,他在追悼大会上说,烈士“死难后,有陈君寄一皮包至上海,内有西式外套一件,此系烈士之遗物。当时系赠杨君,以为纪念”。

1906年秋,蔡元培去北京,翌年夏赴德留学。蔡元培走前,陈独秀邀金少甫即刘师培到芜湖皖江中学、安徽公学任教。

陈独秀、蔡元培再次见面已是10年以后。

◎受聘文科学长

1916年11月28日,陈独秀来到北京,住前门中西旅馆64号。这次来北京,主要是为亚东图书馆和群益书店合并招股筹集资金。

12月26日上午,陈独秀起床开门,发现一位留着山羊须、戴着眼镜的先生端坐在门外的凳子上等候,等认出是蔡元培时,

陈独秀大吃一惊。头天晚上，陈独秀和汪孟邹出去看戏，回来晚了，这天早上贪睡了一会，想不到让这位老翰林久等了。

“蔡先生德高望重，怎敢屈你大驾光临？”陈独秀满面笑容，急忙将蔡元培引入室内。蔡元培是年50岁，和十几年前在上海组织暗杀团相比，明显老多了。但乌黑的分头，精巧的金丝眼镜，浅浅的山羊胡子，除保留了当年朴实敦厚之外，又增添了学者深邃睿智的风度，使陈独秀想到了俄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者车尔尼雪夫斯基。

“光绪三十年分手，一晃十年没有见面了。”蔡元培坐下后说。

“是啊，后来吴烈士遇难，我还给你寄过烈士遗物。”

“记得！记得！”蔡元培连连点头。“听汤尔和、沈尹默讲你到了北京，我就来了。”

“知道了，知道了。”陈独秀忙点头。沈尹默不久前在琉璃厂遇到陈独秀，极力劝陈独秀到北大来。

“你和汤、沈二君什么时候认识的？”蔡元培欠身接过汪孟邹递过来的茶问。

“认识汤尔和是光绪廿八年冬在日本成立‘青年会’，当时章太炎、邹容、刘三、汤尔和君都在，我们还有合影。但以后很少交往。尹默是宣统元年在杭州陆军小学认识的。辛亥革命后分手，一晃也有五六年了。”

“哦！”蔡元培笑着点了点头，说，“我来北大，想必仲甫已听说了？”

“先生上个月初从国外到上海，我就听说了。听说同盟会里的马君武等人很反对你到北大任校长？”

“他们认为北大太腐败，进去了弄不好坏我的名声。但孙文

孙先生主张我来,他说这里帝王思想官僚习气重,更要传播革命思想。我想,北大腐败不要紧,我们从教育着手,未尝不能使我国转危为安。孙先生一说,使我下了最后的决心。”见陈独秀倾心在听,蔡元培又说,“我初到北大,急需一班积学而热心的学者名流到北大,以改造校风,推进学术研究,不知仲甫可有此意?”蔡元培到北京,这几日正忙着结识四方名士,就在陈独秀来北京的头一个星期,专门去访问刚到北京的周作人,可惜未遇。周作人是许寿裳向蔡元培推荐的,说可教希腊文学史和古英文课。不料周作人访蔡校长两次,也未遇上,等蔡元培见到他时,只有预科的国文作文适合他了。

陈独秀见蔡元培点题,说:“蔡校长登门谒贤,令人感动。前日沈尹默见到我,也提到此事。从前我在安徽公学、安徽师范学校任教,却没有到名牌校园任过教授,怕难以胜任。”

“仲甫客气。我想请你任文科学长,有你这些思想,足可胜任。”蔡元培望着桌上的《新青年》说。

几天前,蔡元培从上海到北京,立即拜访了一同留法的老友、医专校长汤尔和,汤尔和拿出沈尹默转来的《新青年》说:“文科学长如未定,可请陈仲甫。”沈尹默听说蔡元培到了北京,也上门推荐陈独秀任文科学长。沈尹默说:“北大以文理科为主,其中文科影响更大,改革北大校风,文科学长人选十分重要。”临走,沈尹默告诉了陈独秀住前门外一旅馆里。当时沈尹默任北大文科教授,因此对蔡元培有特殊的影响,但起决定作用的是《新青年》。二次革命失败后,蔡元培偕夫人黄振玉赴法,一去三年,因此没有看到《新青年》。这次回国到上海,已听人谈到,这会一翻,见陈独秀对孔子开火,正合自己的胃口。信教自由会邀他到北京中央公园开会讨论国教问题,他少不了要批判孔教。

陈独秀见蔡元培提到《新青年》，便说：“因为要办《新青年》，上海那一头恐怕走不开。”

“没关系，把杂志带到学校里办好了。”蔡元培见陈独秀犹豫，忙劝说，“北大要聘一大批名流学者，正可帮你编杂志呢。”

北京大学前身是京师大学堂，1898年经光绪同意设立。维新运动失败后，康、梁维新措施尽被废除，只有京师大学堂留了下来。能到名牌大学任文科学长，对陈独秀也有吸引力。加上蔡校长如此诚意，更是难得。“我有一位朋友留学美国，是个哲学博士，此翁年龄比我小，学识不薄，诗书文论俱佳，能有他任文科学长最好。”陈独秀想到胡适明年要回国，汪孟邹曾和他谈过给胡适联系工作事，说着陈独秀看了一眼身旁的汪孟邹。见陈独秀提胡适，汪孟邹笑容满面，连连点头。

蔡元培不认识胡适，但已听出陈独秀话中仍有推辞之意，沉吟了一下，说：“仲甫推荐的人才，想必不差，不妨请仲甫代劳，替我写一封求贤信，言辞写恳切些。若不当学长，文学教授、哲学教授请他任选，你看如何？”听得出，蔡元培还是希望陈独秀任文科学长。意外中又聘到胡适任教授，蔡元培感到不虚此行。

因文科学长和重要教授月薪都是300元，比群益书店去年开给陈独秀编《新青年》的月薪200元还多，陈独秀便点头道：“我回上海即给他写信。”

蔡元培关照陈独秀快去快回：“我这头近日就给教育部呈文，相信不日就能批下呈文，莫让我在北京久盼。”现任教育部长范源濂与蔡元培也是熟人。民国元年，蔡元培任唐绍仪内阁教育总长，当时蔡即力荐范源濂为教育总长，后来因袁世凯、唐绍仪一再坚持，蔡任教育总长。在蔡元培一再坚持下，范源濂任了教育次长，两人成了搭档。所以这次北大教授马叙伦等人向范

推荐蔡元培任北大校长，范源濂一口答应了，黎元洪也没有二话。有这些老关系，蔡元培才敢许愿，教育部一定会批复聘请陈独秀任文科学长的呈文。

“蔡校长处事明快，我怎敢怠慢？”陈独秀见蔡元培问他回沪事，忙应了一句。

“家眷是否同来？”蔡元培想把事情敲定。陈独秀第二个妻子高君曼毕业于北京女子师范学校，现居上海。

“我对文科学长之任，决而未下，能否胜任，实在是个问号，能否试行三个月，那时再作决定？”提到搬家眷，陈独秀又有些犹豫。北大文科有一班旧派人物，能否与他们处好，陈独秀心里没底，但又不好直接在蔡校长面前说出来。

“仲甫过虑，就依你的主意，该行了吧。”见陈独秀一推再推，使蔡元培想起民国元年请范源濂任教育次长的事，范一开始也是不愿意，说是异党，怕不好合作。但蔡元培一坚持，范源濂还是就“范”了。后来两人合作得不是很好么。

见蔡元培真诚热情，陈独秀不好再说半个不字。

“我要去中央公园开会，不多坐了，望仲甫快去快回，莫让我久盼。”临走前，蔡元培要了陈独秀的简历，便告辞了。

送走蔡元培，汪孟邹问：“真的来北京？”因为事情突然，汪孟邹还没有弄清陈独秀的真实想法。

“来！和这位翰林共事，令人愉快。其实一样，看起来是我给老蔡撑腰，也是老蔡给我撑腰。再说，我在北京有利于书局向北方发展。”陈独秀安慰汪孟邹说。

见汪孟邹闷闷不乐，陈独秀说：“子民把适之也聘了，这事你还要谢我呢。”

“那也是。”提到蔡元培聘胡适，汪孟邹一扫愁云，又露出了

笑脸。“我看蔡先生很平易近人，一定好处的。”汪孟邹说。

“他也是个书呆子。我讲一个笑话给你听。”陈独秀余兴未尽，翻起了老黄历：“子民考中举人后，有一次到北京应会试。出来后将所作的策论给他的乡试主考官看，这人说蔡先生作的是怪八股，难考中。蔡一听信了他的话，十分扫兴地回老家绍兴去了。哪知揭榜时又有蔡的名字，等人快马加鞭追他回来参加殿试，已误了考期，来不及了。”

“啊，真可惜。”汪孟邹听得出了神，“后来呢？”

“幸亏有补应殿试。隔了一年，子民早早进京，考中进士，点为翰林。这次，他说什么也不提前走了。”说罢，陈独秀哈哈大笑起来。见陈独秀笑得欢，汪孟邹也笑了起来。

1917年1月4日，蔡元培到北大任职。进入景山东街（马神庙）北京大学的大门，映入眼帘的是过厅正中两根木柱之间的横匾，上嵌“国立北京大学”六个隶书字。身着棉袍的蔡元培举止迂缓地迈入大门，一眼瞧见了早早站在木柱之间迎候新校长到任的两排校役。他们见蔡校长进门，慌忙深深行礼。蔡元培也摘下礼帽，向校工还礼鞠躬，使躬身的校役感动不已。

一个星期后，1月13日，北大校园里一群人在围看蔡校长任职后的第三张告示：“本校文科学长夏锡祺已辞职，兹奉部令派陈独秀为本校文科学长。”

蔡元培忙里忙外，一刻不闲，但聘陈独秀的事始终未忘。因为是以北京大学名义给教育部呈文，所以蔡元培聘陈独秀要等自己正式任职以后。1月9日他发表了就职演说，隔了一天他就起草了致教育部函：“请派陈独秀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并附了陈独秀的履历表，他想在旧历年之前把这事定下来。

事先已和范源濂讲好聘陈独秀，1月13日，教育部就以函

字第十三号送达北京大学：“贵校函开安徽高等学校校长陈独秀品学兼优堪胜文科学长之任……当经本部核准在案，除令行外，相就函复。”所谓“令行”，即范源濂令：“教育部令第三号兹派陈独秀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

见到校园里新贴出的布告，一时议论纷纷，赞扬与贬斥之声随处可闻。反对陈独秀任文科学长的是桐城派的古文家以及章太炎一派弟子黄侃、马裕藻等人。陈独秀是怀宁人，与桐城同属安庆府，但陈独秀办《新青年》，鼓吹打倒孔家店，主张白话文运动，都是冲着中国正统文学而来，桐城派的古文家当然地视之为同乡中的叛逆。黄侃等人主张晋宋文风，也是冲桐城派而来，因此和陈独秀有相通的地方，但其音韵考据之学，同样因袭古人，同属《新青年》扫荡范围，因此和陈独秀也是水火不相容。

黄侃、马裕藻等人系前任文科学长夏锡祺引荐为北大教授，他们不愿在陈独秀任下执教，除了陈君激进外，还有对前任夏锡祺依念的感情因素，所谓门派观念。但后者却不好在蔡校长面前说出。黄侃不容陈独秀，还有一笔陈年老账。黄侃即黄季刚，当年在日本《民报》馆与陈独秀遭遇，陈和章太炎等人讲到音韵诠释，说“湖北无人”，没想到湖北人黄季刚在里屋大叫：“安徽有人，未必就是足下。”想不到10年后两人冤家路窄，又同校共事。黄侃师从章太炎，有古文底子，小有名气，但周作人等新派人物瞧不起他，曾言黄侃“八部书外皆狗屁”。但黄侃又是苏曼殊的好友，两人在爪哇时唱诗联句，不亦乐乎。

沈尹默及安徽籍同乡教授支持陈独秀任文科学长。古文派教授唯一站得住脚的理由是，陈独秀只会写一些笔记性文章。沈尹默等人则举出陈独秀的《字义类列》等书，说陈训诂学造诣甚高。蔡元培便拿这一派去说服另一派，说：“陈独秀先生精通

训诂音韵,有著作,能胜任文科学长一职。”并说陈一人在家乡办报,有毅力与责任心。

这场风波平息后,陈独秀携眷属到北京,住东安门箭杆胡同9号。

新年伊始,陈独秀在上海旧居编出了《新青年》第二卷第五号。其中第一次收入了蔡元培的文章:《蔡子民先生在信教自由会之演说》。12月26日,信教自由会在北京中央公园开会,邀请蔡元培到会发表演说。后来报纸登出蔡元培演说文章,陈独秀看到后,记起这天正是蔡公去旅社看他的日子。蔡元培说:“孔子是孔子,宗教是宗教,国家是国家,义理各别,勿能强作一谈。”这些话很对陈独秀胃口,尽管其中有些合于宗教的东西,陈独秀还是把这篇文章转载了。因为编、印都在上海,校样没有拿给蔡元培看。

“仲甫,贵报刊出我的演说,有不少讹误。”正月里,蔡元培拿着新出的《新青年》对陈独秀说。

“是么?”陈独秀连忙接过蔡元培手中的《新青年》,翻到蔡文处,只见上面已被红笔勾出十几处错处。“啊呀,怎么搞的!”陈独秀一脸歉意。

“不怪你,不怪你。”见陈独秀局促,蔡元培忙安慰:“报纸上已错了,因为报纸一读就过去了,无留存价值,我也无所谓。只是《新青年》影响大,怕引人注意,引起误解。”

“有不少地方并非鄙意。”蔡元培稍带绍兴口音,听不出有什么怨气,不在意还以为他在向别人致歉。

陈独秀注意到,在“然宗教真理,乃因研究而愈显……凡是者昔今日宗教复兴之所由来也”一段文字下面,蔡元培用笔打了一个问号。

陈独秀抬头看了看蔡元培，蔡说：“我是讲任取一哲学家所假定之一说而信仰之，是谓宗教。知识道德由科学证明，与宗教无关。”

“原来是这样。”陈独秀点了点头。

“你看这里，‘太阳系又何悬而何放，何为而不堕，非科学所能解，’这句话原是宗教家反对进化论之语，不知为什么搞到我的文章里来了。”蔡元培用手指着另一段文字说。

“真是该死。我在转载时，就有疑问，先生是主张信教自由的，也是主张进化论的，怎么有这些话呢？当时没有问你，是我的罪过。”陈独秀边说边看了看后面的文字，不少地方都打上了问号。

“不怪你，不怪你。这次演讲，事起仓促，事前没有准备，事后又无暇校阅记录稿，等报纸刊出，已来不及了。我拟写一函更正，你看如何？”

“这样最好，以信函方式写到《新青年》，我在三卷一号上刊出，这期已编好，即日可印出。你的信既可校出讹错，又可消解读者的疑问，还增添了鄙刊的分量，是谓一举多得呢。”陈独秀说完，两人都笑了起来。

刊文时，蔡元培没有提“陈独秀”，只提了“记者”，陈独秀便以“记者”名义写了一封答信，向蔡元培公开致歉。《新青年》是陈独秀独家刊物，不用说大家也知道“记者”便是陈独秀。这样不署姓名，更显得公事公办。

◎兼收并蓄

年底,蔡元培对陈独秀说:“范源濂向我推荐了一青年,此君叫梁漱溟,文采不错,没有学历,你意下如何?”说着,蔡元培将去年十三卷十五号《东方杂志》递给陈独秀,上面有梁漱溟写的《究元决疑论》一文。

“知道,知道,听说此青年曾考北大未取,可吸收入北大任讲师。”陈独秀翻了翻《东方杂志》说。

“此人对佛学造诣颇深,我意聘进来教佛学,适之二十六七岁,梁漱溟二十三四岁,一个教中国哲学史,一个教印度哲学、佛学,也是兼容互补。”听得出,蔡元培已决定聘梁漱溟。

“梁君对批孔好像有异词。”陈独秀皱眉想了想说。“当然我是同意聘他的。先生能聘辜鸿铭,何人不能聘呢?只是适之对你的兼收并蓄还有些不解。”见蔡校长提到胡适,陈独秀想起适之曾说:“蔡老先生欲兼收并蓄,宗旨错了。”年初,陈独秀代蔡元培致函胡适,请他到北大任教。胡适初夏回国,初秋到北大,对蔡、陈两人,自是只有尊重二字,因此对蔡元培办校宗旨,只是委婉提出意见。胡适比蔡元培小两属,因而叫他为“蔡老先生”;陈独秀比蔡元培小一属,背后叫“老蔡”。

对于胡适的疑义,陈独秀曾在信中解释说:“蔡先生对于新旧各派兼收并蓄,很有主义,很有分寸;是尊重讲学自由,是尊重新旧一切正当学术讨论的自由;并不是毫无分寸。”其实,陈独秀对本科续聘的辜鸿铭教授拖着辫子以复辟派自居也反感,但此人有英文专长,曾将《四书》译成英文。后来胡适自己也承认“老

怪物”很幽默,喜欢讲笑话。辜鸿铭生于1856年,比胡适大34岁,长得凹眼凸鼻,所以胡适背地里称他为“老怪物”。

“学生中也有不满辜鸿铭、刘师培的,我们聘他们,不是叫学生也留辫子做复辟派。是叫你们去学辜的英文、刘的国学。”蔡元培主张做学问要互相交流,常讲“道并行而不相悖”。

陈独秀知道,蔡元培搞冰炭同炉,搞中庸折中,也是不得已而为之。“但先生骨子里是向着新潮,这是路人皆知的。”陈独秀将《东方杂志》还给蔡元培,眼里闪着狡黠的目光。

蔡元培微笑着点点头,说:“梁漱溟已说,‘进北大,除了替释迦、孔子发挥外,不做旁的事。’这也无妨,思想自由,大学才能叫大学。”

陈独秀很赞成蔡元培的话,说:“改日我们再和梁漱溟谈谈。”

隔日,陈独秀、蔡元培和梁漱溟在校长室谈话。蔡元培把想请梁漱溟到北大教印度哲学的话先说了。

梁漱溟一听,忙摇头,说:“我何曾懂得什么印度哲学呢?印度宗派那么多,我只领会一点佛家思想而已。要我教,我是没得教呀!”

蔡元培说:“你说你不懂印度哲学,但又有哪一个人真懂呢?谁也只不过知道一星半点,横竖都差不多。我们寻不到人,就是你来吧!”

陈独秀也说:“我以前也没有当过文科学长,慢慢就适应了。”

蔡元培又说:“你不是喜好哲学吗?我自己喜好哲学,我们还有一些喜好哲学的朋友,我此番到北大,就想把这些朋友,乃至求知中的朋友,都引来一起共同研究,彼此切磋。你怎可不来

呢？你不要当老师来教人，你当是来共同学习好了。”

梁漱溟见蔡元培坚持，又有陈独秀劝说，想了一会，应承了下来。

◎“田必美”与“元绪公”

1919年正月，林琴南在《新申报》“蠡叟丛谈”上发表小说《荆生》和《妖梦》，攻击陈独秀等《新青年》同人。林琴南是光绪举人，以前也是京师学堂教习。和辜鸿铭一样，以清朝遗老自居。写这两篇小说时，林琴南化名林之。

“听说，林琴南写小说影射你们？”一天，蔡元培和陈独秀在新落成的北大红楼办公室中闲谈。“这家伙出语伤人，连我、适之、玄同一起骂了。”陈独秀点了一支烟说。

1918年年初，蔡元培在《北大月刊》上发表《进德会旨趣书》，夏天进德会正式成立。陈独秀也参加了进德会，因为陈独秀不戒烟，蔡元培不戒酒，所以陈独秀只顾一个人抽烟。

“田必美、狄莫、金心异，细一想，还真是你们三个。”蔡元培说。《荆生》里讲，有三个人在一起放言高论，诋毁前贤，被荆生痛打了一顿。“田必美”指陈独秀，“必美”与“独秀”同，“狄”与胡适的“胡”同，“金心异”与“钱玄同”同。

“到底是古文学家，对仗工整，亏他想得出。还好，只是被痛打一顿，没有抓去杀头。”

“不至于。新旧思想交锋，难免讲过头话。”蔡元培想起，钱玄同也骂守旧派为“谬种”。

“你也被骂了呢。”

“是么？”蔡元培将信将疑。

“这‘元绪公’不是讲你么？”陈独秀提醒蔡元培。《妖梦》中有一个元绪公，暗指蔡元培。“这次，我们都被怪物吃了，你也在里面。”陈独秀说着，笑了起来。“他们知道，我是赞成白话文的。”蔡元培说，“我们中国文言，同拉丁文一样，所以我们不能不改用白话。”

陈独秀记得，蔡元培办《俄事警闻》时，就写了白话小说《新年梦》，比陈独秀写小说《黑天国》还早半年。正是在蔡元培的支持下，陈独秀、胡适、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鲁迅等人鼓吹新文化蔚然成风。1918年，《新青年》全部改用白话文作文章。林琴南当然知道蔡元培在其中的作用，所以也不放过他。

“只是手段太卑劣。”陈独秀收敛了笑容。《妖梦》将教务长田恒影射陈独秀，副教务长秦二世影射胡适，白话学堂校长元绪影射蔡元培。林纾写道：白话学堂有一“毙孔堂”，田秦二人毁伦常，赞扬白话文，元绪则点首赞赏。有一个能啖月亮的罗喉罗王妖魔直扑白话学堂，“攫人而食，食已大下，积粪如丘，臭不可近”。陈独秀愤愤地说：“这和市井无赖投粪骂人有什么区别？”

春天，有一个叫赵体孟的人，想出版明朝遗老刘应秋的著作，知道蔡元培与商务印书馆张元济关系特殊，既是同乡，又是同一年中进士，同点翰林，想托蔡出面找商务印书馆，并希望蔡元培出面请梁启超、章太炎、林纾为书写序。蔡元培是个大好人，有求必应，便硬着头皮给林纾写了一函，告知此事。写信前，蔡也有犹豫，他和林琴南都是清末科举出身，以前也认识，入主北大时，有人提到聘林纾教国文，蔡元培考虑其桐城文风已过时，未加聘用。林纾写《妖梦》骂他，已到生吃其肉为快境地，显

然也含吐心中不聘之块垒。但本着宽容之心，蔡元培还是给林纾写了信。

3月18日，林纾在《公言报》上发表《致蔡鹤卿元培太史书》，借机发难，公开指责蔡元培“切不可凭位分势利而施趋怪走奇之教育”，以教训口气说：“今全国父老以子弟托公，愿公留意，以守常为是。”

“打算怎么办？”见到《公言报》，陈独秀夹着烟到蔡校长办公室。

“正准备写封信给《公言报》和林琴南，因为《公言报》写了评论，我不能不公开辩正。”蔡元培说。

“他们矛头一个是对你，再一个是对我的。”陈独秀注意到《公言报》评论，指责自己与适之、玄同等“鹵莽灭裂，实亦太过”。

“林指责北大各项，都是外界传的谣言，这样混淆真伪，哪里是爱惜大学呢？”蔡元培有些生气地说。

“现在各报把反对《新青年》和反对北大连在一起，在《中华新报》、《时事新报》、《民国日报》、《北京晨报》中，谣言最烈的是林琴南、张厚载这两个人。”陈独秀说着将刚出版的《每周评论》第十三号递给蔡，上面有陈独秀署名“只眼”的文章——《关于北京大学的谣言》。

陈独秀写道：“张厚载因为旧戏问题，和《新青年》反对，这事尽可从容辩论，不必藉传播谣言中伤异己。”

“张厚载将谣言造到我的头上，隔日我也以公开信的形式反驳他。依据大学规程，我拟令其退学。”一向说话声音不高的蔡元培，此刻稍稍抬高了嗓音。张厚载2月份两次在《神州日报》上发表《半谷通信》，说陈独秀、胡适等人因思想激烈，受政府干涉，陈独秀已去天津，态度消极云云。3月初，又在《神州日报》

发表《半谷通信》，说：“北京文科学长近有辞职之说，记者往访蔡校长，询以此事，蔡校长对于陈学长辞职一说，并无否认之表示。”这个谣言被各报转载，流传很广。张厚载又叫张镛子，“镛”，半谷，故叫《半谷通信》。

“其实，张厚载造谣，除了前年我在讨论旧戏时支持适之反对他一层，还有一层，林琴南是他的中学老师，听说林纾写《荆生》、《妖梦》都是经张厚载之手寄给《新申报》的。”

“差不多了。”蔡元培下了决心说：“令其退学！”

◎“八年之事”

3月26日，正是春分时节，蔡元培被近一个时期校内外谣言弄得寝食不安，没有一点欣赏初春景色的心情。最近报上又传出文科学长陈独秀有嫖娼之事，使蔡元培忧心忡忡。汤尔和约他去谈谈，想必与此事有关。

晚上，蔡元培、沈尹默、马叙伦三人到了医专校长汤尔和家。汤尔和想，谈这种事在北大里面不太合适。

汤尔和的客厅是一间西式屋子，一张油画悬挂在客厅正面的墙上，一侧是两张旧式单人沙发，呈八字形分开，蔡元培和汤尔和坐在沙发上。对面是一张雕花圆桌，两把椅子上坐着沈尹默、马叙伦。在吊灯照射的明亮的光线下面，蔡元培看上去很疲倦，不苟言笑地品茶提神。

“孑民，何不趁学制改革，撤销文理科界线之机，免去陈独秀文科学长一职？”汤尔和知道蔡元培不想撤换陈独秀，极力劝说。

蔡元培摇头，说：“要免去陈君，理由事小，只是迎合了外人

的心,决非本意。况且,年初我也和玄同君说过,驱逐陈独秀,除非‘上谕’将我革职。今我未革职而先除陈独秀,也不合我初衷。”

“先生想多了。”沈尹默看了一眼马叙伦插话说,“单是张厚载、林琴南的谣言,当然不是解聘仲甫的理由,只怪这位先生太不检点,被人抓住把柄,倘若再任文科学长,社会上沸沸扬扬,大学斯文扫地呀!”

汤尔和一边坐直身子一边点头,侧着头对蔡元培说:“尹默所言极是。陈独秀私德太坏,这是我和尹默当初都没有想到的。要不然,我们也不会极力向你推荐。今日到了这个地步,说起来,我们也有责任。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我也不怕担当这个罪名。”

见汤尔和认真,蔡元培伸手摆了摆,说:“当初你是一番好意,现在还是一番好意,对陈君对我都不是出自私心。陈君是一个人才,你们当初推荐他和我聘他,都没有错。两年不到,北大办学情形有目共睹,这是与陈君和诸位努力分不开的。再说,林琴南要生吃陈君和我的肉,张厚载造谣说陈独秀已辞职,我如果辞掉陈君,这不正证明张的谣言是有源之水,原本不错的了吗?”

“校长过虑,张厚载是说陈独秀去职后到天津,实际情况是北大调整制度,不设学长,陈君是体面下台,不同于辞职;何况理科学长夏元偀也同时免去,更是给陈君一个体面台阶。”马叙伦看着蔡元培说。马叙伦与汤尔和都是杭州人,与蔡元培也是同省。蔡来北大时,马叙伦也在范源濂面前推荐过。因此,尽管马叙伦比蔡小十三四岁,比汤尔和小整10岁,几个人关系却不同寻常。

“陈独秀不当文科学长,还可聘为北大教授,这也不同于张

厚载的流言。”沈尹默附和了马叙伦一句。

见蔡元培绷紧的脸有些放松，汤尔和起身给客人一一加了开水，说：“夷初、尹默说的极是。记得去年你们发起进德会，据说陈独秀也参加了？”

“参加了。”蔡元培点点头。汤尔和的话戳到了蔡的痛处，他蹙一蹙眉头，脸色有些发青。

“仲甫和尹默还是进德会评议员呢。”马叙伦没有注意到蔡元培脸色的变化，顺着汤尔和的话往下说。

“进德会有‘不嫖之戒’吧？”汤尔和得意地眯起眼睛，一会瞅瞅尹默，一会瞅瞅夷初。

“有！有！进德会基本三戒：不嫖、不赌、不娶妾，不嫖首当其冲。”沈尹默解释说。

“‘私德不修，祸及社会’，这话可是你的白纸黑字呀。”见蔡元培沉默不语，汤尔和搬出了去年初蔡元培登在《北京大学日刊》上的话。“而且，子民若解聘陈独秀，对胡适之也是个制约，这两个皖人，一唱一和，北大诸多是非，都与他们闹腾有关。”

汤尔和的一番话将蔡元培的心彻底搅乱了，他敦厚朴实的脸上多了一层凄苦、抑郁的表情。蔡元培点了点头，又摇了摇头，说：“适之是适之，独秀是独秀。如果要免去陈，也完全是私德问题，与他人无关。林琴南、张厚载将陈、胡过激言论的责任归于学校，完全是强加的。”

汤尔和和沈尹默、马叙伦对视了一下，都点了点头，既然蔡校长在调整陈独秀问题上松了口，其他只是迟早的问题。

蔡元培等三人告辞出门时，已是深夜12点。弯弯的下弦月不时地穿出云层，给静寂无声的医专校园抹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冷风吹来，使蔡校长明显感到了凉意。沈尹默和马夷初走

在蔡校长两边，心里却不时地飘拂着蔡校长所没有的快意。此事发生在民国八年，很多年后，胡适仍责怪汤尔和在那天晚上自己家中所起的作用，称为“八年之事”。

◎离开北大

第二天，北大校内外就传开陈独秀将被解职的话。胡适听说26日医专汤宅密谈的事后，为陈独秀鸣不平，认为汤尔和、蔡元培两个校长竟也听信谣传。但他不好将账记在蔡元培身上，只怪沈尹默、马夷初在背后捣鬼。

其实，胡适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蔡元培解除陈独秀文科学长职务，还有来自“上谕”的压力。就在林纾、张厚载向陈独秀等人发难的同时，安福会系参议员张元奇等人向教育总长傅增湘施加压力，说如果不立即撤去蔡元培的职务，以逐陈独秀、胡适、钱玄同等人出北大，将对傅弹劾，其后果然递交了弹劾案，只是国会未通过。

攻击陈独秀私德，是蔡元培最头痛的事。林琴南等人攻击新文化运动不可怕，学理之争，陈、胡、钱、刘四支大笔已可抵御各方进攻，自己也可披甲上阵，况且鲁迅、李大钊、傅斯年又可一旁助威，其势锐不可挡。鲁迅称林纾等是“现在的屠杀者”，“明明是现代人，吸着现在的空气，却偏要勤派巧腐的名教，僵死的语言，侮蔑尽现在。”在蔡元培眼里，鲁迅是天才，其意境之隽永，是他人苦思力索不易得到的。

是啊，正是有了革新派的努力，才增添了蔡元培与旧势力争斗的信心。林纾小说《荆生》中的荆生，大家一看就很清楚，是指

其弟子所谓伟丈夫徐树铮的。徐树铮是皖系头目之一，被段祺瑞称为“小扇子军师”。蔡元培不聘林纾，徐树铮请“恩师”到自己主办的北京正志中学讲授《史记》。林纾希望“荆生”打“田必美”，是唆使北洋军阀干涉新文化运动。这样做，毕竟有些结果，刘半农就明显感到文字狱黑影渐渐压了过来，无时无刻不在栗栗危惧之中过活。

就在蔡、汤、沈、马夜谈的同一天，大总统徐世昌指令教育总长傅增湘致函蔡元培，说：“时论纠纷，喜为抨击，设有悠悠之词，波及全体，尤为演进新机之累。”傅增湘也是翰林出身，1917年底接替范源濂，写信给蔡元培也是出于无奈。在这之前，徐世昌也召见过蔡。蔡元培心情不好，请傅斯年执笔回信，但叫他语气写客气些：“元培亦必勉励俱生，为学问之竞进，不为渝越轨物之行也。”

4月8日，星期二，是清明后的第三日，蔡元培召集文理科教授会议，提前实行文理科统由教授会领导，主任由文理科主要教授轮流担任，马寅初被推为第一任主任（教务长）。

三天后，由北而南行的陈独秀遇到回寓所途中的汤尔和，陈独秀怒目而视，汤尔和见不是滋味，匆匆低头而过。

陈独秀对蔡元培免除他的职务，虽把账记在汤尔和身上，但对蔡元培听信流言也感到窝囊。他的离职，给林纾一班人看了笑话，因此不是他个人丢面子，而是新文化运动受挫。

陈独秀被解职，只是新旧文化思潮斗争激化的一个序曲。20天后，爆发了爱国五四运动，斗争以新的形式更激烈地爆发出来，结果头痛惨烈、极欲坐牢的陈独秀撒传单被捕，引起了全国援陈运动。蔡元培因学生闹事匆匆辞职南下，也引起了迎蔡复职的校内外斗争。

这场斗争延续了三个月，冲淡了北大校内陈独秀被解职的风波。不久，陈独秀被释放，蔡元培复职。陈、蔡二人的芥蒂也消失殆尽，蔡希望陈继续留在北大任教，讲宋史。遗憾的是，出狱后的陈独秀和蔡元培不一样，仍受到北洋政府的监督和迫害，被迫离开了北大。陈独秀这一走，改变了他的人生道路，蔡、陈两人一生中唯一的一段亲密的工作交往也随之结束。

◎“不解西文”

1920年11月23日，已是小雪时节，上海一品香饭馆前的梧桐树叶在寒风中纷纷坠地。

晚上7时以后，门前窄窄的路面上来了不少文弱书生，他们都是旅沪的北大同人，相约在这里为蔡元培饯行。

见到陈独秀、马寅初等人，穿着旧式棉袍的蔡元培忙上前握手，说：“又惊动大家了。”五四运动后，蔡元培剃去了山羊胡子，分头也改成头发往后梳，慈祥的眼里多了些不屈服的光芒。和蔡元培同来的有罗文干、汤尔和、张申府等人。陈独秀大度地和汤尔和拉拉手，寒暄了几句。

“我走时就知道，北京最终是容不下你的。”等菜上桌时，陈独秀和蔡元培低声闲谈。

“你刚才说的是不错的，这几年精力都让安福会占去了。”蔡元培说。刚才，陈独秀代表东道主讲话，说蔡先生之精力用之于对付反对者三分之二，用之于整理校务者，仅三分之一耳。

“我在北大时，为集矢之的，一年不到，就拿你开刀了。见到9月15日的《时事新报》，我就知曹锟、张作霖上台是换汤不换

药,老蔡呆不住了。”10月1日,陈独秀致函报社,说:“真令人看了又好气又好笑。”

提到《时事新报》,大家都笑了起来,说是祸兮福所依,否则蔡校长还想不起去国外呢。夏末秋初,曹锟、张作霖在中央公园宴请各部总次长及军警长官。张作霖突然问:“诸公可曾听说北京有个姓蔡的闹得很凶么?”曹锟应道:“是不是那个男女同校的姓蔡的?”张作霖说:“可不是。”曹锟转身对王怀庆说:“老弟何不看管他起来。”

“张曹以男女同校为口实,不以我为然。此次往欧美考察教育,还是李石曾出的主意。”蔡元培缓缓吁了口气说。

席间,张申府和陈独秀谈到蔡校长支持李大钊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事,说:“春天守常找蔡校长,老蔡不错,拨了两间房子,同意把成立启事刊在《北京大学日刊》上。”见蔡元培在与马寅初讲话,张申府压低声音说:“老蔡一开始有些犹豫,沉默了一会,后来答应了。成立时,请他去讲话,他也去了。”

陈独秀端起酒盅和张申府示意了一下,仰头喝了下去,说:“蔡校长对《新青年》非常支持,适之、玄同反而退缩了。”4月,蔡元培在《新青年》上发表《洪水与猛兽》支持新思潮;5月1日,《新青年》出“劳动节纪念号”,蔡元培题了“劳工神圣”四个大字。张申府也将酒杯里的酒喝尽,说:“知道!知道!”

“初秋,《新青年》还登了蔡校长《〈社会主义史〉序》。”陈独秀也压低了嗓子:“他还不知道这一期《新青年》已成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机关报。”说罢,两人相视而笑。“仲甫、申府,你们两人有什么可高兴的,说出来也让我们快活快活。”罗文干坐在陈独秀对面,他去欧美考察司法情形,与蔡、张同行。

陈独秀接过话说:“没有什么可高兴的,我是说,你们个个都

去西欧,什么时候我也去走走,不然又有人说我不懂西文,是个无赖了。”大家一听都笑了。夏日,《公言报》连载思孟写的《息邪》长文,有《陈独秀传》、《蔡元培传》等,说陈独秀“少无赖,为乡里所不齿”。“思孟”是被北大开除的教员徐某,起“思孟”作笔名和起“尊孔”作笔名一样,是和新潮派叫阵的。

“我去过法国德国,又何曾懂西文。”蔡元培放下筷子说。思孟丑化蔡元培:“居德五年,竟识字至百余,通法三载,又识字十余。”蔡元培环顾大家说:“这次去西欧一年半载,识西文大约只有几字。”说罢同大家一起大笑。

◎《评蔡校长宣言》

1923年初,隆冬季节的北京天空灰蒙蒙的,刚从莫斯科回到北京的陈独秀,感到这里和冰天雪地中的西伯利亚没有两样,而且干冷的寒气和腐败的政治空气搅在一起,使人更加感到沉闷。

1月18日,蔡元培因罗文干案发表《不合作宣言》,随后出走天津。罗文干是“好人政府”王宠惠内阁财政总长,因倾向吴佩孚受到曹锟一派打击,诬其有受贿罪而下狱。无罪释放后,教育总长彭允彝又献计复议,使罗再次入狱。蔡元培与罗几年前一道出国,回来后又聘罗为北大讲师,对彭陷害罗十分忿怒,他在“宣言”里说:“这种恶浊的空气,一天一天地浓厚起来,我实在不能再受了。”

陈独秀见到蔡的“宣言”,摇了摇头,这种消极的辞职方法,老蔡已用过几次了,有什么用呢?恐怕有害而无益!但老蔡是

个大好人。1921年秋天，陈独秀在上海法租界被捕，刚从国外回到北京的蔡元培立即请法使馆设法营救陈独秀。但此翁政见与自己是越走越远了。1922年夏季，胡适拉蔡元培出面，发表《我们的政治主张》，提倡建立有好人参加的“好政府”，因为守常也签了名，陈独秀为此召集了中共中央会议，决定不顾蔡、胡原有友谊，由陈独秀起草《中国共产党对时局的主张》，认为“好人政府”主张，会阻碍革命，是改良的幻想。

过了几天，胡适在自己办的《努力周报》上说，蔡元培“这一次的抗议，确然可以促进全国国民的反省，确然可以电化我们久已麻木不仁的感觉力”。

陈独秀忍不住了，蔡元培依赖少数人消极的拆台政策来打倒恶浊政治，未免太滑稽了，太幼稚了，太空想了。陈独秀甚至由不合作主义而想到鼠疫、霍乱等传染病。情急之下，他写了《评蔡校长宣言》，并用了“罪大恶极”等语。

见到《向导》周报上署名“独秀”的文章，胡适很生气，陈独秀虽然没有点他的名，却字里含讥，一看就有自己的影子。1月28日，胡适又著文说：国家太混浊黑暗，民族太怯懦无耻不爱自由，所以不保不有蔡先生这种正义呼声使我们不好过、难为情。

见胡适把不合作叫主义，陈独秀隔日又发表文章，说不合作主义“引导民众集中到消极的和平退让的路上去”，这次陈独秀点了胡适的大名。

2月4日，胡适也点了陈独秀的名，胡适写道：“蔡先生的抗议在积极方面能使一个病废的胡适出来努力，而在消极方面决不会使一个奋斗的陈独秀退向怯懦的路上去”。在这前几天，《晨报》也发表文章驳陈独秀，说：“劳动阶级的罢工，也是一种‘不合作主义’的表现”，难道我们“连罢工也不赞成吗？”

胡适毕竟是朋友，隔几天总要见见面，《晨报》就不同了。2月7日，陈独秀在《向导》上发表答《晨报》记者的文章，坚持认为要在思想界做防御鼠疫霍乱的工作。

就在这一天，发生了二七惨案，吴佩孚镇压京汉铁路大罢工工人，并通缉陈独秀等人。这场围绕蔡元培不合作宣言而展开的陈胡笔战，也随之结束。

◎酷暑中续求

1931年夏天，被中共开除党籍、正卷入托派漩涡中的陈独秀冒酷暑给蔡元培去信，请他保释5月被捕、关在中央陆军监狱的郑超麟。以前陈独秀就郑被捕事给蔡元培写过一封信，蔡给军政部写了一封保释信，但没有结果。

八九年前那场关于不合作争论之后，陈、蔡私人交往越来越少，到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两人已是在两个营垒作战。当时蒋介石反共清党，主要依靠吴稚晖、李石曾、张静江、古应芬、陈果夫、李宗仁、黄绍弘等人，其中也有蔡元培。蒋介石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时，由蔡元培授印并发表演说，指责武汉国民政府是“受共产党妨害”。

对于蔡元培附和蒋介石反共，陈独秀知道是吴稚晖干的好事。罗文干案后，蔡元培辞去校长职务，到国外一直呆到1926年回国，并不知道国内形势的变化，后经吴稚晖介绍认识了蒋介石，作为国民党中央监委参加了清共活动。

汪精卫七·一五叛变后，蔡元培逐渐看出蒋介石的豺狼本

性,辞去一切职务,只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后在蒋介石下野复职等问题上开罪于蒋介石,并与宋庆龄、邓演达、杨杏佛积极建立反蒋的第三势力。

陈独秀被中共中央开除党籍后,开展了托派活动,这种情形使陈蔡二人殊途同归,又各自相向走近了一步。1929年冬天,蔡元培还给李季的《马克思传》写序,说:“今人以反对中国共产党之故,不敢言苏联,不敢言列宁,驯致不敢言马克思,此误会也。”不同的是,蔡元培是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院长,陈独秀是国民党通缉的在逃要犯,因此有什么事时,陈独秀便请蔡元培帮忙,蔡是决不会卖他邀功的。

住在霞飞坊72号的柏烈武将陈独秀的信转给了蔡元培。陈独秀写道:“不审先生已完全康复,能为郑生作一短函否?闻该监狱近来保释之人颇多。酷暑中续求,惶恐无似。”

蔡元培见到陈独秀来信后,当日给军政部长何应钦写了一封请求保释郑超麟的信。8月25日,即在陈独秀给蔡去信一个月后,何应钦复函蔡元培,答应“免保出监就医”。尽管后来没有保释其出狱,也算纸面上给了蔡元培的面子。

1932年春天,和郑超麟一起被捕的濮德志因狱中流行病,保外就医,郑超麟反而没有保释出来。濮德志是怀宁人,与陈独秀是亲戚,托派开统一大会时,也被选为托派中央委员。从狱中出来后,想找个工作混口饭吃。因为陈独秀不能找工作,濮有了生活来源,就能接济陈。想来想去,陈独秀打算再给蔡元培去一封信。

“要把你我关系讲密切些,才会引起蔡的重视。”濮德志一边帮陈独秀备好笔墨,一边提醒他说。

陈独秀点点头,说:“就讲你刚从日本回来,才碰到我,一年

以来一直照料我的生活。”

“对！对！现在失业了，不能再接济你了。不能讲我刚从狱中出来。”

“嗯。蔡就怕我的政治朋友，他周围都是国民党要人，也难怪他。”陈独秀若有所思地说。顿了一会，陈独秀指着桌上的药说：“此肠胃药还是蔡元培令亲周仲奇先生来开的。”蔡元培1923年7月娶周怒清女士为妻。

“看来先生与蔡先生常来往？”

“认识周医生是金家凤介绍的。这一阵子也确实找过蔡几次。去年深秋，为陈训丹找工作，也给蔡先生去过函。”陈独秀说。

“找到了吗？”

“蔡为人不错，你既找了他，他总是乐意帮忙的。”陈独秀看了濮德志一眼，说，“再说，也没有更好的法子了。”

这次，陈独秀又请柏文蔚将信转给蔡元培，蔡元培四处托人为濮德志找工作，找了中山大学罗家伦校长、暨大沈鹏飞校长，又找了商学院裴复恒校长等，因为陈独秀讲濮曾在沪、皖任教，所以蔡在大学为濮找事。后来几经周折，濮德志到上海招商局月刊任编辑。

◎营救陈独秀

1932年10月15日，陈独秀在上海岳州路永吉里11号宅中被捕。10月19日，陈独秀被押往南京。在北京大学任文学学院院长胡适给蔡元培拍了一份电报：“请就近营救陈独秀”。

蔡元培此时已由南京到上海。1931年“九一八”后，蔡对蒋政权更加不满。1932年春，蒋汪再次合流，行政院长汪精卫希望蔡留在南京支持国民党政府，蔡坚决拒绝了。

10月下旬，蔡元培、杨杏佛、林语堂等人聚在上海法租界亚乐培路331号（今陕西南路147号）中央研究院出版品国际交换处，商量成立民权保障同盟问题。

“蔡院长，陈独秀被押往南京是凶多吉少啊。”三十八九岁的江西人杨杏佛1927年春和陈独秀一起参加了上海第三次武装起义，这几年一直和蔡元培在中央研究院工作，目前单身住在这里。

蒙着绿丝绒桌布的圆形会议桌面上，摆着几张载有陈独秀被捕消息的《申报》、《晨报》。蔡元培端坐着，脑子里想着不久前陈独秀还来信请他为濮德志找工作的事，心中有些伤感。听到杨杏佛的声音，蔡元培“嗯”了一声，说：“《晨报》的社论写得好，陈独秀已被共产党除名，现在虽反对国民党，实与西方共产党议员差不多，没有什么不合法的。眼下我们正在筹建民权保障同盟，陈独秀对国民革命也有贡献，不可不救。”

“听说适之今天来了电报？”在北大任过教授的林语堂问，他比杨杏佛小两岁，讲话带福建口音。

“适之叫我就近营救。陈独秀一生多难，民国八年、十年、十一年被捕，适之都参加了营救。”蔡元培说话声音很低，已陷入对往事的回忆。

“我看速拟一快电致南京国民政府，同时将电文交《申报》发表。”杨杏佛血性浓，办事明快。

蔡元培点点头：“仲甫是文化中人，宜多几个人联名致电，同时要致电中央党部，目前此案由他们经手，对陈独秀很不利。”蔡

想到陈案特殊，多些人署名与一个人署名有不同意义。

“陈君病中被捕，也怪可怜，据说这几年隐居上海，并无生活来源。电文宜多讲其早年贡献。”林语堂说。

最后电文署名的有蔡元培、杨杏佛、柳亚子、林语堂、潘光旦、董任坚、全增嘏、朱少屏共八人。以快邮代电寄往南京。

在蔡元培等人多方营救下，蒋介石做了顺水人情，饶了陈独秀一命，将陈案交江宁地方法院审理。1933年4月，陈独秀被判刑13年。

汪孟邹为接济陈独秀，拟重印《独秀文存》，找到蔡元培，请他写《前言》。蔡元培在北京聘陈独秀到北大，汪孟邹也在场，两人也是多年的老熟人了。蔡元培欣然应允。他说：“我很佩服他的毅力与责任心。”陈独秀在狱中听说蔡肯为《独秀文存》写前言，很感动，说：“在大节上，蔡先生是能坚持真理的。”

1933年1月初，国民党南京市党部以“替反动张目”为名对蔡元培等人提出警告，指责他要求释放陈独秀“为清议所不直”。这年2月，南京市党部作出决议，通电全国警告宋庆龄、蔡元培“妄保反革命及共党要犯”。宋庆龄也于1932年10月底为陈独秀事去宁汉，准备和蒋介石夫妇面谈。

1933年2月12日，《申报》刊出南京市党部对蔡、宋的警告，此事陈在江宁候审期间就听说了。濮德志在狱中和陈独秀谈起蔡元培，陈始终没有讲蔡先生坚持的真理是指什么，但濮德志猜是指蔡元培倾向进步革新。

陈独秀在狱中受到优待，后来狱方同意濮德志、罗世凡出入陈的狱室，以照顾陈的病。一次陈独秀回忆起北大生活，说蔡元培“兼容并包”，容忍辜鸿铭摆臭架子，也容许新派鼓吹主义，是个好好先生。

1937年8月,陈因抗战爆发提前出狱,9月去武汉。此时蔡元培在上海,11月27日,蔡在上海沦陷半个月后避往香港。

◎心中无数伤疤又多一伤痕

1940年3月5日,74岁的蔡元培在香港养和医院逝世。

当时陈独秀住在江津黄荆街83号。3月中旬的一天,何之瑜来访,何问:“先生近来可好些?”

“好些。”陈独秀答道。上个月何之瑜陪陈独秀去重庆看病,知道陈独秀的心脏不好。

何之瑜是北大学生,现在江津第九中学教书,受北大同学会委托,照顾陈独秀。

“蔡校长去世,先生听说了?”

“听说了。”

“有空望先生为蔡校长写篇纪念文章”,何之瑜说。这不是他个人意见,是北大同学们的意见。何说着将一封信递给陈独秀。陈到重庆后无生活来源,一直受北大同学救济。

“我在金陵狱中,时常受到蔡先生照顾,今蔡先生先我而死,是心中无数伤疤又多一伤痕矣。”陈独秀说话时十分伤感,小而发亮的眼里湿润润的。看完北大同学的信,他答应尽快作一篇纪念文章。

何之瑜走后,陈独秀郁郁寡欢。潘兰珍问:“为什么不开心?”潘兰珍不认识蔡元培。但高君曼认识,还在一起吃过饭。1920年在上海一品香送蔡校长赴法,记得高君曼也去了,但高谢世竟也10年了。

“我每次入狱，蔡先生都发援救电文，此次在金陵狱中，又承蔡先生照顾。蔡先生去世，实在是件令人痛心的事。”因为考虑写文章，陈独秀叫潘兰珍沏了杯浓茶，自己找根烟点了。

眼下正是“二月春风似剪刀”的节令，听到窗外树上的鸟叫，陈独秀丝毫没有触动，写出来的文字也是干巴巴的，人是江郎才尽了，文也充满了惆怅和暮气。因为是约稿，陈独秀在写了蔡先生坚持大节和容纳异己这两点美德后，用大段文字讲了蔡先生、适之及自己在五四运动中的作用。

这篇悼文没有如北大同学信中所说，刊在公祭蔡先生的特刊上，而是刊在当年3月24日的《中央日报》上。全文不长，只有两千来字，题为《蔡子民先生逝世后感言》。

陈独秀在重庆刚看过病，估计自己不久于人世，文中他用了“后死的我”四个字。两年后，陈独秀病逝。陈与蔡同属兔，但比蔡元培小12岁，晚去世两年，寿命整整少10年，病逝时仅64岁。

第三章

回头“浪子”与哲学博士

——陈独秀与胡适

◎文学界的雷声

1915年9月15日，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青年杂志》创刊号出刊后，一天，汪孟邹向陈独秀推荐说：“我有位在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学哲学的老乡，此翁聪明好学，小说文论具佳。”

“你是说胡适么？”陈独秀冲口而出。

“你怎么知道？”汪孟邹感到奇怪。

“《甲寅》在日本曾收到一位留美青年的信，提出输入外国文明，要有明达君子的赞助。我印象极深，想不到竟是你的老乡。”

胡适年初在美国康乃尔大学文学院读书时，将暑假中所译的《柏林之围》寄到《甲寅》，章士钊在第四期上发表。陈独秀夏天来日本，章士钊对陈独秀提到胡适。

陈独秀边说边找出几本《青年杂志》，要汪孟邹寄给胡适：“代我向他约稿，言语写恳切些。”

1915年10月15日，陈独秀编出《青年杂志》一卷二号；11月15日又编出一卷三号。每新出一期，陈独秀都要问汪孟邹：“你的美国老乡有消息吗？”

汪孟邹知道陈独秀是急性子，见胡适不回信，也着急了，说：“我每次寄刊给他，都向他催稿，今日我再给他去一封信。”

陈独秀说：“西方文明、美国文明急需引入国内。你把话言重些，就说我盼胡先生来稿，胜于儿童盼过年，一次哪怕只有一个短篇也是好的。”

胡适迟迟不来信，也有他的道理。此时，胡适已到纽约入哥伦比亚大学向杜威学习哲学。在康乃尔大学，胡适学到的是批评实验主义的康乃尔哲学。汪孟邹来信，提到陌生的安庆人陈独秀和同样陌生的《青年杂志》时，正处于他哲学观点180度大转弯的时候，所以他没有及时给汪孟邹和陈独秀回信。11月10日，在哥伦比亚大学佛纳尔得馆宿舍，他给章士钊去了信，《甲寅》刊出他翻译的短篇小说《柏林之围》，也该回信了，再则，手上又有一篇《非留学篇》也可在《甲寅》刊出。

1916年2月3日，是中国农历正月初一，是一年开头的好日子。大洋彼岸的胡适终于给陈独秀来信了。老乡汪孟邹的一封封来信和《青年杂志》署名陈独秀的一篇篇文章，使他越来越多地受到了感染。

陈独秀收到胡适的信，十分高兴。他对汪孟邹说：“适之第

一次来信,就提出改造新文学的意见,使人耳目一新。”胡适在给陈独秀的信中说:“今日欲为祖国造此文学,宜从输入欧西名著入手,使国中人士有所取法,有所观摩,然后乃有自己创造之新文学可也。”

陈独秀不知道,半年前,即与他创办《青年杂志》同时,胡适在《送梅觐庄往哈佛大学》诗中就提出文学革命了。胡适在诗中写道:

神州文学久枯竭,百年未有健者起。
新潮之来不可止,文学革命其时矣。

就在给陈独秀写信的同一天,胡适在给梅觐庄的信中提出文学改良从三事入手:“第一,须言之有物;第二须讲文法;第三,当用‘文之文字’时不可避之。”

汪孟邹见陈独秀高兴,也乐呵呵地问:“何时回信?”

陈独秀知道胡适一时没有译作来,说:“适之答应新年有见赐。等来稿后,我再一起去信。”胡适在信中说:“译书须择其与国人心理接近者先译之,未容躐等也。”

给陈独秀的信发出不久,胡适接到老家绩溪的信,其大哥、大姐及在广德的未婚妻江冬秀的母亲最近都相继去世了。胡适心情不好,但还是未忘记兑现给陈独秀的许诺,译了《决斗》寄给了陈独秀。

陈独秀正在为《新青年》二卷一号筹稿,收到胡适译作,马上给胡适写了录用通知,信上希望胡适“多译短篇名著若《决斗》者,以为改良文学之先导”。

胡适收到陈独秀信十分高兴,他没有想到自己的文学改良

主张在国内得到了这样大的支持。相反,他和老朋友梅觐庄讨论文学改良却遭到了梅的激烈反对。上个月,梅觐庄在来信中还讽刺他说:“皆喜诡立名字,号召徒众,以眩骇世人之耳目,而已则从中得名士头衔以去看。”

看了几遍陈独秀的来信,胡适回了一封信,顺便对以前汪孟邹寄来的《青年杂志》上刊出的谢无量诗提出异议,当时胡适正热衷尝试写白话诗,所以容不得陈独秀称赞谢无量的长律为“稀世之音”。

10月1日,陈独秀编出《新青年》二卷二号。使陈独秀得意的事是,他第一次发表了大洋彼岸胡适几个月前寄来的信。尽管这位未见面的朋友对他在一卷三号谢无量长诗前写的按语不以为然,字里行间流露了不屑一顾的神气。谢无量长诗84韵,胡适发现其中用古典套语不下百余事,要么用典不当,要么文法不通。他想不通陈独秀为什么对这种诗评价如此高,忍不住问道:“诚以足下论文已知古典主义之当废,而独极称此种古典主义下下之诗,足下未能免于自相矛盾之诮矣。”

陈独秀和谢无量是十几年的老关系,1904年就在一起办《国民日报》,胡适当然不知道这层关系。说自己“自相矛盾”,话虽言重,却也还能接受。陈独秀尤其欣赏此翁在信中提出的文学革命的八不主义,确实眼光敏锐,令自己嗟哦半日。

胡适在信中称赞陈独秀:“洞悉世界文学之趋势,又有文学改革之宏愿,故敢贡其一得之急。”这几句客气话,像闷热的季节刮来的清风,使陈独秀心里乐悠悠的。陈独秀细读胡适的八不主义,除了对第五条讲文法之结构、第八条讲言之有物感到不甚理解外,其余不用典、不用陈套语、不讲对仗、不嫌以白话作诗词等,陈独秀视之为中国文学界的雷声。胡适的名字由此风靡学

界,这也是陈独秀、胡适本人始料不及的。

《新青年》二卷二号编好后,陈独秀于10月5日给胡适写了一封信,希望胡适作写实文学,切实作一改良文学论文。胡适提出文学革命八不主义理论,但写实诗文为何物,陈独秀也没有见过。解铃还需系铃人,既然胡适提出八不主义,当然应由胡适为国人拿出写实诗文之范本。

《新青年》二卷一号刊出胡适小说译作《决斗》,但校对失误不少,陈独秀在信中抱歉地说:“下次来文当亲为校对,以赎前愆。”

◎以为吾友之声援

1916年11月下旬,陈独秀和汪孟邹为亚东图书馆招股事到北京。经沈尹默、汤尔和推荐,蔡元培聘请陈独秀到北京大学任文科学长。

因为办《新青年》,陈独秀对到北京来有些犹豫,他想让胡适任文科学长。汪孟邹曾提到过胡适明年夏季回国找工作的事,便向蔡元培推荐了在美国读书的胡适。

胡适是谁,蔡元培并不清楚。他沉吟了一下,聘陈独秀代他写一封信,请胡适到北大任文学教授或哲学教授。蔡元培解释说,北大学长月薪300元,重要教授也有此数。

陈独秀觉得有理,连连点头,说:“我一回上海,就给他去信。”

1917年1月,陈独秀从北京回到上海,着手编《新青年》二卷五号。在一叠信中,他发现一封寄自美国的厚厚来信,知道是

胡适来稿。两个月前,胡适写了《文学改良刍议》一文,复写了三份,一份给了自己主编的《中国留美学生季报》,一份给了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胡适写道:“此八事皆文学上根本问题,一一有研究之价值,故草成此论,以为海外留心此问题作一草案。”陈独秀一口气读下来,快慰无比。以前他和人议论中国近代文学史,提出施耐庵、曹雪芹的价值远远高于散文家归有光、姚鼐,别人总是疑惑不解,想不到远在天边的胡适也是这个观点。

编好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陈独秀兴冲冲地写了读后感。他写道:“白话文学,将为中国文学之正宗,余亦笃信而渴望之。吾生倘见其成,则大幸也!”又趁兴给胡适去了一封信,将自己推荐胡适去北大,蔡元培同意聘请的事说了。信上说:“蔡子民先生已接北京总长之任,力约弟为文科学长,弟荐足下以代,此时无人,弟暂充之。”末了,陈独秀再次提醒胡适给《新青年》来稿,至少一月一篇。

1917年1月底,陈独秀忙着编《新青年》二卷六号。作为文学革命倡导者,在急先锋胡适写出《文学改良刍议》一文后,自己必须表明态度,以作呼应。他伏案疾书:“文学革命之气运,酝酿已非一日,其首举气义之急先锋,则为吾友胡适。余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涨‘文学革命军’大旗,以为吾友之声援。旗上大书特书吾革命军三大主义,曰,推翻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结尾,他号召大家与十八妖魔宣战:“予愿拖四十二生的大炮,为之前驱!”

所谓“十八妖魔”,就是领导明代文风的“前七子”和“后七子”,再加上明代古文大家归有光、清代方苞、刘大魁、姚鼐。尽

管后三人是自己的桐城老乡，陈独秀也顾不得了。陈独秀很满意这篇文字，他相信，这是一篇号角性的文章。

胡适正在杀青已进行了8个月的博士论文——《中国古代哲学方法之进化史》。接到陈独秀寄来的《新青年》二卷六号，胡适对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看了一遍又一遍。见北大教授陈独秀称自己是首举义气之急先锋，胡适由衷地笑了。想不到自己还未回国，就得到这位未谋面的朋友的赏识，被这位急性子朋友称为急先锋。

4月9日，胡适提笔给陈独秀写信，对他的文学革命三大主义表示均极赞成，既然摆开阵势，那就奉陪到底罢。林琴南《论古文不当废》是冲着自己来的，至少和自己观点相左，当然是不能容忍的。想到这里，胡适又加了几句评论。他知道，他的每一封信，陈独秀都会不失时机地刊在《新青年》“通信”栏里。这也是他引为愉快的事。

陈独秀对胡适的话也不是每言必信。他见胡适与林琴南等复古派摆开切磋研究的架势，连连摇头。他认为，自由讨论是学术发达的原则，但要坚持以白话为文学正宗，就不能容忍反对者有讨论余地。

一天，陈独秀和钱玄同谈到此事，说：“胡适在美国留学七八年，好像学生味浓了些。”

古典音韵学教授钱玄同很赏识这位留学生的文章，说：“胡适的建议有重要的意义，不过我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不知他有什么意见。”

“三卷一号怕刚刚到美国，适之还没有收到。我们这么重视这篇文章，我想他会高兴的。”陈独秀说。

5月9日，正在准备参加博士学位考试的胡适收到《新青

年》三卷一号,见北大两位教授重视自己的建议,不禁受宠若惊。看得出,这位未见面的钱玄同先生和陈独秀一样,是个文学革新派,但比自己和陈先生更激进。作为皖人,胡适注意到这两位教授的观点是有区别的。陈独秀叫“十八妖魔”,钱先生则称为“选学妖孽”、“桐城谬种”。陈独秀毕竟是安庆人,对于桐城派至多称其为“妖魔”;江浙人钱玄同就没有了这份顾虑,大呼其为“谬种”。也是一个山东好汉、李逵式的人物,胡适一边看一边独自笑了起来。

第二天胡适给陈独秀、钱玄同回信说:“通信栏中有钱玄同先生一书,读之尤喜。适之改良文学一论虽积思于数年,而文成于半日,故其中多可指摘之处,今得钱先生一一指出之,适受赐多矣。”陈、胡、钱三支大笔终于走到一起,一时文学革新派声势大增。

9月初,白桦树散发出令人心旷神怡的初秋气息,一阵风过,冷落的北京箭杆胡同9号陈独秀门前,又增加了几片落叶。

“陈先生在家吗?”陈独秀寓所外,传来一位年轻人的声音。

陈独秀打开门,门前的石阶下面站着一位约莫二十七八岁的年轻人,一头乌黑油亮的短发,脸稍长,隆直的鼻梁上架着一副黑边眼镜,留着短髭的嘴微微咧开。

“是适之啊!快请进来。”陈独秀连忙说。

“忙啊?”胡适接过陈独秀递过来的扇子说。

“不忙,不忙。”陈独秀将桌上摊开的稿纸移到一边,替胡适倒了一杯茶。“平常和玄同谈的多。现在好了,谈话又多了一个。路上走了多长时间?”

“走了整整一个月。”胡适是6月9日离开纽约归国,经加拿大、日本东京、神户,于7月10日到达上海。后回绩溪看望母

亲，到旌德看未婚妻江冬秀，于秋季开学之前赶到北京大学。

“走了这么长时间？”

“从纽约到上海，按中国的数法，有二万八千五百英里。”胡适说。

“还不到孙猴子半个筋头。”陈独秀笑着说，“这次回乡有什么感受？”

“陆放翁词云：‘重到故乡交旧少。凄凉。却恐他乡胜故乡。’海上航行，见月色皎好，我即想到这首词，这次回乡还是这个感受。”胡适说。

“好！好！”

“听说北大校风不太好？”胡适喝了一口茶说。

“嗯。”陈独秀点了点头：“学生不好学，逛妓院、打麻将，教师因循守旧，抱残守缺。蔡校长广聘名流学者，下决心改造北大，你来的正是时候。”

“都聘新教师，老教师怎么办？”胡适扶了下眼镜问，他主张新旧并立。

“蔡校长主张兼容并包，新旧并立。他这样做，也有他的苦衷。我倒不反对新旧并立，新的东西也许会变成旧的东西，革新派将来也可能变成保守派呢。”陈独秀见胡适若有所思，忙解释说：“辜鸿铭讲课，至今还有一位仆人在课堂上为他装烟倒茶，讲课时慢慢吞吞，学生在下面干着急。”更可笑的是，拖着长辫子的辜鸿铭还专门找了一个留着长辫子的包车夫，在教室外面等他。

“蔡校长也不管吗？”胡适对北大容忍“老妖怪”如此放肆有些惊奇。

“蔡校长也没有办法，只好听之任之。”陈独秀嘘了一口气，像是自己闷了一肚子气。

“你的中国哲学史准备得怎么样了？”陈独秀问。胡适到北大任中国哲学、中国哲学史教授。

“没有问题。我的博士论文写的就是中国哲学史。”胡适轻松地说。

谈了一会，陈独秀提到汪孟邹，陈独秀说：“孟邹说你学名叫洪骅，怎么后来叫胡适了呢？”

胡适笑着说：“1898年，赫胥黎《天演论》‘优胜劣汰，适者生存’刚流行时，我才八九岁。一天，我请二哥帮我起一个表字，二哥正在洗脸，他脱口而出，‘适者生存’，就叫胡适吧。”

陈独秀哈哈大笑，说：“这个名字好，和进化论连在一起，你二哥也算是新派人物。”

◎自古成功在尝试

1917年11月9日陈独秀编《新青年》四卷一号时，刊登了胡适、沈尹默、刘半农的白话诗。胡适的诗是《人力车夫》。过了一个月，《新青年》四卷二号又刊登胡适新诗《老鸦》。胡适写白话诗最早，在美国上课之余，他有意作一些有韵文的白话诗。陈独秀编《新青年》二卷六号时，就刊出了胡适从绩溪老家寄来的《窗上所见口占》，诗云：

两个蝴蝶，双双飞上天。
不知为什么，一个忽飞还。
剩下那一个，孤单怪可怜；
也无心上天，天上太孤单。

胡适用白话写诗,使人读后耳目一新。陈独秀知道胡适希望出几个白话的苏东坡,乐得成其宿愿,将其刊出。“两个蝴蝶”指谁呢?“一个忽飞还”是指自己,“剩下那一个”大约不是指江冬秀吧?或许是指留在美国的某某也未可知。

1918年2月的一天,陈独秀和来访的胡适谈到新诗话题。陈独秀问:“怎么得罪柳亚子的?”陈独秀知道,胡适写白话诗有不少异议。梅觐庄对胡适的新诗不屑一顾,视为“莲花落”,讽刺胡适是革尽古今中外诗人命。朋友赵元任则讲胡适的白话诗“不够白”。南社的柳亚子也有非议。

“柳亚子给永叔写信,说我‘自命新人’,就因为我讲过‘南社不及郑陈’的话,无非说我以资格论人。”胡适笑着说。

“明白了。”陈独秀点点头。

“柳亚子说‘形式宜旧,理想宜新’,‘理想宜新’没有话说,‘形式宜旧’成什么理论?南社为什么还作《清庙》、《生民》这样的诗呢?”

“此话不错。”

胡适见陈独秀点头应允,接着说:“陆放翁有诗云:‘斜阳徒倚空长叹,尝试成功自无古。’陆放翁的话未必是,我主张‘自古成功在尝试’。仲甫,你这位急先锋何时也尝试尝试呀?”

陈独秀笑,说:“你是受人攻击,发誓作出白话诗,我们都成了你的试验田了。”陈独秀说“我们”,主要是讲沈氏兄弟等人,因为自己写新诗极少,写新诗最多的是沈尹默,其次是沈兼士、胡适。

对于沈氏兄弟走到胡适前面,胡适十分高兴,但嘴上还是说:“哪里,哪里。”

陈独秀拿出《丁巳除夕歌》，说：“去年除夕作了一篇。”

胡适“哦”了一声，忙接过来看，上面写道：

人生如梦，
日月如梭，
我有千言万语说不出，
十年不作除夕歌，
世界之大大如斗，
装满悲欢装不了他，
万人如海北京城，
谁知道有人愁似我？

胡适见陈独秀借谈我和“他”（年关），怨恨人间不平，世道不公，沉吟了半晌，问：“不是说你家很有钱吗？”

“谁说的？”陈独秀反问。

陈独秀到北大后，嗣父陈昔凡在北京的铺子掌柜找到陈独秀，请“小东人”赏个脸去一趟铺子。胡适指的是这件事，说：“你家不是在北京开有铺子吗？”

陈独秀摇摇头，忧郁地说：“嗣父曾经发了一点财，不久就破产了。而且，因为恋爱和别的事，嗣父生前就和我断绝了关系。”

胡适哪里知道，陈独秀写“除夕歌”另有苦衷。这时，高君曼和陈独秀已有磕磕碰碰。陈独秀在事业一凡风顺，春风得意，各种攻击也随之而来；高君曼听信流言，认为陈独秀常逛八大胡同、沾花惹草，吵嘴时骂丈夫是无耻之徒。陈独秀讥讽高君曼故作清高、资本主义情调。清官难断家务事。陈独秀比胡适年长，胡适不好问，陈独秀也不说。因为这难言之隐，所以陈独秀说

“万人如海北京城，谁知道有人愁似我？”

闲谈了一会，陈独秀笑着说：“这次回绩溪完婚，老兄是一脸喜气，作了不少新诗吧？”

“新诗作了五首，正要请老兄帮助删改。”说着，胡适从皮包里拿出一叠诗稿。

“春节前，你寄给玄同，我和尹默就看到了。我很赞成把这一首刊出来。”说着，陈独秀抽出《新婚杂诗》中的一首，在手中扬了扬。诗云：

十三年没见面的相思，于今完结。
把一桩桩伤心旧事，从头细说。
你莫说你对不住我，
我也不说我对不住你——
且牢牢记取这十二月三十夜的中天明月！

陈独秀从“完结”两个字隐隐约约中看出了胡适与江冬秀之间的裂隙，一个是留洋的教授，一个是未见世面的农村姑娘，没有裂痕才怪呢。但新婚燕尔，不可造次，一向喜欢打诨取笑的陈独秀张了张嘴，没有说出来。

“谢谢你捐的钱。”胡适见陈独秀欲说又止，忙提到另一件事。为了帮助无力入学的青年，胡适在北大发起了“成美学会”，陈独秀捐助了120元钱。

“没什么。你老弟做事，我还能袖手旁观吗？”陈独秀起身给胡适加水，“什么时候吃你的喜酒？”陈独秀想起胡适在玄同信中说的话，等请他们的客。

胡适看着陈独秀眨了眨眼，没有反应过来。

“自己讲的话都忘了，你不是在给玄同的信中许了愿么？”陈独秀提醒他。

“啊？”胡适突然想了起来，“哈哈，这个玄同，我当什么事，那是自然。”

“算了，还是等新夫人来了，再请我们吧。”陈独秀顿了一下，问：“什么时候接新娘来呀？”

“等暑假吧。”

陈独秀《丁巳除夕歌》刊在1918年3月15日《新青年》四卷三号上。同期刊出王敬轩《给新青年编者的一封信》和记者《复王敬轩》两文。

“王敬轩是谁？”在北大红楼文科学长办公室，胡适睁大眼睛问陈独秀。

“玄同呀！”陈独秀没有注意胡适吃惊的脸。

“‘记者’是你么？”胡适又问，依然是吃惊的神色。

“是半农。”这回，陈独秀注意瞧了一眼胡适。

“一定是刘半农的主意。”胡适听说是刘半农，便有了气。

胡适对刘半农出言不逊，事出有因。刘半农曾在法国人面前大谈音韵，碰巧对方是位音韵学家，一反驳，叫刘半农出了洋相。胡适因此笑话他。

刘半农对胡适也当仁不让。胡适有一次讲，北大有三只兔子，老兔子蔡元培（生于同治元年丁卯），中兔子陈独秀（生于光绪五年己卯），小兔子是胡适（生于光绪十七年辛卯）。一时盛传“北大添个年青人，玉兔常伴月照明”。小玉兔伴月生辉，兔倚丹桂，校园溢香。在北大，小兔子除了胡适，还有刘半农、刘文典，他们三人都是辛卯年（1891年）生。既然是三只小兔子，刘半农就不高兴了，说：“胡适借此抬高自己。”陈独秀知道胡适和刘半

农之间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劝解说：“半农也是好意。”

事情起因于1917年2月8日，林纾（即林琴南）在上海《民国日报》发表《论古文不当废》反对陈独秀、胡适的白话文运动。为了出气，钱玄同、刘半农演了这台双簧戏，由钱玄同化名王敬轩扮作林纾支持者，再由刘半农写文章反驳王敬轩。

“我不这样看。化名写这种游戏文章，不是正人君子所为。外人知道了，也会笑话《新青年》。”胡适一向主张新旧学说并立，相互切磋。

“这样制造一点气氛，也无不可。”陈独秀说。

胡适见是陈独秀自己的意思，忍了忍，不好多说。再说自己在美国对林纾的《论古文不当废》不也提出异议了吗？

一个月后，一位自称“崇敬王敬轩先生者”给陈独秀写信，质问《新青年》记者为什么对王敬轩肆意侮辱。过了几个月，陈独秀给“崇敬王敬轩先生者”写了一封信，说：“对于违背常识，闭眼胡说的妄人，不屑与辩，唯有痛骂一法。”

对于陈独秀的“不屑与辩”，胡适难于接受。一日，胡适和陈独秀谈到中国文字发展方向问题，胡适说：“我很赞成你的废汉文存汉语，用罗马字母书写的观点，但在汉语和拼音字母之间，怕少不了一个白话文环节。”

陈独秀看了一眼胡适，笑着说：“你是反对走极端，尽量缓和与反对派的关系。”

“你主张不容许反对派讨论之余地，怕是行不通。”

“噢？”陈独秀等待胡适下文。

“只要议论平心静气，反对有理有据，《新青年》都要欢迎，不能不容人以讨论。”胡适说话时扶了一下眼镜。

“你这样做，只怕反对派以为你是《新青年》中的异端，是反

对文学革命的呢。”陈独秀笑着说。

“不要紧，观点一致的人，见解还要分先后快慢呢。”胡适说。

◎头巾见解

1919年2月，《神州日报》发表《半谷通信》，说陈独秀、胡适、陶孟和、刘半农等人，以思想激烈，受到政府干涉，陈独秀已去天津，态度消极云云。

开始陈独秀、胡适等人没有在意，只是打听清楚《半谷通信》即张繆子所写。“繆”，半谷也。张繆子即张厚载，是北京大学学生，兼《神州日报》记者。陈独秀见是“张繆子”，似曾相识，突然想起此人1918年曾给他来信，谈及新文学及中国旧戏问题，被自己狠狠地批评了一顿。

“此老弟对我的《尝试集》还有怪论。”胡适也想起来了。一年前，张厚载对胡适编《尝试集》有微词，说胡适“轻于尝试”。当时，胡适没有把张厚载看成旧派人物，还在《新青年》四卷六号上给他平心静气地回信，解释他尝试作白话诗，正是试验白话韵文是否有成立之价值。

陈独秀、胡适等人名气很大，张厚载的言论立即被上海等报刊转载，《神州日报》一时走俏。张厚载见陈独秀等人缄默，以为抓住了把柄。3月，又在《神州日报》上说：“蔡校长对于陈学长辞职之说，也没有否认。”

陈独秀正忙着《新青年》与《东方杂志》的论战，又把注意力放到第一次世界大战胜利后的巴黎“和平会议”上，所以没有顾上张厚载的攻击。胡适对陈独秀热衷于政治不感兴趣，所以去

年底陈独秀、李大钊创办《每周评论》，胡适反倒松了口气，这样《新青年》的政治味就会淡下来。加上母亲刚去世，夫人江冬秀怀孕临产，所以胡适也没有把这件事情放在心上。

3月上旬的一天，陈独秀对胡适说：“这事我们要不要联名写个东西？”1918年10月，他们曾联名写过对易宗夔《记〈新青年〉之主张》的答复信。

胡适想了一会，说：“张厚载太不像话，虽然是冲着你来的，但也涉及到我，还是由我写个东西辟谣吧。”

陈独秀说：“也好。你写一个辟谣的东西，交给《北京大学日刊》，我再写一个东西，用在《每周评论》上。我们沉默，他们就骑到我们的脖子上来了。”陈独秀想说，你不是说要和别人平心静气地争论吗？想想没有说出来。

3月10日，胡适致函《北京大学日刊》，说：“两个星期以来，外面发生一种谣言，说文科学长及胡适等四人，被政府干涉，驱逐出校，并有逮捕的话，并说陈先生已逃至天津。这个谣言越传越远，竟由北京电传到上海各报，惹起了许多人的注意。这事乃是全无根据的谣言。”

胡适刚编出《中国哲学史大纲》，他不从夏、商、周谈起，而是从中割断，从东周谈起，在北大引起一场风波，这会刚自成其说，在学生中引起不少呼声。因此写信批评张厚载，也显出大学者雍容大度，不多计较的姿态。

几天后，陈独秀《关于北京大学的谣言》一文在《每周评论》第十三号上刊出。陈独秀的话比胡适重。说，张厚载曾因为旧戏问题，和《新青年》作对，这事尽可以从容辩论，不必藉传播谣言来中伤异己。

4月上旬，北京一些报刊攻击陈独秀不谨细行，常作狭邪之

游。蔡元培受汤尔和等人影响,也认为陈独秀私生活不检点,决定文理科由教授会领导,撤去陈独秀文科学长的职务。

见陈独秀心情不好,胡适说:“诋毁仲兄,明明是外人攻击文化运动的一种手段,汤尔和竟坠入妖术。而且,尹默、夷初从中也并没有干好事。”夷初指北大教授马叙伦。

“尹默和夷初不会吧?汤尔和大约是小人之心。”陈独秀似有所指。

“此话怎讲?”胡适不解,但他知道陈独秀不是讲蔡元培。在新旧思潮论战中,蔡元培表面上兼容,骨子里倾向新派。所以1918年底,林琴南写小说《荆生》,以田必美、狄莫、金心异影射陈独秀、胡适、钱玄同,在《妖梦》中,将元绪公比作蔡元培,都作为攻击对象。因此在大节上,陈、胡都不埋怨蔡元培。

“去年5月,汤尔和给我写信,明明西欧科学证明是常识的东西,他仍闭眼胡说。我在《新青年》四卷五号上给他回了一封不太客气的信,他一定记恨在心。”陈独秀若有所思。胡适也想起来了,说:“这就对了,这就对了。子民是非常敬重汤尔和的。真是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不管它。子民当初聘我任文科学长,我是坚持不来的。原说试干三个月,不料干了三年,离开北大只在迟早。”陈独秀说。

“此时言走尚早,你不能把我搞来你反而走了。你要沉住气。只是汤尔和这种头巾见解,我是有话要说的。有机会,我要在信中给他点破。”胡适思考一番后说。

陈独秀叹了一口气,说:“子民、汤尔和都是大学校长、学界领袖,居然也听信流言。小人真是无孔不入,可恶!可恶!”

“孟邹来信了。”胡适换了一个话题。汪孟邹在信中说:“仲甫去职,已得来讯。旧党当然以为得势,务望兄等继续进行奋身

苦战,不胜盼念之至。”

“噢!”陈独秀点了点头,说:“我已告诉他准备离职的事。”

“下一步怎么办?”

“没有想好,把《新青年》拿到北京印,事情少不了。”陈独秀说。

4月20日,胡适翻着《每周评论》第十八号,大吃一惊:“仲甫越来越左倾了。”

这一期刊登了胡适的翻译小说瑞典史特林堡著的《爱情与面包》,也刊登了陈独秀《二十世纪俄罗斯的革命》一文。陈独秀写道:“二十世纪俄罗斯的社会革命,当时的人都对着他们极口痛骂;但是后来的历史家,都要把他们当作人类社会变动和进行的大关键。”他自己就骂过,胡适记得陈独秀在《每周评论》四号上讲,十月革命“用平民压制中等社会,残杀贵族及反对者”。

“都怪汤尔和、尹默、夷初,不是他们,子民不会撤仲甫的职,仲甫也不会左倾。”胡适感到窝囊,他知道陈独秀的脾气,说不定会走得更远。

陈独秀对胡适的话不以为然:“去年3月,我就写文章赞成俄罗斯革命。”陈独秀指的是《驳康有为〈共和平议〉》一文。

但胡适的担心也不无道理。文理科合并后,马寅初任教务处教务长。陈独秀一时失落无事,便一头埋进书房,每日专做带有火药味的文章。

“孟邹那儿可有事?”4月下旬,胡适和陈独秀话别,去上海接来华演说的美国老师杜威。

“没有事,你把我的情况和他说一下。什么时候回北京?”

“不一定,要看杜威演讲的安排,至少要一个月,到上海我再写信给你。”胡适说。

◎问题与主义的论战

4月30日,胡适等人在上海码头接从日本来华的杜威夫妇,胡适安排杜威夫妇住沧州别墅,自己住蒋梦麟家。

胡适在美国就养成7点起床的习惯。5月5日早上,胡适从梦中被一阵敲门声吵醒,上海《时事新报》等几家报社记者涌了进来。“胡先生,你知道昨天的北平新闻么?”一位记者问。胡适记得他们与报馆主笔张东荪、俞仲华来采访过自己。

“什么新闻?”胡适前日陪杜威在上海演讲,自己任翻译,精力投入了些。杜威来华演讲,是陶行知和自己一手策划的,自己当然得多尽些力。上海记者突然提到北京的新闻,一时有些懵懂,但他感到一定发生了什么大事。

“昨天北平三千多学生上街游行,听说将章宗祥打了一顿,把曹汝霖的房子也烧掉了。”

“啊?”胡适大吃一惊,眼前出现了赵家楼胡同一片火光的情景。上个星期,陈独秀在《每周评论》上发表《四大金刚》一文,就点了陆宗舆、章宗祥、曹汝霖的名,他当时就感到仲甫太热衷政治。

“学生被逮捕了30多人,北平学生已经总罢课了。”另一个记者说。

“总罢课?”作为北大教授,胡适对学生不读书,而去关心政治不可理解,“不上课不影响学习吗?”

“北平政府不答应学生条件,学生不会甘休,他们已经通电全国了。”记者说。

过了几天,胡适收到陈独秀写来的信,告诉北平发生的情况,陈独秀说30多人中有江绍原等22名学生。“京中舆论,颇袒护学生;但是说起官话来,总觉得聚众打人放火(放火是不是学生做的,还没有证明),难免犯法。”信末,陈独秀担心周报要受牵连。

5月末,胡适匆匆和杜威赶到北京。这一个月在上海陪杜威,实在是因为老师面子太重,心却早飞到北京了。收到陈独秀信的同时,就听说蔡元培离京出走了。然后又收到黄炎培、蒋梦麟来信,说北大要散了;并说如果真散,他们就去南洋,到那时还要请胡适等人代编《新教育》云云。

“北大不能散,北京政府如不容北大,可迁往上海。”胡适一回到北京,对来访的傅斯年、罗家伦等人说。

上次陈独秀来信,已提到大学解散的话题。当时北洋军阀政府扬言要烧北大房子,杀北大学生,花钱买人杀蔡元培等,所以蔡元培辞去校长经天津避往杭州。

傅斯年说:“是啊!迁往上海比解散好。”胡适刚来北大教中国哲学史时异议颇多,当时黄季刚的得意弟子傅斯年对同学们说:“这个人书虽然读得不多,但他走的这一条路是对的。你们不能闹。”替年轻的胡适教授稳住了阵脚。傅斯年、罗家伦发起新潮社时,胡适也乐意做了他们的顾问。所以关于北大南迁的事,胡适首先想到了在学生中有影响的新潮社。

“不成,这样没头没脑迁到上海,不是和蔡校长一样消极么?”陈独秀对胡适的主意不以为然,听说傅斯年等人在搞签名活动,把傅斯年、罗家伦喊去说了一顿。《新潮》是在《新青年》的影响下办起来的,因此,傅、罗二人对陈独秀都很敬重,见陈不同意搬校,便收起签名簿不再吭声。

胡适知道陈独秀的脾气,也不和他计较。再说,他计划中还要陪杜威在北京、太原、济南演讲,他也没有时间和陈独秀争论。搬一所大学谈何容易,也不是他们所能左右得了的。

6月12日午后,北京城南新世界一家游乐场。陈独秀、胡适、高一涵几位安徽老乡正在喝茶聊天。

“今天杜威先生没有演讲?”陈独秀问胡适。胡适发现陈独秀说话时心不在焉,两眼来回看旁桌的人。

“没有,前日刚去手帕胡同演讲。”胡适放下手上的茶杯答道。

“是教育部会场?”高一涵问。

“嗯。”胡适点点头,他两眼被陈独秀的举动吸引住了。只见陈独秀从西服口袋里拿出传单,趁人不备,向旁桌抛去。传单上印着《北京市民宣言》。茶房里一阵骚乱,几个胆大的茶客弯腰捡起传单,四处看看无人注意,便悄悄离去。

胡适见这儿很乱,问陈独秀走不走,陈独秀按了一下西服口袋,使了一个眼色,说:“你和一涵先走。”

高一涵和胡适住在一起,两人同路,便先离开游乐场。

半夜,胡适听说陈独秀在新世界商场五楼上被逮捕了。他大吃一惊,对江冬秀说:“这个仲甫,真拿他没办法,编刊写文章还不够,偏要自己去散发传单。”

陈独秀被捕后,李大钊、周作人、胡适等12人下午7点到六味斋商量《每周评论》善后事宜,最后确定李大钊、胡适共任编辑。不久,李大钊到外地避风头,请胡适负责编辑《每周评论》。

胡适对《新青年》、《每周评论》宣传马克思主义早有看法。4月,《每周评论》发表《共产党宣言》(摘译);5月,《新青年》出版“马克思主义专号”,发表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胡适说:

“《新青年》色彩过于鲜明。”

胡适编辑《每周评论》，最头痛的事是谈不谈政治的问题。《每周评论》是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在胡适回籍奔母丧时创办的。胡适说过“二十年不谈政治，二十年不干政治”，但陈独秀、李大钊想谈政治，便办了《每周评论》。以前他们要自己为《每周评论》写稿，不得已翻译了几篇小说。现在自己编辑它，看来不谈政治是不行了了。

6月底，胡适借评论《星期评论》机会，解释《每周评论》是几个教书先生忙里偷闲杂凑起来的，从来不需要有一贯团体主张，以此冲淡《每周评论》的政治气氛。他感到这些还不够，既然无法避免谈政治，那就谈点针对社会主义、布尔什维克主义、无政府主义的基本问题吧。于是，胡适专心写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说：“空谈外来进口的‘主义’，是没有什么用处的……我主张一个一个地研究问题，一点一滴地解决问题。”

罗家伦忍不住问胡适：“这是不是杜威的实用哲学？”罗家伦给杜威当了几天速记员，记录了杜威《思想的派别》的演讲。

胡适眯着眼睛说：“也可以这样说。”

不久，李大钊从外地回来，读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生气地说：“胡适真是胡说，不懂主义，怎么研究问题？”一次胡适讲课，文言白话掺着讲，在黑板上写“孔说”、“孟说”，写到自己写了“胡说”，成了笑话。胡适自己反无所谓，索性作了一首《胡说》，讽刺“拟古”。李大钊知道胡适针对的不是别的主义，而是马克思主义；针对的主要不是陈独秀，而是自己，便挥笔写了《再论问题与主义》，迎接胡适的挑战。

《新青年》同人从李大钊的文章中闻到了火药味：“《新青年》和《每周评论》的同人，谈俄国的布尔扎维主义的议论很少，仲甫

先生和先生(指胡适)……一方要与旧式的顽逆思想奋战,一方要防遏俄国布尔扎维主义的潮流,我可以自白,我是喜欢谈谈布尔扎维主义的。”

胡适读8月17日第三十五号《每周评论》时,眉头紧锁,半日不语。

在李大钊之前,梁启超的一位朋友、《国民公报》编辑、北大同事蓝志先(公武)以“知非”为笔名写了《问题与主义》,也是针对胡适的。胡适是讲民主的,他在8月3日《每周评论》上刊登了“知非”的文章。

静下心来,胡适写了《四论问题与主义》,提出要用学理的方法,反驳李大钊和蓝志先,准备在《每周评论》上刊出。

这时发生了一件事,8月30日,《四论问题与主义》正在排版付印,徐世昌政府以公开宣传过激主义为由派警察查封了《每周评论》。几天后,胡适拉着虞春汀去警察厅找总监吴炳湘,想恢复办《每周评论》。吴炳湘对胡适说:“不要办《每周评论》了,要办报,可以另取报名嘛!”

胡适没有办法,只好点头了事。问题与主义的争论也无疾而终。

9月16日,陈独秀出狱。因身体不好加上行动受牵制,学校给假一年。一天,胡适来看他,陈独秀笑着说:“别人坐牢,你倒落得一旁打秋风。”

胡适张了张嘴,一时不知陈独秀所云,见陈以目视《每周评论》,才恍然大悟,两人一起笑了起来。原来,陈独秀在被捕半个月后,胡适在《每周评论》上发表随笔《爱情的痛苦》,送给陈独秀的话是:“爱国爱公理的报酬是痛苦,爱国爱公理的条件是要忍得住痛苦。”

胡适止住笑,说:“仲甫坐牢,我哪能讲风凉话,只是有政府和警察,不得不如此。”

10月初,周作人到缎库胡宅拜访胡适,胡适说:陈独秀在家养病,半农要去法国,《新青年》六卷六号拖了4个月还没有出来,自己想一个人编辑《新青年》。

因为以前定下来是同人轮流编辑,周作人不好表态,说:“我看还是先听听大家的意见。”

胡适见周作人犹豫,也没有多说。周临走时,胡适送给他一本自己写的《实验主义》,他希望周作人回去把自己的意见告诉鲁迅。

后来鲁迅托沈尹默带话来,说《新青年》是陈独秀一个人带来的,还是还给仲甫一人去编。胡适便不再提这事。

小雪以后,陈独秀和胡适参加了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生李超追悼会,陈独秀发表演说,胡适散发了自己写的《李超传》。散会后,两人边走边谈。胡适说:“你那篇《论“的”字用法》,我在11月22日的《晨报》上看到了。”

“没有事干,响应老弟的号召嘛。”陈独秀淡淡地说。当时胡适、止水、周建候等人对“的”和“底”的用法都有论及。胡适1916年在美国就认为“的”是“之”、“者”二字之古音,几天前又在《晨报》副刊发表《“的”字的用法》,算得上“的”字专家。训诂是陈独秀的强项,趁在家无事养身体时,陈也翻出训诂书,埋头文字学研究。

“研究文字学是不错的,它的价值不受时间限制。”胡适话里有话地说。陈独秀出狱后的布尔什维主义倾向明显,这是胡适所不愿意看到的,他情愿陈独秀写一点超阶级的文章。以前陈独秀在文章中反对过社会主义,坐牢前也还没有相信马克思主

义。在信仰社会主义方面,和李大钊比,陈独秀是一个后进。

胡适想编《新青年》,目的是改一下办刊倾向,见大伙不同意,便把精力放到给杜威演讲作翻译和别的一些事情上。

“《新青年》你可不能撒手不管!”陈独秀也听出了胡适的言外之意。出狱后,陈独秀着手编被耽误了几个月的《新青年》。《新青年》七卷一号拟在12月1日出版,上面有陈独秀写的《新青年》宣言。和以前不同的是,陈独秀明确提出我们的主张是民众运动社会改造。

“那是自然。这一期上不就有我一篇吗?”胡适指的是他刚刚翻译好的杜威讲演录《社会哲学与哲学》。

“嗯。”陈独秀漫不经心地点点头。自己已辞去文科学长一职,胡适因马寅初眼疾,被刚返校的蔡元培任命为代理教务长,特别是两人信仰上的分歧越来越大,他预料和胡适见面的机会和话题渐渐要少了。

其实,事情发展比陈独秀预想的还要快。1920年初,陈独秀应章士钊等人之邀到上海谈筹办西南大学事宜。随后胡适又推荐他去武汉高校作演讲,因没有经北京警察署同意,2月中旬回北京时差一点被捕。陈独秀打算到胡适处避一下,见不是地方,又去了李大钊、王星拱家,最后由李大钊护送陈独秀到天津。

站立在赴沪的海船甲板上,看着李大钊消失的背影,陈独秀感慨万千。他知道这是一个不同往常的离别,此去上海,不仅是他北大教授生涯的结束,也是与包括李大钊、胡适在内的北大同人共同办《新青年》的结束。用胡适的话说:“自此以后,陈独秀便与我们北大同人分道扬镳了。”

遥远的天际吹来了一阵阵凉爽的海风,随着海船渐渐南归,摆脱了北京警察逮捕的陈独秀的胸襟也渐渐宽广起来,他相信,

迎接他的是一个更新更壮丽的时代。

◎《新青年》风波

陈独秀回到上海后，不久即热心于创办上海共产党小组，与胡适一南一北，来往更少了。

1920年8月2日，陈独秀心血来潮，冒酷热给胡适去信，请他担任攻击老子总司令。因为胡适对老子有研究，商务印书馆1919年出版了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陈独秀的用意是拉胡适多为《新青年》写文章。自陈独秀把《新青年》带到上海后，《新青年》同人编辑班子名存实亡，但陈独秀不时地给鲁迅等人去信，请他们撰稿。

不巧得很，胡适没有收到陈独秀的信，他已于8月4日到南京了。这次到南京，胡适是受南京高等师范学校邀请来演讲的。胡适得知陈独秀为他加冕为“攻击老子总司令”，是几天后他到上海和陈独秀见面时才知道的。

8月8日是星期日，胡适在上海一品香召开茶话会，邀请各团体讨论自由问题。不久前，胡适、李大钊、蒋梦麟、陶孟和、高一涵等一班北大同人发表《争自由的宣言》，针对北洋政府，强调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集会结社自由、书信秘密自由。这次因为李大钊参加了，正在筹办上海共产党小组的陈独秀二话没说，也积极参与了此事。

“你的‘赤日炎炎似火烧’高论，我在孟邹处看到了。”席间胡适和陈独秀闲谈。

7月初，亚东图书馆汪原放新标点了《水浒传》，请陈独秀作

序,陈独秀胡乱写了几句。

“我那是什么高见,还是你的水浒宏论到家。”陈独秀摇着扇子说。胡适于7月下旬写完了《〈水浒传〉考证》,提出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文学见解。

这次胡适到上海,本想多逗留几日,因女儿素斐在北京出世,加上南京演讲结束,便和陈独秀匆匆告别,经南京回到北京。

骨子里,陈独秀对胡适的谈自由并不感兴趣,这还是找政府要自由呀。他针锋相对地写了《谈政治》刊在《新青年》八卷一号上。胡适提出不谈政治主张,陈独秀反驳说:“我敢说,若经过阶级战争,若经过劳动阶级占领权力阶级地位的时代,德谟克拉西必然永远是资产阶级的专有物。”

胡适血气方刚,当仁不让。9月中旬,胡适在北大开学典礼上发表演讲,说到新文化运动、共产主义时说:“我自己是赌咒不干的,我也不希望你们北大同学加入。”

一个要谈政治,一个不谈政治,陈胡二人终于擦开了面纱,一南一北公开摆起了擂台,但两人的私人感情并没有受到影响。接下来发生了一件事,几乎使二人反目为仇。

1920年12月中旬,陈独秀受陈炯明邀请,到广州任教育委员长。临走前,陈独秀给胡适、李大钊等九人写了一封信,说:“弟日内须赴广州,此间编辑事务请陈望道先生办理,另外新加入编辑部者,为沈雁冰、李达、李汉俊三人。……以后来稿请写编辑部陈望道先生收不误。”

在这之前,汪孟邹已给胡适去信,告诉他仲甫要去广州。陈独秀去不去广州,胡适无所谓,但接到陈独秀来信,胡适不高兴了。上半年,大约4月下旬,陈独秀也来过一封信,征求北京同人关于《新青年》的意见,信上说,今后编辑《新青年》要么北京诸

人轮流编,要么北京一人编,要么陈独秀一人在上海编。最后实际是选择陈一人在上海编。但这次,又冒出陈望道、沈雁冰、李达、李汉俊,全是陈独秀上海的共产党一班人,胡适当然有意见。以前自己希望一个人编,北京同人不同意,自己有气不好发,现在陈独秀走了,《新青年》就该在以前的三个方案中挑选另两个方案。现在好了,又冒出第四个方案,而且,仲甫不和人商量,就这么一封信写过来,这叫什么话?

胡适想来想去,提出《新青年》有三种解决办法。一种办法是听任《新青年》办成一种有特别色彩的杂志,而另办一个哲学文学杂志。这一条是针对《新青年》宣传共产主义太鲜明而言。如果陈独秀不改变宗旨,那就各走各的路。谁来另办一个杂志,胡适没有说,但含义很清楚,是他胡适,而不是陈独秀,因为陈独秀有一个《新青年》。用鲁迅的话说,这是仲甫带来的,是他的专利。

第二个办法,是陈独秀改变《新青年》宗旨,不谈政治。这一条,北京同人原有戒约,但仲甫偏要大谈政治,还写了谈政治的文章,所以胡适用了“恢复”这个词。胡适知道,陈独秀上海的新朋友是不会答应这一点的。而且陈本人又有个性,从来不甘示弱,不会宣布恢复不谈政治,所以胡适提出,可以把《新青年》搬到北京来办,由北京同人发表一个不谈政治的声明。胡适想搬到北京来办,也是去年4月份陈独秀信中提到的,只是未涉及谈不谈政治问题。

前天,陶孟和谈起《新青年》听说被邮局停寄了,提出何不暂时停办?胡适觉得这也是一种不是办法的办法,就作为第三种办法。

信写好后,为了慎重起见,胡适誊抄了一份,交给北京同人

传阅，另一份寄给了陈独秀。

鲁迅对胡适的三条意见中不谈政治这一条，摇了摇头。他倾向于胡适的第二条意见，即拿到北京来办。但他和胡适又有不同，即不同意发表不谈政治的声明。他给胡适写信道：“这固然小半在‘不愿示人以弱’，其实则凡《新青年》同人所作的作品，无论如何宣言，官场总是头痛，不会优容的。”鲁迅提出在办《新青年》时，让学术思想艺文的气息浓厚起来就行了。

对于鲁迅来信不主张发表不谈政治的声明，因为语气委婉，胡适虽然不太舒服，但也无话可说。1月下旬，陈望道从上海寄来一张明信片，使他大为恼火。陈望道不用信而用明信片，就含有二人话不多或无私交可言。信上内容更像是一个气冲冲的声明：“《新青年》内容问题，我不愿意多说话，因为八卷四号以前我纯粹是一个读者，五号以后我也只依照多数意思进行。”

显然，仲甫是将自己给他的信交给陈望道看了。因为自己在信上说恢复不谈政治戒约，“此时上海同人似不便做此一着。”陈望道来信，正是由此而发。

从陈望道信中，胡适感到自己的三点意见已遭到上海的陈独秀的新朋友的反对。思量再三，他决定只提移回北京编辑一个办法。《新青年》差不多成了苏俄的汉译本了，听任自流，落于素不相识的陈望道手里，不如移回北京。这样，也吸收了鲁迅的意见，以后不谈政治便是，若是硬作声明不谈政治，仲甫不同意、树人不同意、守常也不会同意，反对的面就大了。上次信中自己提出另办一个杂志，语言非常平淡，陈独秀还是动了肝火，认为是反对他个人的举动。既然仲甫发火，收回即是。仲甫年纪大，性子直，犯不着为这点事与他搞僵。这样想着，胡适于1月22日提笔给李大钊、鲁迅、钱玄同又写了一封信，修正了自己的意

见,目的是缓和与陈独秀突然紧张起来的关系。

几天后,胡适整理北京同人的意见,有八人在胡适写了按语的陈独秀信上签字表明态度,结果三种意见都有人赞同。慰慈、一涵、守常同意胡适意见,赞成移北京编辑。周氏兄弟和钱玄同主张在北京办,并表示不争《新青年》名目,即可以另办一个杂志。这条意见比胡适意见进了一步。抚和、孟和不赞成周氏兄弟意见,认为办两个杂志会导致《新青年》精神分裂,如不迁到北京编,不如停办。他们认为,停办《新青年》还留了一个完整的同人形象的面子,不留下话柄给外人说。

就在这时,胡适又收到陈独秀一封给他和高一涵的来信,责怪他和研究系有瓜葛。陈独秀在信中说:“南方颇传适之兄与孟和兄与研究系接近,且有恶评……我盼望诸君宜注意此事。”研究系是梁启超、汤化龙等人组织的,因支持段祺瑞政府,汤化龙被段任命为财政总长。该研究系对新思潮持敌视态度,所以陈独秀劝胡适不要和研究系打得火热。

胡适接到陈独秀的信,气不打一处来。这件事和《新青年》风波看似两件事,其实有某种联系。去年7月直皖战争结束后,段祺瑞兵败辞职,梁启超失势,曾声称不过问政治,专门从事学术研究。这一点,仲甫能看出胡、梁二人是有共同点的。而且还有一点能看出他们的一致性,研究系的机关报便是北京的《晨报》和上海的《时事新报》,胡通常在这两个报上发文章,这不能说明一些问题吗?

此时的胡适像捅了马蜂窝,弄得焦头烂额,上海的陈望道对他有意见,广州的陈独秀对他有意见。而且,《新青年》的事情没解决,又冒出一个研究系的事来。

仲甫是老朋友,尽管莽撞,不能不去信作些解释。陈独秀说

自己和研究系有关系,凭什么呢?学理要讲考证,讲话也要有证据,总不能听信流言蜚语吧?2月6日,他在给陈独秀的信中说:“你要是一个卤莽的人,我实在有点怪你。你在北京的日子也很久了,何以竟深信外间那种绝对无稽的谣言!”胡适觉得语气过重,又说,“我究竟不深怪你,因为你是一个心直口快的好朋友。”

这时又发生了另一件事,冲淡了陈独秀与胡适的矛盾。几乎与胡适来信同时,上海租界巡捕房包探没收了正在印刷的《新青年》八卷六号,使陈独秀蒙受了不小的经济损失。因此,他决定将《新青年》搬到广州来自己办。上次,陈独秀以“北大空气不好”一句话回绝了迁往北京的意见,但这时,他已无理由再反对胡适及北京同人另办一个刊物了。他在给胡适的信中说:“你们另外办一个报,我十分赞成,因为中国好报不多,你们做出来的东西总不差。”陈独秀内心深处是不希望北京同人另办报的,因为这标志着他陈独秀和北京同人的分裂,所以对于他们新办的报,他明确表示没有工夫作文章。既然不给胡适写文章,就不能指望胡适来文章了,所以陈独秀便想到要给鲁迅和周作人去封信,请他们速给《新青年》来稿。

胡适对研究系事已做了解释,陈独秀总觉得还应说上几句。陈独秀写道:“你对我对于朋友不要太多疑,我承认是我应该时常不可忘却的忠告,但我总是时时提心吊胆,恐怕我的好朋友书呆子为政客所利用。”胡适讲他是个卤莽的人,他想回敬胡适为书呆子也不过分。

陈望道那一头,胡适回了一张明信片,叫有来无往非礼也。信上说:“我不是反对你编辑《新青年》,而是反对你把《新青年》作宣传共产主义之用。”

“这和反对我编有什么两样？”陈望道一肚子不高兴。这次，他连给胡适的明信片也不愿寄了，但一时又出不了这口气，便给周作人写了一封信，了结他与胡适之间的过节。信上说：“我也并不想要在《新青年》上占一段时间的历史，并且我是一个不信实验主义的人，对于招牌无意留恋。不过适之先生的态度，我却断定说，不能信任。”陈望道列出胡适《少谈主义》、《争自由》等文证明，胡适口头称不谈政治，其实不是这么回事。

既然陈望道把话讲得这么重，胡适也没话可说。只是与陈独秀虽然在信中仍朋友来朋友去，但两人心里都清楚，他们之间的裂缝增宽了。

◎攻击孔教的健将

1921年春，胡适在家养病。陈独秀在信上劝他不可上课、作文章，希望他到广州一游，胡适一笑置之。除了不可上课他能做到，其他都做不到。广州是南方一派的大本营，虽然他曾在上海见过孙中山，并和孙中山先生讨论了他的“行易知难”，几个月后，他还就孙中山“知难行易”在《每周评论》发表过评论文章，但此时他不想跑这么远的路，而且，仲甫说的只是客套话而已。

课不上了，但文章不可不写。趁养病无事，胡适作了《〈红楼梦〉考证》一文。以前研究《红楼梦》的人虽然不少，但都没有用考证的方法去研究，目前只有自己是用考证的方法考证出这本书的作者、身世、时代、曾有几版本及来历等等，这无疑是《红楼梦》研究的一个贡献。

差不多同时，住在广州看云楼的陈独秀收到亚东图书馆来

信,请他为汪原放新标点的《红楼梦》作序。和胡适不同,陈独秀不擅长于考证,也没有时间考证。所以他简单地写了几句,说《红楼梦》不如叫《石头记》,《红楼梦》语言琐屑,否则是一本代表作等。

汪孟邹请陈独秀写《红楼梦》新序,当然也忘不了胡适。他写信催胡适尽快把《胡适文存》稿件寄来。此书出版的广告已登出一年,不能再拖了。5月底,胡适翻出《新青年》杂志,将自己发表在上面的文章一一剪下来。上个月,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部主任高梦旦邀请他到商务印书馆工作,胡适答应去上海养病散心,顺便把稿子交给亚东图书馆。

6月,亚东要再版新标点的《水浒传》,胡适便写了《〈水浒传〉后考》。写这篇东西时,他和陈独秀一样,都感到亚东汪家叔侄促成他做成不少事,使他受益不浅。

陈独秀在广州时,胡适仍不忘这位老友。6月中旬,他在为《吴虞文录》作序时,还提到陈独秀,说:“吴先生和我的朋友陈独秀是近来攻击孔教最有力的两位健将。”而且,他继续给陈独秀的《新青年》撰稿。7月1日,《新青年》九卷三号刊出他的《国语文法的研究法》。陈独秀一看就知道胡适的用心,寄一篇不谈政治的稿件,又和自己保持了一个文化朋友的关系。

尽管文章长,因为是胡适的稿子,陈独秀计划将文章分两期载完。既说明和老友关系融洽,又表明稿源充裕。

7月11日,杜威离京回国。胡适带着5岁的大儿子祖望送行,心里虽有惜别的情感,但随着火车吐出白烟轰轰隆隆而去,胡适也如释重负,一下子轻松了许多。杜威来华整两年,他胡适确实分神不小。暑假期间,他打算到上海、南京一游,放松放松。

临行前,胡适收到陈独秀来信,批评他和孟和等为饭碗问题

闹了一年的风潮。1921年6月3日,是北京六三运动一周年,北京学潮再起,结果马叙伦被军警打伤,进了受政府监视的首善医院。这会见陈独秀来信关心,不禁有些感动。他回信说,陈独秀骂得句句都对,是不该让马夷初带着大家往地狱跑。

◎法国人真不要脸

1921年7月15日,胡适动身前往上海,住汪惕予家中。当天,商务印书馆高梦旦等人在一品香为胡适设宴洗尘。隔日,胡适访问了沈雁冰、叶圣陶等人,但他没有去见陈望道。

上海友人很关心北京学潮事,毕竟马夷初受伤住进了医院。胡适解释时没有忘记陈独秀的话,说:“我们这一年多以来,为了教育经费问题,不幸荒费了无数学子的无价光阴,这是我们很抱歉、很惭愧的。”

这一次反对学生罢课,胡适和陈独秀总算站到一起来了。胡适反对罢课是因为他赞成一步一步改良,马叙伦被打,使他也看到根本问题是非打倒军阀不可,这和陈独秀多少是一致的。

胡适此次南行的目的,除了到上海商务印书馆,再就是到东南大学和南京高师演讲。安徽朋友借机请胡适到省府安庆讲学,因为是家乡省城,又是陈独秀的故乡,胡适也答应了。8月初,胡适冒酷热到安庆住了6天,一连作了7次演讲。讲了一通实验主义、科学人生观和好政府主义,临走还讲了对安徽教育的意见。

胡适此次安庆演讲,不少旅沪皖人都知道了,他们劝胡适只作学问,不做官僚,出任安徽省教育厅长。陈独秀也希望胡适

去,还专门写信,说:“担任教育行政职务和他项官吏不同,但能做事,似不必避此形式。”此时陈独秀任广东军政府教育委员长,因此劝胡适,同时也替自己作解释。此时中共一大已召开,作为新上任的中国共产党总书记,陈独秀已打算辞职回上海了。

安徽庙小,胡适显然看不上这个官位,所以陈独秀替安徽省教育厅长准备了第二人选,即在胡适不来的情况下,推荐教育部秘书任叔永出任安徽省教育厅长。任叔永是文学革命支持者,也是胡适在美国读书时的朋友。陈独秀便请胡适写信给任叔永,征求他的意见。

9月7日,胡适在暑假结束后离上海回北京,他没有想到,4天后陈独秀离广州回上海,两人失之交臂。听说适之刚离沪,陈独秀不无怅惘地对汪家叔侄说:“正有一肚子话要和适之说呢。”

10月6日夜里,住在后门里钟鼓寺14号的胡适接到顾名君从上海打来的电话,说10月4日下午陈独秀在上海被捕了。胡适大吃一惊,忙问怎么回事?顾名君说,陈君到上海不足一个月,就被法巡捕房逮捕,罪名听说还是今年初查封《新青年》时的老话,宣传过激主义。

胡适说,这事怕要请蔡校长出面,蔡校长是留法的。

放下电话,胡适给刚访欧回国的蔡元培打电话,请他向法使馆设法营救陈独秀。末了,胡适用安徽话骂了一句:“法国人真不要脸!”

10月下旬,陈独秀被判罚一百元结案。沈雁冰见陈独秀没有职业,便推荐他到商务印书馆任兼职编辑。陈独秀答应了,说:“事少干,钱少拿。”

王云五问陈独秀:“有没有文稿?”他知道陈独秀对文字学有研究。

陈独秀拿来自己翻译的《社会主义之思潮及运动》，说：“你看这篇东西怎么样？”

“我寄给适之，请他看一下如何？胡先生外文好。”王云五皱着眉头说。他知道出版这类书惹事生非，他刚任商务印书馆编辑部副主任，也没有把握出版这本书。

“可以。”陈独秀知道王云五有难处，便轻描淡写地说。王云五到商务印书馆，是这次胡适来上海推荐的。高梦旦希望胡适来，结果胡适推荐了王云五。陈独秀嘴上不说心里说，胡适何以能审查我的东西，何况他正一心扑在杜威实验主义的哲学上，与社会主义唱对台戏哩！出于礼节，陈独秀没有拒绝王云五的建议。

◎仲甫老爱标新立异

1922年新年伊始，32岁的胡适便一心一意准备办一份新报。1921年，《新青年》风波促使他下决心另办一份报纸，省得受陈独秀上海一班朋友的气，现在，是该兑现的时候了。

正月里，胡适拟了申办《努力周报》的呈文给警察厅。但警察厅此时仍把胡适视为陈独秀一派人，驳回了胡适的呈文。

忙了一个春天，好说歹说，警察厅才批准胡适办周报。立夏第二天，《努力周报》出版，胡适自任主编。独立地如仲甫一样办一份报，现在是如愿以偿了。他取名努力，是认为只有努力，才能减少阻力，打倒武力。

5月中旬，胡适写了一篇《我们的主张》，打算用在《努力》上。写好以后，觉得可以邀上一些人，签名后公布出来，这样回

时也扩大《努力》的影响。想到这里，胡适打电话给李大钊等人，约好第二天在蔡校长家中开会。胡适提出，现在改革中国政治的最低限度要求，是要有“好政府”，好政府至少能监督不法官吏，为社会谋福利，容纳个人自由。

大家觉得要求虽低，但好政府比坏政府好，结果李大钊、梁漱溟、陶孟和、汤尔和、朱经农、蔡元培、高一涵、丁文江等 16 人签名，同意发表《我们的主张》。

事后，李大钊感到此事应和陈独秀等人说一下。他在给陈独秀的信中说，“好人政府”是当前混乱局势中一种差强人意的办法。

接到李大钊来信，陈独秀于 5 月底召开了一次中共会议。陈独秀不满地说：“适之在办一份新报，这个政治主张一定是他的主意。好人政府还是他的一点点改良那一套。”大家都同意陈独秀的意见，“好人政府”的主张会阻碍革命思潮发展，将一般人引导向改良幻想的歧途。

碍于蔡元培、胡适等新文化运动党外朋友的面子，陈独秀在起草《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时，只是说“好政府主义”等办法不能解决中国问题。李大钊是同意“好政府”的，陈独秀这样写，不止是冲着党外朋友的。但守常怎么想呢？为慎重起见，必须要征求他的意见后再发表。

6 月中旬，陈独秀请张国焘去一趟北京。见到《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李大钊毫不迟疑地说：“我同意。”张国焘见李大钊爽快地同意，放心地笑了。迟疑了一下，张国焘问：“蔡校长、适之他们怎么办？”

李大钊想了一下，说：“适之他们当然是希望共产党支持的，现在共产党不支持，宜事前和他们打个招呼。这些朋友中间，也

会有赞同共产党主张的。”他建议召集一次“好人政府”朋友会议，听听他们的意见。张国焘表示赞成。

开会时，李大钊将宣传中共主张的印刷品发给大家。有人说，仲甫老爱标新立异，别人提出什么东西，他常常唱反调，这也是标新立异。

胡适见到《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脸又拉长了。他很赞成别人说“仲甫老爱标新立异”的话，他说：“人各有志，何必勉强。可改良的，不妨先从改良做起，太坏了，不能改良，也要革命。但最好是把政治上大奢望收起。”李大钊听得出，胡适是改良为主，革命为次，不过是当年问题与主义之争的继续。

对于陈独秀和中国共产党的不支持态度，胡适并未到此为止。6月16日，他在家写了《我的歧路》一文，把矛头指向了“主义”派。他想光叫人研究问题不谈主义行不通，结果主义越来越过激。他愈主张不谈政治，结果谈政治的人愈多，所以他也来大谈政治，以我谈政治对付你谈政治，我谈政治正是为了“我研究问题，少谈主义”。他不点名指责陈独秀等人成立共产党，是马克思的奴隶，是浅薄的新典主义。

7月初的一天，胡适冒暑热乘火车到济南参加中华教育改进社第一次年会，返程时在天津遇见丁文江。江苏人丁文江比胡适长三四岁，早年留学日本、英国，按理是新派人物，回国获清格科进士，思想又转向保守。巴黎和会时丁文江是中国代表团顾问。胡适虽是新派，但骨子里守旧，坐在养心殿里的溥仪前不久还召见胡适进宫谈了20分钟。因此，两人一拍即合，胡适办《努力》，丁文江成了得力帮手。两人谈到中共十一条主张，胡适说：“仲甫高谈理想，我们最低限度要求如果做不到，共产党的理想哪里能实现呢？”

丁文江问：“《努力》作何反映？”

胡适说：“即将共产党主张转载，并作后记，我只希望不至互相菲薄。”

◎爱国君子要慎重一点

1921年8月4日，陈独秀在渔阳里2号被捕，释放后搬到环龙路铭德里2号居住。不料没到一年，又于1922年8月9日被法巡捕房逮捕。罪名是家中藏有违禁书。黄金荣此时在法巡捕房任督察员，逮捕陈独秀时也到场。陈独秀被捕后，汪孟邹马上写信告诉了胡适。

当时舆论已沸沸扬扬，有10个团体发表了营救陈独秀的宣言，胡适都看到了。8月16日，胡适给外交总长顾少川写信，说法国人近年做的事，实在大伤中国青年的感情。顾少川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生，虽比胡适早，也是老校友。胡适请顾少川转话给法公使，不要倒行逆施惹出思想界“排法”的感情，胡适已见到《晨报》上刊出“打倒法帝国主义”的口号。为了避免政府的误解，胡适解释他为陈独秀出力的原因时说：“我并不是为独秀一个人的事乞援：他曾三次入狱，不是怕坐监的人，不过一来为言论自由计，二来为中法两国国民间的感情计，不得不请他出点力。”

给顾少川写过信，胡适又找到蔡元培。胡适说：“我已给顾维均去信，请他找法使，你最好也和法使约谈一次。”蔡元培答应翌日即去见顾维均。

17日，陈独秀在拘押所翻着闲书，看押的狱卒悄悄告诉他

《时事新报》的新闻,说:“明天先生会是没有问题的,听说北京的蔡元培质问了法国大使,长辛店工会也发了营救你的电报。”

陈独秀连声说:“谢谢。”

隔日,胡适正在家看《诗经》,“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文法优美的句子使他感到《诗经》是一座宝库。他想以后每星期花一点时间做篇注和序,等于消遣。修改完《关雎》序,胡适想到仲甫已放出,顺手给外交总长顾少川写了一封信,感谢这位老校友派秘书到法使处替陈独秀讲话。

陈独秀被捕和胡适的参与营救,并没有弥补两人在政治上的分歧。在对待北洋政府的态度上,胡适提出“好人政府”,陈独秀不同意;在对待南方陈炯明“联省自治”问题上,胡适支持陈炯明,陈独秀反对,两人在一南一北两大问题上都较上了劲。

9月8日,胡适在陈独秀出狱后10来天时,写了《联省自治与军阀割据——答陈独秀》一文,刊在《努力》上。几个月前,即6月16日,陈炯明炮轰孙中山总统府,背叛了革命。这就迫使陈独秀站在国共合作的立场,反对陈炯明,包括反对陈炯明鼓吹的“联省自治”。胡适在7月下旬公开站到了陈炯明一边,说陈炯明这一派推翻孙文在广东的势力,是一种革命,表示“反对那些人抬出‘悖主’、‘犯上’、‘叛逆’等等旧道德的死尸来做攻击陈炯明的武器”。

陈独秀在狱中时,《东方杂志》于8月10日刊出他入狱前写的《对于现在中国政治问题的意见》一文。《东方杂志》此时刊出新闻人物陈独秀的文章,含有招揽舆论的意思。陈独秀出狱后,为感谢适之对自己的营救,给他写了一封信,同时将此文寄给胡适。胡适正在办《努力》,这次寄给他,尽管文章已发表,毕竟是表示一种合作姿态。当然,陈独秀不寄别篇文章,单寄这篇谈联

省自治的文章,原因之一是胡适的《努力》已成了鼓吹联省自治的公开刊物。联省论是建立在武人割据之上的,不仅不能解决时局,还会增长乱源。陈独秀委婉地说:“我希望爱国君子要慎重一点。”

胡适当然明白陈独秀的用意,这话是责怪自己不慎重呢。但他仍能理解这位热衷于政党的心直口快的老朋友。陈独秀将文章寄给自己,便有给面子的意思。接到陈独秀文章,胡适即作了答陈独秀,同时将陈文也一起转载。胡适愿意公开这场争论,还因为可以活跃一下《努力》。

在胡适看来,用集权形式的政治组织,勉强施行于这最不适于集权政治的中国,是中国今日军阀割据的一个大原因。从这个意义上说,联省自治不仅不会增长乱源,恰恰相反,它是打倒军阀的一个工具。

这时,正在筹办《向导》周刊的蔡和森请陈独秀写一篇文章登在创刊号上,陈独秀问:“写什么呢?”

“上次李先生来上海,同意你与胡适争论。就写一篇谈联省自治的文章如何?”蔡和森说。

过了几天,陈独秀将写好的文章交给蔡和森,题目是《联省自治与中国政象》。蔡和森发现这次陈独秀点了胡适的名。

对于陈独秀拉开架式的公开应战,胡适也不示弱。10月1日,他在文章中分析中共二大宣言中对国际帝国主义宰割下中国局势的分析时说:“很像乡下人谈海外奇闻,几乎全无事实上的根据。”

但争论归争论,朋友归朋友,这时,李大钊向胡适提议联名发表启事为陈独秀募捐,补偿他上次被捕造成的经济损失。胡适二话没说就签了字。

◎十二个大人物

1922年10月3日下午，北京钟鼓寺14号胡宅幽静如常，门前的榆树在秋风中摇动，发黄的树叶不时坠下，在明净的阳光中闪闪发光。

“适之在家吗？”屋外传来了笃笃笃的敲门声。

“啊，是仲甫呀？”不期而至的陈独秀突然到来，给开门的胡适一个大惊喜。

“在家忙什么？”摘下礼帽的陈独秀和明显胖起来的江冬秀打过招呼，坐了下来。

“不忙！”胡适笑嘻嘻地说。上午，美国朋友加纳在北大演讲联邦制问题，胡适为他当翻译。下午在家休息。“你是什么时候来北京的？”胡适不知什么风把陈独秀吹来了。

“到苏联去。”乔装打扮的陈独秀压低声音说。他赴苏联参加11月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的四大。

胡适“哦”了一声，点了点头。他知道涉及党事，不宜多问。“和谁同去？”

“刘仁静。”

提到北大学生刘仁静，胡适眉头皱了一下。上个月在公园吃饭，他碰到刘仁静等几个学生，谈到政治，刘仁静还和他抬了杠子。

“这次又让你费心了。”陈独秀想到自己入狱胡适找人说情及联名募捐事，说：“你们这样一搞，我成了天下第一号大乞丐了。”说完，两人哈哈大笑。

“你的回报也很好呀，是在报上狠狠地把我批一顿。”胡适笑容依旧地说。陈独秀见胡适提到《向导》上那篇文章，说：“是你先有‘胡言’，然后才有我这个阶下囚的‘陈说’呀。”

胡适听陈独秀讲他“胡言”，忙摆摆手说：“胡言不等于乱语，公婆吵架，各有道理，今天高兴，我们不谈这个。”

陈独秀见胡适挂免战牌，正合己意，多时不见，他也不想一见面就谈不愉快的话题。“我那本小册子收到了吗？”还在夏天，亚东图书馆出版了《独秀文存》，一共出了3000册，汪孟邹说他给适之寄了一本。

“你是说《独秀文存》吗？收到了，收到了！”胡适用手指了指书案上《胡适文存》旁边的小册子说。

“这回也是先有《胡适文存》，后有《独秀文存》，记得当年搞文学革命时，也是先有你的‘刍议’后有我的‘论’。”陈独秀喝了一口浓茶，兴致勃勃地说。

“每次也都是你后来居上。”胡适替陈独秀点了一支美国烟说。

“好烟，”陈独秀用力吸了一口，美美地吐出来。“哪来的？”看着轻烟渐渐淡去，陈独秀问。他身上带的是“双喜”牌。

“加纳送的。”

“什么时候出《胡适文存》第二集？”

“再等一等。”

“你的东西有文学性，不像我的东西，不是和张三争，就是和李四争。孟邹出版我的东西怕兮兮的。”

“争争也好，名气大呀。现在全国青年，哪个不知道你陈独秀三个字？”

“哎！”陈独秀苦笑了一下说，“安知非福。”丢烟蒂时，他向窗

外望了一眼，屋外的榆树一片金黄。两人已谈了许久，不知不觉中，黄昏笼罩了胡宅。

这次陈独秀与胡适交谈，冲淡了两人在政治上的分歧。陈独秀去莫斯科后，胡适谈论联省自治也少多了。11月中旬，胡适写《谁是中国今年的十二个大人物？》时，想起上次和仲甫的谈话，列出康有为、梁启超、蔡元培、陈独秀4人为影响近20年的全国青年思想的人。今年春季，梁启超演讲《评胡适之〈中国哲学史大纲〉》，对胡适的书提出不少批评，胡适很不满。这次列大人物名单还是不记前嫌，列进了这位光绪进士。至于陈独秀，胡适觉得也不勉强，其《新青年》影响超过了全国所有报刊。只是再往下就不好列了，除非列他本人。

胡适把孙文、段祺瑞、吴佩孚3人列为近20年政治上有很大努力的人。接杜威来华时胡适和孙中山在上海见过面，孙文只把胡适认作哲学家，只和他谈哲学，此后两人再无交往，胡适公开谈政治后，站在陈炯明一边鼓吹联省自治，甚至视陈炯明图谋推翻孙文是一场革命。胡适不满孙中山用武力统一中国。上次仲甫来京逗留，两人还谈到此事。

12月上旬，陈独秀自莫斯科给蒋梦麟和胡适写信，说“中山近日颇有觉悟。已切言专力军事之错误，方努力谋党之改造”。看得出，陈独秀希望胡适倾向孙中山。

◎病废的胡适与奋斗的陈独秀

1923年1月19日，蔡元培在各报发表启事，宣布“自本日起，不再到校办事”。蔡校长辞职，起因是北大兼职教员、“好人

政府”成员之一的罗文干加入王宠惠内阁任财政总长后，被陷害贪污受贿，引起蔡元培对教育总长彭允彝等不满，遂愤而辞职。

罗文干案发于1922年11月18日，作为“好人政府”成员，胡适和蔡元培对政府都采取了不合作态度。罗案一个月后，胡适以生病为由向学校请长假一年，他的教务长由顾孟余接替。几天后，他以查糖尿病为由，住进了协和医院。1月23日，蔡元培则发表抗议宣言，提出当工具的学者官吏不与那不学无术的当政坏人合作，政府就会垮台，就能“打倒恶政治”。

看了蔡校长宣言，刚从苏联回到北京的陈独秀直摇头。蔡元培、胡适搞“好人政府”，陈独秀当时就不同意，罗文干案正好说明“好人政府”破产了。

当天夜里，陈独秀写了《评蔡校长宣言》：“正告蔡校长及一般国民：革命的事业必须建设在大民众积极运动的力量上面，依赖少数人消极的拆台政策来打倒恶浊政治，未免太滑稽了、太幼稚了，而且太空想了。”陈的文章在第二天即24日的《向导》上刊出。

陈独秀的话讲得很重，《晨报》立即发表社论反对陈独秀的观点，说“劳动阶级的罢工，也是一种‘不合作主义’的表现”，难道我们“连罢工也不赞成吗？”

见到陈独秀的《评蔡校长宣言》，胡适很生气，陈独秀说蔡校长“罪大恶极”，要“如防御鼠疫霍乱一样，日夜防御蔡校长之消极的不合作主义侵入思想界”，他实在看不惯陈独秀这种苦不苦、酸不酸的话。自蔡校长辞职以来，他胡适一直是帮蔡元培讲话的，陈独秀话里含讥不仅冲蔡校长，也是冲着胡适来的。《晨报》发表社论，胡适很高兴。几天后，胡适病中在《努力周报》上发表了《蔡元培是消极吗？》反驳陈独秀，他挖苦说：“蔡先生的抗

议在积极方面能使一个病废的胡适出来努力,而在消极方面决不会使一个奋斗的陈独秀退向怯懦的路上去!”

胡适2月4日发表文章,三天后发生了吴佩孚屠杀京汉铁路工人的二七惨案。这时,北洋政府发出了逮捕陈独秀的通缉令。陈独秀在北京呆不住了,中国工人运动的低潮中断了陈胡争论。

2月中旬,陈独秀匆匆离京经上海去广州。临行前,陈独秀将瞿秋白的一部书稿交胡适,请他帮助出版。

4月中旬,在北京养病的胡适收到陈独秀寄自广州的来信。陈独秀到广州后,大元帅孙中山任命他为国民党参议,是陈炯明叛变后孙中山的座上客。这位新上任的国民党参议不知又有什么高见。

拆信一看,原来是要他去催商务印书馆出版瞿秋白的书。瞿秋白的书是介绍苏俄的,所以胡适没有当一回事。

再过一个月,就是《努力》创刊一周年,胡适决定在外出疗养期间还要将《努力》办下去。

这次外出,陈独秀与胡适不期而遇。

◎三个杂志代表三个时代

1923年10月5日,已是深秋季节。胡适踏着满地黄叶,由杭州烟霞洞到上海。

隔日,胡适到五马路亚东图书馆。汪孟邹见胡适来了,忙倒茶让坐,说:“仲甫上月从广州回上海了。”

胡适问:“仲甫知道我到上海了么?”

“大概不知道，前日仲甫来还问到你是不是还在烟霞洞，我说还在。他知道近日你要来上海检查身体。”汪孟邹说。“仲甫是安静的日子不过，偏要过动荡的日子。”听说陈独秀回到上海，胡适感叹地说。陈独秀与胡适初春在北京分手，差不多快一年没见面了。

胡适临走，汪孟邹约他第二天来喝茶，说：“回头叫原放对仲甫讲一声，叫他明天也来。”

第二天，陈独秀从闸北象山路（秀山路）公兴路口的三曾里3号中共中央机关办公地来到五马路亚东图书馆，胡适已先到了。

“烟霞洞果然养人，适之气色好多了。”刚一进客厅，穿着西装的陈独秀就嚷了起来。胡适见是陈独秀，笑着用手指了指一旁的藤椅说：“坐。”

“这次来要多住些日子了吧？”陈独秀吸了一口烟说，“记得前年我从广州回上海，你从上海回北京，只差几天没见着，像是有意躲我。”

“是你见我走了才回上海的吧？”胡适笑着说。“这次在上海多住一些日子。去年底我向学校请了一年假，至少等假满了再授课。上海的医生也说我不能授课。”

“好，这次我们又可常见面了。听说你在烟霞洞很自在，又是观日，又是吟诗，还给人题扇面，学尽骚人墨客。”

“高梦旦、陶行知、徐志摩、汪精卫、任叔永诸君来看我，少不了应酬一番。记得你当年在杭州，不也风光得很么？”说着，胡适眯着眼看着陈独秀笑了。胡适话已出口，才知犯忌了。“风光”什么？那不是暗指陈独秀和高君曼的事吗？

“你不要说我，”果然，陈独秀以攻为守地挥了挥手，说，“你

身边怕也有红粉佳人吧！”陈独秀说完哈哈笑了起来。

胡适一听，有些窘迫，不经意地朝周围看了看。6月，胡适因患痔疮到烟霞洞疗养，一住三个月，其间女友曹佩声常来探望。陈独秀提胡适观日，便是7月底大暑之后陪曹佩声在西湖南高峰观日一事。

“你又在听人瞎说了。”胡适观日时，对日出奇景状况印象极深，写了《南高峰看日出》诗，刊在8月12日《努力周报》上。估计仲甫已看到此诗了。

见胡适局促，陈独秀本来想要胡适新诗，也不好要了，说：“你在烟霞洞，我也应该去看你。”

“你这个大参议大书记恐怕没有这个闲心了。”胡适知道，陈独秀正忙着和孙中山搞国共合作，早已身不由己。“《新青年》还在办吗？”

“在办。”陈独秀点了点头。6月15日，陈独秀在中共三大之后将《新青年》改为季刊，仍作中国共产党机关刊物。因为其宗旨是指导中国工人运动，所以陈独秀早就没有寄给胡适了。

“我在想20多年来，有三个杂志可以代表三个时代，一个是《时务报》，一个是《新民丛报》，再一个就是《新青年》。”胡适说着看了一下刚落座的汪孟邹。

“不错。”汪孟邹用力点了点头。陈独秀与胡适谈话，他很少插嘴。

“可惜《新青年》中途改行了。”胡适叹了口气。他想说《努力》正在接着发挥《新青年》的使命，但仲甫一定要和他争。难得见面，还是少争吧。

“上次去信叫你寄《努力》，还是难收到。”陈独秀埋怨道。

“我出来半年，都是一涵在编，怕身体耽误了。近来我已打

算暂时停办《努力》。”说到这里，胡适望了一眼陈独秀。

“哦？”陈独秀果然吃了一惊。“也可以，像你现在这个身体，老是叫别人代办，能办到今天就不错了。下一步怎么办？”

“继续办《读书杂志》，《努力》订户已交了钱，暂时用《读书杂志》代替，等我身体好了再办《努力》。我打算改为月刊或半月刊，办周报太累。”

“你的《努力》同人都是这个意思？”陈独秀是指任叔永、陈衡哲、朱经农、徐新六等胡适一班新老朋友。

“都赞成。”胡适来上海后，刚和他们谈过。

10月中旬的一个晚上，胡适与徐志摩请郭沫若吃饭，田汉夫妇和任叔永夫妇、徐振飞也到了。散席后，胡适与徐志摩醉眼朦胧地到亚东图书馆，正好碰到陈独秀上楼。

“志摩，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仲甫，《新青年》主编陈独秀。”胡适向徐志摩介绍陈独秀。

徐志摩在昏黄的灯光下头发显得凌乱，脸色稍白。看着面前这位二十五六岁的年轻人，陈独秀笑着点点头。

“志摩1916年在北大读书，我们办《每周评论》时，他到哥伦比亚大学，算是我的校友，小兄弟。”胡适继续向陈独秀介绍徐志摩。

“哦，知道、知道。”陈独秀伸手和徐志摩握了一下：“听适之讲过你，你的诗我也拜读过。”

“幸会。陈先生是大名人，你办的《新青年》我出国前就喜欢看。”徐志摩怀着敬意说。

◎冒犯老兄

一天,陈独秀到汪孟邹处小坐。陈独秀问汪孟邹:“上回印的《独秀文存》能否再支点钱?”陈独秀知道,《独秀文存》一版再版,赚了些钱。

汪孟邹说:“有!有!”便到后面去拿了大洋百元递给陈独秀,说:“你要要,只管讲。”

陈独秀点点头,将钱收好。

汪孟邹说:“你来得正好,我编了一本《科学与人生观》文集,你回头看看,有空作一篇序。”汪孟邹知道陈独秀近日身体不好,有些空闲。

“叫适之作吧,如何?”

陈独秀叫胡适写序,是因为科学与人生观的论战是《努力周报》发起的。北大教授张君勱上半年演讲《人生观》宣传玄学,演讲后和学地质学的丁文江讨论,丁不同意,两人辩论了一个多小时。4月中旬,丁文江在《努力周报》上发表《玄学与科学》批评张君勱,引起了“科学与人生观”的公开争论。5月中旬,胡适在上海写《孙行者与张君勱》支持丁文江,批评张君勱。丁文江是《努力》同仁,所以胡适态度明朗。张君勱也有来头,是前总统秘书,作为北大原教务长的胡适也不愿意得罪他,便写信给张君勱解释说:“文虽近于游戏,而意则甚庄。”当时人称张君勱为“玄学鬼”,胡适比之孙行者,已很客气了。

“要不,你和适之各作一篇。你们两人到一起就没完没了的争论,这下好了,让你们好好地争一下。”汪孟邹半认真半开玩笑

地说。

“这是个好主意，叫原放去沧州饭店看看适之在干什么，若没有事，叫他来坐坐。”陈独秀说。胡适来上海后住在沧州饭店。

胡适来后，陈独秀把汪孟邹叫各写一篇序的事说了。胡适看了看论文目录，自己批张君劢的文章和信也在里面，连忙答应了。

提到批玄学派，胡适不免有些得意。一年前办《努力》是以谈政治登场的，但最使他满意的不是谈政治，而是批张君劢这组文章。算一算，思想界名流梁启超、吴稚晖、张东荪、林宰平、任叔永、朱经农、王星拱、唐钺、孙伏园、陆志伟、范寿康等人都参加了进来，可谓阵容强大。如果《新青年》以文学运动而不朽，那他胡适办《努力》也可以科学与人生观论战在中国思想史上占一席之地。胡适是研究中国哲学史的，他很重视自己在思想史方面的地位。

“在想什么呢？”陈独秀见胡适半天不语，伸手递给他一个橘子。

“哦。”胡适扶了扶眼镜，回过神来，说：“我在想这场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你是局外观，我是异地观，想不到最终还能劳你大驾。”

“我和你不一样，我局外观是实，你恐怕不仅仅是异地观吧？”陈独秀知道，胡适尽管只写了一篇《孙行者与张君劢》，但真正的主帅还是他。

“属实！属实！”胡适笑着说，伸手接过陈独秀递过来的半边橘子。

“以我之见，玄学派张君劢是信口雌黄，科学派丁文江们也难以服人，我都不赞成。适之的实验主义是支持丁文江的，少不

了我又要冒犯老兄了。”陈独秀在五四之前把实验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并提，还劝胡适信奉历史唯物主义。

胡适说：“不要紧的，只管写好了。你的唯物史观至多只能解释大部分问题，我当然少不了说说你的唯物史观，你也要做好准备哟。”说完，胡适看了陈独秀一眼。陈独秀“哦”了一声，说：“承认唯物史观能解决大部分问题，于你已是很难得了，至于不留面子，我极赞成，写得舒服。”

胡适点点头，表示同意。汪孟邹在一旁急了，忙说：“还是要留面子。”他知道仲甫的脾气，连蔡元培校长他都敢比作鼠疫，对适之还不知道做出什么事来。事情是自己惹出来的，他当然不希望两个老友伤了和气。

陈独秀见汪孟邹着急，乐了，说：“你以为我能对适之怎么样？他一个病中人，倘若气恼了他，会说我雪上加霜呢。”

汪孟邹忙点头说：“仲甫身体也不好哩。”

陈独秀回到寓所，将丁文江、张君勱、梁启超等人的文章拿出来翻了翻。因为已读了不少马克思的书，见到了、张等人争论，他感到有些可笑，使人想起“电线是不是蜘蛛精”这样一类问题。胡适那天在亚东图书馆一脸喜气，仿佛是攻破了张君勱大本营的得胜方。其实，细看一组进攻张、梁的的文章，范寿康、任叔永已是在帮倒忙，或者暗中投降；丁文江是五十步笑百步，他自己也不清楚科学何以能支持人生观；至于梁启超，则耍了滑头，一方面讲人生观十有八九要用科学方法解答，又说一小部分是超科学的，骨子里是帮张君勱的。至于张君勱，其文算是玄学狂吠，但他抓住丁文江不可知论来为神灵上帝求证，倒挺有意思。

在陈独秀看来，这正好说明不用唯物史观是打不倒张君勱

的,最后反给张君勱抓了把柄。

和陈独秀分手后,胡适忙于别的事,耽误了半个月。听汪孟邹说仲甫的序已作好,自己就要回北京,11月29日,胡适就在沧州饭店匆匆为《科学人生观》论文集作序。

翻着从亚东图书馆拿来的一叠剪报,他仔细将吴稚晖《一个新信仰的宇宙观及人生观》一文看了看,他觉得仲甫讲得不全对,还有吴稚晖提出了自己的宇宙观和人生观,其他人包括丁文江在内正如仲甫所说只讲科学可以解决人生观,而未具体讲科学的人生观是什么。尽管吴稚晖爱放大炮,但这一次却“放”得让胡适舒服。他准备借这次作“序”,具体地提出自己的科学的人生观。至于方法,吴稚晖做了一个好榜样,可以仿效。

胡适找来一张大纸,列出十条科学与人生观的联系,大致勾画了人生观的轮廓。胡适满意地吐了口气,他想自己的人生观有科学的实验根据,仲甫无法挑剔。

写好后,胡适稍事休息了一会,将陈独秀的文章又看了看,仲甫在结尾点了他的名,问他一个两难问题,要么相信唯物史观为完全真理,要么相信张君勱玄学也可以超科学而存在。仲甫这个人,四十五六岁了,还如此好斗。

胡适坐下来写《答陈独秀先生》。独秀指着鼻子问,他胡适焉能不反击?

上次和陈独秀交谈,胡适已说唯物史观只能解决大部分问题,因为时间短,没有详谈为什么唯物史观只能解决大部分问题。这回他要详细说说思想、知识也是客观原因,也可以变动社会、解释历史、支配人生观。陈独秀希望他“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也和陈独秀一样完全信奉唯物史观,那怎么可能呢?在胡适看来,陈独秀自己也不是一个彻底的唯物论者,譬如他就把

“物质”解释成“经济的”嘛。

1923年12月上旬，天气已明显变冷。一天，患脑炎稍好一点的陈独秀来到五马路亚东图书馆。

“好些了？”汪孟邹见陈独秀脸呈倦容，关心地问。

“好些了。”

“抽烟么？”

“好！抽一支。”陈独秀坐在藤椅上接过烟，凑着汪孟邹擦着的洋火吸了一口，“你去把适之写的〈序〉和答信拿来。”

上次来，汪孟邹说适之写了答信，因为头痛，陈独秀没有看。

“适之自己是个二元论，反把我说成不彻底的唯物论者。”看着胡适的答信，陈独秀皱起了眉头。

“怎么办？”见陈独秀沉着脸，汪孟邹有点局促不安。

陈独秀弹了弹烟灰，笑了一下，说：“没什么，改日我来，就坐在你这里给他作封答信，你把纸墨准备好。”

“这样最好，我把你们的信都收进去。只是要快些，这个月书就要印出来呢。”汪孟邹提醒道。

12月9日是个星期天，下午陈独秀来亚东图书馆作答信。汪孟邹问：“可去看梅兰芳演戏？”

“不看，今天来是作答信的。”陈独秀一边说一边坐下了。陈独秀动手写时，汪孟邹不敢过来打搅，一直到陈独秀3000字的信收笔。

“写好了。”陈独秀将稿子递给汪孟邹。

汪孟邹发现仲甫火药味很浓，但还是给适之面子的，他最后写道：“像这样明白主张心物二元论，张君勱必然大摇大摆的来向适之拱手道谢!!!”在陈独秀看来，张君勱是唯心论，胡适是二元论，张、胡之争不过是同一个阵营内部彻底唯心主义和不彻底

唯心主义之争。

“怕要给适之看看。”

陈独秀知道汪孟邹的苦心，点了点头说：“到时寄一份清样给他。”

“我明日给适之去封信，说你作了答信。”汪孟邹说。

“他不是在南京么？”陈独秀知道胡适去了南京。

“他说近日回北京。”

◎“家庭革命”失败

腊月间，李大钊等人去广州参加国民党“一大”，陈独秀没有去，他给胡适去了几封信，希望他帮忙推荐张申府到商务印书馆做事。商务印书馆高梦旦是胡适老友，王云五是胡适推荐进商务的，所以陈独秀想，只要胡适肯给面子，问题不难。陈独秀去信的第二件事也和商务有关，即帮正在病中的蔡和森催稿。

一连写了三封信，胡适都没有回音。有几次陈独秀和汪孟邹谈起：“不知为什么，我给适之去了几封信，连个回音也没有。”

汪孟邹一月中旬收到胡适来信，见陈独秀抱怨，他安慰说：“我今天就给适之去信。”

胡适接到汪孟邹信，仍然没有给陈独秀写信。张申府、蔡和森都是陈独秀共产党内的朋友，尽管同张申府在北大共过事，但毕竟与自己没有私交。仲甫是个热心人，也不问事情大小，大笔一挥，一个条子就寄来了。

见胡适不回信，没有办法，陈独秀从别处周转了200元借给了病床上的蔡和森。他不知道，胡适迟迟不来信，与他的“家庭

革命”失败有关。

去年夏秋,胡适与女友曹佩声在杭州烟霞洞许下宿愿,寒假回绩溪老家,双双与原配达成离婚协议,然后再结连理。

曹佩声身材高挑,贤淑端庄,反叛旧式婚姻却很坚决,回去后经过一番周折,终于与原夫胡冠英达成离婚协议。江冬秀一听胡适提出离婚,即大哭大闹,扬言用菜刀杀死两子,然后自杀。胡适见江冬秀起“杀”机,不敢把事闹大,只好忍气吞声。陈独秀来信时,正是胡适进退维谷时期。他自己说:“提起笔来,一天只写得二百个字。从来不曾这样懒过,也从来不曾这样没兴趣。”

正月里,陈独秀到亚东图书馆,汪孟邹拿出适之的信说:“适之来信了。”

“哦?”陈独秀忙接过信看,见胡适正陷入烦恼之中,说:“差不多了,差不多了。我说适之怎么不给我来信了。”

“适之叫我把话转给你,我是转到了。”汪孟邹说。

“嗯,我回头给他写封信。”陈独秀将信装好,递给汪孟邹说:“张君勱的《人生观之论战》序,对我和适之都开了炮,我打算写一篇《答张君勱》,不知适之的《努力》复刊了没有?”

“怕还没有,他那么消沉。”

“也是。”陈独秀点点头。“他的《努力》不复刊,那就只好用在《新青年》第三期上。”陈独秀说。

回到家中,陈独秀给胡适写了封信,劝他不要烦恼,说自己天天都有烦恼,不少于他,陈独秀用“顽钝不理”四个字送给胡适,让他克服心绪不宁现象。

末了,陈独秀又提到帮蔡和森到商务催稿事,因为陈独秀帮蔡周转了200元,蔡的稿费不来,等于是陈独秀成了债务人。

这次陈独秀开错了药方,他不知道胡适得的是“心”病。对

于陈独秀的信，胡适还是不答。1924年2月底，陈独秀再去信催，而且用了“求”字。这件事，陈独秀印象极深，承认算是领教到了胡适的“不睬术”的厉害。

◎ 讼棍行为

1924年4月，印度诗人泰戈尔到上海。他的提倡东洋文化的讲话在《申报》发表后，陈独秀在《中国青年》上将泰戈尔批了一顿。

《中国青年》拟出特号反对泰戈尔，请陈独秀出面让胡适也写一篇，哪怕短些也行。陈独秀知道胡适的脾气，自办《努力》后，渐渐有了架子，不情愿的事，连信也不回。当然，这与找他的人多、太忙以及情绪低落也有关系。陈独秀答应说：“我给他去封信，但你们不要作指望。”

果然，胡适对于《中国青年》做专号反对泰戈尔不以为然，但碍于老友陈独秀的面子，也不好说什么。

5月初，胡适和徐志摩等人在协和医院礼堂为64岁的泰戈尔祝贺生日，胡适被邀致词。他的生日贺礼是一首写在横幅上的《回向》小诗。胡适在诗中歌颂泰戈尔是已成“菩萨道”之人，仍为众生努力。

初夏，陈独秀召开共产党扩大会议，纠正了一些取消主义做法。会议结束后第二天，陈独秀到亚东图书馆散心。

汪孟邹忙别的事去了，不在店中。汪原放见陈独秀来了，忙招呼“仲叔坐”，然后给陈独秀泡了一杯茶。

“思想是不进则退的。”陈独秀随手翻了翻茶几上的《胡适文

存》，若有所思地说。

见仲叔提到胡适，汪原放眨了眨眼，坐了下来。他知道陈、胡二位叔叔政治观点不一致，不久前为泰戈尔的事又闹了一点不愉快。“胡叔还是主张文学革命，提倡白话的。”汪原放尽管要乔年帮他入党，但提到胡适，他还是要帮他说句话的。

“文学革命不仅要去文言，提倡提倡白话，便算了事；除此之外还有许多要紧的事要干的。”陈独秀看了一眼汪原放，打住话头。

汪原放点点头，他知道仲叔讲的是党事，不便插嘴。

此后差不多半年，陈、胡二人没有什么来往。胡适5月份发现染有肺病，向校方提出再休息一年。夏天，北洋军阀政府秘密下令书店禁止出售《独秀文存》、《胡适文存》，胡适对此大惑不解。陈独秀在《向导》上多有冒犯曹锟内阁处，怎么把陈、胡并列呢？胡适给总理张国淦去信，问了一个“为什么”？举人出生的张国淦想给胡适面子，答应查一查，但没有结果。在北洋军阀政府看来，胡适是宣传新思想的，与陈独秀皆属于乱源。

只有陈独秀一班人发现适之已变了。陈独秀知道胡适、新月社徐志摩一班人为泰戈尔祝寿等事之后，气得大骂：“泰戈尔是一个什么东西！只是和清帝、舒尔曼、安格联、法源寺的和尚、佛化女青年及梅兰芳这类人周旋了一阵子。”陈独秀没有点胡适的名，但胡适知道，字里行间，仲甫早已把他网了进去。

《向导》是共产党刊物，陈独秀有时也寄给胡适。9月份，陈独秀在《向导》发表《我们对于义和团两个错误的观念》。正在考虑出《努力月报》的胡适见到陈独秀的这篇文章，看着看着气就上来了。陈独秀反驳的第一个错误是，义和团是野蛮的排外；第二个错误是，义和团是少数人的罪恶。

这不是出尔反尔吗？胡适清楚地记得戊午年十一月，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克林德碑》，认为义和团是野蛮的排外，义和团是少数人的罪恶。事隔不过六年，陈独秀的行为不算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也可以叫他“讼棍行为”。

“我个人是主张继续出《努力》的，陈独秀一边畏惧资本家，一边为拳匪曲说巧辩，这种混沌思想要彻底批判。”胡适对《晨报》的朋友说。12月，《晨报·副镌》刊出胡适的《〈努力〉的问题》。在这篇文章里，胡适已怀疑陈的人品，说：“君子立论，宜存心忠厚。”陈独秀没有反击胡适对他的攻击。10月，发生了冯玉祥逼曹锟下台的北京事变，孙中山决定离粤北上。这次事变冲淡了陈、胡之间旧的阴影，但又出现了新的阴影。

◎难道我是谋私利吗

1925年立春第三天，陈独秀来到亚东图书馆。

“来了？这么久没见到你，适之以为你也北上了。”汪孟邹忙招呼陈独秀坐。这次汪孟邹没去拿烟，上次陈独秀就发誓说不抽那不卫生的奢侈品了。

“适之来信多久了？”陈独秀问。

“初四写来一封信，问你身体情况，我昨天给他写一封信，说你还常到牯岭路。”汪孟邹并不知道陈独秀在横浜路6号刚开了中共四大，会上专门谈到揭露段祺瑞“善后会议”阴谋问题。

“适之愈走愈远了，你去拿纸来，我给他写封信，你尽快寄给他。”陈独秀绷着脸说。

“发生什么事了？”见陈独秀板着脸，汪孟邹紧张地问。

“段祺瑞搞善后会议，分明是日本帝国主义操纵的一个阴谋，用来对付孙中山国民会议的。适之这么糊涂，竟然也搅了进去。”上个月，胡适在北京给许世英去信，表示愿意参加2月份段祺瑞召开的“善后会议”。许世英是清末拔贡，与陈独秀、胡适都是安徽老乡。他立即给胡适写信，向他表示“折佩”，望他“预备充分贡献之案”。陈独秀知道这事后，十分恼火。

“此事重要么？”

“重要！适之弄得不好，将来在国民之中无立足之地，事关他的前途。”陈独秀醮了醮墨说。

“怕是他们有意利用。”

“你尽快把信寄去。我希望适之最好不参加‘善后会议’，若出席，也不要附和别人。”陈独秀站起身说。

“我今天即寄去，适之要是独立发言，不跟在他们后面被人利用就好了。”汪孟邹一边说着，一边趴在桌上写了几个字。“适之不会讲我和你站在一起反对他吧？”

“哪里，这全是为他好。”陈独秀喝了一口茶。

“明日元宵节，到我这儿来吃元宵？”

“不了，你别忘了寄信。”临走，陈独秀再次叮嘱。

段祺瑞匆匆在2月1日召开了“善后会议”。胡适在会上提出《国民会议组织法草案》，反对人民民主主义。

身在上海的陈独秀闷在鼓里，过了几天还劝胡适不要参加会议。2月7日，上海《民国日报》刊出《善后会议开场》，使上海舆论界大为震惊。

2月11日，在北京的胡适收到汪孟邹及陈独秀的信，便提笔给汪孟邹去信，叫他转告仲甫：“我是不谋私利的，不荐一个人，不写一张条子。”又说，“会议式的解决时局总比武装对打好

一点,解决不了,至少可以看出会议式的解决何以失败的内幕来。”

就连汪孟邹也看得出,胡适前面的话是讽刺仲甫,后面的话是给他自己搬梯子。隔了几日,汪孟邹给胡适去信,说:“仲翁对于吾哥确是十分爱惜,但他说话偏激,哥焉知其详,望勿介意为幸为幸。”

陈独秀见到胡适的信,大光其火。“不谋私利,难道我是谋私利吗?不荐一个人,不写一张条子。不荐好了,不写好了,有什么了不起。”陈独秀联想到请胡适找商务推荐张申府和出蔡和森书的事。这事不提便罢,一提陈独秀就生气。

“适之是个书生,身体也不好,仲兄千万别和他计较。”见陈独秀发火,汪孟邹急得团团转。

见汪孟邹发急,陈独秀叹了口气:“等舆论起来了,适之会反省的。”

胡适渐渐也觉出“善后会议”不是滋味,参加前就有过怀疑,然而他信奉试验主义,凡事愿意尝试,所以才写了《尝试集》。这次,胡适意识到尝试了一粒苦果,他必须找一点爽口之物,清洗一下此次尝试的苦涩之味。

2月中旬,胡适抱着这个目的,去协和医院看望病危中的孙中山。孙中山是通电反对“善后会议”的,胡适当然不提“善后会议”,只是劝他试服中药。他自己这几年,就不曾离过中药罐子。

3月初,胡适在孙中山逝世前几日辞去了“善后委员”一职。

◎简直要做仇敌了

1925年10月初,胡适到上海医痔疮,同时到一些学校作讲演,融洽一下和上海青年的关系。早在8月下旬,上海学生联合会给他去信,指责他拥护复辟余孽,尝试“善后会议”是“无聊卑污之举”。北京反清大同盟因胡适反对逐溥仪出宫,拟呈请警厅,将胡适逐出北京。所以这次胡适南来,先入烟霞洞,再经武汉到上海,也与此有关。

12月初,陈独秀和胡适二人在亚东图书馆闲谈。“仲甫,这次火烧《晨报》,也符合你的争自由主张吗?”胡适小心翼翼选择词语,婉转指责陈独秀。

11月底,北京发生了群众火烧新月派把持的《晨报》馆事件。上个月,他们谈到“善后会议”事,仲甫指斥胡适为帝国主义所利用,气得胡适大叫:“哪有帝国主义!哪有帝国主义!”

“你以为《晨报》不该烧吗?”陈独秀不点破胡适的用意,只是反问他。

“你以为该烧?”胡适睁圆的眼睛在镜片后面闪着光。他有些震怒。这几个月来,不断有人攻击他尝试“善后会议”、拜见溥仪,不都是陈独秀同党少年所为吗?但胡适压住了火气,说:“仲甫,以前你脑子里还有一点容忍异己的东西,这样下去,这个社会怕要变得更残忍更残酷了。”胡适想说,怕我们这对老朋友,也要变成仇敌了。见陈独秀拉下脸,他忍了忍没有说出来。但他实在不能容忍陈独秀,打算回北京后给陈独秀写信,和他摊牌。

“适之,你也该吸取教训了。你劝学生有秩序的运动,说我

们讲三民主义是名词运动,今天又叫我容忍。正因为社会残酷了,才逼出我们不容忍。章行严以乱罪抓共产党容忍了么?五卅运动他们容忍了么?把我关进大牢,他们容忍了么?”陈独秀提高了嗓门。

“你也不要忘了,你坐大牢时,马通伯、姚叔节这些旧学究还署名营救你。当时在桃李园请客,我还很感慨,觉得这个社会还有些人味儿。”胡适提醒陈独秀说。

汪原放见这两位世叔刚才还非常高兴欢喜,这会又争吵不休,忙端出水果,让他们谈些别的,消消火气。“你们在一起,总是各有各的见解,各有各的意见。”汪原放不偏不倚地笑着说。

“两个阶级呀!”陈独秀喝了一口水,口气已缓和多了。

“是两个阶级!”胡适说话时加重了语气,没有笑。

“打算什么时候回去?”陈独秀问。天已冷,看得出胡适没有带过冬的棉衣。

“过几日就回去。不想教书,打算写点书、译点书,养养身体。”提到回北京的打算,胡适情绪又好了起来。

这次争吵,给胡适心里投下了巨大的阴影。几年来,陈独秀与胡适的分歧已屡次影响他们的私人感情。回到北京,胡适给陈独秀写了一封信,说,我们“简直要做仇敌了”。

◎帮倒忙

从那以后,陈独秀和胡适几乎不通信了。1926年夏季,胡适到欧美旅行访问,直到1927年5月底回到上海,陈、胡音信断绝。蒋介石叛变革命后,途经日本的胡适发表讲话支持蒋介石。

1927年6月底的一天,刚刚租下上海极司斐尔路(万航渡路)49号甲的一幢楼房的胡适,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弄得心神不定,开门一看,是满头大汗的汪孟邹。神色慌张的汪孟邹将一张皱巴巴的纸条给胡适,说:“延年被捕了,你快想法子救救他。”

“啊?”见是陈延年亲笔写的求援信,胡适眼前浮现出在北大时见到的陈延年的音容笑貌,心里一沉。这回延年难逃一死。蒋介石开杀戒后,已杀了许多共产党人,对于共产党头号人物陈独秀的儿子,蒋绝不会放过。

“我一定营救。”胡适安慰汪孟邹说。尽管凶多吉少,他还是答应帮忙。吴稚晖是陈延年的老熟人,当时曾帮助陈延年、陈乔年赴法留学。他决定将信转给吴稚晖,请他帮忙。

谁知吴稚晖将信转给扬虎,加快了陈延年的死亡。1927年7月4日夜,陈延年被杀害。

汪孟邹也没有想到,这回他和胡适帮了倒忙。

◎请蔡元培就近营救陈独秀

1927年八七会议后,陈独秀到上海隐居。因生活困难,加上寂寞难熬,陈独秀埋头写《中国拼音文字草案》。书稿写成后,陈独秀想卖给商务印书馆,于是想到了胡适。

胡适将书稿转给商务,商务也不敢出。见陈独秀生活困难,胡适、赵元任等人赠陈独秀千元稿费。

陈独秀是要面子的人,他不愿意过这种乞丐式的生活,此后再也没有找胡适。胡适此时也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仲甫不找他,正是求之不得。

1932年10月，陈独秀被捕了。胡适当时任北大文学院院长，多少生了些怜悯之心，再说，此时若无表示，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10月24日，胡适给在上海的蔡元培发了一份电报：“请就近营救陈独秀。”接到电报当天，蔡元培等八名知名人士联名以快邮代电致国民党中央党部、国民党政府，为陈独秀说情。胡适给蔡元培拍过电报后，自己又直接致电蒋介石：“请将陈独秀案付司法审判。”不久，蒋介石从武汉给胡适拍来电报，说“陈独秀案已电京交法院公开审判”，给胡适一个顺水人情。

陈独秀被捕，使寂寞了五六年的他又被新闻界炒得沸沸扬扬，北大学生也议论纷纷。胡适禁不住于10月底作了一次演讲，题目是“陈独秀与文学革命”。胡适称赞说，陈独秀把我们的玩意儿变成了文学革命，由他一往直前的精神，使得文学革命有了很大的收获。

陈独秀听说《申报》刊了胡适等人救他的电报，十分感动，一扫往日对胡适的怨气。12月1日，在南京候审的陈独秀给胡适写了一封信。前几日，北大校长蒋梦麟来看他，谈到适之可能从政，陈独秀认为胡适著述之才优于从政。他给胡适去信，除了对他从政事发一番感慨外，还请他寄点英文版图书及甲骨文方面的著作来，以消磨时光。蒋梦麟来时，听报上说陈独秀想看《水浒传》，便找了几本小说带来，但陈独秀此时已无兴趣看小说。几年前，陈独秀曾将《中国拼音文字草案》稿交胡适，请商务出版。陈独秀想，现在大概敢出版了吧！倘若不行，傅斯年的研究所能否出版呢？孟真在不久前还发表文章称陈独秀是“中国革命史上光焰万丈的大慧星”，主张依据法律特赦。

陈独秀希望胡适给他回信，由段锡朋转给他。但胡适这几日在武汉、长沙等地演讲，没有马上答复陈独秀。11月，陈独秀

听说胡适帮他推荐律师，因自己已请了章士钊，便托段锡朋带信给胡适，感谢他的好意。胡适也没有及时回信。

◎旧朋友中又失了一个

1933年夏天，胡适赴美，直到10月25日经日本回到上海。胡适路过南京时没有时间看狱中的陈独秀，他感到应该解释一下，便于11月2日在北京的家中给陈独秀去了一封信，说这次从国外归来路过南京未能去看他，感到抱歉，过两个月南下，当来奉看。

陈独秀知道胡适来南京与国民党一班达官贵人喝酒拜会，十分生气，提笔给汪原放写信，发了一顿牢骚。汪原放见仲叔火冒三丈，忙给陈独秀来信，说胡叔太忙，叫陈独秀不要介意。

接到汪原放来信，陈独秀于11月15日回了一封信，叫汪原放不要把此事告诉别人。“我和他仅仅友谊关系，其他一切不必谈，他现在既不以友谊态度待我，不过旧朋友中又失了一个，如此而已。”

但陈独秀并没有与胡适绝交。他叫汪原放不外传，就留有余地。1935年夏，关在南京狱中的陈独秀突然想起研究太平天国史，写信叫汪原放帮助找参考书。北大学生罗尔纲出版了《太平天国广西起事史》，写得不错。陈独秀听说罗尔纲在胡适家中帮助抄写整理胡适父亲遗著，便想请罗尔纲到南京谈谈。但胡适不同意罗尔纲去南京。当时罗尔纲以未出山的弟子身份住在胡家，兼辅导胡适的孩子。胡适说：“仲甫是有政治偏见的，他研究不得太平天国，还是让尔纲努力研究吧！”胡适记得陈独秀当

年议论义和团，一会骂拳匪，一会为之曲说强辩。他觉得仲甫是不能研究史学的。

但胡适对陈独秀生活上还很关心。1935年年关，胡适给陈独秀来信，寄来陈独秀的《中国拼音文字草案》手稿，说稿费已付帐，要陈独秀修改后出版。这对陈独秀来说，不啻是一支兴奋剂，该书写于1928年，催过适之几次，几乎无望了。

此事并没有消除陈、胡之间的介蒂。几天后陈独秀给汪原放去信，谈到谋股办书店事时，说：“惟此事务必慎重，不可冒昧邀胡加入，是为至要。”陈独秀对于胡适在《新青年》风波中的作用及办《努力》等事，记忆犹新，认为胡适是喜拿主见、不易合作之人。

胡适不赞同罗尔纲去南京，不赞同陈独秀研究太平天国，但对陈独秀早期办《新青年》还是肯定的。夏末秋初，亚东图书馆与求益书社重印《新青年》，请胡适题词，他信笔写道：“《新青年》是中国文学史和思想史上划分一个时代的刊物，最近二十年中的文学运动和思想改革，差不多都是从这个刊物出发的。”

提到《新青年》，胡适便想到陈独秀和自己的分手事。陈独秀任文科学长时，是受自己及孟和英美思想影响的。自己与守常争论问题与主义，守常还把仲甫划入问题派。坏就坏在蔡元培受汤尔和、尹默、夷初的影响，免了陈独秀的文科学长职务，使其左倾。这事几乎决定了陈独秀后来的命运。

1935年12月下旬，胡适翻阅汤尔和送来的1917——1919年的日记。看到1919年3月26日夜开会解除陈独秀文科学长一事，胡适仍然怪汤尔和，他在还汤尔和日记时附了一封信，说：“此夜之会，虽有尹默、夷初在后面捣鬼，然子民先生最敬重先生，是夜先生之议论风生，不但决定北大的命运，实开后来十余

年的政治与思想的分野。”

汤尔和见胡适把陈独秀创立中国共产党、《新青年》的分化、北大自由主义者的变弱等责任都推到他的头上，很不服气。接信当天给胡适复信说：“陈君当然为不羁之才，岂能安于教授生活，即非八年之事，亦必脱鞴而去。”

1935年年底，丁文江因煤气中毒住长沙医院，胡适刚从长沙看丁文江回来，又接傅斯年从长沙拍来的急电，正忙着到协和医院请医生前往抢救。这时接到汤尔和来信，看着看着胡适就生气了，他回信反驳说：“但若无三月廿六日夜的事，独秀尽管须因五月十一日夜的事被捕，至少蔡、汤两公不会使我感觉他们因‘头巾见解’和‘小报流言’而放逐一个有主张的‘不羁之才’了。”

◎不用去美国

1937年初秋，日机轰炸南京，陈独秀呆的监狱也被炸。金陵女子大学中文系主任陈钟凡来探望，见陈独秀不安全，便和胡适商量保释陈独秀。当时胡适参加庐山谈话会，正在帮蒋介石、汪精卫拟外交方案。陈钟凡找到胡适时，胡适刚被聘为“国防参政会”参议员。因为常和汪精卫晤谈，又与蒋介石共宴，胡适便答应说：“我试试给兆铭写一信保释陈独秀。”

卢沟桥事变后，中国共产党提出保释政治犯，成立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这个大形势下，蒋介石与汪精卫商量，同意开释陈独秀，再给胡适一个面子。8月19日，汪精卫给住在南京教育部内的胡适写了一个便条：“适之先生惠鉴：手书奉悉，已商蒋先生转司法院设法开释陈独秀先生矣。”汪精卫用“设法开释”

一词，胡适知道是法律用语，因为行政首脑要尊重司法程序。

8月23日，星期一，处暑。陈独秀在狱中呆了5年差53天终于出狱了。傅斯年把陈独秀接到家中，他告诉陈独秀：“适之太忙，不能来接，过一会来看你。”

陈独秀连声说：“谢谢。”

胡适来看陈独秀时，发现59岁的陈独秀目光迟钝，明显衰老了，但态度却明显谦和了。

陈独秀说：“这次出狱，又给你增加麻烦。”

“你是因祸得福。日本人不来，你出来还没有这么快。”胡适一边笑着说，一边拿烟请陈独秀抽。陈独秀点了点头，拿了一支说：“你还没有戒？”

“下过几次决心，戒不掉，什么时候心脏不行了，才能彻底戒掉。”

谈了一会儿话，说到守常惨死，半农病逝，两人有些伤感。胡适问陈独秀下一步作何打算。

陈独秀说：“这一把老骨头，真不知还能干什么呢？”

“我觉得仲甫可以进‘国防参政会’，现在国难当头，正是用人之际，中正、兆铭都有此意。我现在也是国防参政会参议员，仲甫若进来，我们又可以轰轰烈烈在一起干了。”胡适一面吸烟，一面笑嘻嘻地说。说到后来，情不自禁离开座椅，在房间里走动起来。

陈独秀听明白了胡适的意思，摇了摇头，说：“蒋介石杀了我许多同志，还杀了我两个儿子，我和他不共戴天。”

胡适见陈独秀提到陈延年、陈乔年之死，闪闪发光的眼睛又暗淡了下来。他知道叫仲甫和蒋、汪共事，是不可能的了。

见胡适默不作声，陈独秀也有所悟，便换了语气说：“现在大

敌当前，国共二次合作，既然国家需要他合作抗日，我不反对他就是了。”“他”指的是蒋介石。

这次南京见面，是陈独秀、胡适两人的最后一次晤谈。傅斯年在胡适面前称赞陈独秀说：“我们比他年轻，还没他精神旺，他现在还是乐观。”

9月8日，胡适受蒋介石委托，经武汉、香港前往美国，做非正式的外交使节和国民党驻美国大使，这一去呆了9年。临走前，胡适请人捎信给陈独秀，问他可愿意去美国写自传。当时美国一家图书公司看中了陈独秀在狱中写的《实庵自传》前两章。

陈独秀回话说：“我生活简单，不用去美国，也厌烦见生人。”陈独秀不去美国，还因为外语不过关，身体也不好，但他不愿意这样说。

9月9日，在胡适离开南京的第二天，陈独秀也乘船离开南京，前往武汉，这一别成为陈独秀、胡适两人生命中的最后永诀。

◎回头“浪子”

1938年8月3日，陈独秀携潘兰珍到江津住下。陈独秀每月给汪孟邹写两封信，告诉自己的情况。当时陈已60岁，胃病、高血压经常发作。中国托派根据托洛茨基建议，请汪孟邹出面给胡适写信，把陈独秀弄到美国去。胡适于9月23日在瑞士得到通知，被任命为“中华民国驻美利坚国特命全权大使”，于10月5日赴华盛顿就任驻美大使。汪孟邹听说胡适当了驻美大使，想请他找政府，为陈独秀、潘兰珍出点赴美川资。1937年仲甫出狱时，胡适曾问他是否愿意去美国写自传。

10月21日,汪孟邹给胡适写了一封信,说陈独秀“到美之后,如林语堂卖文办法,陶行知演讲办法,该可生活无虞。此事国内友人均无力量办到”。汪孟邹怕胡适有顾虑,多病的陈独秀一旦生活不能自保,就成了胡适的负担,所以多解释了几句。

当时广州陷落,胡适正忙于争取美国经济援助,美财政部长摩根韬答应美国贷款给中国,胡适正为此事忙上忙下,哪有心思想到陈独秀出国事。中国托派催了汪孟邹几次,见胡适不回信,也没有办法。汪孟邹对原放说:“适之就是这个脾气,当年仲甫催他给《新青年》来稿,催他给朋友帮忙,他也是不回信。”

1942年5月27日,多病的陈独秀在江津去世。六年后,负责陈独秀遗著出版的何之瑜给回到北大任校长的胡适去信,请他给商务印书馆张元济去信,劝张出版《独秀丛著》。同时,何之瑜请胡适为《独秀丛著》写总序。北大的“三只兔子”只剩下胡适了,因此写总序非胡莫属。

《独秀丛著》最终没有印出来。在以后的10多年中,胡适多次谈到白话文运动和《新青年》,却很少提到陈独秀。

1949年4月14日夜,胡适在乘威尔逊总统轮去美国途中,写了《陈独秀最后对民主政治的见解——〈论文与书信〉序言》。胡适写道:“我觉得他的最后思想,特别是他对于民主自由的见解,是他‘沉思熟虑了六七年’的结论,很值得我们大家仔细想想。”胡适没有想到出狱时仍很固执的陈独秀,经过六七年思考,终于与他殊途同归了。这也是胡适乐于写这篇序言的原因。这个序言因《独秀丛著》未出版,1949年收入台北出版的《我们必须选择我们的方向》文集中。

1962年2月24日,在陈独秀去世整整20年后,胡适在台湾去世了。

胡适去世后第二天，蒋介石写了一副挽联：“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这副挽联道出了新文化运动的两位巨子陈独秀与胡适同中之异和异中之同：陈胡两人都鼓吹新文化，都鼓吹新思想，但陈独秀只讲新文化不讲旧道德，只讲新思想不讲旧伦理，这与胡适既讲新文化又讲旧道德，既讲新思想又讲旧伦理是远远不同的。

这也是陈独秀与胡适两人两种文化人格的区别所在。

第四章

南陈北李

——陈独秀与李大钊

◎扬木铎之声

1914年7月的一天，烈日炎炎，天气燥热异常。随着几声汽笛的鸣叫，一艘外国海轮由上海码头起锚向异国东瀛驶去。船舷边，一位三十五六岁的小个子中年人不顾海水蒸发起来的热气，凝神望着远方。这位依舷伫立的中年人不是别人，正是最后一次赴日本的陈独秀。

两个月前，章士钊在东京创办了《甲寅》杂志，他当时便想到了请陈独秀来协助。十几年前，他们曾一同办《国民日报》，一起参加了暗杀团，一同留学日本，是共过患难的老朋友。章士钊

原计划去英国,所以邀请陈独秀来日本的事便推迟了。

一望无际的海水风平浪静,暗绿色的水面与远处湛蓝的天空连成一色,让人心旷神怡。不久就要见到老朋友了,对新生活的憧憬使陈独秀暂时忘却了二次革命失败后的苦闷,他的心胸似乎也变得像大海一样宽广起来。

出入《甲寅》编辑部的有高一涵、易白沙和李大钊等人。六安人高一涵 1884 年出生,和大他 5 岁的陈独秀是老乡。因为陈独秀的老丈人也是六安高姓,为他们异域生活增加了不少谈资。比高一涵小两岁的湖南人易白沙,辛亥革命时在安庆帮助组织青年军,主持过陈独秀老家的怀宁中学,所以和陈独秀也是一见如故。

伏在书桌上编文章的章士钊是湖南善化人,见他们谈得高兴,一边插话一边放下手中的笔说:“《甲寅》快要成了皖人的清谈馆了。”

24 岁的河北乐亭人李大钊是去年残冬季节冒着风雪来到日本的。春天入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读书,住在下户冢的基督教青年会内。他的英语老师鲁宾逊感到,李大钊似乎对学习英语比对学习基督圣经更感兴趣。

初次见面,陈独秀就对李大钊说我们是校友。光绪二十七年,陈独秀第一次赴日留学进的是东京专门学校,这是早稻田大学的前身。

“当时不叫早稻田大学?”理了一个平头的李大钊问。李大钊看上去天庭饱满,看人讲话时喜欢紧抿着嘴,讲一口半官半土的河北话。

“好像我来第二年才设大学部,改名也就是那时候。”陈独秀长李大钊 10 岁,两人都是秋花含笑的 10 月出生的。后来谈多

了,两人又发现都是在两岁时死了父亲。不同的是,李大钊3岁时,母亲也去世了。陈独秀对此很叹了一口气,说:“我说我苦,没想到你比我还苦哩。”

立秋后,《甲寅》杂志一卷三号刊出陈独秀宣统二年在杭州作的几首诗。诗中有“垂柳飞花村路香,酒旗风暖少年狂。桥头日系青骢马,惆怅当年萧九娘”句,李大钊看完后说:“仲甫真有雅兴。”

“一时高兴,胡乱写一点。你不作么?”

“以前作过,作不好,已很长时间没有作了。”李大钊若有所思地说。

在一旁的章士钊摆摆手,说:“不对吧?‘无限伤心劫后话,连天烽火独思君。’不是你作的吗?”

这首诗还是李大钊出国前发在1913年11月1日自己负责出版的《言治》第六期上的,“劫后”是指“二次革命”被袁世凯镇压以后,“君”指友人郭厚庵。李大钊说:“行严真是好记性,其实那算不上诗。”

“怎么不算诗呢?仲甫托古,守常喻今,都是好诗。”章士钊说完,三人都笑了。

“独秀山民是谁?独秀是谁?”初冬的一天,李大钊和章士钊在《甲寅》编辑部闲谈。李大钊手中拿着刚出版的《甲寅》一卷四号,上面有自己写的《国情》和署名“独秀山民”、“独秀”的《〈双枰记〉叙》、《爱国心与自觉心》。

“仲甫是也。”章士钊见李大钊皱着眉头看文章,问:“是不是《爱国心与自觉心》?”

“你不觉得调子低了一点么?”

“仲甫自来日本,调子就没有高过,是我劝他写的,如其闷在

胸中,不如说出来快活。”章士钊笑了笑。

“说的也是,只怕说出来还快活不了。”

章士钊点头:“已有人责问《甲寅》,话讲得很重。”

“怎么说?”李大钊抬起头。

“以为不知爱国,宁复为人,何物狂徒,放为是论?”章士钊说着哈哈笑了起来,“仲甫成了‘狂徒’了。”

“陈先生的话,似于国于民都无可为,过于灰心丧气了。”李大钊收起笑容说。因为和陈独秀是熟人,他措辞尽力平和些。陈独秀在《爱国心与自觉心》中发牢骚:“国家国家,示行下法,吾人诚无之不为忧,有之不为喜。吾人非咒骂尔亡,实不禁以此自觉也。”李大钊已读了一些马克思主义著作,房间里便放有幸德秋水在《平民新闻》上发表的《共产党宣言》日译本。在《国情》中,李大钊还抨击袁世凯的美国顾问古德诺、日本顾问贺长雄两个人著书立说,为袁世凯准备称帝的“新约法”制造舆论。李大钊写道:“求国情于外人,窃恐此憾终难弥耳。”

章士钊知道李大钊和陈独秀不同,后者是对国家失望,前者是探求救国良策。沉吟了一会,章士钊说:“仲甫个性刚烈,所谓回头草弗啮也。有闲时,不妨也将你的话托出,从容讨论之,如何?”李大钊点头称是。

临别时,李大钊突然想起仲夏在《甲寅》上看到的署名“生机”的记者来信,问:“生机也是仲甫么?”

“正是。”

李大钊恍然大悟,两文同出一辙。陈独秀在那封信中就说:“国人唯一之希望,外人之分割耳。”当时李大钊就很诧异,竟有如此直言亡国而不怕遭天下唾骂的人,现在见陈独秀说出“国不必国”的话就很自然了。

1915年仲夏的一天,天气闷热,住上海法租界嵩山路吉谊里21号的陈独秀还是禁不住常去章士钊处。不久前,汪孟邹从上海给在日本的陈独秀来信,说高君曼染肺病咯血,催他回国。章士钊见陈独秀要走,也决定把《甲寅》带到上海办。

谈了一会苏曼殊写的《绛纱记》,章士钊将刚印好的《甲寅》一卷七号递给陈独秀,上面有陈独秀在日本写的两首诗。

这时,章士钊想起一件事,起身找出一叠文稿递给陈独秀,笑着说:“‘狂徒’,你的那篇《爱国心与自觉心》引出来的风波还没有了结。”

“是么?”陈独秀放下手中的《甲寅》,接过一看是李大钊的字,题目是《厌世心与自觉心》。陈独秀抬头望了章士钊一眼。

“是针对你的颇有见解,我打算用在下期《甲寅》上。”章士钊拎起茶壶给陈独秀斟了一杯冷茶,说:“你来了正好。”

陈独秀急急地翻了一下文章,李大钊行文娓娓道来:“勿谓所逢情势,绝无可为,乐利之境,陈于吾前,苟有为者,当能立致,惟奋其精诚之所至以求之,慎勿灰冷自放也。”

“近日我在筹办新杂志,正合守常‘奋生花之笔,扬木铎之声’之说。”陈独秀读完,松了一口气,说:“至于宿命论,肚子一填饱,早已丢到爪哇国去了。”

“那我就照用不误了。”见陈独秀爽快,章士钊高兴地说。

“其实我说‘不’字,你还是照用不误呀。”陈独秀说着先笑了起来。

“不敢!不敢!‘章子’只是‘当年有令名’,眼下该是仲子‘扬木铎之声’了。”章士钊想起了陈独秀“存歿六绝句”中讲自己的话。言毕,两人哈哈大笑。

◎青春之气, 万古长青

东京郊外高田村有一间简陋的民房叫“月印精舍”。这便是李大钊和几个友人在日本合租的房子。舍外萧瑟荒芜, 唯一引人注目的是假山边的古刹。春天, 李大钊喜欢在古刹前的池塘边散步, 观赏樱花。池塘旁边有一棵梅树, 李大钊记得刚来时梅花已开始凋谢。

1916年春天的一日, 阳光明媚, 东风送暖, 门前池塘厚厚的冰块终于化去了。受着国内反袁斗争形势的鼓舞, 看着窗外冬去春回的季节变化, 李大钊不禁满怀激情, 写下了热情洋溢的充满革命者活力的《青春》一文: “春日载阳, 东风解冻。远从瀛岛, 反顾祖邦。肃杀郁塞之象, 一变而为清和明媚之象矣; 冰雪沍寒之天, 一幻而为百卉昭苏之天矣。每更节序, 辄动怀思, 人事万端……”文章结尾, 李大钊纵笔放歌, 发出内心的呼唤: “以青春之我, 创建青春之家庭, 青春之国家, 青春之民族, 青春之人类, 青春之地球, 青春之宇宙。”

全文 7000 余字, 李大钊一气呵成, 满腔热情地提出了革命民主主义者崭新的青春宇宙观、青春人生观。写完后, 李大钊将《青春》寄给了陈独秀。不久前李大钊为联系反袁事专程回了一趟上海, 看到了陈独秀 1915 年 9 月创刊的《青年杂志》, 当时他就打算写一篇稿子。这不仅仅是因为陈独秀办的杂志叫《青年杂志》, 还因为在守常看来, 仲甫低沉的人生观不改变, 必将贻误青年。所以他将这篇充满了青春活力和积极向上的人生观的文章取名《青春》。

“守常真文如其人啊！”接到李大钊寄来的《青春》，陈独秀一气读完，深深为李大钊的浩然正气所触动。想不到守常年龄不大，却如此有气节。对陈独秀来说，李大钊的《厌世心与自觉心》与《青春》两文，正是针对他的《爱国心与自觉心》而来，前文驳论，后文立论，一反一正，成为合璧矣。

1916年2月15日，陈独秀出版《青年杂志》一卷六号后，因与《上海青年杂志》名雷同，《青年杂志》改为《新青年》。9月1日，陈独秀在《新青年》二卷一号上发表了李大钊的《青春》。《青春》刊出后，为《新青年》大增光彩，吴玉章读后连声感叹：“青春之气，万古长青！”

◎文科学长与图书馆主任

1918年初，陈独秀召集《新青年》同人开会。陈独秀于1917年初任北大文科学长，将《新青年》带到北京来办。这天，住在皮库胡同的李大钊也来了。李大钊比陈独秀到北京早半年。1916年5月由日本回上海后，李大钊即赶到北京主编《晨钟报》兼任汤化龙的秘书。《晨钟报》是研究系办的报纸，李大钊因揭露政客们勾心斗角，得罪了这帮人，不到一个月，李大钊便辞职而去。

李大钊离开《晨钟报》后，1917年初又和高一涵协助章士钊编辑《甲寅》日刊。1918年2月，章士钊让出了自己兼任的北大图书馆主任一职，由李大钊接任。

守常像是教师塾的好好先生。坐在李大钊对面的陈独秀心里想。他和鲁迅都感到李先生话不多，人很忠厚。

散会后，大家陆陆续续地走了，陈独秀叫住了李大钊：“上次

我对你的《青年与老人》发了一通感慨,也没有听到你的回音。”1917年春,陈独秀收到了李大钊给《新青年》写的第二篇文章《青年与老人》。李大钊在文中说:“老人一闻青年之行动,辄骇为危险。青年一见老人之行为,辄嗤为腐败。”陈独秀读后,信手写了几句读后感:“吾国之老人,当敬让少壮。愚甚望现时诸老人,其勿误会李君立论之旨。”然后将李大钊这篇“义极精确”的文章刊在4月1日《新青年》三卷二号上。

“你总是先声夺人。”陈独秀哈哈笑了起来,“你那篇《厌世心与自觉心》给我印象很深,那时能批评我而又出自好心的,寥若晨星。”

“你的《吾人最后之觉悟》已经走到很前面去了。”李大钊也笑着说。

1918年中秋后,蔡校长在校长室召开本校编译处会议,《新青年》同人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陶孟和、高一涵也到了,一共来了14人,把校长室挤得满满的。

蔡元培说,10天前,评议会推陈独秀、胡适组织法文协会,专管法文名著直译事,问大家有没有意见。大家都赞成。出门时,陈独秀和李大钊在已竣工的北大红楼前闲谈。

“近日还做古体诗么?”陈独秀记得夏天李大钊在《言治》季刊第三期上发表了《复辟变后寄友人》诗,诗云:“英雄淘尽大江流,歌舞依然上画楼。一代声华空醉梦,十年潦倒剩穷愁。灯帘半卷江天雨,蕉扇初迎海外秋。忆别万山无语句,只应共泛五湖舟。”

“好久未作了。”

“你的诗朴实中有英雄气,很像你的为人。”

“那里。癸丑年到日本,大家心情都不好,我也闷得慌,那时

写的东西都脱不了一个愁字。”李大钊说。

“嗯。”陈独秀的“国不必国”的话也是那时说的。“你写东西好像很受季节变化的影响。”李大钊写《青春》是在冬去春回的时候，写《复辟变后寄友人》是在夏末秋初。

“人是万物之灵，季节一变化，多少影响情绪。”李大钊点头认可。

“说的也是，秋虫啾鸣，遍地黄花，所谓多事之秋也。不过有空还望写点文章，《新青年》上已不大见你的文章了。”陈独秀万变不离其宗，三句话一讲，就讲到了《新青年》。

1918年春，李大钊写《今》文，对陈独秀《一九一六年》发表感叹。陈独秀说：“青年欲达民族更新的希望，‘必自杀其一九一五年之’青年，而自重其一九一六年之青年。”这使李大钊想起自己以前讲的话：“从现在青春之我，扑杀过去青春之我，促今日青春之我，禅让明日青春之我。”李大钊也感到文章有些“杀气”，解释说：“所谓杀者，不过使今日的‘我’不仍旧沉滞于昨天的‘我’。”这篇文章刊于4月15日《新青年》四卷四号上。一个月后，在发表鲁迅小说《狂人日记》的四卷五号上，又发表了李大钊《新的！旧的！》一文。

见陈独秀提到写文章事，李大钊忙说：“近日图书馆忙搬迁，闲时我即多作几篇。”

◎性格与众不同

12月上旬，天已开始下雪。陈独秀到红楼一层东南端图书馆主任室，正在读书的李大钊穿着棉袍马褂，见仲甫来了，忙起

身让坐。陈独秀在李大钊对面的木沙发椅上坐了。

“《新潮》社没有人？”陈独秀架起腿，点了一支烟问。《新潮》社刚成立，李大钊把图书馆的一间房子拨给了傅斯年用。

“不知道。他们打算元旦出第一期《新潮》，大约是忙去了。”李大钊望着窗外的满天飞雪说。

“你是顾问，要关心这个小兄弟哟。”陈独秀已见到前日《新潮》杂志社启事。傅斯年、罗家伦办《新潮》，目的是为《新青年》呐喊助威，所以《新青年》同人视《新潮》为《新青年》的小兄弟。

“你答应学校负担经费，我才敢做他们银钱顾问的。”李大钊笑着说。

“办刊物其实是很吃苦的。我担心他们的决心和长久支持的志愿。”

“青年人开始都要被人担心的。”李大钊说。

陈独秀听出了李大钊话里的弦外之音，换了一个话题：“《每周评论》就要获准创办，你我怕要更忙些了。”

上月底，蔡元培、李大钊、陈独秀等人在中央公园发表演讲，庆祝第一次世界大战协约国胜利。李大钊发表《庶民的胜利》讲演，刊在11月15日的五卷五号《新青年》上。这一期《新青年》正好轮到李大钊编辑，他索性又编入了《Bolshevism的胜利》一文。但《新青年》出版周期长，送到上海印刷，等印出来新闻已成旧闻。加上胡适不愿意谈政治，所以上月底，陈、李即商量出版《每周评论》。

李大钊是极力主张办《每周评论》的，张申府、周作人、高一涵都表示支持。11月27日下午，他们几个人聚集在陈学长的办公室讨论创办《每周评论》的事，决定下个月14日出版。

胡适态度冷淡，这会正好回绩溪老家奔母丧去了。他对李

大钊《Bolshevism 的胜利》尤不感兴趣。

见陈独秀提到《每周评论》，李大钊说：“你尽快将明年同人轮编《新青年》次序公布出来，容些精力办《每周评论》。六卷一号该你编，前几期的《每周评论》我多出点力。”

陈独秀点点头，说：“就这样说了，只是你们图书馆事多。回头叫张申府帮你忙。”守常一个人办太累，陈独秀打算写几封信，找周作人、鲁迅等人约稿。

“有空你写一个《发刊词》，再在《新青年》上做一个广告。”

“好。读《新青年》不可不读《每周评论》，我这就去做。”说着陈独秀站起身来，用力搓了搓有些发僵的双手，噤噤噤上楼去了。

12月21日，是旧历冬至的前夜，北京的夜已很冷了。李大钊和张申府相约来到宣外大街北京《晨报》的印刷所。无论如何，他们必须在今夜完成《每周评论》第一号最后的校对。原来是定在上个星期出版的。

校对时，张申府注意了一下陈独秀写的《发刊词》道：“《每周评论》的宗旨，也就是主张公理，反对强权。”

“仲甫讲美国总统威尔逊是主张公理反对强权的第一个大好人，我不以为然。”二十五六岁的张申府是河北献县人，比李大钊小4岁。身材欣长，留着分头，戴着眼镜，一看便知是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

望了一眼这位同乡，李大钊点点头，说：“这是仲甫的性格，想到哪写到哪。倘若引起争论，则正是仲甫求之不得的。”讲到这里，李大钊又想起陈独秀的《爱国心与自觉心》。

张申府恍然大悟地说：“仲甫起笔名，也能见他的性格：‘独秀’、‘只眼’，都有别具一格与人不同的意味。”陈独秀在《每周评

论》上写文章署名“只眼”。

见张申府这样说，李大钊笑了。是啊，自己取笔名“李钊”、“守常”就很合自己的性格。“你叫崧年，不也和你这个大个头很配吗？”李大钊伸了伸腰说。

这一夜，两人校对到凌晨4点。出门时，高阔的天空挂着如镰的下弦月，苍穹中几点星辰眨着眼，望着隆冬之夜干冷的大地。穿着灰布棉袍的李大钊和张申府踏着冰冻的马路，抄着手并肩前行。《每周评论》今天就要面市，新生命的诞生冲淡了夜的寒冷，随着步伐的加快，他们渐渐隐入那迷梦般的夜色之中。

◎团结千万不可不顾

1919年春天是一个多事的季节，保守势力受不了《新青年》咄咄逼人的攻击，开始集矢《新青年》，首当其冲的是主编陈独秀。

“真是无聊的举动。”看到《新申报》上的文章，李大钊第二天一早来到文科学长办公室。“新旧冲突只在迟早。”陈独秀说话时吐出一口浓烟。看上去他很平静，只是脸上有点苍白。是啊，他对这场冲突早有预感。新年伊始，陈独秀在自己编的《新青年》上发表《〈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宣称“若因为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但他没有想到林琴南这样没有品性。

林琴南在《新申报》化名林之，发表小说《荆生》、《妖梦》，攻击丑化陈独秀、胡适、钱玄同等人。李大钊是个性格温和的人，但最讲光明磊落，对林琴南这种鬼鬼祟祟的做法很反感：“你抱着腐败理论不放，可以堂堂正正出来辩驳呀，公众总可以判断谁

是谁非的。”

“这个伟丈夫荆生，大约是他的学生徐树铮吧。算什么本事，拿军阀吓人么？”比陈独秀小一岁的徐树铮也是皖人，做段祺瑞的军事参谋时，曾南下镇压辛亥革命，眼下正操纵安福国会。陈独秀说着起身将烟蒂丢到窗外。

楼前的小树吐出了鹅黄色的嫩芽，草坪上到处是新生嫩绿的小草，他禁不住多看了几眼。空气新鲜，景色宜人，可惜兴致被林琴南搅掉了，不然他又将萌发作诗的念头。新草总是间杂着枯草，绿叶旁边总有黄叶，新旧势力的交锋与自然界的新陈代谢一样，是避免不了的呀。

“抱陆军部次长的大腿，靠写胡编乱造的小说出气，不是正派人所为。”一向心平气和的李达也有些愤愤然了，这些人是不怕什么“伟丈夫”的。回到图书馆主任室，愤怒的李达从抽屉里拿出稿纸，放在红漆书桌上，飞快地写出“新旧思潮之激战”7个大字，反击林琴南的挑战。

李达不怕“伟丈夫”、不怕强暴势力，却担心《新青年》同人内部的不团结，尤其担心适之。继林琴南发难之后，北大学生兼《神州日报》记者张厚载又在报上造谣，讲陈独秀等人受到政府干涉，已被驱逐出校；为避逮捕逃至天津云云。这个消息立即引起了保守势力的欢呼，大大小小的报纸纷纷转载，一时舆论沸沸扬扬。

事情出在正月里，当时钱玄同就对胡适很有意见，话说得很绝，说胡适若再要袒护张厚载，他便退出《新青年》。胡适也不希望《新青年》内部有意见，更不愿意为了一个学生而得罪古文音韵大师钱玄同，解释说请张厚载作文章，不过是叫他替我找作文的材料。说到后来，胡适又转攻为守讲他的道理，你钱玄同、

刘半农演什么双簧戏？化名演双簧戏就正派了么？此外，宋春舫是不错的，你钱玄同什么人不能骂，为什么要诋毁他呢？

胡适与《新青年》同人的矛盾，还在他对《每周评论》的态度上。陈独秀、李大钊找他要稿子，他总是不写。第一期选稿，为了淡化警察厅的注意，登了一些不痛不痒的文章，连高一涵看后都说，尽是一些迂腐的议论！胡适反而没有话说，在他看来，与其赤化，还不如迂腐。第二期正好是元旦，李大钊写了一篇《新纪元》社论，提出“打倒全世界资本的阶级”。胡适当然不愿意新纪元是这个样子，坚信自己没有错，不给《每周评论》写文章是对的，后来碍于面子，答应翻译点小说。《每周评论》是议论时事的，翻译什么小说呢？李大钊知道胡适的苦心，他是不想介入进来，但又不愿意与朋友闹僵，便想了这个办法。

李大钊知道，根子是胡适对自己宣传苏俄十月革命有意见。从私人感情上讲，他们之间并无什么。胡适对自己态度上的变化始于1918年底自己发表《庶民的胜利》演讲，胡适当时就听不下去。今年初自己发表了《Bolshevism的胜利》，使一向崇拜美国的胡适更不以为然了。

李大钊在《Bolshevism的胜利》一文中说：“人道的警钟响了！自由的曙光现了！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胡适写信给在美国读书的朋友张奚若叫苦。张奚若和胡适一样，不满李大钊的苏俄倾向，他在3月中旬给胡适写信说：“李大钊好像是个新上台的，所作《Bolshevism的胜利》……并未言及Bolsheviki的实在政策……”张奚若贬低李大钊，胡适感到了不小的快意，但这封信是拿不出手的，仲甫知道了似不太好。看了几遍，胡适就夹到日记本里了。

1919年4月上旬，陈独秀因谣传有逛窑子事，在旧势力围

攻下,被免去了文科学长职务。一时陈独秀情绪不好,成天闷在家里写文章。主编受挫,《新青年》内部的团结面临着严重的挑战。李大钊忧心忡忡,别的人都好办,他最担心的是胡适。他知道胡适的一些做法不利于《新青年》的团结,考虑再三,他给胡适写了一封信,专谈团结事:“我觉得外面人讲什么,尚可不管,《新青年》的团结,千万不可不顾。”外人讲什么,就是讲陈独秀逛窑子的事。

◎站在时代的风口浪尖

李大钊的信,胡适并没有当一回事,团结,团结,又不是我搞不团结。使他感到窝囊的是,一向对社会主义无所谓的陈独秀在免去文科学长以后一下子左倾了。李大钊的左倾并不可怕,仲甫的左倾就不同了,这意味着同人内部自由力的减弱。

1919年4月上旬,陈独秀、李大钊办的《每周评论》火药味越来越浓,已经公开点巴黎和会代表的名,亲日派四大金刚章宗祥、曹汝霖、江庸、陆宗輿已成众矢之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对此胡适都没有什么,只是见到陈独秀居然写出《贫民的哭声》这样纯苏俄式的文章,心里咯噔了一下。

过了几天,约在4月20日,《每周评论》刊出陈独秀写的《二十世纪俄罗斯的革命》,寥寥数字,使胡适惊讶不已。在短短数月里,仲甫变了,变得让他产生了一种隐痛和怨恨。除了汤尔和、沈尹默、马叙伦唆使蔡元培免去陈独秀的职务原因外,就是李大钊《Bolshevism的胜利》发生的直接影响了。单纯为免去职务,仲甫会有怨恨,但不会这样快的左倾。倘若不免去其职务

呢？胡适叹了一口气。章士钊说仲甫是不羁之马，这位老兄由着性子惯了，不免去其职务会不会左倾实在是个问号。陈、李已实实在在走到一起去了，自己和仲甫之间的距离也实实在在拉大了。

朋友间这种裂隙的形成，使他感到心情特别压抑，此时他情愿离开北京到外面散散心。这时陶行知来信，说杜威夫妇要来华讲学，胡适二话没说，于4月底去了上海。

5月4日是个星期日，李大钊、高君宇、邓中夏、张国焘、赵尔康等3000多人上街游行，火烧曹汝霖住宅，痛打章宗祥，当天军警逮捕了30多人。

“听一涵说，你这次很危险的。”第二天，陈独秀在图书馆主任室见到李大钊说。昨天陈独秀在家中写文章，没有上街游行。

李大钊憨厚地笑了笑，说：“我想他们还不至于敢开枪。”游行队伍走到国务院门前时，紧闭的铁门内架有机枪，虎视眈眈地对着游行队伍，走在前面的李大钊突然跑出队伍冲了上去，赵尔康等人一看不妙，跑上去紧紧地把他拖住。

“实在看不出来，你平时话不多，关键时刻可真勇敢。”陈独秀钦佩地说。

“你不是说要‘直接解决’么？”

在昨天出版的《每周评论》第二十号上，陈独秀写道：“我看这两个分赃会议，与世界永久和平人类真正幸福，隔得不止十万八千里，非全世界的人民都站起来直接解决不可。”

“对！对！”陈独秀会意地笑了起来。

“这次事件闹得很大，北大已成了徐世昌政府的眼中钉。”

“听说章宗祥被打得不轻，现在在日华医院，生死不定？”陈独秀问。

“如不是日本人保护，章宗祥性命难保。”李大钊沉思了一会，说，“他们对付北大，一定要对付《每周评论》的。”

“不怕。下期《每周评论》要用特大字号出。官方用机枪，我们用舆论。”陈独秀狠狠地说。

“《新青年》五号已编好了，我把它编成了马克思主义专号，你不会反对吧？”说着，李大钊从柜子中拿出一叠稿件。

陈独秀接过来翻看，其中有一篇是李大钊写得很长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似系统地介绍马克思主义。近一个时期，守常在看日本人河上肇写的《马克思社会主义之理论体系》。“现在正缺像你这样观点鲜明的文章，”陈独秀边翻边说，“好像没有登完？”

“全文有三万字，留一半等下期尹默编。”

提到尹默，陈独秀没有吭声。3月份蔡校长在汤尔和家商量解陈独秀的职，沈尹默在场。“怕尹默不编了。”陈独秀有某种预感。

“不要紧，半农还想编呢。”李大钊宽慰地说。见陈独秀半天没有抬头，李大钊起身过来看，陈独秀指着鲁迅的小说《药》说：“豫才的政论我不恭维，他的小说我是真的佩服。”见李大钊笑而不语，陈独秀问：“我找他要稿，是催一回一篇，你呢？”

“也催了几次，豫才还是好讲话的。他来信一口答应了。”李大钊给鲁迅的信是请钱玄同转去的。

五四后不久，蔡元培被迫辞职离京。李大钊也劝陈独秀到南方去：“仲甫，你还是避一避的好。”别的人都好办，陈独秀宣传新思潮得罪了許多人，特别是当权的皖人，旧势力是不会放过他的。再说，学潮闹到这个地步，北洋政府找不到蔡元培，有可能找陈独秀做替罪羊的。

“不走！怕什么？我的脑筋惨痛已极，极盼政府早日捉我下狱处死，不欲生存此恶浊之社会也。”陈独秀用手按着太阳穴，眼里闪着愤怒的光，一副万难不屈的样子。

李大钊见陈独秀倔脾气上来了，点点头说：“也好，现在《每周评论》发行量猛增，说明运动需要我们的指导。只是你要留神些，以防不测。”李大钊虽不知道京师警察厅已盯上了大沟头18号印刷所，但他明白陈独秀和自己已在警察的秘密监视之下，凭种种迹象，估计北洋政府不会善罢甘休。

“我是不怕的。我主张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监狱也是文明的发源地。”陈独秀按捺不住亢奋的心情，在房间里走来走去。

相比之下，李大钊要平静得多，“话虽这么说，我们还是要避免作无谓的牺牲。《每周评论》不能刊出的东西，可以另印传单散发。”

“这是个好主意。”陈独秀表示赞成。

分手时，两人用力握了握手。几天里，严峻的斗争形势和群众运动的高涨，使他们都有了危机感，时代的责任和共同的命运使他们之间的感情一下子升华了，他们已站到了新旧时代更替的风口浪尖。

◎小监狱与大监狱

1919年6月9日是星期一，这天陈独秀和李大钊一上班就商量，群众运动正澎湃向前发展，被捕的学生已陆续放出，陆、章、曹免职已不成问题，大家日益感受到了胜利的喜悦。现在要

趁热打铁,再烧一把火,把斗争引向深入。

讨论了半天,他们决定起草《北京市民宣言》,向政府提出最后最低的五点要求,倘若政府不接受,“我等学生、商人、劳工、军人等,惟直接行动,以图根本之改造。”陈独秀对直接行动感兴趣,说要给点颜色给他们看看。

为了避开军警监督,李大钊提出不要把《宣言》拿到《晨报》所在地印刷,最好在北大平时印讲义的小印刷所印刷,那里安全些。陈独秀说你们快印,印好了,我明天就拿到中央公园去散发。

6月11日是星期三,这天和以往没有什么不同。下午出门时,陈独秀匆匆忙忙穿了一套白色西装,怀揣一卷传单直奔新世界游艺场而去。他没有想到会有什么危险,所以口袋里北大教授、《国民公报》编辑蓝公武给他的信也没有留下。

几个小时后,陈独秀在新世界五楼散传单时被逮捕。

陈独秀被捕那天下午,李大钊去城南游艺园散发传单。现在,如何将陈独秀从狱中救出,成了他心头的第一件大事。

陈独秀被捕后,北京《晨报》、《北京日报》、上海《民国日报》都作了报道。李大钊发现,北方的报纸还遮遮掩掩,但南方的报纸却摆出替天行道的架式,趁机给北方政府施加压力。他对高一涵说:“南北分寸迥然有异。要造成南北呼应形势营救仲甫。罗家伦、黄昆仑已经写信给上海安徽协会及全国学联,请他们声援,这个办法好。大家各显神通,先把舆论造出来。”

“行严与龚代总理关系不错,给他拍个电报如何?”陈独秀被捕时,高一涵和邓初也在场,陈独秀性急胆大,一个人登上了新世界五楼。高、邓见陈独秀出事了,只好跑回来向李大钊告急。

“我来拍个电报吧。”看高一涵焦急的样子,李大钊显得平静

些，“你也拍个电报，行严散漫惯了，什么事也不着急。”几年前，他和高一涵帮章士钊办《甲寅》，所以彼此性格都很了解。

高一涵点头答应了一声说：“《神州日报》说，‘营救能否有效，殊难预卜也’，阴阳怪气。”几个月前被北大开除的张耀子曾是《神州日报》的记者，高一涵想到此事有些担心。

“仲甫宣传新思潮得罪了旧势力，这些人是乘机落井下石。”李大钊捏紧拳头说。以前这些人在陈独秀面前纷纷落马，现在借刀杀人的机会来了，他们当然也不会错过的。李大钊认为，只要密切注意动态，随时揭露旧势力的阴谋，仲甫尚无杀身之虞。

一个星期后，上海《民国日报》刊出“陈独秀案之大疑团”，披露陈独秀已释放的谣传，同时揭露了邮局克扣李大钊致章士钊电文事。

“报上说北大新潮社傅斯年、罗家伦被安福会收买。”高一涵说。为这事，胡适准备给上海《时事新报》主编张东荪写信辟谣。

“守常，你也躲一躲吧。”种种迹象表明，李大钊已上了警察厅的黑名单，高一涵劝李大钊走为上策。

“仲甫家眷怎么样？”上次给章士钊发电报后，李大钊不放心，又叫高君曼给章士钊写了信。

“还是不让见仲甫。”

“估计仲甫没有生命危险。我走后，《每周评论》交适之负责，你和《新潮》的同学多关心一下陈太太。”李大钊留在北京凶多吉少。

李大钊提出将《每周评论》交适之负责，是根据几天前的一次同人会议确定的。那天，胡适、李大钊在六味斋招待同人，周作人、高一涵、张申府等12人到场，讨论陈独秀被捕后《每周评论》善后事，讨论到10点，最后决定维持现状，由李大钊、胡适负

责。

“适之从外地回来，便反对学生罢课，近来和罗家伦天天陪杜威到处讲课，你看……”听得出，高一涵对把《每周评论》交给胡适编，有些担心。

李大钊对胡适一人编《每周评论》也有顾虑。6月15日，胡适把《每周评论》第二十六号编成《杜威讲演录》专号，大家都不满。张申府直接给胡适写信，特别对胡适一心扑在杜威讲学上不满，怪他对政局消极。也有人甚至怀疑胡适在觊觎蔡元培出走后的校长职务。蒋梦麟给胡适来信，力劝学生闭门读书，李大钊也听说了，六味斋会议定下来自己和胡适两人负责编《每周评论》，自己走了，不叫胡适负责也不好呀。

陈独秀入狱后，李大钊一刻未忘狱中的战友，全国援陈运动起来后，他放心了。一天，邓仲夏见到《每周评论》第二十八号上李大钊《牢狱的生活》，说：“先生说得对，现代的生活，还都是牢狱的生活，仲甫是小监狱，我们是大监狱。”

“我说仲甫比我们自由，没有错吧？”李大钊在文中说：“倒是为运动解放入了牢狱的人，还算得了一块自由的小天地。”

“最不安全的地方也是最安全的地方，陈先生现在不用东躲西藏了。”邓中夏接着说。

“讲是这样讲，还是大监狱更安全一点。”

“适之叫陈先生忍得住痛苦呢。”邓中夏扫了一眼胡适的短文《爱情与痛苦》。上面说“爱国爱公理的报酬是痛苦，爱国爱公理的条件是要忍得住痛苦”。

李大钊点点头，说：“适之忙于陪杜威讲演，能抽空写几句已不易了。”

1919年7月中旬，骄阳似火。店铺前的柏油路已经蒸了半

天,车轮压上去,留下了深深的轱辘印。

“辛白,你的诗和适之的《爱情与痛苦》成了姊妹篇了。”在北大红楼图书馆主任室,脱光上衣的李大钊挥着芭蕉扇,和李辛白交谈。暑假期间,教室空荡荡的,窗外高高的白桦树上的知了的叫声此起彼伏,衬托出校园的宁静。

庶务主任李辛白是安徽无为,比陈独秀长4岁,是老同盟会会员。以前办过《白话日报》和《共和日报》,1905年陈独秀在芜湖成立岳王会,李辛白也参加了。傅斯年、罗家伦办《新潮》,请李大钊作顾问管帐,请了李辛白管发行。陈独秀、李大钊办《每周评论》,也请李辛白管发行。所以暑假别人能脱身,李辛白却走不开。李大钊很喜欢李辛白写的小诗《怀陈独秀》,将它刊在第三十号《每周评论》上:

依他们的主张,我们小百姓痛苦。

依你的主张,他们痛苦。

他们不愿意痛苦,所以你痛苦。

你痛苦,是替我们痛苦。

见李大钊夸他的小诗,李辛白笑了笑,便转了话题。“《是谁夺了我们的光明》怕是你自己的来信吧?”李辛白看着李大钊,眼里闪着狡黠的目光。

和李辛白诗同期刊出的这篇杂感,引起不少人怀疑,认为来信人子虚乌有。李大钊写道:“有一位爱读本报的人来信说:我们对于世界的新生活,都是瞎子。亏了贵报的‘只眼’,常常给我们点光明。我们实在感谢。现在好久不见‘只眼’,是谁夺了我们的光明?”

“所谓你说有时便是有，你说无时便是无。”李大钊笑着说。

“你的《新生活》什么时候创刊？”讲到“新生活”，李大钊想起李辛白在创办《新生活杂志》

“争取暑期出一期。”李辛白说。

临别时，李辛白问李大钊何时回老家，李大钊说：“等编出下期《每周评论》吧。”

新一期的《每周评论》刊出了胡适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李大钊看后不是滋味。

不久，李大钊即回老家。夫人赵纫兰发现，守常这次回家和往常不同，心事沉沉地带了许多书。他说：“这次回去，要做几篇长文章。”

◎对社会的告白

回老家乐亭县大黑坨村，要乘京丰线的火车，清晨到滦州站下，再雇小船穿越平原向南而行。李大钊带着长女星华回到乡村才发现，村子里正在闹土匪“绑票”，李大钊不敢久留，便带着孩子来到昌黎五峰山的韩昌黎祠。

五峰山风景秀丽，李大钊清晨呼吸烟霞，白天攀松披榛。山中梨树正果压枝头，主人刘克顺常请李大钊品尝。坐在山石上啃梨，看着山泉汨汨流下，听着山中樵夫的歌声，李大钊如入仙境，一时忘了京城的忙碌和紧张。

一日，山中突然刮来一阵烟雨，将山峰四周团团围住，站在韩昌黎祠前的李大钊只听得见风声雨声，却看不见眼前屹立的崇山峻岭。这使他想到了狱中的陈独秀，想起了胡适那篇黑云

压城式的文章。山中的闲情逸致一扫而净，他决定立即着手写出深思已久的文章，一篇反驳《新青年》同人的文章。

胡适写《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没有点李大钊的名，但针对性明显，所以李大钊干脆以给适之先生书信的形式写出。为了防止胡适扣住不发表，李大钊有意写上“对社会的告白”几个字。

胡适说：“偏向纸上的‘主义’，是很危险的。这种口头禅很容易被无耻政客利用来做种种害人的事。”适之是什么意思呢？难道“问题”和“主义”是绝对的两回事吗？不错，纸上空谈的“主义”是危险的，但主义本身并不带来危险呀！

至于安福会也讲社会主义，那就更不通了。胡适说：“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是阿猫阿狗都能做的事。”这话说指安福会也行，说是骂李大钊也行，但李大钊不和他计较，毕竟现在还没有到撕破脸面的地步，只当他是讲安福派吧。想到这里，李大钊写到：“本着主义作实际的运动。免得阿猫、阿狗、鸚鵡、留声机，来混我们骗大家。”

仲甫、适之和自己有共同的一面，如与旧式顽逆思想作战，也有不同的一面，他们是防遏俄国布尔什维主义的潮流的。自己写《Bolshevism 的胜利》，胡适不以为然，刚回国的陶孟和也反对。说不定他们还认为，仲甫下狱，适之披上“过激党”罪名，都是自己写《Bolshevism 的胜利》的罪过呢。尽管如此，李大钊还是直截了当地写道：“我可以自白，我是喜欢谈谈布尔扎维主义的。”值得高兴的是，同人中也有站在自己一边的，慰慈近日在《每周评论》上就发表了俄事研究的文章。

李大钊一口气写了三五千字，自觉口气还是心平气和的。反复看了几遍后，8月初寄给了胡适。

见到李大钊寄来的文章，胡适没法不登，但心中又不服，便在刊出后的一期上，发表了《三论问题与主义》，刊在8月24日《每周评论》第三十六号上。

这时李大钊已从五峰山回到北京。对于胡适的反驳，他是有心理准备的：适之是一个要面子的人，不会偃旗息鼓。但胡适反驳却不太有力，胡适说：“一切主义……只可认作参考印证的材料，不可奉为金科玉律的宗教。”这样的话，胡适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中已讲过了，李大钊觉得不必再反驳。倒是胡适见李大钊不反驳，心中的话又似乎还没有说尽，便又写了《四论问题与主义》，专谈输入学理的方法。这篇文章胡适拟刊在《每周评论》第三十七号上，就在这时，警察厅查封了《每周评论》。李、胡之争遂告一段落。

◎中国没有主义不行

1919年9月16日，星期二，在全国舆论压力下，北洋政府被迫同意陈独秀保释出狱。李大钊按捺不住心头的喜悦，挥毫写下了《欢迎仲甫出狱》。诗云：

你今天出狱了，
我们很欢喜！
它们的强权和威力，
终究战不胜真理。
什么监狱什么死，
都不能屈服了你；

因为你拥护真理，
所以真理拥护你。

在北池子箭杆胡同9号陈独秀卧室里，李大钊正坐着藤椅上，和躺在床上的陈独秀闲谈，年轻一点的刘半农坐在桌前的木凳上。

“我们的D回来了，《每周评论》却被他们查封了。”李大钊说着替陈独秀掖了掖薄薄的被子。

刘半农笑了一下，他写了欢迎陈独秀出狱诗《D——！》。诗的题目土不土洋不洋，像是火车出站时拉汽笛。

“你写的几首诗和《五峰游记》我看到了，不错的。”陈独秀说着从床里边一堆书中抽出第三期《新生活》。

“到底是大监狱比小监狱好呀。”刘半农记起了李大钊的《牢狱的生活》。

“我是度日如年，你是‘山中无历日，寒尽不知年。’”陈独秀苦笑了一下说。“但看得出，山中虽夜不闭户，山下却不太平。”

李大钊忧郁地点点头，说：“今年久旱，乡间赌风很盛。下山时，瘟疫猖獗，走四五十里地，到处是新坟，哭声不断。”

见李大钊说到乡间的事，脸色苍白、眼光迟钝的陈独秀长长叹了一口气。狱中关了几个月，使他对贫民的哭声又多了一分同情。

刘半农起身帮陈独秀点着了烟，陈独秀连声说谢谢：“这次入狱让你们受累了。”这时高君曼进来为李大钊、刘半农加水，也说：“亏得有你们大伙。”

“适之很不像话，用对付林琴南那一套对付守常，说守常宣传主义是阿狗阿猫。”刘半农换了一个话题。

陈独秀缓缓地说：“我以前主张从研究室到监狱，从监狱到研究室，这次真进了监狱，才感到守常是对的，中国没有主义是不行的。”除了增加对黑暗势力的仇视，三个月的牢狱生活，没有给陈独秀留下别的印象。

李大钊脸上露出了笑容：“都说监狱是革心洗面的地方，想不到把我们的D革成主义派了。”

在家休息了20来天，李大钊邀陈独秀出门走走。陈独秀被免去文科学长以后，蔡元培邀他任历史系教授教宋史，给假一年。

10月12日，星期天，欧美同学会在南湾子开成立周年纪念大会，李大钊、陈独秀、蓝公武、徐宝璜等人都来了。

“志先，这次逮捕，你的信帮了警察的忙呢。”陈独秀和蓝公武开玩笑说。蓝公武是江苏吴江人，比李大钊长两岁。6月11日，陈独秀刚收到他的来信，揣在西服口袋里去了新世界，所以警察一下就知道抓住了陈独秀。当时就引起步兵统领军与警察争功，一个要往王怀庆步兵统领处带，一个要往吴炳湘的警察厅带，最后警察占着人多，把陈独秀带到了警察厅。

蓝公武笑着说：“我哪知道你要逮捕，否则，打死我也不给你写信，或者写‘只眼’收就是。”蓝公武此言一出，几个人都笑了起来。

李大钊看着陈独秀说：“志先不怪你，你反怪起他来了。这封信弄得不好，是要诛连志先九族的。”蓝公武连声说对对对，几个人又笑了。

“看来，你们是有攻守同盟的，志先帮你，你帮他。”陈独秀余兴未了。

“非也！非也！”蓝公武摇着头笑着说。胡适写《多研究些问

题,少谈些主义》后,蓝公武以“知非”为笔名在《每周评论》第三十三号上发表《问题与主义》,反驳胡适。陈独秀提的就是这件事。

1919年12月17日晚,傅斯年、罗家伦、李小峰等《新潮》社的人在香丁浣花春聚会,招待老大哥《新青年》同人。陈独秀、李大钊、钱玄同、周作人都来了。刘半农出国了,鲁迅回老家搬家,胡适忙着给杜威当翻译,他们没有来。

“陈先生看起来完全康复了。”罗家伦和李大钊闲谈。他们对面是满面春风的陈独秀正在和周作人高谈阔论。“他是个闲不住的人。”李大钊说。上月,蔡元培、李大钊、胡适等人发起组织李超女士追悼大会,陈独秀到会讲了话。

陈独秀和周作人寒暄后,谈了几句鲁迅兄弟给《新青年》写稿事,便走到李大钊这边来了。“讲什么呀?”陈独秀见李大钊讲话时看着他笑。

“没讲什么,只是讲先生精力旺盛,恢复很快。”罗家伦见陈独秀过来,忙起身让坐。罗家伦和鲁迅同乡,绍兴人,二十三岁。

陈独秀手上夹着一支烟,美滋滋地吸了一口,说:“适之说把章程寄到上海,寄出了吧?”几天前,蔡元培等人发起成立工读互助团,陈独秀、李大钊、王星拱、高一涵、胡适、张申府、周作人、李辛白、罗家伦、王光祈、程演生都参加了。程演生是皖人。王光祈二十七岁,四川人,在北京中国大学毕业后,作为《川报》驻京记者,夏天和李大钊成立少年中国学会,任执行部主任。

“差不多寄出了,适之说寄给《星期评论》的沈定一、戴传贤。”罗家伦说。

提到上海,陈独秀想起一件事,他偏过头对李大钊轻声说:

“行严希望我去办西南大学,你怎么看?”

李大钊沉思了一下,说:“南方空气比北方好,这次你出狱,孙先生也讲了话。只是你还在保释之中,出京是否麻烦?”

“不要紧。我去去就回,八字未见一撇,我不会在上海多呆,等警察厅知道时,我已回来了。再说,我真的到了南方,他们奈我何?”陈独秀也知道,办个大学,也决非陈炯明一个人支持就能办到。

“速去速回,先摸摸情况也好。”李大钊问何时动身。他知道陈独秀的脾气,定了的事情,他是一定要办的。

“春节前后吧。也许,在上海过春节了。”说着陈独秀将烟蒂丢到冰天雪地的窗外。想到要回南方,陈独秀心中有一种说不出的轻松愉快。

◎北京脱险,相约建党

陈独秀原打算神不知鬼不觉离京,不料中途去汉口讲演,华中报纸将他到武汉的活动公之于世,惊动了北京警察厅,决定在陈独秀回京时将他逮捕,罪名是违反保释戒约。

1920年2月7日,陈独秀在武汉大智门登车回北京,下车时径直回到家,结果遇上了一名警察。警察盘查了几句后出去叫人。陈独秀发现警察慌里慌张,越想越不对劲,赶紧离开了家。

高一涵和李大钊等人听到风声不妙,派人到西车站等候陈独秀。车站人多,没有碰上陈独秀,正在着急,陈独秀到李大钊家来了。

“啊呀，你可回来了。”李大钊上前接过陈独秀手上的小皮箱，转身将门关上。“你从哪里来？没有回家吗？”

“回去了。差一点又被他们抓去了。”陈独秀将他回家遇险的事说了一遍。“我发现不妙，赶紧到了适之家，他家人杂，我就想到你这儿。”

“仲甫，北京呆不下去了，想法子回南方吧。”李大钊对陈独秀的处境十分担心。陈炯明支持办西南大学，陈独秀回南方是个机会。

“我也这样想。”陈独秀现在已被北洋政府盯上了，不走也得走。“只是乘火车和小汽车是万万不行了。”陈独秀想起家中遇到的那个贼眉鼠眼的警察，心有余悸地说。

李大钊想了一会说：“我送你到天津，你从天津乘船去上海。”

连夜，李大钊雇了一辆骡车，从朝阳门出京。陈独秀上车前，在北大化学教授、怀宁老乡王星拱家中精心化妆过。戴了一顶毡帽，穿着王家厨师的一件油迹斑斑的背心，装成病人，陈独秀坐了几个月牢，正闹胃病，加上去汉口讲演旅途疲劳及逃避被捕的惊吓，脸色泛白，胡髭拉碴，极像个病人。李大钊扮成年底收帐的生意人，带了店家的红纸片子，携带几个账本，两人一起上了骡车。

“你的那篇文章我仔细读过了，由经济上解释思想变动的原因，很有道理。”出城以后，陈独秀松了口气，因为兴奋，他点燃一支烟吸着。

1920年1月1日，李大钊在《新青年》七卷二号上发表了《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一文，陈独秀很用心地读了一遍。

“仲甫，这次回上海，《新青年》又可以发挥作用了。”李大钊发现，出狱后的陈独秀和自己的苏俄倾向越来越近了。在上一期《新青年》上，陈独秀为布尔什维克辩护说：“Bolsheviki 是不是扰乱世界和平，全靠事实证明，用不着我们辩护和攻击。”

“我也这样想。现在的官场资本家把无产阶级踏在朝靴底下，不当作人看待，当然是将来之隐患。”陈独秀的思想还在李大钊的那篇文章上。

“仲甫，你看我们中国是否也走苏俄的道路，成立 Bolshevism 式的政党？”李大钊知道陈独秀此去，不知何时再见面，上车时他就决定利用这次机会和他交流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的看法，这也是他亲自送陈独秀离京的一个原因。中国要成立苏俄式的政党，像陈独秀这样有影响的人物是非常需要的。现在见陈独秀兴致好，他便不失时机地提了出来。

“好啊。”陈独秀在光绪时就发起组织过爱国会等组织，说起来还是个老职业社会活动家，但他骨子里不愿攀附别人，包括孙中山的中华革命党，所以李大钊一提出建党，便不加思索地叫好。“我以前是反对成立为一个阶级服务的政党的。倘若那个时候你要我成立一个新党，我是不干的。”陈独秀欢快地说。上个月，陈独秀在《〈新青年〉宣言》中说，永远不加入“没有全社会幸福的政党”。

“哦，现在怎么变了呢？”李大钊想多听听陈独秀的意见。

“没有变。苏俄式政党是谋求全社会幸福的政党，再说……”陈独秀用力吸了一口烟，“我声明不加入这样的党，并没有声明不发起一个自己信仰的党啊！”

“好！”李大钊话音刚落，两人不约而同地大笑起来。赶车人受到情绪感染，随着轻轻的一声吆喝，“叭”的甩出了一个响鞭，

骡车欢快地奔跑起来。客人的笑声与有节奏的骡铃声、车轱辘声响成一片，在白雪映照的空旷原野上久久回荡……

这一夜，两人亲密地交谈分头在南北筹划建党事宜，直到拂晓。

到天津后，李大钊安排陈独秀住在租界一家客栈里，自己去码头为他买船票。当晚，李大钊住在河北马路日纬路附近的一位朋友家中。

分手时，李大钊握着换了新装的陈独秀的手说：“我马上给许德珩、张国焘他们拍电报，让他们给你联系房子。你只管放心地在船上睡觉。”

陈独秀紧紧地拉着李大钊的手，用力摇了摇：“你也要保重。”要说的话是太多了，话到嘴边，终于没有说出口，此时无声胜有声啊。他感到和李大钊的感情又近了许多。

“放心！”李大钊的目光温和、慈祥，虽然年少十岁，却透出一种兄长的关怀，使陈独秀难以忘怀，自长兄去世后，陈独秀多年没有体会到这种手足亲情了。

“你什么时候回去？”

“天津几个同志约我晚上去一个苏俄同志家谈谈，这对我们下一步工作有好处。”李大钊说话时看了看左右，放低了声音。天津几个同志指章志、胡维宪等人。

陈独秀到上海后，给李大钊写了一封报平安的信，李大钊悬着的心才放下来。准备赴日的高一涵到李大钊家中辞行时，李大钊告诉他这件事的经过。高一涵竖着大拇指对赵纫兰说：“守常真是见义勇为呢！”说得李大钊夫妇笑了起来。

守常收起笑容说，这次去天津，还真差一点闹出事来呢。说着从里屋拿出天津《益世报》递给高一涵，上面登载了“党人开

会，图谋不轨”的消息。高一涵不解地望了望李大钊，后者淡淡一笑，说：“消息很快呀。”

◎南陈北李遥相呼应

陈独秀回上海后，一直忙于和章士钊等人筹划办西南大学，但困难重重，正在一筹莫展时，法租界环龙路渔阳里2号的家里来了一位俄国客人。来人是伊尔库茨克第三国际远东局的维金斯基，同行的有翻译杨明斋。

“陈先生，这里有李大钊先生写的信。”见面时，带有山东口音的俄籍华人杨明斋递过一封信。看样子杨明斋比陈独秀小一点，约莫三十八九岁。

“哦！”听说是李大钊介绍来的俄国客人，陈独秀狐疑的脸上露出了笑容。他一边让坐，一边接过信急急看了一遍。

“是柏烈伟先生介绍我们认识李先生的。”杨明斋说。他估计陈独秀认识这位北大俄国籍教员。

“啊，欢迎，欢迎。”陈独秀读完信，满面笑容地说。李大钊在信中介绍了维金斯基也就是眼前的吴廷康一行的目的：要联络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人物。显然，这位老朋友把自己看成是领袖人物了，这使他感到了莫名的愉快。俄国客人到上海来先找自己而不是先找别人，这是相当意味深长的。

“你们一起来了几个人？”陈独秀说话时，礼貌地对维金斯基笑笑。后者忙咧了咧嘴，他一直挂着笑容注视着陈独秀。

杨明斋说：“吴先生的秘书马马耶夫及其夫人萨赫雅诺娃留在北京，协助李先生在北方从事建党工作。”

“看来你们对中国情况知道不少。”

“不,我们知道得很少。我们是从少数俄侨口中听说《新青年》和陈先生大名的。李先生也称您是上海社会主义运动的中心人物。”说话时杨明斋欠了欠身,看得出他对眼前这位中国新文化运动的领袖很尊重。

“差得远,差得远。”陈独秀笑声朗朗地摇摇手。见杨明斋投来探寻的目光,陈独秀说:“我是说,李先生才是中国社会主义运动的中心人物。”几天前,陈独秀接到北京来的消息,李大钊和罗章龙等人在北大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

“陈先生、李先生都是中国社会主义运动的领袖人物。”吴廷康用生硬的中国话插了一句。“你们常有接触吧?”

陈独秀眨了眨眼,充满敬意地点点头,他没有想到这位俄国人还能讲华语。不错,他和李大钊联系密切,维金斯基到上海之前,李大钊还来信谈到北京工读互助团解散的原因。

“我和李先生讨论过在中国建立布尔什维克式的党,这次吴先生和杨先生来华,正是我们求之不得的。”陈独秀意识到自己思想打岔了,忙应了一句。

末了,陈独秀答应尽快安排他们和上海的中国先进分子见面。

1920年4月下旬,《新青年》“劳动节纪念号”编好送排,共400个页码,陈独秀这才松了一口气。5月1日正好是七卷六号出刊日期,陈独秀于3月初就开始约稿,准备出“劳动节纪念号”。李大钊是最积极的支持者,赶写了《五一运动史》,号召中国劳工同胞“认今年的五一节作一个觉醒的日期”。

编好七卷六号后,陈独秀突然想起一件事,八卷马上就要开始了,按在北京的惯例,此时是开编前会议定轮流编辑次序的时

候了。会是开不起来了,但尊重北京同人是不必要的。这样想着,陈独秀给李大钊、胡适等人写了封信。

接到陈独秀来信,正是李大钊忙于开展五一节纪念活动的时候。他主张五一运动是街市上的群众运动,不只是纸面上的笔墨运动。5月1日上午9时,校工和学生500多人在校内召开纪念大会,李大钊在会上讲了话。同一天,邓中夏专程到长辛店对铁路工人作了演讲。麻烦的是,北大何孟雄等8名同学乘车上街游行时被捕。

同一天,陈独秀与陈望道、施存统等人到上海澄衷中学参加了庆祝五一节大会。但和北京相比略显简单。看到天津《大公报》刊出的消息,陈独秀十分兴奋,对陈望道说:“守常真行。”

南陈北李遥相呼应,加快了建党的步伐。

1920年夏日的一天,李大钊和张申府在北大西斋学生宿舍“亢慕义斋”(德文共产主义直译音)讨论陈独秀的来信。陈独秀在考虑党章时,对叫“社会党”还是叫“共产党”拿不定主意。维金斯基的意思,各国共产党名称不一致,不必强求。于是陈独秀写信给李大钊,征求北方同志的意见。

李大钊在房间来回踱步说:“俄国以前叫社会民主工党,现在已改为共产党,其他各国也称共产党了。”

“仲甫担心戴季陶、张东荪不愿用共产党的名称。”张申府坐在椅子上,一边看陈独秀的信一边说。陈独秀的意思,如果争取戴季陶、张东荪等人在党内,能否不叫共产党。

“不要紧。他们真要是不满意共产党的名称,那是留不住的。共产主义运动是实际运动,并不停留在名称上。”李大钊注视着墙上的马克思像说。马克思画像两边是一副对联:“出实验室入监狱,南方兼有北方强”。

“好，我给仲甫写封信，就定下来叫共产党。”张申府也知道戴、张只是找借口罢了。

仲秋时节，天高气爽。9月中旬，张申府去沪接英国学者罗素，住到了陈独秀家中。

茶余饭后，两人常交流建党问题。继8月上海共产党小组建立后，北京共产党小组常在李大钊家中和北大图书馆主任室开会。李大钊利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已团结了一大批进步青年知识分子，如邓中夏、何孟雄、高君宇、罗章龙、张国焘、刘仁静及天津的张太雷、刘清扬等。

“既然组织起来了，就要发展。”陈独秀对北大的同学大都认识。

“你的意思是多吸收党员？”

“能入党的人最好都吸收到党内来。”陈独秀觉得当务之急是增加党员数量。不创党则已，既然创党，就轰轰烈烈地创，干出个眉目来。他已去函湖南、湖北、山东等地，希望各地加快建立共产党小组的步伐。编《新青年》和在北大的三年，使他认识了不少有作为的青年朋友。

回到北京，张申府和李大钊谈到陈独秀对张国焘的评价，“仲甫对张国焘印象不错，是不是先把 he 吸收进来？”张国焘是北大学生会主席，五四运动时曾被捕，在学生中算是活动能力较强的。“可以吸收张国焘入党。”李大钊表示同意。北京共产党小组开第一次会议时，有李大钊、张国焘、罗章龙、刘仁静、黄凌霜、陈德荣、张伯根等人。开会前，张国焘将从上海带来的《劳动者》创刊号拿出来，一个人发了一份。

谈到经费问题，大家想了许多办法。北京小组和上海小组相比，经费要困难得多。陈独秀编辑《新青年》，经济上比李大钊

稍宽裕。因为小组成员大都没有工作,最后李大钊说,每月从我个人薪俸中拿出80元作活动经费。

1920年初冬,张申府经上海赴法国讲学,到上海后又到了陈独秀家中。“《共产党》月刊收到了么?”陈独秀问。这个刊物是上海党小组刚创办的。

“收到了。黄凌霜等人见共产党讲纪律,中途退出了。”张申府说。

对陈独秀来说,这是意料中的事。“戴季陶、张东荪也退出了,不要紧的,就让他们退出好了。人各有志。”

两人谈了一会其他地方的组织发展情况,张申府越听越高兴,说:“守常向吴廷康推荐你发起党组织,看来是不错的。”

◎两种不同的主张

1920年12月16日晚,陈独秀乘船去粤。陈炯明在粤桂战争中取胜后,急欲干点事,来电请陈独秀去广州任教育委员长。这对陈独秀有很大吸引力,当初离京也是准备去广州办西南大学的。作为上海共产党小组的中心人物,和当初单纯去办西南大学有不同,必须写信征求李大钊的意见。

接到陈独秀来信,李大钊很快回信表示同意:广东是孙中山革命活动的中心,在广东发起组建共产主义小组,有特别的意义。

有了李大钊的支持,陈独秀最后下了去粤的决心。走前还有一件事要办,即《新青年》的事。12月初,陈独秀写信给李大钊、胡适等人,告诉他们《新青年》由上海的陈望道负责。陈独秀

编的最后一期是12月1日出版的八卷四号《新青年》，上面有李大钊写的《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陈独秀希望北京同人继续来稿，他万万没有想到这件事闹了很多不愉快。

最不满意的是胡适、陶孟和等人，他们对陈独秀将《新青年》交给素不相识的陈望道办很有意见。胡适骨子里不满意《新青年》宣传苏俄布尔什维主义的倾向，碍着李大钊、陈独秀的面子不好说什么，现在陈独秀走了，何不拿到北京来办？这是一个机会。所以陈独秀来信征求意见，胡适积极性很高。

李大钊不赞成停办，他的用意，是为上海共产党小组留下一个谈政治的阵地。从9月1日八卷一号开始，《新青年》已成为上海共产党小组机关刊物。1921年1月22日，他在给胡适的信上写道：“我还是主张从前的第一条办法。”这条办法指在北京另办一个刊物。

陈独秀不同意在北京出版《新青年》。1921年2月初，上海法租界巡捕局查封《新青年》八卷六号后，陈独秀便移到广东自己接办了。

夏日的一天，在广东的陈独秀和谭平山、陈公博等人在谭植棠家中商量去上海开一大的事，陈独秀说：“共产国际来人，希望我们加快建党速度，我恐怕不能脱身去上海了。”共产国际为促进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不久前派马林、李克诺斯基为代表到中国。在北京，李大钊和他们进行了交谈，然后由邓中夏陪他们到了上海。

“李先生不知有没有时间去上海？”谭平山问陈独秀。

陈独秀摇摇头，说：“守常来信说他去不了。”6月3日，李大钊等人率领“八校教职员索薪团”到新华门总统府请愿，遭到军警殴打，李大钊头部被刺刀戳伤。

“我正好有事去上海，只是李先生和上海的同志都希望你去。”陈公博说。

陈独秀也知道大家都希望他去，毕竟架子是他和守常搭起来的。“不要紧，我写封信解释一下。”回到看云楼寓所，陈独秀给李大钊写了一封信，谈到自己不能去上海开会的情况，顺便谈到与陈望道、沈雁冰、戴季陶等人共同发表《新时代丛书编辑缘起》一事。

一大开过不久，陈独秀作为总书记到上海主持中央局工作，此间李大钊仍在北京，两人信件往还不断。半年后，各地党的组织都有了起色。就在这时发生了一件事，差一点影响到陈、李的友谊。

事情起因是胡适。1922年5月12日，胡适一起床就给蔡元培打电话，说约了几个人11点到他家开会，讨论“好政府”主张。胡适正在办《努力周报》，想约北京大学朋友谈政治改革。应邀而来的有陶孟和、梁漱溟、汤尔和、顾孟余、朱经农，其中也有李大钊。胡适知道李大钊是主义派，又和仲甫组织了共产党，可能和自己意见不一致，但李大钊性格温和，又是《新青年》老同人，想想还是约了他。

开会时，正遇上徐伯轩找蔡校长，既然遇上了，就一起开吧。徐伯轩也不反对，这样开会的人就多了一个。讨论结果是提出建立好人政府的主张，发表《我们的政治主张》。丁文江、陶行知和胡适是好朋友，虽然没有到会，公开登报时也签名了。

李大钊觉得好人政府也未尝不可，好人政府总比坏人政府好，便同意了。他同意的另一个原因，是蔡元培也同意了。对于蔡校长，他向来是尊重的。但文章发表后，因事关今后活动，他觉得有必要告诉陈独秀，保持与上海的中央局一致。

陈独秀不久前去广州参加共青团一大。从广州回来，看到李大钊参加胡适搞的好人政府宣言，吃了一惊。“好人政府是改良幻想，会阻碍革命思潮发展。”陈独秀对张国焘嚷嚷说。

“李先生、蔡校长、胡先生都参加了呢。”张国焘提醒陈独秀。

“直奉战争刚结束，我们在发表对于时局的主张时，必须指出好人政府解决不了问题。”陈独秀说。

“我想，”张国焘迟疑了一下，见陈独秀望了他一眼，索性把话说了出来，“李先生和蔡先生还有不同。”

“嗯。”陈独秀思考了一下，说：“我起草一个宣言性的东西，你去一趟北京，和守常交换一下意见。”

“这样最好。”张国焘说。

6月中旬，张国焘带了一卷中央对时局的主张宣传品到了北京。李大钊见了中央对时局的主张，毫不犹豫地表示同意。张国焘高兴地笑着，他赴京的使命眨眼工夫就完成了。

“前些时候我曾认为好人政府是一个可行的办法，但现在时局的发展显得不可乐观。”李大钊一边读中央对时局主张的宣传品一边说：“上海中央局这种主张是正确而及时的。”

“蔡校长、胡先生处怎么办？”

李大钊决定与他们聚会，宣传一下中共对时局的主张，不管他们怎么看。

闲时，李大钊写了一篇《平民政治与工人政治》一文转给陈独秀。陈独秀立即看出了上面有与好人政府不同的东西。李大钊写道，列宁称议会制度“为中产阶级装璜门面，而特权政治，则在内幕中施行”。陈独秀立即将这篇文章刊在7月1日出版的九卷六号《新青年》上。

◎帮助孙中山

1922年8月中旬,李大钊冒酷热到上海。几天前,陈独秀在环龙路铭德里2号的家中被法租界逮捕。李大钊到沪,一则参与营救陈独秀,另一件事是讨论中共与国民党联合的事。在上个月召开的中共二大上,李大钊当选为中央委员。这次会议北京小组的代表是张国焘、高君宇。

8月19日,陈独秀出狱回到家中,李大钊已在他家等候。两人见面分外高兴。李大钊笑着说:“你是真的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了。”

陈独秀脸色苍白,精神疲乏,见到李大钊又来了兴致。自1920年初陈独秀逃离北京,两人有三年没有见面了。他点了一支香烟,深深地吸了一口,说:“看来入研究室是不够的。你来得正好,我们尽快与孙中山的国民党联合起来。”

提到国共合作事,李大钊担心地问:“听说你和马林闹得有些不愉快?”

“他总是以共产国际的大帽子压人。”

“马林从苏联回来了,他建议召开中央执委会议,传达共产国际指示。”李大钊口气婉转地说。

陈独秀皱了一下眉头,说:“趁你在这里,开个会也好。”他活动了一下酸胀的脖颈,笑着说:“你是第一次参加中央局会议呢。时间真快,那次分手,一晃快三年了。”

“是啊,形势发展真快,当时我们是纸上谈兵,现在是实际运动了。”李大钊欣喜地说。

陈独秀、李大钊征求蔡和森、张国焘的意见，考虑到陈独秀刚出狱，可能被暗中监视，加上马林出入不方便，张国焘建议去杭州西湖开会。陈独秀心情烦闷，极愿意外出散心，杭州又是他与高君曼十几年前度蜜月的地方，故地重游，也是一件乐事，即满口答应。李大钊是客随主便，只希望早点开，因为北京还有许多事等他回去办。

8月20日，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国焘、高君宇五位新中央执委及马林、翻译张太雷赶到杭州西湖。经过陈独秀和马林的一番争论，通过了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决议。但马林也采纳了陈独秀的意见，不采取国民党的加入方法，如打手膜、宣誓服从等。

8月23日，从杭州回沪的李大钊通过张继拜见了孙中山。刚被陈炯明赶出广州的孙中山脸色腊黄，情绪低落，听了李大钊关于“振兴国民党以振兴中国”的主张，孙中山十分兴奋。他对李大钊说：“你尽管一面做第三国际党员，一面加入本党帮助我。”

李大钊拜见了孙中山后，张继又安排了陈独秀、李大钊和孙中山见面。孙中山欢迎共产党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并接受共产党建议，用民主化原则改组国民党。李大钊由张继介绍加入了国民党，其后陈独秀、蔡和森、张国焘、张太雷等人也加入了国民党。

回北京前，李大钊和陈独秀在渔阳里2号陈独秀寓所话别。陈独秀挥着扇子说：“共产国际要我们将中央机关迁往广州，你认为合适吗？”

李大钊思考了一下，说：“共产国际不知道陈炯明叛乱的情况。暂时去广州不适宜，我们加入国民党，陈炯明会怎么对待我

们呢？”

共产国际作出中央机关迁往广州的指示，是根据马林考察孙中山在广州的情况作出的，现在孙中山被赶出广州，马林也看到了。陈独秀在房中踱步，说：“我再和马林谈谈，实在要迁，迁到北京去。”陈独秀感到守常在北京办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发表介绍马克思学说的文章，干得轰轰烈烈，北京的政治空气比上海也不差。

提到马林，李大钊语重心长地说：“中央工作主要靠你多做。和马林的关系不要弄僵，马林不是代表他个人。”

10月初，陈独秀经北京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四大。见到李大钊，陈独秀拉着他的手说：“我的事总给你们添麻烦。”

李大钊知道陈独秀是讲为他募集讼费事，说：“我们是想为你补偿一点钱，结果还不知道怎样。”陈独秀被捕后，讼费及销毁书籍版费损失2000元以上。

“国焘任代理书记，凡事还要你多照应。”陈独秀这次到北京，中央机关同时迁到北京。考虑到张国焘长期在中央局工作，熟悉全国各地情况，陈独秀决定自己在苏联期间由张国焘代理中央局书记。

“不要紧的。和森、尚德都在北京。”李大钊说。

◎白色恐怖下的南陈北李

1923年1月10日，陈独秀和瞿秋白一起从莫斯科回到北京。李大钊说不巧，马林回莫斯科汇报工作去了。陈独秀将带回来的共产国际《关于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关系问题的决议》抄

件给李大钊看。李大钊看后松了一口气,共产国际要求我们支持国民党,和西湖会议精神是一致的。

几天后,李大钊以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名义发起纪念李卜克内西、卢森堡殉难四周年大会,陈独秀没有出席。纪念会在高师大礼堂举行,瞿秋白在大会开始时还唱了国际歌,然后瞿秋白、李大钊、张国焘、蔡和森相继发表演说。

1月下旬,北大开始放寒假。李大钊对陈独秀说:“湖北教职员联合会邀请我去武汉讲学,你看我能去吗?”

“去。”陈独秀毫不犹豫地说,“那一年我被北京警察通缉,也是去湖北演讲。这次你去,正好可以会会武汉小组的同志。”几天前,李维汉来汇报过旅欧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情况,陈独秀也想了解一下各地情况。

“我也这样想,正好放寒假,工作请文虎负责。”

2月7日,吴佩孚血腥屠杀京汉铁路工人。正在武汉各大学作讲演的李大钊对李汉俊、朱务善说:“我们早就认定了吴佩孚和中国其他军阀一样,我们从前接受了白坚武的意见,派我们的同志到各铁路上参加工作,并不相信吴佩孚的什么保护劳工政策。”白坚武是李大钊的老同学、老朋友,当时任吴佩孚的政治顾问。吴佩孚屠杀京汉铁路工人,李大钊与白坚武断绝关系。陈独秀也认识白坚武。1922年3月,李大钊还拍电报给白坚武,请他和上海的陈仲甫接洽。

朱务善说:“武汉已很危险,先生还是赶快离开的好。”朱务善是北京学生代表,因京汉铁路工人罢工的事到武汉,通过陈潭秋、夏之栩的关系,找到了李大钊。在这之前,李大钊在武汉还见过陈潭秋、施洋。

李大钊决定经上海回京,临走时劝朱务善等人小心。在船

上,他又听说发生了许多流血事件。

1923年2月中旬,负责京汉铁路罢工的张国焘经南京赶到北京,向中共中央汇报二七惨案的情况。这时李大钊也赶回北京。这时,吴佩孚发出通缉令,通缉陈独秀、马林等人,中央机关在北京已不安全。张国焘、李大钊回京后,陈独秀召开了中央局会议,决定秘密迁回上海。分手时,陈独秀和李大钊说:“吴佩孚已拿起屠刀,北京已不安全,你先避一避。不行也到上海来。”

李大钊点头答应了。

夏天,已搬到广州的中央机关召开三大,离学校放假还有一个多月,李大钊便以孙中山邀请讨论外交为由,来到广州。

见到李大钊,陈独秀高兴地说:“来得正好,会议怎么开,还只是一个意见,趁开会前我们先开个预备会,把一些事情定下来。”

预备会在陈独秀寓所太平沙看云楼、马林寓所春园开了两天。谭平山、蔡和森、毛泽东、罗章龙等人参加了会议。

大会选举中央执行委员时,陈独秀得40票,李大钊和蔡和森都得37票。考虑到李大钊回北京,三大选李大钊为中央局驻京委员。

这次李大钊在广州呆了一个月,7月中旬赶回北大参加了评议会特别会议。

10月下旬,李大钊根据中央局安排请了两个星期假去上海参加三大一中会议,当时有课在身,只好说所授的课回来补。

到上海后,不料会议与劳动大会时间冲突,延长了20天,后来又等谭平山、毛泽东,但都没有等到。会议直到11月24日上午才开,第二天下午结束,只开了两天。

“听说包惠僧对回武汉工作有想法?”开会前,陈独秀和李大

钊闲谈道。

“二七惨案后，汉口工作难做，所以惠僧不想回去。”李大钊说。二大前，包惠僧在北方区工作，三大决定他回武汉，当时请李大钊转信给他。

“这怎么行呢？”陈独秀不高兴了。

“他担心太太分娩。后来还是同意回武汉了。”李大钊笑了笑说。

陈独秀绷紧的脸放松了些。“你对胡鄂公入党怎么看？”胡鄂公是曹锟政府众议员，提出加入共产党。陈独秀吃不准胡鄂公的意图。

“他要求入党是真的，反对贿选是假的。”

“噢！”陈独秀示意李大钊接着往下说。对一个不反对贿选的人要求入党，这样的事以前还没有遇到过。

李大钊说，1921年胡曾在北京联络湖北青年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但他现在是曹锟政府众议员，问题有些复杂。

“胡鄂公党籍要作为一个问题来单独研究。”陈独秀也觉得此人入党不是一句话两句话的事。

◎我又要回到战场上去了

正当李大钊埋头于党的工作之中的时候，张国焘于5月21日早上5时在地安门内蜡库寓所被捕了，同时被捕的有其妻杨子烈。

紧接着，有人给李大钊报信，警察总监要缉拿鼓动罢工、宣传赤化的共产党领袖。北京区委是三八妇女节那天改组的，新

的中共北京区委由李大钊任委员长，蔡和森任秘书，张昆弟管劳动运动，何孟雄任国民党运动委员会秘书，范鸿劼任会计。北京的风云突变使李大钊大吃一惊。他万万没有想到，张国焘被捕后即叛变，供出李大钊为共产党在北方之领袖，同时供出张昆弟、黄日葵、高君宇、范鸿劼、陈佩兰、缪伯英等人为共产党员。既然警方要缉拿共产党的领袖，不管张国焘被捕后态度如何，北京区委成员都必须离京避难，以防万一。

1924年5月下旬，李大钊带着儿子李葆华上昌黎五峰山避难。当时李大钊最心爱的女儿李钟华因肺炎刚刚去世，李大钊带着丧女的悲痛二上五峰山。警察在李大钊离开家的当天晚上，查抄了他在北京的住处铜幌子胡同16号。扑空后，又追到他的老家乐亭抓人。6月11日，北洋军阀密令各省长、都统、镇守使、护军使严速查拿，务缉归案。

夫人赵纫兰十分焦急，她既担心李大钊的安全，又要靠自己挣钱养家糊口。她想托人带信找白坚武说情，但守常同意吗？赵纫兰便请人捎信到五峰山。

李大钊接到夫人来信，颇有晋人陶渊明“上弦惊别鹤，下弦操孤鸾”的感慨，知道她牵肠挂肚，日子很不好过。但找白坚武说情是绝对不行的，二七惨案后两人即断绝了关系。他借着砚田余墨写信给夫人说：“那张不起任何作用的通缉令，没有什么可怕。现在我的工作很忙，今后再没有时间来照顾家庭了。你应当坚强起来，千万不要为我的生活颠沛流离焦急，而要振作起精神来抚养和教育子女。”在信的最后，李大钊相信眼前只是一时的恐怖，不出十年，红旗将会飘满北京。

在上海的陈独秀十分担心李大钊的处境，当时共产国际指示中国派代表参加共产国际五大，陈独秀和在沪的中央执委商

量,请李大钊作为中共首席代表,率代表团去苏联开会。

李大钊接到仲甫来信,非常高兴,第二天便化装成一个行庄生意人,冒着被缉拿的危险回到北京,和青年代表彭泽湘、卜士奇,妇女代表刘清扬等见面,最后分别乘火车到哈尔滨。在满洲里的一家小旅店,李大钊的哥哥李瑞景为他们雇了三辆马车,于拂晓出了国境线。

在共产国际五大上,李大钊作了书面讲话。陈独秀当选为共产国际在华干事。李大钊在苏联呆了四五个月,临回国前,他对袁玉冰说:“我又要回到战场上去了。”

冬天,戴着黑礼帽,穿着棉袍的李大钊回到北京。这时北京政局已发生了变化。9月爆发直奉战争,冯玉祥倒戈后,成立了段、张、冯三派联合政府,北京形势对革命有利多了,至少李大钊可以回北大教书,不用再避往五峰山了。

李大钊回京后,立刻在邱祖胡同自己的新寓所,召集赵世炎、彭桂生等人开会,讨论成立北方区委事。根据陈独秀及上海中央局的意见,李大钊负北方区委总责,区委成员有赵世炎、陈乔年、范鸿劼等。

1925年1月中旬,党中央在上海召开四大。李大钊因配合孙中山北上、召开国民会议,没有出席这次大会。

张申府参加了这次会议。1924年春节,张申府经莫斯科回国。本来打算回北大数学系继续任教,但胡适任代理校长,不同意他去。李大钊当时刚从广州开国民党一大回来,劝张申府去广东,说“现在国共合作,广东正需要人”。张申府到上海和陈独秀谈到此事,陈独秀也赞同李大钊的建议。张申府到广州后,任黄埔军校政治部副部长。

在上海参加中共四大后,张申府回到了北京。见到李大钊,

张申府气呼呼地说：“我不想在党内干了。”

李大钊吃了一惊，忙问：“为什么？”

张申府说：“会上我们为一份文件发生了争论，我认为那是绝对不妥的。”

陈独秀 1924 年春发表了《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一文，已经形成了自己的一整套想法，党内不少同志有不同看法，但李大钊想，问题可以慢慢统一认识啊。这会见张申府发脾气，便意识到什么，说：“你慢慢说。”

“他们说幼稚可笑。”

“是仲甫么？”李大钊担心陈独秀不是没有道理的。一大前他与李汉俊吵，一大后与马林吵。二大后又与李达发火，后来又与杨明斋发火。

“是一帮青年人。”张申府说。其实他自己年龄也不大。

“你是老同志，不该和青年计较呀。”李大钊见不是陈独秀，松了一口气。张申府是北京党小组发起人之一，入党资格老。四大选上的驻中央局的中央执委中，除了陈独秀，像彭述之、张国焘、蔡和森、瞿秋白，资历都比张申府浅，张国焘还是张申府的学生呢。

张申府解释说：“赞成我的是多数就干，赞成我的是少数就滚蛋。”见李大钊失望的样子，张申府宽慰李大钊说，“我可以在党外帮助干。”

一介书生张申府就这样脱党了。

李大钊没有出席四大，但仍被选为中央执委驻北京。张国焘是北京事变后出狱的，他庆幸自己变节的事没有暴露出来，留在北京协助李大钊推进国民运动工作。听说四大选举他进中央执委驻中央局，大喜过望，于 3 月中旬赶到上海报到。

◎树北进之声威

1926年春节前后,陈独秀因伤寒住进了医院。事起仓促,没有来得及和其他人打招呼,一时谣言四起。《晨报》在2月初报道广州国民党“二大”选举情况时也说,选出执委36人,“其中著名共产党之谭平山、李大钊等皆有名,惟无陈独秀。”他们不知道陈独秀即使没有住院,也不会进国民党中央执委会。

北京特别会议开后不久,即接到陈独秀来电,说已能扶病视事,大家才放心。会议提出将中央迁出上海,但往哪里迁,意见不一致,多数人主张迁往北京。考虑到陈独秀是中央总书记,此事议而未决,请陈独秀最后确定。

陈独秀不同意迁出上海。住院期间他和一位女医生施芝英有频繁来往,此外北京的空气又能比上海好多少呢?这次陈独秀并没有错,不到一个月,即3月18日,李大钊、赵世炎、陈乔年在北京领导群众游行示威,抗议段祺瑞政府媚日卖国罪行,遭到残酷镇压。惨案发生后第三天,上海中央局发表《为段祺瑞屠杀人民告全国民众》,提出民众团结起来,武装革命。

此后不久,张作霖、张宗昌的奉系与直系军阀联合占领了北京,到处搜捕革命党人。李大钊被迫迁往东交民巷苏联大使馆西院的兵营里继续领导北方区委工作。广州蒋介石自中山舰事变后,加快了清共步伐,陈独秀不得不花主要精力对付蒋介石的反共活动。南陈北李,一个在受到新军阀的步步进逼,一个被老军阀监督包围,两人分身南北,都陷入了最困难时期。

1926夏天,陈独秀考虑到李大钊在北京工作十分危险,想

叫他离开北京，写了一封亲笔信交中央秘书处同志专程由沪至京。李大钊对罗章龙说：“北伐军不久攻下武汉，中央决定迁到武汉去，仲甫要我们去武汉。”罗章龙接过陈独秀的信仔细阅读了一遍，高兴地说：“好啊。”

李大钊沉吟了一会，说：“我的意见，你先去，我暂留北京，至少要成立一个北方新区委。”罗章龙问要不要开一次北方区委会议，李大钊答应了。

后来北方区委开会，同意李大钊意见，派罗章龙去武汉。陈独秀担心李大钊的安全，又以中央名义来信催。罗章龙也劝李大钊说：“我是南方人，我们一起走方便些。”当时长江已被封锁了。

“现在走我不放心，北伐军很快要打到北京，北方区委人少，有许多事要做。”李大钊坚持不走。罗章龙又去做赵纫兰的工作，赵纫兰摇头说，守常定下的事，我劝不了。罗章龙只好离京南下。

9月8日，李大钊在苏联大使馆住室给陈独秀写信，谈国民政府迁都武汉事。当时陈独秀给粤特委写信主张政府仍留粤，李大钊主张武汉局面一旦稍固，就应该迁到武汉，可以进逼北京政府，树北进之声威。他在信中说：“此策所关甚巨，请钟兄详加讨论决定之。”为安全起见，李大钊在信中将“仲”写成“钟”。

陈独秀将李大钊信以《守常政治报告》为题，刊在当月《中央政治通讯》第三期上。但陈独秀当时仍不主张广州政府迁到武汉。中央在致广东区委信中说，李大钊同志决不能参加国民党中央组织的“特务委员会”。该会拟请李大钊参加，处理打下武汉以后的湖北事务。12月上旬，北伐军向上海方向推进，国民政府筹备迁都武汉。

◎南陈徒有虚名,北李确如北斗

1927年4月6日,星期三,正是春寒料峭的清明节。上午,北京东交民巷苏联大使馆及邻近中东铁路办公处、俄款委员会、远东银行一带刺耳的枪声和叫嚷声响成一片。在帝国主义公使团默许下,奉军、警察厅派出数百名宪兵、警察、特务,将这一带团团围住。

李大钊预感到情况有异,奉系军阀公然违背外交惯例和国际公法,使他十分愤怒。从抽屉里拿出小手枪,李大钊从容坐在一个僻静的房间。赵纫兰带小女儿去了儿童娱乐场,只有长女星华依偎着和他坐在一起。10点半左右,身穿灰制服、脚套长统皮靴的宪兵,身穿黑制服的警察及胸系红线为记号的特务冲了进来。

“你认识他吗?”凶恶的特务用枪指着不久前被捕的工友阎振三问。刚受酷刑的阎振三体无完肤,见到他一向尊敬的李大钊,艰难地摇摇头。

李大钊比以前消瘦了,但狡猾的敌人从李大钊四方脸堂、戴眼镜和明显的八字胡特征上认出这就是他们要抓的头号目标,立即将李大钊及其女儿李星华簇拥着押上警车。

4月28日下午2时,身着被捕时穿的灰布棉袍、青布马褂的李大钊在警察厅被绞杀,牺牲时年仅38岁。同时遇难的有路友于、范鸿劫等20人。

李大钊牺牲时,党中央正在汉口秘密举行五大,陈独秀因大革命的受挫、许多同志的牺牲,受到出席大会的同志的指责,心

情十分压抑。听到李大钊被害的消息,陈独秀悲怆万分,久久不语。守常是自己最亲密的同志和战友,情同手足,年轻的他竟在自己之先而死,陈独秀心里确实不是滋味。北李已去,南陈奈何。几天里,陈独秀感到自己一下衰老了……

1933年4月23日,北京举行李大钊葬礼,送葬群众从浙寺出发,将李大钊灵柩送到香山万安公墓,在西四遭到国民党军警开枪阻击。事后,宪兵在几个月内逮捕了上千名青年,仅在狱中杀死的送葬群众就有四五百人。

为李大钊送葬,很容易使人们联想起他的最亲密的战友、正在国民党狱中的陈独秀,当时群众就写了一副挽联:

南陈已囚,空教前贤笑后死
北李如在,那用我辈哭先生

这件事传到南京狱中,狱友濮德志问陈独秀:“人们说‘南陈北李’,你比他如何?”

陈独秀十分钦佩地说:“差之远矣,南陈徒有虚名,北李确如北斗。”

这次谈话再一次唤起了陈独秀对老朋友的回忆和思念,20多年里的如烟往事,历历在目,一齐涌上心头。

见陈独秀沉默,濮德志问:“在想什么?”

陈独秀说:“守常是一个难得的好人。他的生平言行,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光明磊落,肝胆照人。我哪能和他比呢?”

值得一提的是,1942年1月6日,即陈独秀去世前几个月,陈独秀在给郑学稼信中还提到李大钊。正在研究中共党史的郑学稼发现,邓中夏在《职工运务史》中说,中共中央似曾批准李大

钊的“利用”吴佩孚。陈独秀说“守常以与自白坚武同学之故和吴佩孚见过面，说不上合作。”

关于中国共产党的两位创始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最早的传播者——李大钊和陈独秀的个人友谊和历史作用，早已留芳于世，有诗赞曰：

北大红楼两巨人，
话说北李与南陈，
孤松独秀如椽笔，
日月双悬照古今。

第五章

“旗手”与“主将”

——陈独秀与鲁迅

◎寻找友军

1917年夏日的一天，北大文科学长陈独秀住宅箭杆胡同9号来了一位戴着黑边眼镜、理着平头的客人。不等主人动手，客人便动手为自己倒了杯凉茶，咕噜咕噜喝了几口，用力扇着扇子说好热好热。此人不是别人，正是浙江吴兴人、住师大宿舍的钱玄同。陈独秀与钱玄同两人说东谈西，扯南道北，因为是留学日本时认识的，两人很快谈到日本、谈到章太炎。这时钱玄同突然想到鲁迅，说：“周树人先生也是太炎的朋友。”

“知道。记得他在《民报》馆对你还有高评。”陈独秀打诨说。

1908年夏天,留一撮泥鳅须的章太炎光着膀子在《民报》馆讲《说文解字》,从星期天早上8点讲到正午,那时鲁迅、钱玄同都去听。尤其是钱玄同,特别爱听章太炎讲课,有时听入了迷,激动得两手挥动,坐席前移,鲁迅称为“爬来爬去”。

“记得。”钱玄同笑着说。

“周树人走路有点外八字,好像目不斜视。”在教育部任俭事的鲁迅是蔡校长在教育部时的老部下,所以陈独秀在北大偶尔能见到鲁迅。提到他,陈独秀眼前便浮现了个头不高,穿着黑色旧布长袍,前额方正,眉骨突出,上唇留着浓密短须的形象。

“周君文采不错,去日本原是学医的,以后从文了。他对《新青年》印象不坏。”钱玄同留日时与鲁迅是同窗好友,陈独秀也听说鲁迅在日本编了两册《域外小说集》。

“周先生平常在家做什么呢?”

“没做什么,偶尔我去,见他临摹碑帖。”钱玄同说。鲁迅在南京教育部时就喜欢以抄书打发时光,他的另一个爱好是搜集古碑拓片。

“能否请他写稿?”陈独秀并不知道鲁迅写得怎么样,但他正筹划将《新青年》办成同人刊物,既然周树人一个人能在日本出两本文学集子,想必是不差的。

“试试看吧。”钱玄同抓了抓头发,答应了。鲁迅个性很强,他能否写,钱也没有把握。

钱玄同是鲁迅家的坐上客,以前他常常午后5点去,谈谈话就留下吃饭了。这次不凑巧,午后没有时间,只好挨了两天。

几天后的一个晚上,穿着长衫的钱玄同咚咚咚地敲响了半截胡同绍兴会馆的大门。白底黑字的门匾悬在门庭的上方,门前的狗跟在后面盯着他狂吠,几乎要咬着他的长衫,使他的心狂

跳了几下。

看门人因吸鸦片，已很瘦弱，他慢慢吞吞地开了门，见是大先生的客人，一边喝退狂吠的犬，一边侧过身让钱玄同进屋。

穿过会馆南边的前院，绕过仰蕺堂的南墙，经过月亮形的门，便进了鲁迅住的补树书屋院内。补树书屋风门朝西，南偏室木窗前有一棵大槐树，以前有一棵楝树被风刮倒，补种了槐树，所以叫“补树书屋”。后来一位姨太太在树上吊死了，没有人敢住。鲁迅是不怕鬼的，见这里清静，蚊子又少，便于1916年夏天从“藤花馆”搬了进来。

月光下，在槐树下纳凉的鲁迅一眼就认出了钱玄同，“玄同，是你呀。”将他引入北偏室。

脱去长衫，放下手上的大皮包，钱玄同接鲁迅递过来的蒲扇，用力扇了几下：“豫才，老抄碑帖有什么用？”说话时钱玄同扫了一下房间，和上次来时一样，南墙壁下的书桌上，有几本金石拓本，堂间的书架和方桌上也堆满了这些东西。

“没有什么用。”坐在藤椅上的鲁迅点了一支烟，歪着头看钱玄同翻他的碑帖抄本，他不知道钱玄同是什么用意。

“那么，你抄它是什么意思？”钱玄同放下手中的抄本问。

“没有什么意思。”

“我看你可以作点文章。”钱玄同说。

鲁迅突然想到，钱玄同和陈独秀等人正在办《新青年》，正到处寻找友军，似乎这个刊物还无大的影响，没有赞同者，也没有反对者，大约寂寞了。想了一下，鲁迅说：“你们把要闷死的人从熟睡的铁罐子中喊醒来，使他们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吗？”

“或许，从梦中醒来，还不至于死呢？你不能说他们决没有

生的希望。”钱玄同劝说道。

鲁迅笑着点了点头。他知道希望是不能抹杀的。他答应钱玄同：“做篇小说如何？”钱玄同见鲁迅肯重新拿笔，高兴地说：“豫才肯动笔，也不枉我此行。”

鲁迅示意钱玄同喝茶。“下次来早些，我请你吃广和居的炸丸子怎么样？”广和居是半截胡同口外的一家饭馆。

“不错！不错！就这样定了。”尽管鲁迅家用度不丰，钱玄同有时坐久了，也在他家用饭，通常吃过晚饭，还要谈到十一二点钟。

1918年年初，陈独秀在北大召集李大钊、刘半农、钱玄同、沈尹默、周作人等同人开会。鲁迅是钱玄同头天晚上去打招呼的，说独秀先生邀你去商量怎样办《新青年》，并说还有其他人要来。鲁迅知道，所谓其他人大多是指包括二弟在内的“卯字号的名人”——住在预备室一排平房里的北大文科教员，便答应了。

陈独秀说：“去年《新青年》发行了一万多册，书社仍嫌其过少，将《新青年》改为同人刊物，《新青年》一定会有大的发展。”

周氏兄弟来后，钱玄同起身招呼鲁迅坐到自己身边。落坐时，沈尹默和鲁迅打了个招呼，他们是老熟人了。1909年秋，鲁迅在杭州的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教化学，沈尹默在杭州陆军小学任教，

刘半农忙招呼周作人坐到自己身边。周作人应了一声，一边脱下大绒帽，解开马夫式的大衣，一边坐了下来。在刘半农眼里，留着浓髯、性格温和的岂明，颇有点像俄国英雄。周作人也喜欢和性格活泼、好与人抬杠的刘半农交往。第一次见到刘半农，见他“头大，眼有芒角”，还以为遇到了奇才。

陈独秀递了几期头年的《新青年》给鲁迅。最后一期三卷六

号还是1917年8月1日印的。钱玄同告诉他,《新青年》将改横行印刷。鲁迅点点头,他知道这是钱的主张。

陈独秀见鲁迅低头看出版日期,解释说:“上海的群益书社嫌发行量少,耽误了。”

“新的一期何时出版?”鲁迅对陈独秀《三答钱玄同〈文字符号与小说〉》一文很感兴趣。

“本月15号。”陈独秀说。

“办同人刊物,宜实行轮流编辑,集体讨论制度。”这是北大图书馆主任李大钊的声音。鲁迅以前不认识李大钊,知道李大钊也在日本留过学。他对李的第一印象是:诚实、谦和,不多说话。

“我还是那个观点,文风用白话文体。”这是钱玄同的声音,他的桌前放着那只形影不离的大皮包,说话时气壮如牛、慷慨激昂。

“甭绝对。”陈独秀笑着说。说着递了一支烟给坐在钱玄同旁边的鲁迅。鲁迅手上的烟还未燃尽,正仰着头听大家发言。

讨论轮流编辑的顺序时,陈独秀侧身对坐在身边的沈尹默说:“沈二,你也讲讲。”“我的眼睛不好,排号把我排到最后吧。”沈尹默鼻隆脸阔,话音和钱玄同差不多,带吴兴口音,说话时下意识地扶了一下眼镜。

刘半农打断了沈尹默的话,说:“不要紧的,有困难,可以请别人帮忙。”鲁迅已记不清第一次在哪里见过他,但知道他是江阴人,比自己小10岁。因为年轻,刘半农满头乌发,不戴眼镜,给人印象很活泼。

“对,对。”钱玄同表示赞成。他还和当年在日本的《民报》馆一样,喜欢插话。

“下次开编辑会议,再请玄同通知你。”送鲁迅出门时,陈独秀拉着他的手说。他希望鲁迅多讲话,既然来了,就不希望鲁迅是局外人。周氏兄弟和陈独秀以前不熟悉,认识周作人比认识鲁迅还早一点。周作人到北大,本来是教希腊文学史的,后来几经反复,在北大附设的国史编纂处任编纂,月薪120元。1917年中秋前,到文科任欧洲文学史教授,月薪240元,和陈独秀成了同事和上下级关系。鲁迅被邀请来开会,本来就抱着听听别人怎么说而来的,因此很少讲话。见陈独秀话里有话,鲁迅微笑着答应了。

回到家里,鲁迅心情很好,陈独秀一班人给他的印象不坏,尤其对《新青年》主编陈独秀的话感兴趣。乘着余兴,鲁迅给老朋友许寿裳写了一封回信,顺便提到《新青年》近况:“《新青年》以不能广行,书肆拟中止;独秀辈与之交涉,已允续刊,定于本月十五出版云。”因为还没有投稿,开一次会还不能算是进入其阵线,所以鲁迅用了“独秀辈”这样的字眼。

鲁迅用“独秀辈”,还因为戴着眼镜、浓眉短髭的老夫子许寿裳对《新青年》的评价并不高,说过“这里面颇有谬论,可以一驳”。不过自己看了,倒觉得没有什么可驳的。

◎鲁迅是谁

1918年4月2日是个晴天,鲁迅心情愉快,他想轻松一下,晚上集中精力作篇小说。因为答应了钱玄同,陈独秀便天天催钱玄同,钱简直成了跑龙套的,光上个月就跑了三趟,弄得鲁迅也不好意思。但这小说也不是说写就写的,一拖就拖下来了。

自年初《新青年》恢复正常出刊后，因为人多稿源足，大家又有兴趣，每逢15日就按时出一期，已经出了三期。二弟周作人在《新青年》四卷二号上发了“古诗今译”，用白话文翻译了古希腊诗人的牧歌。现在，鲁迅只要去开会，陈独秀都笑嘻嘻地找他要稿子，弄得鲁迅越来越没有退路了。

一次，陈独秀送了不少新印出的《新青年》给鲁迅，让他送人。他问陈：“费用怎么办？”他的意思，倘若收钱，给人时可以要的。以前他送杂志给别人，人家也问他要不要钱。

陈独秀说送人的，不收钱。这是陈独秀当初和群益社说好的，每期要留一些送人。上月，鲁迅给许寿裳写信说：“《新青年》二号已出，别封寄上。今年群益社见贻甚多，不取值，故亦不必以值见返耳。”

晚饭后，鲁迅习惯地靠在藤椅上，一言不发地吸烟。家人都知道大先生是在打腹稿了。桌子上放着1916年10月至11月的日记。他想起姨表兄弟久孙当时从太原到北京，得了“迫害狂”病，后来鲁迅送他去池田医院看了一个星期，没有效果，11月6日请蓝德将久孙送回绍兴。此后，鲁迅脑中常浮现久孙惊恐万状的影子，他决定以久孙为原型，写一篇小说，题目叫《狂人日记》。

天亮时，小说写好了。末尾想了想，第一次以“鲁迅”为笔名。趁着余兴，鲁迅用隔夜水重新泡了一杯清茶，吃了几块点心，点燃了烟嘴上的半截纸烟，又将《狂人日记》上可有可无的字删去。他想尽快将稿誊清，然后请钱玄同交给陈独秀。

清明节晚上，钱玄同、刘半农顶风去了半截胡同，见到这篇小说，钱、刘两人急急地看了一遍。鲁迅写道：“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

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两人赞赏了半天，说《新青年》还没有发表过这样的作品，算得上《新青年》之佳品。

第二天，钱玄同将《狂人日记》交给陈独秀，陈还没有读完便说写得好，算得上上乘小说。“玄同，你立了大功哪。”陈独秀没忘记钱玄同跑腿的事。

“我说周君文采不错吧！其实，他也写新诗。”钱玄同在鲁迅家看过他写的诗《梦》。

陈独秀放下手中的文章说：“何不一块找豫才要了来，四卷五号上还有空。”自今年四卷一号刊出胡适、沈尹默、刘半农的白话诗后，每期《新青年》都辟有新诗园地。陈独秀自己在四卷三号上也发表了《丁巳除夕歌》。

“好，哪天晚上我再去一趟。”钱玄同答应了。

过了几天，钱玄同将鲁迅的新诗拿来了，一共三首：《梦》、《爱之神》及《桃花》。

陈独秀尤喜欢其中的《桃花》诗。诗云：

春雨过了，太阳又很好，随便走到园中。

桃花开在园西，李花开在园东。

我说，“好极了！桃花红，李花白。”

（没说，桃花不及李花白。）

桃花可是生气了，满面涨作“杨妃红”。

好小子！真了得！竟能气红了面孔。

我的话可并没得罪你，你怎的便涨红了面孔！

唉！花有花道理，我不懂。

“常作诗么？”一次陈独秀问鲁迅，“听玄同说你以前也作旧体诗。”

“我不喜欢作新诗的，但也不喜欢作古诗。玄同说，作新诗的少，就作了。”鲁迅不苟言笑，讲话直，但语调亲切。

“不错的，不错的，闲时还望你多作一些。”陈独秀说。

“打打边鼓，凑凑热闹罢。”这次鲁迅笑了一下。

“鲁迅是谁？”见到《新青年》四卷五号上的《狂人日记》小说，不少人问。“周树人是也。”陈独秀满脸喜气地说。

7月5日，因头夜雷雨，天稍凉爽。下午邮差送来钱玄同写的一封信。鲁迅不看就知道，又是来催稿的。鲁迅苦笑了一下，自己嘴上答应的稿子，怕有六分不能兑现哩。但他感到这位仁兄变化真快，五天前，钱玄同晚上来还说这一期让别人编，自己要编讲义。这次来信说，这期《新青年》还是由他编，真是几天一个反复。

鲁迅下午去琉璃厂转转，晚上打算冒着蚊虫的叮咬给钱玄同复信，说等自己写稿子怕靠不住。谁知钱玄同性急，信还没有写好就上门来了。

“我正在给你写信。”

“我还是自己来了。独秀说得对，要豫才兄的稿子，怕要多跑几趟。他上次编，因没有来，你竟一篇不给。”钱玄同坐下来。

“不是这个话。”鲁迅笑着抓了抓刚理的头。“即使你来，也是一样的，没有还是没有。”

“作几首新诗如何？这总比作长文来得快。”钱玄同退了一步。

“这里有几首现成的。”鲁迅起身在书架上拿出《他们的花

园》、《人与时》两首白话诗。钱玄同扫了一遍，欢天喜地放入了大皮包。

◎ 侯机出击

“豫才，看来你是偏爱玄同啊。”开五卷二号《新青年》编辑会议时，陈独秀对鲁迅说。

“近日一定作一篇。”鲁迅明白陈独秀的意思。

“那是给尹默帮忙。”陈独秀笑着说。五卷二号轮到沈尹默编。

“其实还是一样。”鲁迅目视了一下《新青年》上的“陈独秀主编”几个字说。

“他们要编国粹丛编，说明《新青年》之于他们，是很难过的。”鲁迅想起钱玄同上次去谈到的话题。

“实是一大快事，即专对《新青年》而发就不用玄同、半农演双簧了。”陈独秀用力摇了几下手中的扇子。四卷六号《新青年》出来时，鲁迅就注意到陈独秀写了《答崇拜王敬轩者》一文。见陈独秀主将上阵，鲁迅对钱玄同说，“王敬轩”的“双簧戏”表演是一场“大仗”。在第三期上，刊出王敬轩《给新青年编者的一封信》和记者《复王敬轩》一文。事后，钱玄同告诉鲁迅，自己是“王敬轩”，“记者”是刘半农。

鲁迅笑，不说他也猜得出这是钱、刘二人所为。钱玄同、刘半农到一起，总要争几句。刘半农说：“我们两个是一见面就要抬杠的，真是有生之年，即抬杠之日。”后来刘半农写了一首抬杠打油诗，诗云：“闻说杠堪抬，无人不抬杠。有杠必须抬，不抬何

用杠。抬自由他抬，杠还是我杠。请看抬杠人，人亦抬其杠。”

大家闲谈时，鲁迅看了一下新一期的目录，除了自己的新诗，还有独秀的五篇随感录、《今日中国之政治问题》以及适之诗、信等，他对胡适的《贞操问题》很感兴趣，多扫了几眼。胡适写《贞操问题》，起因是四卷四号上刊登了周作人翻译的《贞操论》，因为谈的是性道德和妇女问题，在舆论界引起了不小的震动。胡适受西方文化熏陶，又是旧道德的受害者，第一个起来响应。

1918年7月20日，已近大暑。下午下了一阵小雨，可惜一会儿就停了。吃过晚饭，鲁迅躺在藤椅上闭目养神，正要构思文章，宋子佩来了。宋见周树人摆好笔砚，说了一会话就走了。鲁迅还没有回过神来，钱玄同又来了。鲁迅索性说白了：“上午上街给你寄了信，这会打算作一篇文章。”

“小说么？”钱玄同问。

鲁迅摇了摇头说：“是适之已作了的。”

钱玄同说：“知道了。”坐了一会，他也告辞了。

这次，鲁迅写了《我之节烈观》。写之前，他将今年已印出的几期《新青年》翻了翻，四卷三号上有陈独秀《驳康有为〈共和平议〉》的长篇大论，鲁迅想了一会，写道：“康有为，指手画脚的说‘虚君共和’才好，陈独秀便斥他不兴……”他先列出陈独秀、陈百年、钱玄同、刘半农及胡适在《新青年》上的文章，与之呼应。

因为是周末，鲁迅写了一个通宵，在文章里，他提出“要除去制造并赏玩别人痛苦的昏迷和强暴”。天亮时，文章写好了，5000多字。

四卷四号《新青年》辟出“随感录”栏，陈独秀写了几篇极短的文字，颇合鲁迅口胃。该刘半农编辑的五卷三号《新青年》至

迟要到9月15日寄到上海,因为文章不够,8月里刘半农冒酷暑两次上门催稿,中间又写了信,话中都有写稿的事。但鲁迅总感到《新青年》出刊慢。上次陈独秀也说《新青年》销路大不佳,说明现在青年之顽固。鲁迅此时38岁,已把自己看成长辈。

刘半农活泼、热情,想编出来不比人差,鲁迅推托不过,答应试试写篇随感录,也算不驳半农的面子。

8月29日,已过了处暑。鲁迅前天伤风发热还没有好,午后逛到琉璃厂散心,顺便买了《杨宣碑》一枚、《广业寺造象碑》一枚。回到家正在欣赏,刘半农来了。

“知道你要来的。”鲁迅拿出周作人译的两篇小说递给刘。

“总算译好了。”刘半农笑着说。“你的呢?”

鲁迅拿出一短文:《随感录二十五》。

“其实就是‘随感录’。”刘半农看了一下题目说。

“只是一个名目。”

“上次你的狂人要吃人,这次不要‘生人’要育人了。”刘半农见鲁迅谈生与育,笑了笑说。

因随感录短,鲁迅索性署了一个“俟”字。“俟”,俟机进攻之意。陈独秀曾说:“豫才兄取笔名,很见其孝顺上人,攻击敌人的个性。”但许寿棠不知“鲁迅”是谁,鲁迅只好去信自报家门。

见鲁迅桌上摆着池田医院开的规那丸,又见鲁迅脸色有些发青,刘半农不好久坐,便带着稿子告辞出门。

1918年10月底,已是深秋时节。陈独秀问鲁迅:“近日做小说了么?”

“没有。”

“《狂人日记》都说不错的。适之开白话诗先例,你是开白话小说先例。”陈独秀赞赏地说。

“过奖了。”鲁迅接过陈独秀递给烟。

“你的‘随感录’也很有人喜欢读。”陈独秀说。五卷四号上打算刊出一篇鲁迅反对鬼神的随感录，与陈独秀两质有鬼论呼应。

“《新青年》四面受敌，我所做的只是一小部分。”

鲁迅不用把话说尽，陈独秀就听明白了，那是说自己是对付大头的。“有你这一小部分，《新青年》就多了不小的分量。”陈独秀希望鲁迅不断“俟”机出击。

◎省出纸墨，移作别用

1918年11月1日，天已渐冷，冬季就要来临了。午后天上阴云密布，下了一会小雨。鲁迅提笔给钱玄同复了一封信，玄同来信催五卷五号的文章，鲁迅想还有半个月定稿，这中间不知要催多少次呢。

吃过晚饭，鲁迅写了两篇“随感录”，因为短，没有熬夜。两篇都是谈国粹的。自己在光绪廿八年去东京弦文书院学习日文，在“江南班”是第一个剪掉辫子的，那时保留国粹，是叫留学生保留辫子。现在已是民国七年了，保留国粹保留什么？脸上的瘤、额上的疮也是“粹”，也要留住么？

隔了两天是星期一，天像是漏了似的，从头一天起开始下雨，一直没有停歇。昨夜抄毕《淮阴金石仅存录》，今日无事，鲁迅打算给《新青年》写篇文章。起因是夏天钱玄同编五卷二号时，冒出一句“唐俟也不反对 Esperanto，以及可以一齐讨论”的话。钱玄同是用激将法，叫鲁迅参加讨论。鲁迅知道陈独秀是

赞成世界语的,认为有利于世界将来去国别、归大同。鲁迅赞成陈独秀的话,说:“人类将来总当有一种共同的言语;所以赞成 Esperanto。”但鲁迅和陈独秀不尽相同,认为将来是否必有一种共同的语言,现在没有讨论的必要。

隔日,鲁迅将这篇取名《渡河与引路》的文章寄给钱玄同。

“豫才,你这一期不错的。”11月中旬,陈独秀对鲁迅说。写了《渡河与引路》之后,鲁迅又写了两篇“随感录”,是针对“打拳”、“自大”而发的。鲁迅自己也感到笔滑,现在有些一发不可收了。

“多是不足道的小问题,玄同盯得紧,没有办法。”鲁迅穿着黑色棉袍,慢慢地摇了摇头。

“你给玄同的信,名义讲世界语,其实也是对通信栏提供意见呢。”陈独秀呵着气,脸上笑着。

“我认为那些不负责任的随口批评,没有常识的问难,可节省笔墨不必答它,或者顶多答一次。”鲁迅想起通信栏中见鬼、求仙、打脸一类东西就皱眉头,他感到《新青年》上小东西太多。

“有时,是想‘通信’栏发达些,所以明知是常识,来稿都尽量用了。”陈独秀迟疑了一下说。鲁迅说教人“二五得一十”可怜,陈独秀也承认颇切中要害。他感到豫才的肠子比自己直些,自己似有观音下凡、以普渡众生为己任的意识,鲁迅则主张教人方法,用功夫去引路,让人渡河,他不主张一个个的去拉、去扶,太多了,怎么拉得尽、扶得尽呢?

“只是随便想到的,同样是不足道。”鲁迅微笑着仰起头说。

“‘省出纸墨,移作别用’,可是你的主见,还仰仗你写一些‘足道’的东西!不然,还怕免不了要教人‘二五得一十’呢。”陈独秀将了鲁迅一军。

“看来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鲁迅说完，两人哈哈大笑。

握别时，陈独秀发现鲁迅手有些冷：“上次听玄同说你泻肚子，好了吧？”陈独秀问。

“好了。”鲁迅抽回手说。他感到玄同成了自己与仲甫之间的“桥”了，虽然自己很少见到仲甫，但什么事也瞒不了他。

◎为《新青年》撑面子

1919年年初，《新青年》轮到陈独秀编稿，然后依顺序是钱玄同、高一涵、胡适、李大钊、沈尹默。陶孟和要去欧洲，周作人要去绍兴，然后送住在老家的妻子、子女去日本，鲁迅因绍兴县馆不能再住，要找房子，找好房子后还要回绍兴接母亲来北京住，因此确定这年轮编计划时，这几个人都没有安排。

1月中旬，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胜国在巴黎召开和平会议。鲁迅一开始就对此次会议很怀疑，“都说公理战胜了强权；还向公理颂扬了一番，客气了一顿。……将来如何收场，我是毫无经验，不敢妄谈。”陈独秀比鲁迅说得更激烈：“难道公理战胜强权的解说，就是按国力强弱分配权利吗？”两人讲话口气和性格差不多，一个看得尖锐，说得隐晦含蓄；一个一旦认准，则勇往直前。

整个一月份，钱玄同、刘半农轮番上门，或写信，或一道来坐，少不了替陈独秀催稿。他们来催一次，鲁迅便作一篇随感录。钱、刘陆陆续续来五次，鲁迅便作了五篇随感录。“豫才对尼采似有不忘的印象。”见到鲁迅的随感录，陈独秀对钱玄同说。

“他在日本时是盛赞尼采的超人哲学的。”钱玄同说现在周

树人有些变了,上次他在给我的信中说赞成耶稣不赞成尼采。陈独秀依稀记得鲁迅在《渡河与引路》中说:“耶稣说,见车要翻了,扶他一下。尼采说,见车要翻了,推他一下,我自然是赞成耶稣的话。”

“嗯。”对耶稣教也抱好感的陈独秀点点头:“他现在对尼采式超人,已太觉渺茫了。”陈独秀用夹着烟的手指了指鲁迅的短文说。

在鲁迅请钱玄同转来的随感录中,陈独秀尤对谈进步美术家一文感兴趣。凑巧自己最近写《答吕澄〈美术革命〉》一文,鲁迅的短文正补了《新青年》谈美术的不足。

谈到书画,陈独秀并不陌生。嗣父陈昔凡是清末画家,家中藏有200多件王石谷的山水画。可惜二次革命后被马联甲带人抄走了不少。王石谷的画在京城能卖大钱,但缺点是临摹仿古画,并不追求自家创作。这种因袭古人的方法陈独秀并不感兴趣。陈独秀主张美术革命,要学西洋画写实精神,不落古人窠臼。

鲁迅和陈独秀不同,自己爱画画,也肯花钱搜集画。因此在美术知识上,比陈独秀专得多,这也是陈独秀喜欢鲁迅文章的原因。鲁迅还谈了讽刺画家的人格、思想的进步性。陈独秀觉得豫才论美术,文如其人。

腊月二十七日晚,钱玄同送来了几张票,说农历正月初二下午北京大学开游艺会,请鲁迅去参加。鲁迅翻翻日历,见正月初二是2月2日,又是个星期天,答应说如果不下雨就去。

正月初二是个晴天,鲁迅新换了一件棉袍,和二弟合叫了一辆人力车到北大。进了北大,到处是熟人。天晴气朗,又刚过春节,大家都很高兴,不住地点头作揖,嘴上不停地叫“新年发财”、

“恭喜恭喜”、“同庆同庆”。陈独秀也来了，穿着对襟袄，头发刻意梳了一下，比平常更精神些。

“来了。”见到鲁迅，陈独秀迎了上来。

“来了。”鲁迅拱拱手。

“你也来了。”陈独秀和周作人打了招呼。

“嗯。”周作人笑着点了一下头。

“还是暮气很深。”鲁迅目视着不远处的辜鸿铭，他正拖着辫子和人施礼。

“无大效果。”陈独秀回顾了一下。远处傅斯年、罗家伦在与蔡元培谈话，陈独秀的脸放松了些。

“《新潮》办得还不错，第一卷我已看了。”鲁迅也注意到了傅、罗两位学生。

“北大无大变化，豫才兄却有变化。”陈独秀笑着说。周作人也笑。

“仲甫说的也是。此一年无所得，只是思想有变迁。”鲁迅说。

“老兄气色似不好。”陈独秀关心地问。

“大哥背部痛，涂了碘酒，又在吃规那丸。”周作人插了一句。

“小事。”鲁迅不足道地看了二弟一眼。

“听玄同说，你在找房子？”陈独秀记得半个月前钱玄同说，鲁迅家和族人有矛盾，已逼迫他们搬走，然后卖掉绍兴县馆。

“没有办法，已托人重新找地方。”鲁迅说。因为是老大，这找屋之事便落到自己头上了。

“《新青年》四面受敌，虽有《每周评论》、《新潮》助阵，仍感孤立。今年还望二位出大力呀。”临走时，陈独秀未忘“主编”使命。

“你的‘摧’术，我已领教不少了。”鲁迅说完，三人都笑了起

来。

钱玄同、刘半农、胡适等人在那边闲谈，见到陈独秀和周氏兄弟，老远打招呼，三人便说笑着走了过去。

过元宵节，大家忙着吃元宵观灯，鲁迅破例没有熬夜，第二天起来也早些。

“听说琉璃厂火神庙很热闹，有空去么？”二弟周作人见大哥早起，走过来问。

“好啊。”鲁迅兴致也很浓：“不如在外面用午餐。我想去德古斋看看，已好久没有去了。”

“干脆去前门外京汉车站食堂吃饭。”周作人同意大哥的主意。

因下午出门，鲁迅上午给钱玄同写了一封信。这个月轮到钱玄同编《新青年》，鲁迅知道躲不过，一气给他写了四篇随感录，写得很杂，谈美术、进化论、尼采、易卜生什么的，想到什么写什么，但调子只有一个，无非是站在新派一边，反对旧派。

钱玄同近来写了两封信，中间还匆匆来过一次。4天前，陶孟和赴欧洲，欧美同学会为之饯行，鲁迅、周作人、钱玄同、陈独秀、胡适、高一涵诸同人都来了。20多人围在三桌上，人多嘴杂，酒气熏天，信中的事便没有提。

钱玄同头封信见鲁迅稿子上没署名，来信问署什么。无非“鲁迅”、“唐俟”或“迅”、“俟”等等，因为笔名过多，钱玄同反而不好办了。鲁迅无所谓，叫钱玄同看着办。鲁迅建议钱玄同转载《悠悠我思》回骂上海一家报纸的短文。

钱玄同希望鲁迅再作几篇文章。六卷二号讲是2月15日编好，因为要寄到上海印，正式出版要一个多月以后，所以钱玄同等鲁迅的文章又拖了几天。鲁迅过了年后到处看屋，本来是

没有时间坐下来写文章的,但他还是抽空为《新青年》增写了一篇杂文,题目叫《什么话?》。钱玄同不管鲁迅讲什么话都高兴,只要豫才给他稿子就行。他和陈独秀都已越来越感到鲁迅的文章给《新青年》撑了不小的面子。

◎新世纪的曙光

1919年3月10日,惊蛰已过了几天,厚积的浮云终于散去,但前夜的雨雪还使大地湿漉漉的。趁着大地解冻,气温转暖,鲁迅开始誊抄《孔乙己》,这篇小说还是1918年冬天作的。抄毕,鲁迅给高一涵写了一封信,打算寄给他。这一期轮到高一涵编稿。

周作人正有事找高一涵,说:“我捎给他吧。”

鲁迅点头,说:“一涵如说三号已满,可交适之。”这之前,鲁迅曾将两篇杂文交钱玄同转高一涵。钱玄同当时说,《新青年》出版慢,不如交《每周评论》。鲁迅也知道《每周评论》比《新青年》出刊快。近来陈独秀的“随感录”都用到《每周评论》上去了,但一涵编稿,很早就约自己写稿,总要给他一两篇。

4月19日,天已明显暖和起来。昨天鲁迅收到二弟从绍兴寄来的信及译稿,便坐下来给周作人回信。

周作人是上月末由前门站上车去上海,本月5日到绍兴的。因为要送家人回日本东京,请了一个多月的长假。前一阵子北大谣言四起,迫使蔡元培撤去陈独秀文科学长一职。在绍兴乡间的周作人很关心这件事,在信中问及北大情况。

鲁迅也很关注这场新旧冲突,陈独秀被围攻这阵子,《新青

年》同人更忙，钱玄同很少来了。

鲁迅郁郁寡欢地告诉二弟：“大学无甚事，新旧冲突事，已见于路透电，大有化为‘世界的’之意。”鲁迅对外国记者报道北大这场争战很感诧异。

下期《新青年》该守常编稿，周作人将译稿《沙漠里之三梦》寄来，交鲁迅处理。鲁迅翻了翻，发现原作有几处未译出，于是决定以后交给沈尹默发，等二弟回京改一改。

但李大钊那里，鲁迅是不想让他落空的，他很敬重守常的为人。约在清明节后两日，他寄了几篇随感录给李大钊，其中两篇是谈“主义”的。上一期胡适编稿，将《孔乙己》登了，胡适对这位落魄的读书人的命运很感兴趣，但不恭维鲁迅的杂谈。在“问题和主义”问题上，他和李大钊已有分歧，鲁迅不反对过激主义“来了”，是明显对守常口胃的。既然对守常口胃，当然就不对胡适的口胃了。胡适已开罪李大钊、蓝公武，他不想把矛盾扩大，对鲁迅的意见就只能视而不见了。

2月初，胡适和钱玄同也闹了矛盾，胡适怪钱玄同诋毁宋春舫，钱玄同怪胡适庇护张謇子，所以钱玄同宁愿帮李大钊捎信，不愿帮胡适说话。

胡适的朋友张奚若对李大钊《Bolshevism 的胜利》颇反感，认为空空洞洞。在《新青年》同人中，张奚若只恭维胡适、陶孟和，当然，张奚若是冲着“主义”来的。

李大钊索性将六卷五号办成“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鲁迅不太留意李大钊的文章，但自信和他是站在同一阵线上的伙伴。在写《“来了”》和《“圣武”》时，鲁迅赞美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他也不怕胡适不高兴，写道：“在刀光火色衰微中，看出一种薄明的天色，便是新世纪的曙光。”

谷雨之后一个星期，天很晴朗。北大调整陈独秀后，蔡元培日子也不好受，鲁迅便去北大看他。去时手上握着一封给钱玄同的信及稿子，这就是小说《药》。

《药》是3天前写的。再往前10天，李大钊写了封信，托钱玄同转寄，希望鲁迅再写点东西。于是鲁迅熬了一夜，写了这篇小说。

《药》是写革命者夏瑜的。这个孤独的精神的战士，为着民众战斗，却在死后被愚昧者喝了他的血。《药》写得有些王婆式的鬼气，鲁迅铺纸蘸墨时，总感到有老熟人秋瑾的亡灵在脑中，屋外又有那棵曾吊死人的大槐树，连鲁迅自己也感到留着安特莱夫式的阴冷。他预感李大钊对这篇文章有特殊的兴趣。

果然，李大钊从鲁迅的文章中立即看到了革命者的悲哀、群众的愚昧与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联系。他视《药》为主义派，将其收进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

“仲甫近来有些消极。”蔡元培和鲁迅叙了一会，便讲到陈独秀。讲话时，蔡元培的脸色泛白，颇有难言之隐。

“新旧冲突，免不了的。”鲁迅知道蔡校长解除陈独秀的职务，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1919年6月11日，陈独秀在新世界被捕。第二天孙福源到鲁迅家说，昨天陈独秀在东安市场散发传单被捕了。孙福源是周作人在绍兴第五中学的学生，现在是《国民公报》副刊编辑。

周作人对鲁迅说：“我去看看。”

鲁迅点点头说：“你要注意。”周作人是5月18日从日本回到北京的。6月3日下午，他就和刘半农、王星拱、陈百年去北大第三院法科看望关在那里的学生，北河沿的沟未填平，警察隔在中间，不让过去。6月5日下午，他去文科时经前门内警察

所,被警察的马队冲了一下,一匹黄色的高头大马抵到了他的右肩。所以鲁迅叫他注意。

到了北大,周作人和王星拱、李辛白等人以北大代表名义去探监,但警察不允许他们进去。

10月5日,已是深秋季节。午后周作人告诉鲁迅,下午他要去胡适家坐坐,问可有什么事。鲁迅说:“没有事,你去吧。我下午去八道湾。”鲁迅在八道湾看上了9间房子一套的新居,打算下午去交定金,把它买下来。

“是和徐吉轩一道去么?”徐吉轩是鲁迅在教育部的朋友,八道湾的房子是他介绍的。

“一道去,他在家等我。”

胡适住南池子缎库后胡同,陈独秀住北池子箭杆胡同,两人一南一北,同人笑他们是南猿北辙。

下午有点小雨,周作人乘人力车回来了。天黑时,鲁迅也回来了。周作人问:“办好了?”

“办好了。”

“适之想一人办《新青年》。”周作人说。

鲁迅闻之吃了一惊。6月11日,陈独秀在新世界被捕,《新青年》六卷六号就耽误了。这一期本该沈尹默编,因在汤尔和主张撤陈独秀文科学长这件事上,沈尹默是赞成汤尔和的,因此也不想再插手《新青年》,便以眼疾为由推辞了。刘半农本来就希望编,但胡适一向瞧不起他,鲁迅也认为他带有“红袖添香夜读书”的习气,最后改为玄同、半农合编这一期。

“你怎么说?”鲁迅见胡适送了一本《实验主义》给二弟,伸手接过来翻了一下。

“我说听听大家意见。”周作人知道,胡适是冲李大钊编马克

思主义研究专号来的。仲甫被捕，两人在《每周评论》上唇枪舌战了一阵，一个讲“主义”，一个讲“实验”，结果吴炳湘把《每周评论》查封了。现在只剩下一个《新青年》，按轮流编辑次序，轮到胡适要到明年3月的七卷四号，他嫌太慢。

“我和尹默讲过，《新青年》是仲甫带来的，现在仍旧还给仲甫，让仲甫一人去编吧。”鲁迅直截了当地说。

鲁迅和沈尹默都主张由陈独秀一人编，不过目的不同，沈尹默有碍前事，想和陈独秀远一点。鲁迅在李大钊与胡适争论中虽保持沉默，但态度上倾向守常，这从他给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写稿也可以看出。

1919年中秋之后，仲甫邀玄同、半农、守常、适之、尹默、启明等人开了编辑会议，鲁迅因修理八道湾房子，没有来。启明说了长兄的意见后，鲁迅意见占了上风。决定从12月1日七卷一号起，《新青年》仍由陈独秀一人编。

“六卷六号，还望二位抓点紧。”陈独秀关照钱玄同、刘半农说。

“稿子早齐了，隔日就送给你过目。”刘半农抢在钱玄同前面答了。这次，他们找鲁迅要了七八篇短文。9月16日，陈独秀出狱，李大钊、刘半农作了欢迎诗，刘半农将这两首诗也补了进来。

“下个月一号出版没有问题。”钱玄同附和了一句。

12月17日晚，新潮社在香厂浣花春举行聚会，陈独秀、李大钊、钱玄同、周作人都来了。月初，刘半农和潘力山出国留学去了，陈独秀等人在东兴楼饭庄摆了一席，为他们饯行。那次，周作人也来了。

“豫才还没有回来？”见到周作人，陈独秀问。上次听周作人

说,鲁迅月初回绍兴搬家去了。11月下旬,沈尹默、马幼渔陪刘半农来辞行,鲁迅就说自己要回一趟故乡,

这会见陈独秀问,周作人说,怕要到月底,路上乘船换车五六次,需要一个星期哩。“《新青年》他看到了么?”陈独秀问。

“七卷一号?”周作人不知哪一期,六卷六号和七卷一号几乎同时出来。陈独秀出狱后,改在北京印刷《新青年》,出版快多了。

“我编的那一期。”

“没有。大哥走那天,你编的七卷一号还没有出来。半农走后,我才拿到,10天前我给他寄了一本,现在大概收到了。”周作人说。

“下期先把‘译者序’刊出来。”陈独秀喝了一口茶说。

“嗯。”周作人点点头。陈独秀讲的是鲁迅的译作《一个青年的梦》,这是日本人武者小路笃实写的剧本。陈独秀在狱中时,鲁迅开始译它,并在《国民公报》上连载。两个月后,该报被禁停刊。“大哥临走前又作过一个序。”周作人提醒陈独秀。

“知道。两个序分开来登好。”陈独秀笑了笑。

“《第一幕》呢?”周作人是指鲁迅临走之前重校的《第一幕》。

“我想把《第一幕》放到七卷二号上去。”陈独秀想等鲁迅回来。

12月29日,鲁迅回到北京。周作人和几个朋友在前门车站迎接。见到他们,鲁迅说:“北京天气不错,前天在南京可受大罪。”后面是周建人夫妇扶着周母,周建人也说:“又是风又是雪,幸亏是卧车。”

回来后,鲁迅抽空译《一个青年的梦》,过了20天,终于全部译完。看着同僚送来的七八盆桃花、梅花,鲁迅揉了揉痛疼的

背,长长的吁了口气。

◎五体投地佩服

1920年正月里,满枝盛开的黄色的梅花散发着沁人肺腑的清香,鲁迅和二弟一边观赏一边闲谈,想把《域外小说集》刊印出来。这本书是宣统元年在日本东京神田印刷所印刷的。

“请仲甫找群益书社,如何?”周作人理了一下脖子上的灰色羊毛围巾说。1月下旬,陈独秀去武汉讲演,不久前返北京后受通缉,后在李大钊帮助下逃往上海。陈独秀和鲁迅都没有想到,此后他们俩再也没有见面。

“我也这样想,但版权不给群益。”鲁迅说话时看了一眼外面的浓云密布的天,要下雪了。

“版权不给群益,稿酬怕低些。”

“可问问仲甫。”鲁迅见一时雪下不下来,决意去琉璃厂看看古董,上一次还是除夕前去的。

“回头我给仲甫去信,你有什么事?”

“《青年梦》校好了,你一起寄给他。”鲁迅转身从书案上找出抄讫的译稿,其中有《〈一个青年梦〉的正误》。

陈独秀给周作人写了回信,说:“很盼望豫才先生为《新青年》创作小说,请先生告诉他。”陈独秀希望钱玄同给他写信,但没有提鲁迅给他写信。以前都是玄同在中間走动,两人毕竟隔了一层。鲁迅见仲甫点名要他的小说,便知独秀一贯的口味,与自己的杂谈比,仲甫宁要自己的小说。

8月初,天大热,家人一个个闹病,鲁迅在家休息了几天。5

号午前去山本医院取药,回来后静下心来,开始写小说《风波》。

1917年6月12日,张勋拥戴废帝溥仪复辟,10天后就失败了。但这事在乡间却引起有遗老臭味的“赵七爷”们的蠢蠢欲动,用来吓唬“七斤”之类老实的农民。当时鲁迅在北京,后陆续听到家乡的骚动,这次回乡后又听说一些事,触动他把它写出来。

《新潮》的傅斯年也来催过稿,但鲁迅还是打算将《风波》寄给《新青年》。5月1日陈独秀出七卷六号《新青年》“劳动节专号”,向周作人约译托尔斯泰泛劳动主义。同人中不少人写了稿,鲁迅没有写。他认为旧状无以维持,转变也是一塌糊涂而已,既非官吏所希望之现状,也非新学家鼓吹的新式。但有一点,鲁迅并不反对介绍俄国思潮到国内。

立秋头一天是周六,鲁迅将抄好的《风波》寄给陈仲甫,这次他没有请二弟转寄,是自己踏着满街梧桐叶到铭伯先生家去,顺路到邮局的。

见到鲁迅寄来的小说《风波》,陈独秀喜不自禁。尤其对下面这段话感兴趣:“九斤老太早已做过八十大寿,仍然不平而且康健。六斤的双丫角,已经变成一支大辫子了,伊虽然新近裹脚,却还能帮同七斤嫂做事,捧着十八个铜钉的饭碗,在土场上一瘸一拐的往来。”

8月下旬,陈独秀给周作人写了一短函。鲁迅寄《风波》后,周作人过了一星期又给陈独秀写了一个明信片,问《风波》收到没有。陈独秀已复一函,其中问及玄同为何不来信,但主要是告诉他,《风波》将登在八卷一号上。陈独秀写道:“鲁迅兄做的小说,我实在五体投地的佩服。”

收到陈独秀来信,北京正好天降喜雨,凉爽多了。看了陈独

秀信，鲁迅笑盈盈的，将信笺递给了二弟。周作人说：“仲甫是很希望我们多给他写东西的。”说了一会话，周作人说《新青年》的稿纸怕一时印不出来。

“就用《新潮》稿纸吧。”

1920 中秋后两日，陈独秀又给周作人写了一封短信，问周氏兄弟有没有文章，顺带又问到钱玄同。周作人对鲁迅说：“你有文章么？看来玄同是不会给《新青年》写了。”

鲁迅无事，但也提不起精神写小说，说：“有空我译点小说。”当时沈雁冰的《小说月报》也找鲁迅要稿。

“玄同怎么办？”

“你写封信，把仲甫的意思转告他。”鲁迅也感到陈独秀把《新青年》带到上海，钱玄同是极少来了。

几天后，钱玄同给鲁迅写了一封信，仍然不理陈独秀。这是陈、钱之间的事，鲁迅不好多说，倒觉得仲甫看得起自己，人到上海，仍然左一封信右一封信催，再拖下去就不好说了。这样想着，平常就多了一分心事，在月底前译完了俄国小说《幸福》，寄给了陈独秀。

陈独秀希望鲁迅、周作人、钱玄同写点随感录，但除了自己，总没有人写。他感到这不是路子，自己到了上海，和在北京就是不一样。这时，陈炯明要他去广州任教育委员长，离上海前，陈独秀编了《新青年》八卷四号，无论如何，走前必须将鲁迅译的《幸福》登出来。

◎不必争《新青年》名目

1921年元月3日，在八道湾寓所中的鲁迅正看前日买回的《三体石经残石》，这时邮差送来了胡适的信。

起因是陈独秀半个月前离上海时，给北京的同人来了一封信，信是寄给适之、一涵的。信上说，他要去广州了，《新青年》交陈望道负责。这封信不知怎么回事，路上耽误了，直到10天后胡适才收到此信。见陈独秀说“新青年色彩过于鲜明，弟近亦不以为然”，十分高兴。胡适便起草了处理《新青年》的三个办法，一个一个往同人处寄。

拿着胡适的信，鲁迅到后院去找二弟。周作人因身体不好，医生嘱他卧床休息。二弟媳羽太信子见大先生来了，打过招呼，上了一杯茶，便回到隔壁自己屋里去了。

“三个办法中，我以为第二个办法最好。”周作人把胡适的信仔细看了一眼说。第二个办法是把《新青年》拿到北京来办。

“我以为三个办法都可以。”另外两个办法是停办《新青年》或再办一个刊物，鲁迅都无所谓。他觉得不必像胡适那样计较。

“总有一个更好些的。”周作人希望鲁迅有一个明确的意见。

“拿到北京办当然好，至于发表不谈政治的宣言，我想大可不必。”

“胡适是想发的。”周作人说话时脸上泛起潮红，医生怀疑他是肺炎。

“仲甫不愿示人以弱，不愿发表不谈政治宣言。其实北京同人发与不发，官场总是一样头痛的。”鲁迅说着，起身给二弟倒了

一杯开水。

“也是。”周作人喉咙正干，接过水喝了几口。

“平时学术思想多了，就合青年的口胃了。”鲁迅起身告辞时说。他看了一眼屋外自己种下的两棵花椒，现在叶已退光，只剩下光秃秃的枝。

“你给适之回信，把我的意思说一下。”平时都是周作人写信，这次鲁迅推不掉了。

“嗯，我今天就给他回信。”

月底的一天，鲁迅到高等师范学校讲《中国小说史》，回来又去了一趟德古斋。路上突然想起适之昨天来信，信上附了陈独秀从广州寄来的信。胡适说读完独秀信后，圈了自己的名字，再转寄给没有画圈的人。鲁迅回家将适之信连同陈独秀的信一起寄给了钱玄同。封口前，鲁迅提笔写了几个字，说不必争《新青年》名目。

三天后，钱玄同给胡适写了一封信。他说话还是大大咧咧的，既不赞成孟和停办之说，也反对要求陈独秀停办，因为北京同人无权。和胡适一样，钱玄同对陈独秀将《新青年》交给不相识的陈望道、李汉俊、袁振英等人不满，他措辞激烈：“与其彼此隐忍迁就的合并，还是分裂的好。”最后他赞成了鲁迅的意见，只是语气更强烈：“断不在乎《新青年》的金字招牌。”

1921年春节，喧闹的爆竹声已渐渐稀落，远处不时传来零星的“噼啪”声。鲁迅迈着外八字步，踏着爆竹纸屑，出门散步，顺便将刚写好的小说《故乡》寄给上海的陈望道。仲甫三番五次催他做小说，这《故乡》既然是陈独秀催出来的，当然是给《新青年》。鲁迅尚不知道，《新青年》社两天前被法巡捕房查封了。此事发生后，在上海的朱我农立即写信告诉了胡适。

收到鲁迅稿件,陈望道很感动,他原以为陈独秀在北京的一班朋友是不会来稿的,想不到鲁迅还是给他寄来了小说,而且,是在《新青年》社被查封之际,这尤其使他感动。陈望道当天就写信给周作人,对周氏兄弟病中替《新青年》作文章表示感谢。陈望道给鲁迅写信更直:“办《新青年》不能靠胡适,要靠你。”

在广州的陈独秀决定把《新青年》搬到广州来编,他便给鲁迅、周作人两人写了短函,说:“北京同人料无人肯作文章了,唯有求助于你两位。”陈独秀和陈望道不约而同地感谢周氏兄弟,鲁迅当然心中有数。

《新青年》不能迁京,胡适心里憋了一口气,决定在北京办《读书杂志》。他知道办好杂志,必须要有一班人写稿。3月初,他给周作人去信,想叫鲁迅也参加进来。尽管鲁迅有苏俄倾向,但和陈独秀、李大钊毕竟不同。况且,周作人和自己很谈得来,是可以影响鲁迅的。

鲁迅笑着对二弟说:“现在陈、胡二位把我们看成一盘香菜呢。”

春节之后,周作人因肋膜炎在床上躺了三个月,后来为了赶一篇文章,病情又加重了。午后发热,晚上昏睡,只好住进了山本医院。鲁迅经常去看望,也没有时间写稿。加上胡适自己身体也不好,便不再催周氏兄弟。

《新青年》八卷六号因上海法租界干预,直到1921年4月1日才在广州出版。鲁迅2月份寄到上海的《故乡》,一下子拖到5月1日的九卷一号才登出来。陈独秀这时的心思已在对付广州的无政府主义上面,同人的稿子越来越少,色彩也越来越鲜明,所以鲁迅的小说为《新青年》增色不少。

陈独秀读鲁迅小说,从心里佩服他,他讲的话很富有哲理,

也很像自己目前的现状。另一方面，他又佩服鲁迅笔快，真正是个人才，回故乡一趟，便作出两篇小说。

鲁迅收到《新青年》九卷一号已是初秋，是子佩转寄来的，可惜只寄了一册。因上面有《故乡》，鲁迅想到书店再买一本，跑了几家也没有买到。

1921年8月21日是星期天，鲁迅冒暑热去香山碧云寺看二弟。周作人在6月初住进碧云寺疗养。山本医院的医生说，周先生宜在空气新鲜、环境幽静处调养肺病。他们便想到了碧云寺。

周作人住在碧云寺般若寺内。寺外西墙与溪谷相连，沿寺东面流下泉水来。小溪上有一座木板桥，桥旁有两三棵大树。鲁迅经过时，总看见几个马夫模样的人坐在大树下面的石头上纳凉谈天。进入般若寺的东偏室，是三间西房，周作人就住在其中的一间房子里。

“医生叫你少作文章。”见周作人书案上有一叠译稿，鲁迅坐下后说。周氏兄弟情同手足，记得周作人刚到北大上班时，一个月后突然得了麻疹，高烧不退，鲁迅以为得了猩红热，虚惊一场。后来兄弟二人不和，鲁迅专门写了小说《弟兄》，讲的就是这件事。

“不碍事。”周作人坐在床上。

“听说九卷二号也出来了。”见二弟翻看《新青年》，鲁迅说。书桌一角摆着几本佛书，是鲁迅专程到卧佛寺替二弟买的。

“我想书店一定不止一本。”周作人想起鲁迅刚写来的信。

“也许。书店怕侦探将《新青年》没收了去，不敢将书拿出来。”说话时，鲁迅拿出烟准备抽，想想又放下了。

“你抽吧，不要紧。”周作人说。“你看看仲甫写的《编辑室杂

记》。”鲁迅一边说，一边将烟放下。

周作人翻了一下，见上面写着：“本社社员某人因患肋膜炎不能执笔，我们希望他早日痊愈。本志次期就能登出他的著作。”

“仲甫讲话很明确，很希望你写稿给他。”

“大约《小说月刊》登多了，仲甫见怪了。”周作人笑了一下。《新青年》社被查封后，周作人给沈雁冰的《小说月刊》寄了不少译作。

“老三于显克微支不太有兴趣，如你身体不碍，不如你译出来寄给《新青年》，以后再出单行本。”鲁迅说。

周作人点头答应了。“你译的《三浦右卫门的最后》，什么时候出来？”记得自己上山后，大哥译了菊池宽作的这篇小说。初夏陈独秀给鲁迅来了一封信，鲁迅便给陈独秀寄去了。

“独秀要回上海，我想还是寄给李季，请他转交。九卷二号出来了，最快是九卷三号了。”鲁迅正在译《斯拉夫文学史》，他打算寄给沈雁冰的《小说月报》。

1921年8月30日，北京已有了秋的凉意。头天三弟周建人去看周作人，带回二弟为《新青年》译的一篇稿子。刘半农从法国巴黎也寄来两篇文章，他在鲁迅面前抱怨看不到《新青年》，又说陈独秀不给他写信。鲁迅隐隐约约听说一件事，说陈独秀在上海截住人家带给刘半农吃的东西，自己吃了。

这一段时间，鲁迅在几个杂志之间搞平衡。四五天前他把自己的想法在给二弟的信中说了：“我们此后译作，每月似只能《新》，《小》，《晨》各一篇，以免果有不均之诮。”当时《新青年》、《小说月报》、《晨报》的主编都向周氏兄弟约稿，而且都是朋友，鲁迅犯不着得罪哪一家。因此在寄给陈独秀三篇稿子的同时，

他又将自己的另外两篇稿子及二弟的两篇稿子寄给沈雁冰的《小说月报》。其实,鲁迅也知道,搞平衡是平衡不了的。胡适不久前又来信,推荐世界丛书社出版周氏兄弟的小说集。

16日是旧历中秋。夜晚,八道湾被一大片浅灰色的云笼罩着,不一会下起了小雨。中秋之夜本该是花好月圆的时候,可惜无月观赏,虽没有苏轼“此生此夜不长好,明月明年何处看”的感叹,但鲁迅多少有些扫兴,毕竟连生铁一样冷且白的影子也没有,只好埋头继续作文。这一夜终于将《狭的笼》译完了。这是俄国盲诗人爱罗先珂作的童话。33岁的爱罗先珂2月从上海来到北京,任北京大学世界语讲习班讲师,住在鲁迅家,和羽太信子一家为邻。

鲁迅打算将《狭的笼》寄给陈独秀,但书中有个“注”不明确,鲁迅想等二弟有空时帮助整理一下,周作人已准备9月21日下山回家。这样一想,便没有马上寄出。

1921年9月25日,陈独秀来了一封信,告知已从广州回到上海,仍住渔阳里2号,无非还是希望周氏兄弟来稿。接到陈独秀信的第二天是星期一,鲁迅将二弟、三弟及自己的译稿各一篇寄给了陈独秀。

给陈独秀写信后,鲁迅又给宫竹心写了一封信。宫竹心是山东人,起了一个日本人的名字,二十一二岁,喜欢写武侠小说。月初给鲁迅来信要借《新青年》,鲁迅曾回信说:“这种杂志大抵看后随手散失,所以无从奉借,很抱歉。”宫竹心当时还不知道给他写信的周树人就是他很崇拜的小说作家鲁迅。

陈独秀收到鲁迅的《狭的笼》,便补在九卷四号里,这期本该8月1日出版,因陈独秀回上海,延误了。

10月4日,陈独秀在收到鲁迅信后四五日,即被法租界逮

捕。月底陈独秀出狱后,不便再编《新青年》,《新青年》社宣告解散。此后鲁迅的译作、小说便寄往《晨报》、《小说月报》、《东方杂志》、《妇女杂志》等刊物。鲁迅和陈独秀之间书信交往也中断了。

1922年3月31日,周作人与钱玄同、沈兼士、沈士远、马裕藻等人在《晨报》上发表《主张信教自由宣言》。4月2日,陈独秀发表了致周作人等人的《公开信》,几位昔日的战友公开发生了论战。鲁迅此时和二弟已有芥蒂,没有参加论战。

◎内皆武器,来者小心

但鲁迅于陈独秀办的《新青年》总有一种不忘的印象。1922年12月3日,鲁迅在编好《呐喊》后,写了《〈呐喊〉自序》,回忆了金心异受陈独秀之托,来催他写小说的情景。金心异即钱玄同,鲁迅当面也这样叫他。鲁迅写道:“我懂得他的意思了,他们正办《新青年》。”

后来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三集》中,鲁迅追怀这段历史说:“北京虽然是‘五四’运动的策源地,但自从支持着《新青年》和《新潮》的人们,风流云散以来,一九二〇年至二三年间,倒显得寂寞荒凉的古战场的情景。”字里行间流露出孤身与旧派奋战的鲁迅对这段沸腾高涨的历史及包括陈独秀在内的老朋友的眷念。

1927年10月,鲁迅与许广平迁居上海,当时陈独秀也隐居上海,但两人一直没有交往。这一方面是陈独秀受蒋介石通缉,不便交往;另一方面是两人思想有了差距。当时瞿秋白也遭通

辑,但与鲁迅保持了亲密的联系。陈独秀转向托派以后,与鲁迅政治分歧明显,两人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

1932年10月,陈独秀被捕了。此后直到鲁迅去世,陈独秀一直在狱中。但鲁迅只要回忆起《新青年》,也总是不忘陈独秀。1934年夏天,刘半农去内蒙调查方言,不幸染病,回北京后去世。当时李小峰请鲁迅写篇文章纪念他,鲁迅便写了《怀刘半农君》。鲁迅在这篇文章中写道:“《新青年》每出一期,就开一次编辑会,商定下一期的稿件。其时最惹我注意的是陈独秀和胡适之。假如将韬略比作一间仓库罢,独秀先生的是外面竖一面大旗,大书道:‘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但那门却开着的,里面有几枝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

就在这篇《怀刘半农君》里,鲁迅说:“我佩服陈胡,却亲近半农。”

◎我对于鲁迅之认识

陈独秀在狱中和濮清泉也常议论鲁迅。1936年夏天,托派陈其昌化名陈仲山给鲁迅写信,并寄去刊物《斗争》、《火花》,想拉鲁迅支持他们反对的建立抗日联合阵线的主张。当时鲁迅病重,对陈其昌的做法很反感,口授了一封公开信在报上登了出来,表示“自觉和你们总是相离很远的罢”,并严厉地说:“我只要敬告你们一声,你们的高超的理论,将不受中国大众所欢迎,你们的所为有背于中国人现在为人的道德。”陈独秀在狱中听说后,深怪陈其昌对鲁迅发生幻想。

一次,陈独秀对濮清泉说:“我很佩服鲁迅,他在中国现代作

家中,是首屈一指的人物。”

“和世界第一流作家、中国古典作家比呢?”濮清泉问。

“怕还有一段距离。”陈独秀说。

“你贬他,是不是他骂你是焦大?”濮清泉记得,1933年,即他们被捕后第二年的春季,鲁迅以何家干为笔名在《申报》“自由谈”上写《言论自由的界限》,讽刺新月社奴才得罪主子,如同《红楼梦》里焦大得罪贾府,落得吃马屎。当时濮清泉怀疑是讽刺陈独秀,所以一直记得这件事。

陈独秀说:“不管他,我一生挨人骂多矣,从不计较。决不会反骂他是妙玉。”鲁迅没有点陈独秀的名,陈独秀也不清楚除了新月社诸人,是否连他一起骂了。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因肺病去世了。见陈独秀默然无语,濮清泉问:“先生何不为鲁迅作一篇纪念文章?”

“可以。”陈独秀肯定地点点头。“但现在不行。”陈独秀看了一眼窗外高张的铁丝网说。

“你认为鲁迅的作品好在哪里?”

“有自己的东西,有自己的个性。”陈独秀站起来走了几步,“以我私见,鲁迅先生的作品,周作人的作品在《新青年》中所以有价值,就是因为他们不附和别人。”

“当时适之和守常争问题和主义,他们为什么没有介入?”

“倾向还是有的,但他们始终有独立的思想。还是我刚才的那个意思,他们是不轻易附和别人的。也是这个原因,《新青年》风波后,别人不来稿了,唯有周氏兄弟还来稿。”陈独秀记得胡适之、钱玄同当时就不来稿了。在陈独秀最困难的时候,鲁迅给他来稿,这是他不忘记鲁迅兄弟的主要原因。

“现在社会上对鲁迅有褒有贬,你怎么看?”见陈独秀兴致

好，濮清泉想继续听他的高谈阔论。

“我在党内时，曾为他打抱不平，那时党中一班人骂他一文不值。现在又抬他到天上，成了神。鲁迅先生不是狗，也不是神，是个有文学天才的人。”说这些话时，陈独秀有些激动，走到桌前拿根烟点着了。他说将来一定写篇关于鲁迅的文章，哪怕是一篇短文。

一年后，即1937年11月21日，《宇宙风》登出独秀的文章——《我对于鲁迅之认识》。这是“旗手”关于“主将”的最后文字。文章很短，约500来字，却包含了陈独秀对这位十几年前的畏友的总认识。

第六章

友谊与分歧

——陈独秀与瞿秋白

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中国历史发生天翻地覆变化的开始,正是在中国发生巨大历史变革和社会发展锐不可挡的历史潮流中,瞿秋白成长起来了。

与此同时,作为维新运动之后中国政治生活中赫然跃起的人物——陈独秀,已完成了由康党向革命党的转变,正以《新青年》为阵地孕育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端。在年龄上作为晚辈的瞿秋白和当时的绝大多数进步青年一样,正是通过风靡全国的《新青年》知晓陈独秀的。也正是《新青年》所表现出来的思潮变动和翻天巨浪震荡着全国,引导了包括瞿秋白在内的青年学生社会心理向科学救国、民主救国的方向发展。瞿秋白也由此步入社会,抛弃了厌世的人生观。而且,他很快到了俄国,以略尽一份“东方稚儿”引导中国社会新生活的责任……

◎莫斯科相逢

1922年10月初的一天,这是北京的一个温暖如春的秋日。晚秋的晨霜早已化去,晴朗的天空一片湛蓝。

在李大钊家中,一位操着南方口音的小个子客人正和主人一边喝茶,一边愉快地交谈,他就是来自上海经北京到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四大的陈独秀。

在谈到莫斯科的党员时,李大钊提到了瞿秋白:“你到北大那一年,他是北大旁听生。当年他入俄文专修馆学习。五四逮捕的学生中也有他。”李大钊说话时拿出一叠《晨报》,在“莫斯科通信”栏里,清一色是瞿秋白从莫斯科寄来的文章。

“是关在北大法科校舍的学生吗?”

“是的。”

“他是什么时候去莫斯科的?”陈独秀问。

“你到上海那年,他就去了莫斯科,当时是以《晨报》和上海《时事新报》记者名义去的,先是加入俄共党组织,今年转为中共正式党员。”

陈独秀突然想起什么,说:“听太雷、特立讲过他。”

“前年我们发起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瞿秋白也参加了。”李大钊介绍瞿秋白时,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这次你去,可请他作翻译。”李大钊还说,1921年开共产国际三大,今年初开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瞿秋白都参加了。

陈独秀“嗯”了一声,说:“这次去苏俄,很像辛丑年第一次去日本,不懂外国话,心中没有底。正需要既懂俄文又了解情况的

同志作翻译。”出席少共国际三大的刘仁静和陈独秀结伴去苏联，刘仁静懂俄文，但他不熟悉那里的情况。

离开李大钊的院落，已是夜深人静时分。陈独秀戴上礼帽，看看四周没有可疑的人影，加快了步伐。

异国的寒月，晶晶的寒雪，伴随着瞿秋白度过了两年苦读生涯。国内要来人的消息，日夜搅扰着他的心神。他是多么希望早一天看到国内的同志啊！

11月，陈独秀、刘仁静、王钧到莫斯科时，共产国际四大开幕式已开过了。

见到陈独秀率中国代表团来，瞿秋白特别高兴。他戴着近视眼镜，头发后梳，高隆的前额和五官匀称的脸庞，使人感到气质不凡。刚下车的陈独秀十分疲惫，见到瞿秋白，精神为之一振。瞿秋白说，五四运动那一年，他和一起办《新社会》的朋友郑振铎等人曾到箭杆胡同拜访过陈独秀，请教办刊问题。

那时，刚接受社会主义思想的瞿秋白对国外思潮似有无限的兴趣。但社会主义流派繁杂，观之如隔窗纱看晓雾，或如开闸放水，虽喷沫飞溅，却分不清流去的方向。郑振铎似观点明确，瞿秋白常与他辩论不休。到俄国才知道，他们争来争去，却没有超出唯心论的范围。

提到《新社会》旬刊，陈独秀想起了那个操着温州话的瘦瘦的年轻人，说：“记得记得，郑振铎来大约也是11月，天已很冷了，当时我出狱不久。”第一次见到比自己小20岁的瞿秋白，陈独秀就感到两人有不少话可说。

“对！对！那时《新社会》刚创刊，第二年5月就被警察厅查封了。”

说了一会话，陈独秀问瞿秋白脸色怎么不好。瞿秋白说：

“去年这个时候病了一场，住了医院，今年春天病发了，又住了医院。”瞿秋白患肺溃疡，出现血痰，住进莫斯科高山疗养院。

“你要注意身体。”陈独秀拿出一包“双喜”牌烟问瞿秋白抽不抽，瞿秋白说：“医生不让我吸烟。”

“听你的口音是江浙人？”陈独秀发现瞿秋白讲话时总是微笑着，说话慢条斯理，像个学者。

“我老家在江苏常州。”提到家乡，瞿秋白别有一番思念之情。在俄国，他常回忆起常州红梅阁的翠竹野花、环溪的清流禾稼。

“哦？常州离我的老家安庆不远。”陈独秀美美地吐了一口烟说。

提到安庆，瞿秋白笑着说：“我离开常州到武昌投奔堂兄纯白时，乘船路过安庆。记得岸边有一座古塔，想不到是你的老家。”

“印象怎么样？”

“不敢恭维。”瞿秋白歉意地笑了一下。1920年自己在《俄乡纪程》中描述了当时的感受：“长河的落日，皖赣的江树，和着茫无涯埃的波光，沉着浑噩的波声，渗洗我的心性，舒畅我的郁积……”

陈独秀曾当过皖省的秘书长，不得不承认家乡很落后。他不想再谈这个话题。“你的名子取得好，大约不是本名吧？”陈独秀怀疑瞿秋白是秋天生的。

“我是1月29日出生，正经寒冬腊月。因为头上有两个旋心，父母给我取学名瞿双，双和‘霜’近音，上初中改为瞿霜。因为喜欢白玉盆中栽秋菊，便取笔名‘秋白’。再说‘霜’含有‘秋白’的意思。”见陈独秀兴致好，瞿秋白将自己的早年生活和感受

介绍了一番。“袁世凯做皇帝梦时，我对政治还没有兴趣，有时，竟想出逃到写小说的生涯中去。先生将科学称作‘赛先生’，我印象极深。只有聘请‘赛先生’到古旧的东方国来，才能重新引动中国人的傲慢心。”

陈独秀发现，五四运动前三年，瞿秋白经历了由“避世”到“厌世”的过程，这和自己办《新青年》前的思想很相似。

11月13日，陈独秀十分兴奋，这天列宁出席共产国际四大给代表作报告。见一见列宁，也是陈独秀此行的一个愿望。

瞿秋白以译员身份参加会议，他坐在陈独秀身边说：“列宁讲话喜欢用极明显的比喻。”

陈独秀问：“你和列宁谈过话吗？”瞿秋白参加过两次国际大会，他想应该谈过。张国焘来过一次，就和列宁交谈过。

“谈过。去年夏天开三大，列宁在走廊上见到我，听说我是中国同志，和我交谈起来，还把几篇关于东方问题的材料介绍给我。”瞿秋白兴奋地说。陈独秀羡慕地点点头。

这时，一阵热烈的鼓掌声、欢呼声骤然响起，他们知道是列宁来了，大家起立唱《国际歌》。在苏俄，《国际歌》几乎是国歌，人人都会唱。瞿秋白用俄文熟练地唱，陈独秀用中文半生不熟地唱，歌声响彻大厅内外。列宁微笑着向代表点头，挥手致意。

列宁带病作了一场十分精彩的讲演，因为身体不好，没有像往常那样和各国代表交谈。这成为陈独秀的一件憾事。

余下的日程是参加“关于东方问题”的讨论。会议日程拉得很长，休息日瞿秋白便陪陈独秀去看望东方大学的中国同学。

当时刘少奇、罗亦农、彭述之、任弼时、柯庆施、王一飞、卜士奇、曹靖华、韦素园都在这里学习。他们和瞿秋白是学生与老师的关系，瞿秋白俄文好，任他们政治理论课的翻译。

任弼时等人是从上海大学来的,和陈独秀是熟人,大家见总书记来了,都很高兴,围着陈独秀问这问那。陈独秀也高兴,身在异域,见到他们像是回到国内一样。

12月7日,陈独秀到东方大学召集党员开会,瞿秋白、卜士奇、罗亦农、李人俊参加了会议。在这次会议上,王一飞、彭述之、任弼时转为正式党员。

一个月的接触,陈独秀发现瞿秋白是个人才。他劝瞿秋白回国,说:“二大后,国民党与共产党建立联合阵线,国际会议这次也明确了,希望你和我一道回国内工作,把你在俄国研究的理论运用到中国社会中去。”

瞿秋白也想回去,原因是身体不好,去年俄国医生就劝他回国休养。他还想,光了解俄国历史与环境,不了解中国环境,不读中国的书怎么行呢?

临行前,瞿秋白陪陈独秀向拉狄克辞行。拉狄克是“关于东方问题”讨论组的头,他希望陈独秀再等几天,等《关于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关系问题的决议》提交执委会通过以后再走。

陈独秀听完瞿秋白的翻译,说:“我就不等了,《决议》内容我已参加了意见,估计不会有大的改动。”

中东铁路火车的车身十分宽大,简陋的三等车厢里横七竖八地坐着拖儿带女的俄国人。坐在单间的二等车厢里,陈独秀拥着厚被和瞿秋白坐在一起。他对瞿秋白说:“这次来莫斯科是划得来的。马林建议我们加入国民党,只知道加入,加入后怎么办,马林也不知道。”

火车正由西而东通过白雪皑皑的西伯利亚原野,荒漠般的旷野,蒙着厚厚的积雪,肃气森然。瞿秋白注视着窗外远处的一幢教堂式的建筑,金色的尖顶正放出金灿灿的光环。他提醒说:

“共产国际态度很明确，坚持我们留在国民党内，这一点和马林是一致的。”陈独秀这次来，带来了中共二大和西湖会议的精神，瞿秋白注意到了陈独秀与马林观点的明显区别。

陈独秀请瞿秋白参加筹办《新青年》季刊及参加《向导》的编辑工作，说：“和森身体不大好，你协助他一块编，近期就望你作一篇政治评论。”

瞿秋白打算作一篇政治运动与知识阶级的文章，点头答应了。这次回国他很兴奋，竟不顾医生劝告抽起了香烟，毕竟有两年多没有回国了。他想起了北京西城表舅母家小院子里的鸡冠凤仙花，想起了秋夜东城龙泉寺的虫鸣，也想起了正阳门畔三四层高楼放射的雪亮的光……

燃着的烟灼痛了瞿秋白的手，使他从遐想中回过神来。回头看陈独秀时，在晃晃荡荡的颠簸声中，陈先生已进入了梦乡。

◎初次合作

1923年1月13日，陈独秀一行乘坐的火车终于抵达北京站。看到火车站前的军警，瞿秋白下意识地看了一眼脚下一捆笨重的俄文书籍和行李。临分手时，他告诉陈独秀，自己住到在外交部做事的堂兄瞿纯白家中。说这句话时，瞿秋白眼前浮现出那个坐落在东城大羊宜宾胡同的小小的院落，那稀疏的带着清晨微霜的闲花闲草。离开北京前，他在这里度过了四年的光阴。

二七惨案后，陈独秀和中央机关迁回上海。李大钊准备介绍瞿秋白进北大任俄文教师，外交部也打算聘用他，但瞿秋白最

终选择和陈独秀在一起,到上海做职业革命家。

3月下旬,陈独秀和中央机关迁到广州。陈独秀作为国民党21名参议之一,夏初任孙中山大本营宣传委员会委员长,因此将中共三大党纲草案起草工作交给了瞿秋白。

瞿秋白起草后,陈独秀作了一些修改。在一些最基本的问题上,瞿秋白发现自己的认识和陈独秀是有区别的。譬如,自己认为无产阶级是唯一的、最现实的、最先进的、最彻底的革命力量,陈独秀改为“无产阶级却是一种现实的最彻底的有力部分”。在陈独秀看来,无产阶级的地位显然要轻得多。还有,自己认为“不得农民参加革命不能成功”。陈独秀改为“也很难成功”,似乎没有农民参加,革命也能成功,只是困难些。

瞿秋白一向尊重陈独秀,非常赞赏他对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贡献。认识陈独秀之前,瞿秋白就在文章中说过,“当时爱国运动的意义,绝不能望文生义的去解释他”。这会见陈独秀对文章的改动,心中虽有一丝困惑,但一闪就过去了。也许,总书记这样改是有道理的。

6月12日,出席中共三大的代表集中到广东东山恤孤院后一寓所举行正式会议。会议主要讨论党的统一战线方针。张国焘在会前和马林发生了争论,不赞成共产党人无一例外加入国民党。在会上,张国焘继续发言说,中国资产阶级是不革命的,无产阶级只能与小资产阶级联合。此外,他还举出共产党要有组织独立性的一些理由。

瞿秋白参加了共产国际四大,支持陈独秀和马林的意见,实际上也即支持了共产国际的意见。因此他是赞成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的,同时他也主张保持共产党组织上和政治上的独立性。

选举中央执委时，瞿秋白记下了陈独秀等人的得票数。陈独秀得票最多，依次是李大钊、蔡和森、毛泽东、王荷波、朱少连、谭平山、项英、罗章龙。张国焘在大会上受到马林、陈独秀的批评，没有入选；瞿秋白刚从苏联回国，时间太短，有些同志还不熟悉他，因此也不在其内。

会议期间，陈独秀和瞿秋白商量出版《新青年》季刊。当时中央有一个《向导》周报，还需有一个理论刊物。陈独秀太忙，他请瞿秋白任主编。

瞿秋白在会议空隙抓紧撰写了《新青年之新宣言》，提出“真正的解放中国，终究是劳动阶级的事业”。陈独秀见讲“劳动阶级”，不是光讲“无产阶级”，便也认可了。

会议结束后，瞿秋白和陈独秀商量，打算回一趟上海，并去参加夏天在南京召开的共青团二大。陈独秀说：“适之在杭州烟霞洞疗养，你经过杭州，可去看看他。”

◎分歧开始

1923年初冬一日，陈独秀来到瞿秋白家。9月中旬，陈独秀和中央机关迁回上海，办公地点设在闸北象山路公兴路口三曾里3号。瞿秋白夏天在南京东南大学参加共青团二大后，到上海任上海大学教务长，住在离闸北青岛路师寿坊上海大学不远的地方，因此陈独秀常来走动。

瞿宅是西式楼房。陈独秀进屋后，与瞿秋白的弟弟瞿云白点点头，又和房东夫妇打个招呼，便随瞿秋白上楼进入他的布置精巧的书房兼卧室。瞿秋白请陈独秀坐在写字桌前的木椅上，

自己坐在宽大的床上。陈独秀边点烟边说：“房间布置得像闺秀，就是这儿像书生。”陈独秀用夹烟的手指了指三架摆满俄文书籍的书橱。

瞿秋白微笑着说，不少书是从苏俄带回来的。

“在谈恋爱了吧？”陈独秀见瞿秋白精神很好，想起了施存统的话。夏天在南京开共青团二大，施存统介绍瞿秋白认识了四川姑娘王剑虹，现在王剑虹也在上海大学文学系听课。瞿秋白与王剑虹一见如故，往来频繁，有时和施存统夫妇一道在宋教仁公园散步。

“才开始。”瞿秋白笑着说。

“你的《自由世界与必然世界》我看过了，很有道理。现在你又有了自己的自由世界了。”陈独秀想起科学派与玄学派论战，借机和瞿秋白开了一句玩笑。瞿秋白在文章中说：“阶级斗争的过程里发见社会现象的公律，能使无产阶级觉悟：‘非解放人类，直达社会主义，不能解放自己’。”

“《新青年》二号下个月要出来，你有文章吗？”瞿秋白发现，陈独秀在《向导》上写短文很勤，唯独一篇大文章《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已定在《前锋》第二期上了。《前锋》比《新青年》季刊迟创刊半个月，两个刊物都由瞿秋白主编。陈独秀说，两个刊物内容有侧重，《新青年》重视理论问题，《前锋》重经济理论。

见瞿秋白催稿，陈独秀想了一会说：“马上要开三届一中全会了。三大决议案引起不少同志疑虑，影响了各支部的成立。近期怕没有时间写长文章了。”提到不少同志疑虑，瞿秋白想到杨明斋。陈独秀从广州回上海后，杨明斋因为不赞成三大加入国民党的做法，和陈独秀争吵了一通。瞿秋白也和杨明斋谈过，劝他打消去甘肃的念头，但劝不住。

瞿秋白起身从书案上拿出一叠稿件,递给陈独秀说:“我打算将它用在《新青年》上。”陈独秀瞟了一眼标题,是瞿秋白自己写的《自民治主义至社会主义》。陈独秀浏览文章时越往下看速度越慢,而且皱起了眉头。瞿秋白写道:“劳工阶级在国民革命的过程中,因此日益取得重要的地位,以至于领袖权。……到国民革命的最高度,很可以与世界革命合流而直达社会主义。”

中央决定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后,党内同志都在思考一个问题,谁领导国民革命?国民革命成功后,谁来掌权?和杨明斋争论,和张国焘争论,争来争去,都是这个问题。因此,作为总书记的陈独秀不得不回答这个问题。春天,他写了《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在《向导》发表后,并没有统一全党的认识。一般来说,国民革命胜利后,自然是资产阶级掌权,但也有例外,如俄国十月革命。眼前正在和国民党讲合作,现在讨论中国国民革命胜利后我们的情况,只会引起思想的混乱。

“你怎么看?”瞿秋白见陈独秀不语,忍不住问。陈独秀讲国民革命胜利后,自然是资产阶级掌权,是资产阶级的胜利,这是瞿秋白接受不了的。十月革命就是直接到社会主义的嘛,为什么中国只有一条路呢?他担心陈独秀会发火,或者弃稿而去。

“我们的看法似有不同处。”出乎瞿秋白意外,陈独秀十分平静地说。一个时期以来,陈独秀和这个争,与那个吵,自己也感到了火气太盛。

◎为街春色上云梢

1923年新年伊始,天气仍然很冷。街上残留着积雪,树梢

送来冷飕飕的寒风。但瞿秋白心里却洋溢着盎然的春意：他和王剑虹结婚了。

上海大学放寒假后的一天，陈独秀来到瞿秋白的新居坐。新房在上海大学新址西摩路附近的慕尔鸣路，是一幢两楼两底的弄堂房子。主人将客人引到楼上正房，这便是新房。这次，陈独秀没有看到书架，瞿秋白将它们搬到楼下的厢房里去了。

人逢喜事精神爽。这一段时间，瞿秋白精神焕发，总是西服革履，比平时更讲究些。陈独秀进门就开玩笑说：“新郎官上任几天，就叫你去做国民党的官，你是双喜临门呢。”上次瞿秋白发表《自民治主义至社会主义》，尽管陈独秀有一丝不快，但很快被别的事冲淡了。12月19日，瞿秋白在《向导》上发表《国民党改造与中国革命运动》一文，这是一篇根据上月下旬召开的三届一中全会精神写的文章。瞿秋白写道：“应当积极的加入国民党，共同的实行国民革命的运动，中国才有复苏的希望。”陈独秀很赞赏这篇文章，在他们的不同中，毕竟还有不少是相同的。

瞿秋白习惯地笑了一下，旋即担心地说：“这次去广州，是一场好戏，各种人都要登场表演。”陈独秀不参加即将召开的国民党“一大”，由瞿秋白陪同鲍罗廷去广州，会同李大钊、毛泽东、张国焘等人参加，瞿秋白去广州的另一个原因是给鲍罗廷当翻译。

1924年1月中旬，瞿秋白赴广州参加国民党“一大”，被选为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将新婚妻子丢在上海过新年，虽然使瞿秋白缠绵难舍，但参加国民党“一大”是一件大事，不能不去。

残冬的寒流未尽，广州的早春似乎比上海来得更早些。海风挟着春的气息扑面而来，人们已渐渐闻到了温暖的热土气息。在新生的绿草青枝之间，在春满人间之前，仍穿着一身冬装的瞿

秋白看到了报春的燕子来往穿梭,忙碌着衔泥筑巢。这使他联想到自己的处境,自己不也是一只冒着严寒为人类衔泥筑巢的春燕吗?想到这里,瞿秋白的呼吸舒畅多了,内心深处洋溢着青春的活力。在写给王剑虹的诗中,瞿秋白表达了当时的心境:

万郊怒绿斗寒潮,检点新泥筑旧巢。
我是江南第一燕,为衔春色上云梢。

王剑虹喜欢写诗,因此瞿秋白工作之余,常在信中附上一首唱和。

不幸的是,1923年夏天,瞿秋白新婚才7个月的妻子王剑虹因染肺病去世了。

夏日沉闷的空气,连着黄昏时分天际的淡云,伴着瞿秋白度过了许多无眠之夜。

新妻的猝然离去,给个人的幸福生活才开始的瞿秋白心头蒙上了一层浓厚的阴影,充满爱意的心灵似残秋垂柳着了严霜,失去了生气。一片云影,几朵落花,时时震动着瞿秋白的心灵。将王剑虹后事办完后,瞿秋白告诉陈独秀,自己想返回广州工作。他要用艰苦的工作去排遣心灵的创伤。

分手时,陈独秀嘱咐瞿秋白要注意增强国民党左派势力,多介绍革命分子进入国民党。

“谢持、张继和老鲍的谈话很明确,希望共产党退出国民党。”瞿秋白提醒陈独秀说。6月下旬,谢、张和鲍罗庭有一次面对面的争执。

“这是预料之中的事。”陈独秀说。在这之前,汪精卫、张继也找到陈独秀,指责共产党在国民党内开展党团活动。

“即将召开的政治委员会议，怕又是一场争斗。”瞿秋白有这种预感，因为事情并没有解决。自上个月中旬张继、谢持、邹鲁提出反对共产党“弹劾案”、《“护党”宣言》后，这股风愈演愈烈。瞿秋白在谭平山辞职后，进入新设立的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

1924年10月初，正是菊花盛开的深秋季节，瞿秋白回到了上海。想到故人一去不复还，秋花不再含笑，灰蒙蒙的天空更加压人，瞿秋白心境凄然。好在广州的夏末秋初，瞿秋白全身心地参加了反击右派弹劾案斗争，使他忘却了烦恼。陈独秀很高兴，在孙中山的支持下，右派的反共活动被击退，张继提出离职，谢持跑到上海，邓泽如也一蹶不振。

回上海之前，瞿秋白曾写了《帝国主义与反革命压迫下之孙中山政府》，陈独秀将这篇寄自广州的通讯刊在《向导》第八十五期上。瞿秋白分析广州商团叛乱的原因在于英帝国主义的阴谋。陈独秀也认为商团军是广州政府的心腹之患，早在夏天就提出将其解散。

10月10日，上海举行反帝反军阀性质的国庆纪念大会，上海大学学生黄仁鼓掌时，被国民党右派指使的暴徒推下主席台。瞿秋白到同仁医院时，黄仁已死。瞿秋白和陈独秀商量，决定在上海掀起反对帝国主义、反军阀的斗争。陈独秀写了《这是右派的行动吗？还是反革命？》，指责右派是帝国主义、军阀的走狗。瞿秋白和沈玄庐、恽代英等参加了上海大学举行的黄仁烈士追悼会，并发了言。

此后，上海大学左派与右派的斗争更加激烈，瞿秋白便辞去社会学系主任一职。陈独秀说：“这样也好，你可腾出时间来做些别的事。”当时《国民日报》在叶楚傖把持下，明显右倾。瞿秋白和上海国民党执行部毛泽东、恽代英、施存统、沈泽民、邓中

夏、杨之华等配合，上书孙中山，逼迫叶楚傖退出报社。

11月7日是十月革命节，瞿秋白与杨之华结婚了。杨之华原是沈玄庐的儿媳妇，不久前因丈夫沈剑龙即沈玄庐的儿子腐化堕落，两人感情破裂离婚。头年底，杨之华考上上海大学，成为瞿秋白的学生，但年龄只比瞿秋白小一岁。瞿秋白迅速再婚的原因之一，是王剑虹早逝留下了极深的创伤，极需弥合。

◎心系“热血”

1925年春节之后，陈独秀到宝山路顺泰里12号瞿秋白家谈工作。不久前，即1月11日，中共中央在上海闸北区横浜路6号召开四大，会议一直开到大年三十前夜才结束。陈独秀、瞿秋白、彭述之、蔡和森、王荷波、罗章龙及共产国际代表维金斯基等20人参加了大会。李大钊、张国焘在北京协办孙中山北上后的事务，毛泽东在湖南，他们都没有出席会议。和三大不同的是，瞿秋白不仅参加了大会文件起草，也参加了大会领导工作，任政治决议案审查小组组长。开会时，瞿秋白对决议案中无产阶级领导权、国共合作等问题作了长篇发言，大会选举时首次进入中央局。

走进瞿宅，陈独秀发现，瞿秋白的新居小多了，书架和所有的家具都挤在一间卧室里。

“再过几天，便是二七惨案两周年，我想《向导》要登一些纪念文章。”坐下来后，陈独秀解开大衣上的扣子，走路急了些，光亮的脑门上已渗出微汗。

提到二七惨案，瞿秋白想到了最近发生的沪西劳资冲突，当

时上海地委正在组织领导工人罢工。“我也这样想，工人阶级要成为伟大的独立的政治势力，还有一段路要走，眼下要促进职工运动，以壮大工人阶级。”瞿秋白一边说一边拿出吃食招待客人。

“张国焘作为工农部主任，应立即到上海来工作。和资产阶级比，工人阶级才是不妥协的、最革命的阶级。”陈独秀说。

“《向导》还要靠你多写文章。”瞿秋白发现，一提到二七惨案，陈独秀身上的革命性就多一些，以往对工人阶级的怀疑和顾虑消失了。

因为蔡和森身体不好，在四大上再次担任总书记的陈独秀为了加强宣传工作，安排了蔡和森、瞿秋白两个宣传委员，由瞿秋白主编《向导》。瞿秋白现在是以《向导》主编和中央局成员的双重身份向陈独秀约稿。陈独秀爽快地答应了。

五卅惨案深夜，党中央在闸北横浜桥附近宝兴里的一幢旧式两开间楼房开紧急会议。瞿秋白住宝山路顺泰里12号，离这里近，他和杨之华来到这个秘密机关时，任弼时已坐在后厢房会议室中等候。过了一会儿，陈独秀、蔡和森、李立三、恽代英、罗亦农也来了。张国焘、刘少奇刚从广州回沪，也参加了会议。

陈独秀强调了民族自由运动是一个长期的斗争过程，要有普遍的持续力。会议决定由瞿秋白、蔡和森、李立三组织行动委员会，陈独秀居中指挥。

为配合上海的罢市、罢工、罢课的反帝斗争，会议决定出版《热血日报》。瞿秋白在去年编出《新青年》季刊第四期后，即以编《向导》为主。主编《热血日报》的任务顺理成章地落到了瞿秋白头上。

瞿秋白怕自己一个人的精力不够，提出增加人手。《热血日报》是党办的第一份日报，工作量很大。

陈独秀说,可从中央宣传部和《民国日报》社抽人。结果选定了郑超麟、沈泽民、何味辛等人组成编辑委员会。

6月4日,天已开始燥热,陈独秀来到闸北华兴路56号一间客堂里。这里是《热血日报》的编辑部。几天前,瞿秋白告诉陈独秀,今天是《热血日报》创刊日。

陈独秀穿着衬衣在白木长桌旁的长凳上看报,报头是瞿秋白写的。见大家兴奋,陈独秀问瞿秋白:“怎么了?”

没等瞿秋白开口,杨之华就笑着说:“他说这比在大学讲台上讲课有效得多。”杨之华每天去浦东区组织工人罢工、了解情况,晚上向瞿秋白汇报。

“这一阶段你辛苦些,但要注意身体。”陈独秀发现瞿秋白自从主编《热血日报》后,脸色苍白,显得疲惫不堪。

瞿秋白笑了一下,说不要紧,有空还请你多写稿,你多写一篇,我就少写一篇了。陈独秀对瞿秋白说:“你是主编,唱主角!我给你敲敲边鼓,化名写点短文。可以了吧?”

瞿秋白说:“我是推不了的,一期上少不了一两篇。”

“《热血日报》初办,稿源一开始不多是正常的,以后就不需要你主编亲自动手了。”

陈独秀说这番话时想到了《新青年》。

在瞿秋白、陈独秀等人的努力下,《热血日报》在短短的几天里销数达三万份。不料6月下旬正办得火红时,大资产阶级首先发生动摇,停止了罢市斗争,《热血日报》出版第二十四期后,也被查禁。

陈独秀十分惋惜地对瞿秋白说:“你号召民众推翻这种政府,反对帝国主义,它哪能允许你公开存在呢?”

“你不也提出立起国内战争反对政府吗?”瞿秋白想起上一

期陈独秀在《向导》上的文章《此次争斗的性质和我们应采取的方法》的话。

两人相视而笑。

◎留下后患

1925年秋的一天，中央局召集会议讨论反击戴季陶。夏天，戴季陶抛出《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两本小册子，要把共产党排斥出国民党。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思想上群龙无首，戴季陶是孙中山的秘书，其小册子一出笼，立即得到新老右派的捧场，形成了以戴氏理论为支柱的右派势力。

瞿秋白首先提出粉碎戴季陶主义。他说：“戴季陶和冯自由不同，他的观点有系统性，可以叫戴季陶主义。”

陈独秀穿着无领白色衬衫，不停地摇着手中的芭蕉扇。对于是否反击戴季陶，他拿不定主意。戴氏在国民党“一大”上选为中央常务委员、宣传部长、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因为排斥共产党，受到孙中山批评后，辞去上述职务。反击戴季陶本身并无什么，因为有孙中山的批评在先，他担心汪精卫、蒋介石不高兴，会借机找茬。陈独秀说：“戴季陶反对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属实，但戴季陶只是小资产阶级的代表，是民粹派，怕还不能称是国民党的右派的代表，这个问题要慎重。”

陈独秀的观点遭到瞿秋白、任弼时等人的反对，见大家都主张反击戴氏，最后陈独秀同意由瞿秋白写一篇系统反驳戴季陶主义的文章。

回到家里,瞿秋白用全副精力赶写文章。动笔之前,他在房间里踱来踱去,习惯地用牙咬着铅笔。在搜集了大量材料后,他用了一个晚上一气写成了《中国国民革命与戴季陶主义》。

第二天,瞿秋白将文稿拿给陈独秀看,陈独秀认真地看了一遍,很满意瞿秋白的反驳。8月20日,在戴季陶右派理论蛊惑下,廖仲恺被刺杀,使陈独秀感到瞿秋白、任弼时等人坚持反戴季陶是对的。

8月30日,陈独秀给戴季陶写信说:“你所写的《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那本小册子,错误的见解非常之多。”征得陈独秀同意,瞿秋白将这封信在《向导》上公开发表。

一天,瞿秋白儿时的朋友羊牧之找到闸北宝山路瞿家。羊牧之和瞿秋白都是常州人,还沾亲带故。

“你怎么知道我住这儿?”见到羊牧之,瞿秋白高兴地问。

“我在南市沪军营工人夜校上课,遇到了高语罕,是他告诉我的。”羊牧之说。

杨之华拿出瞿秋白写的《中国革命与戴季陶主义》小册子,递了一本给羊牧之。说这是秋白刚刚写出来的,你拿去看看。

羊牧之没见过陈独秀,瞿秋白说:“陈独秀宣传马列主义是有功绩的。”

从这以后,羊牧之常到瞿秋白家。1926年1月,国民党在广州举行“二大”,瞿秋白是国民党候补中央委员、政治委员会委员,按理要去参加。羊牧之问瞿秋白为什么不去?瞿秋白说我身体不好,不能去。当时瞿秋白肺病加重,经常咯血。

在毛泽东、周恩来、陈延年等人的努力下,迫使蒋介石、汪精卫表态批评戴季陶,并在国民党“二大”决议中警告戴季陶。

羊牧之听到这个消息,对瞿秋白说:“你应该高兴才是,这是

中国共产党反击戴季陶主义的胜利,有你的一份大功劳。”

瞿秋白摇了摇头,遗憾地对羊牧之说:“你不知道,戴季陶虽然受到批判,却仍然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委,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见羊牧之摇头,瞿秋白叹了一口气说,“这是留下后患,是潜伏的危险。”

羊牧之影影绰绰感到,瞿秋白对陈独秀、张国焘的退让政策是有意见的。

◎头脑千万要冷静

1926年夏天,广东国民政府发布北伐宣言,这使瞿秋白极为高兴。年初他参加了北京中央特别会议,回到上海后病情加重,在白克路宝隆医院住了一段时间院。陈独秀说:“我的病刚好,你就病倒了。”陈独秀因伤寒住进了医院,没有出席北京特别会议。瞿秋白住院疗养期间,遂了一个心愿,写了《俄国革命运动史略论》一书。此时在家中带病工作。

一天,已到中央宣传部工作的羊牧之受彭述之委托,送《现阶段宣传要点》给瞿秋白看。进门时,靠在床上的瞿秋白正在吟“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诗句。难得见病中的瞿秋白兴致这么好,羊牧之开玩笑说:“上海这地方既没有东篱,也没有南山。”

“是啊,也不见秋菊呢。”瞿秋白摇着纸扇说。

两人谈到北伐,羊牧之才知道瞿秋白兴致好的原因。瞿秋白扬了扬手中的《现阶段宣传要点》,说:“伟大的北伐战争已经开始了。看来要经过几次大战后,革命形势将会突变。我们要宣传北伐的伟大意义。”

谈了一会,瞿秋白兴致又低落下来,见羊牧之疑惑不解,说:“作为我们在中央工作的同志来说,头脑千万要冷静,任何事物,看了这一面,又得看看另一面。譬如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蒋介石强行通过了‘整理党务案’,我们党内有人表示欣然接受,说这是国民党内部问题,他党无权赞否,这些你们宣传部的同志怎样看?制订宣传要点时,是否考虑了这些情况?”

羊牧之没多注意《向导》上陈独秀《给蒋介石的一封信》的内容,惊异地反问道:“什么叫他党无权表示赞否?这些情况为什么部里没听到讲过?”

见中央宣传部的同志都没有注意,瞿秋白坐不住了,起身穿着拖鞋踱步说:“问题就在这里啊!你回去可向述之同志转述我的看法,请他酌情考虑如何?”

隔日,瞿秋白看到陈独秀在《向导》上发表的《论国民政府之北伐》,大吃一惊。陈独秀写道:北伐的意义,“不能代表中国民族革命之全部意义。……革命的北伐时期尚未成熟。现在的实际问题,不是怎样北伐,乃是怎样防御。”

很长时间没有吸烟的瞿秋白点燃了一支烟,陷入了沉思。关于北伐,北京中央特别会议很明确提出,广东政府应冲出帝国主义和军阀围攻,转守为攻。这也是瞿秋白的观点。3月14日,《中央通告》公布该决议时还说,“党在现时政治上主要职任是从各方面准备广东政府的北伐”。虽然陈独秀没出席会议,但这个《通告》是经陈独秀同意签发的。现在陈独秀态度发生这么大的变化,与蒋介石策划的“整理党务案”有关。另一方面,瞿秋白也知道陈独秀的苦衷,他担心身为北伐总司令的蒋介石借北伐之机扩充自己的势力。这一点,陈独秀在文章中是不好明说的。

陈独秀的文章立即引起了轩然大波。一个叫黄世见的读者写信给《向导》编辑部，质问陈独秀：“挑拨北伐期中的的人心，煽惑一班不明真相随风飘荡的幼稚革命者吗？或者先生被反动派利用，在此北伐期中灌输令人怀疑的论文，代他们鼓吹吗？或者先生聪明一世懵懂一时吗？”

在广州，国民党黄埔特区党部下令禁止学生阅读《向导》周报。国民党中央党部李济深、孙科、张静江、顾孟余等人开会讨论此事，最后决定由张静江给陈独秀写信，指责陈独秀乱放炮，甚至有投机权位之嫌。

很长时期以来，瞿秋白就主张武装革命。北伐无疑有利于革命的武力的增长。4月，他专门写了《中国革命之武装问题》，刊在《新青年》上。陈独秀反对北伐以抑制蒋介石，瞿秋白则主张在北伐中可以争得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权与武装。这一点恰恰是陈独秀犹豫不决的。8月初，瞿秋白写了《北伐的革命战争之意义》一文，指出农民寄希望于无产阶级，“足以证明无产阶级争取上的领导权，革命及其武装之领导权的万分必要。”

陈独秀见到这篇文章不高兴了。关于无产阶级争取领导权这一点，他是难以接受的，这会破坏国共合作。7月13日，即陈独秀写北伐文章后一个星期，在上海召开了四届三中扩大会议。讨论北伐军能不能打下武汉时，陈独秀表示怀疑，并指责各地农运有左倾毛病。现在瞿秋白又写支持北伐文章，是明显批评他的，尽管措辞委婉。

瞿秋白将写好的文章交给《向导》编辑部后，便去广州参加两党联席会议。他预感陈独秀、彭述之可能不同意发表这篇文章。

对于彭述之，瞿秋白在1925年即发现不对头。起草四大文

件时,彭述之提出无产阶级在国民革命中是必然的天然的领导者,对此,瞿秋白在年初生病期间写文章反驳,说中国革命的领导权绝对不会天然落在无产阶级手中。在北伐问题上,彭述之附和陈独秀,说北伐战争还不能说是革命群众的军事行动。瞿秋白在文中明确地说,北伐战争是“中国平民反守为攻的革命战争”。四届三中全会后,瞿秋白曾问羊牧之下面对决议的意见,羊牧之说:“下面反映这个决议太右了。”

《北伐的革命战争之意义》一文如瞿秋白所预料,被陈独秀、彭述之扣下,没有发表。

◎中国革命之争论

1927年新春,雪霁天晴。上海法租界望志路五丰里5号瞿宅,穿着旧皮袍的瞿秋白坐在楼上卧室的藤椅上,隔窗晒太阳。在冬日的阳光下,他的消瘦的脸更加苍白,但精神很好,不时拿起铅笔,在一旁的纸上记下什么。

近来,瞿秋白预感到自己和陈独秀、彭述之及共产国际代表维金斯基之间的争论已不可避免。1926年初,他在病中写俄国革命史,眼下整理自己回国后写的130篇论文,都使他强烈感到中央出了机会主义。党有病,陈独秀又讳疾忌医,这是中国革命当前最头痛的问题。

1926年12月,陈独秀去汉口召开中央政治局特别会议,瞿秋白因身体不好,未参加会议。没有想到陈独秀在会上将看不起国民党、包办农民运动等列为“左稚病”。

今年1月罗易带来共产国际指示,提出满足农民土地的要

求。斯大林还特别指出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特点和优点,这个消息像春风一样,使处于痛苦之中的瞿秋白精神为之一振。他在中央会议上立即表示完全接受共产国际指示,并批评汉口会议与共产国际指示不吻合。没想到陈独秀、彭述之则不冷不热,只表示今后按共产国际提案办。这件事如迎头泼下一盆冷水,使瞿秋白倒抽一口凉气。瞿秋白与陈、彭之间的矛盾加深了。

还有一件事令瞿秋白不快。汉口会议后不久,陈独秀、瞿秋白与刚上任的苏联驻上海领事馆驻华代表 N. 那桑诺夫等人谈话时,瞿秋白提出党的工作主要应放在支持北伐上,但陈独秀不同意。这几件事促使瞿秋白下决心写一本小册子,在全党公开批评陈独秀、彭述之等人的错误。瞿秋白将小册子取名为《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陈独秀在党内还有威信,除此之外,没有更好的办法。

沉沉的夜色笼罩着大地,瞿秋白带着病体熬过了一个又一个不眠之夜。看着微露晨曦的鱼肚白之光,他常常想到这既是“夜余”,也是“晨初”啊!

上海第三次武装暴动期间,陈独秀、彭述之与瞿秋白的矛盾进一步加深了。

2月中旬,上海第二次工人暴动在即,瞿秋白的心情也兴奋起来,主动写信给陈独秀,提出参加上海活动分子大会并作报告。陈独秀回信说,“你‘病’,不准你去了!”结果让彭述之去作报告。陈独秀在病字上打了引号,显然是指瞿思想有病。

尽管瞿秋白从陈独秀信中看出了挖苦自己的意思,但22日,瞿秋白仍到拉斐德路启迪中学暴动指挥所,参与领导起义。当时,工人处死了一名叫“小滑头”的工贼,瞿秋白赞成说:“做得

好”。不料陈独秀、彭述之听说后非常生气，命令总工会发布罢工“纪律”。

第二天晚上，瞿秋白参加了联席会议，他直截了当地说，这次罢工失败的原因是一味依赖大资产阶级，等待兵变，脱离群众。在这次罢工之前，瞿秋白就提出一个提案，说工人应参加市政府选举及联合小资产阶级反对大资产阶级，但陈、彭反对这个提案。

这次会议决定成立第三次起义的指导机关——中央特别委员会，成员是陈独秀、周恩来、罗亦农、赵世炎、汪寿华等人。瞿秋白、彭述之没有参加，中央决定瞿秋白到武汉筹备五大，将中央机关迁往武汉。

第二天，瞿秋白写了《上海“二·二二”暴动后之政策及工作计划意见书》，向中央提出自己关于第三次工人起义的意见。2月底3月初，他多次出席特委会的会议。在会议上，他措辞尖锐地批评第二次暴动中的策略是卖阶级的策略，说要指明工人阶级通过武装斗争夺取参政权之目的。

◎党已有病

1927年3月中旬，瞿秋白奉命去武汉，主持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住汉口英租界辅义里27号。楼上是瞿秋白住室，楼下是中宣部机关。当时李立三、蔡畅、羊牧之等人也住在这里。

一天深夜，住在楼下的羊牧之被开会回来的瞿秋白叫醒了，瞿秋白将一沓稿件交给他，说这个材料要单独刊印，让他先看看。羊牧之睡眼朦胧地看了一眼标题，是毛泽东写的《湖南农民

革命(一)》。羊牧之知道文件重要,想问问情况,瞿秋白说明天再说。

第二天早上,羊牧之上楼找瞿秋白,瞿秋白一边披衣下床一边对羊牧之说:“目前党内,特别在中央,有些同志不敢支持已经开始,或者正在开始的农民革命斗争,反而横加指责,今天一个过火,明天一个越轨。这不行!毛泽东同志这篇文章是亲身下去做了几十天实地调查,很有说服力的文章,文字里痛斥党内外一切怀疑、否定农民斗争的论点是没有根据的。”看得出,瞿秋白很兴奋,因为在反对陈独秀、彭述之的斗争中,他并不孤立,他和毛泽东、任弼时等人都有共同的话题。

“看了没有?”瞿秋白见羊牧之拿着稿件没有反映,转身问。

羊牧之老老实实地说:“翻了一下。”

瞿秋白批评说:“要认真研究,不能翻翻了事。”

隔日,瞿秋白将自己赶写的序言交给羊牧之,羊牧之便将文章、序言交给一位熟悉印刷的同志,嘱他在长江书局赶快排印。当时汪原放负责长江书局。

后来羊牧之才知道,瞿秋白关心毛泽东这篇文章,另一个原因是陈独秀、彭述之不同意将此文在《向导》上全文发表,对此瞿秋白很生气,说:“这样的文章不敢登,还革什么命?”

瞿秋白不止一次对人说:“我们至今还没有自己的党报——日报,你看这样的材料却不准宣传,真岂有此理!”他在序中号召中国革命者要同读彭湃的《海丰农民运动》一样,都来读毛泽东的这本书。

毛泽东当时正抱病在武昌农民运动讲习所,这本小册子出版后,使他增添了抵制陈独秀错误的信心。

4月12日,蒋介石向共产党人举起了屠刀。当夜,杨之华

接到中央从武汉拍来的电报,叫她立即去武汉。

到武汉后,瞿秋白拿出三个文件给杨之华看,说:“这是我在武汉和你见面的礼物。”

三个文件是毛泽东写的《湖南农民革命(一)》单行本、瞿秋白写的《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底稿及《俄国资产阶级革命与农民问题》手稿。手稿是瞿秋白用复写纸写的,一式两份,字迹工整,没有涂改。

瞿秋白指着毛泽东的《湖南农民革命(一)》说:“这是一篇好文章,你必须读。”杨之华知道这篇文章不同寻常,点头答应了。

瞿秋白在《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中写道:“我可不怕皇帝制度的斩首。我敢说:中国共产党内有派别,有机会主义。”

杨之华见丈夫将问题提到“斩首”的地步,心情也不好受,她想起了秋白走后自己和陈独秀争论的事,心想应该让他知道,便说:“起义胜利后,工人在政治要求、经济要求得不到满足的情况下,进行自发罢工,我去请示陈独秀,希望解除禁止罢工的命令。他不同意,说:‘现在不是罢工的时候!’。”

“你怎么说?”瞿秋白问。

“我说现在工人群众已经罢工了,我们就应该去领导他们在斗争中组织工会,这样才能提高工人群众的革命觉悟。”

“你说得对!”瞿秋白点头说。

“陈独秀生气了,说‘你应该服从今天早晨党组的决定,不然,如果因此而破坏统一战线,那我们就什么也做不成!’”杨之华记得陈独秀使劲吸烟,然后将烟头掷在地上。

“你就离开了他的办公室?”

“我出去后,想想又回来了,这次他更生气了,问我是不是一个服从纪律的党员。”杨之华说。第二天陈独秀批评了她和其他

领导工人罢工的同志,他说蒋介石在上海不会像在江西、安徽那样做。

瞿秋白沉思了一下,压低声音说:“党已有病,必须根治,五大将有一场争论。”说话时,他将《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按了一下。另一份底稿已拿去排印了,瞿秋白准备在五大上分发给代表。

◎真正要出一身冷汗

1927年4月27日,星期三。中共五大在武昌小学礼堂开幕,汪精卫赶来礼节性地致了贺词,然后匆匆离开。汪精卫走后,会场迁往汉口黄坡会馆继续开会。

陈独秀穿着长衫做工作报告,足足讲了五个小时,因为对大革命受挫没有作自我批评,甚至提出先退到西北去的口号,引起满怀希望的代表们不满,会场出现了躁动不安的情绪。

叶挺情绪不好,大会开始时,全体起立唱《国际歌》;有人发现叶挺手臂上有一个胖虱子,伸手捻了捻交给叶挺,叶挺一边捻一边说:“捻死这个吴佩孚!”

这位代表笑,他又从叶挺的衣领上捻下一个虱子,问:“这是哪个呢?”

叶挺也笑,说:“你应该晓得这是哪一个!”他是指蒋介石。

听陈独秀讲话时,叶挺不满地问站在身边的工作人员羊牧之:“报告稿,中央集体讨论过没有?”

羊牧之苦笑,说:“不知道,但这应该是讨论的。”

会间休息时,罗亦农走到瞿秋白面前说“糟糕”。罗亦农绰

号“大口”，他刚刚赶到武汉。4月中旬陈延年去上海任代理书记，替回了罗亦农。

过了一会，羊牧之走到低头一支接一支抽烟的瞿秋白身边，轻声说：“叶挺问中央讨论过没有？”

瞿秋白看了一眼羊牧之，说：“要相信中央。”羊牧之点点头，便走到一边去了。

叶挺的话，唤起了瞿秋白的回忆。陈独秀的报告，在五大预备会上讨论过，而且发生了争论。对于中山舰事件，陈独秀归咎于革命力量不足，甚至指责上海工人不该起义，提到党内妥协退让，陈独秀就发火，就训人。这些情况，瞿秋白当然不好告诉羊牧之。

第二天开会时，每个代表坐凳前的长桌上放着一本小册子，这就是瞿秋白写的《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

大家如饥似渴地低头读小册子，脸上漾满笑容，有人在小声交谈，交换意见。会场上出现了喜气洋洋的气氛，昨天令人压抑的气氛被冲淡了。

这不是突然袭击吗？陈独秀没有想到身体多病、面若书生的瞿秋白早已作了准备，一时愣了半晌。瞿秋白列举了1923年至1927年党内领导层右倾错误17例，说：“将这些事实一一罗列起来，自己看一看，真正要出一身冷汗！”

现在该轮到陈独秀出冷汗了。他拿出手帕擦去脑门上渗出的汗水，看了彭述之一眼。彭述之早已躁动不安，嘴里咕嘟着：“见了鬼了！见了鬼了！”这是他的口头禅。瞿秋白矛头直指陈独秀、彭述之，陈独秀身为中央总书记不好点名，瞿秋白就直接点了彭述之的名。瞿秋白写道：“彭述之虽然一口咬定没有民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等于似有似无的鬼，实际上却去和这个

鬼联合,以备反抗他所认为是买办阶级的新右派。如此说来,资产阶级是有的,不过是‘鬼’而不是人,他的力量很小,不妨和他联合。这真是彭述之的有鬼论!”在文章后面,瞿秋白写道:我们的党已经是群众的了。我们党一定能克服并消灭彭述之主义。

在小组讨论时,瞿秋白当面讽刺彭述之:“当前革命的领导权,已经或正在被这个鬼篡夺了。”正在作记录的羊牧之发现,瞿秋白讲话时脸色变白了,但声调高昂。

陈独秀当然知道,瞿秋白的小册子表面上点彭述之,实际是针对自己,甚至是共产国际代表维金斯基。维金斯基说过:“现在应在无党农民中让出一大部分给国民党左派。”瞿秋白生气地写道:“让给谁?让给顾孟余吗?他说农会是土匪。让给甘乃光吗?他说不要叫耕地农有!”

使陈独秀坐立不安的是,瞿秋白的小册子在代表中赢得了广泛的支持。

坐在杨之华身边的恽代英一边翻《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一边笑着对杨之华说:“这个标题写得好,写得尖锐。”他是指扉页上的副标题,“第三国际还是第0国际?——中国革命中之孟塞维克主义”。见杨之华在认真听,恽代英接着说:“目录上的五大问题也提得鲜明,问得实在好!”这五个问题是:中国革命么?谁革谁的命?谁能领导革命?如何去争领导?领导的人怎样?

毛泽东在大会前和其他同志准备了提案,在大会上发言批评了中央的错误,但陈独秀拒绝在大会上交流,并将毛泽东排斥在大会领导之外。瞿秋白在文章中支持了毛泽东关于湖南农民运动的观点,指出:“‘农民革命’是中国革命之中枢。”此外,蔡和森、任弼时等人在大会上都发言批评了陈、彭的右倾错误。

因为瞿秋白点了彭述之的名,加上陈独秀作了检讨,共产国际代表罗易又说:“中国的劳动群众是英勇斗争的,因此,中国不会有孟塞维克主义。”结果选举时,已失去权威的陈独秀仍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但陈独秀自己已感到,通过的决议中许多内容和自己的意见相左,昔日自己在党内的威信从根本上动摇了。

◎“进攻”与“退让”

五大后,武汉形势日益严峻。5月13日,夏斗寅叛变,武汉的局势顿时紧张起来。5月18日,叶挺率独立师开赴前线反击夏斗寅。因为胜负未卜,武汉人心惶惶,国民党的要员有的躲进租界,有的化装买票,准备隐匿逃跑。在汉口任《民国日报》主编的沈雁冰也十分焦急,半夜来到瞿秋白家里。

瞿秋白开了瓶白兰地,已和陈公博对酌了半夜,正焦急地等待消息。杨之华见沈雁冰来了,忙加了一个酒杯。沈雁冰问:“怎么样?”

陈公博愁云满面地摇摇头。

瞿秋白镇静地说:“叶挺出兵必胜。”

沈雁冰点头,喝了一口酒,说:“就怕叶挺不能很快获胜,武汉无人防守,现在人心不稳得很。”

“如相持不下,可从河南调第四军来武汉。”瞿秋白说。

黎明时,从前线传来叶挺部队粉碎夏斗寅部的消息。三人酒酣耳热,举杯同贺,脸上露出了轻松的笑容。

不料三天后,许克祥在长沙叛变革命。5月29日,朱培德

在江西将共产党员遣送出境。郭沫若从江西到武汉后，一度感到悲观失望，常借酒浇愁。

一天，瞿秋白和杨之华去看他。对于身穿戎装、刚写下《请看今日之蒋介石》的文友郭沫若，瞿秋白十分关心他，劝他说：“你的失望，出发点是由于认识不足，你以为以前的武汉政府是很革命的，现在反动了，是不是呢？这种见解根本就是错误的，武汉政府几时革过命？你到现在来才要失望。革命是从此以后啦！”

隔日，瞿秋白约郭沫若去游黄鹤楼，想到大革命的严峻形势和陈独秀等人的错误，瞿秋白不禁触景生情，和郭沫若吟出苏东坡《念奴娇·赤壁怀古》“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诗句。

与此同时，瞿秋白对陈独秀的“退让”政策进一步抵制。一天，沈雁冰告诉瞿秋白：“独秀埋怨《民国日报》办得太红了，国民党左派有意见，他希望少登一些工运、农运和妇女解放的消息和文章。”

瞿秋白此时已补入中央政治局常委，听到这话，他激动地摸着自己头上的长发说：“你就按照五大决议的精神去办。《民国日报》过去办得不错，旗帜鲜明，就这样继续办下去！”沉思了一会；又说，“我们另办一张报！你不是说他们常来干涉你的工作么？共产党的政策要通过国民党的报纸来宣传，本来就不正常，许多话只能讲一半，不如干脆把《民国日报》交给国民党，抽出我们的同志另办一张党报。”

1927年6月30日，天气很热。中午，瞿秋白、杨之华乘人力车到江边渡口，然后乘小划子到武昌出席中共中央武昌扩大会议。

陈独秀在大会开始时说，共产党和跟着她革命的工人农民

已经走得太远了,现在必须退让以挽救与国民党的联合。

恽代英十分生气,大声问陈独秀:“现在中央很奇怪,我听说秋白同志到处作报告是‘进攻’‘进攻’,现在中央又决定‘退让’‘退让’,中央内部是否有不一致?”

陈独秀尴尬地说:“正因为不一致,所以要开会呀!”

陈独秀起草的关于国共合作问题的十一条政纲,是这次大会讨论的重点。听到“工农等民众团体均应受国民党党部之领导与监督”等条,瞿秋白主张坚决开展工人运动和土地革命,依靠工农群众来努力战胜反革命的进攻。

争来争去,大会还是通过了十一条政纲。瞿秋白也不愿意把中央内部的矛盾,全部暴露给蒋介石、汪精卫,再一次迁就了陈独秀。

回家路上,杨之华发现瞿秋白十分平静,她知道,秋白已尽了最大的努力,此时正在考虑如何挽救时局的问题。

◎不尽长江滚滚流

7月初的一天傍晚,瞿秋白邀羊牧之同游黄鹤楼,说“今天校对了一天,我们出去轻松一下”。

当时一阵夏雨刚过,空气格外清新,远处残阳如血,红云万朵。羊牧之高兴地应了一声,难得疲惫不堪的瞿秋白今天有这样的雅兴。

在江汉,两人登上了小划子。船到江心时,夜色渐浓,两人默默地看着江岸的灯火,听着小划子划水的声音,陷入了沉思。

沉默了一会,瞿秋白轻声问:“你看古诗中,哪句能刻划出我

當前的心境？”

羊牧之想了一下，搖搖頭說：“想不出。”

瞿秋白禁不住站了起來，脫口吟道：“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流！”

“現在落木不是沒有蕭蕭下么？”羊牧之問。眼下正是盛夏時節，離暮秋尚遠呢。

瞿秋白感嘆地說：“許多同志在犧牲，這不是蕭蕭下么？大鈞同志在敵人的絞架下，英勇地犧牲了。前幾天的中央會議上，有些人還在高談要承認國民黨應處於革命的當然領導地位，這是不是對得起為黨犧牲的大鈞同志？”他指着太陽西沉的遠方說，“大好河山，又要沉淪一個時期了。”

1927年7月12日，鮑羅廷見大勢已去，被迫執行共產國際6月中下旬改組中共中央的命令。6月底，陳獨秀已有預感，每周兩次的國共兩黨聯席會議有時已不通知他參加了。鮑羅廷要陳獨秀、譚平山去莫斯科，瞿秋白、蔡和森去海參崴辦黨校，所以新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沒有瞿秋白、蔡和森。

約在8月中旬的一天，瞿秋白、李維漢來到陳獨秀隱居的紙行樓上。汪精衛叛變革命後，陳獨秀等人受到通緝，武漢處於白色恐怖之中。根據中央指示，負責長江書局的汪原放幫陳獨秀聯繫了這個隱蔽地點。

陳獨秀見他們到來，十分意外。他聽秘書黃文容說，瞿秋白和鮑羅廷上了一趟廬山，現在兩位政治局常委相約而來，一定有什麼重要的事。

黃文容端上茶水下樓去了。談了一會閑話，瞿秋白說明了來意：“近日共產國際派來了代表羅明那茲，不久前我們開了一個緊急會議。”

李维汉说：“是8月7日。我们受大家委托，来告诉你一下会议情况。”陈独秀点点头，没有作声。脑海中浮现了俄租界三教街41号那幢熟悉的西式公寓。记得苏联援华农业顾问洛卓莫夫就住在这幢称为怡和新房的三层楼房子的第二层。楼下是俄人开的商店，正好掩护开会的人。

李维汉说：“因为天热，会议只开了一天。”会议代表进来后，不再出去。先来的同志便在地板上过夜。瞿秋白介绍了一下参加会议的人，他解释说，中央委员不过半数，北方、上海、广东、广西代表来不了，所以监察委员、共青团中央委员也参加了会议。

陈独秀点头。

瞿秋白看了一眼李维汉，说：“这次会议根据共产国际指示，检查了过去中央的错误，制订了新的工作方针。”

会议的主要文件《告全党党员书》由罗明那兹起草，瞿秋白参与意见并翻译成中文。罗明那兹写道：“如果共产主义者不能无所畏惧无所忌讳地批评党的错误、疏忽和缺点，那么共产主义也就完了。我们的党公开承认并纠正错误，不含混不隐瞒，这并不是示弱，而正是证明中国共产主义的力量。”

在会上，瞿秋白谈补充意见时说：“在国民革命和阶级斗争中，对小资产阶级的态度，党只看到其上层领袖，而没有看见群众。以后仍然要与小资产阶级联合，但不能采取过去的态度。”

关于党的新任务，瞿秋白代表中央常委说：“过去，党的领导机关犯了错误，现在党不能再以退让手段来争得民权，是要以革命方法来争得民权。”

陈独秀专心听瞿秋白介绍情况，讲到中央政治局改组时，李维汉说：“新的政治局常委是秋白、兆征和我。”

陈独秀心里“咯噔”了一下。停止工作后，他也知道自己会

被免去职务,但没有想到这样快,而且,正式免去他的总书记职务的会议也没有让他参加。他当然不知道,也有同志在会前提出,陈独秀是中央委员,又在武昌,应让他参加会议,但罗明那兹不同意。陈独秀一千次一万次作了心理准备,但事到临头还是不是滋味。隔了一会,陈独秀控制住自己的冲动,说:“我同意大会决议。”

迟疑了一下,李维汉说:“大家劝你去莫斯科。”任弼时在大会上说:“老头子可去莫斯科。”鲍罗廷离开中国前也建议陈独秀去莫斯科。

陈独秀气色不好,摇了摇头。他这才知道,瞿、李此行的主要目的。他说:“大革命失败,共产国际有责任,不能全记在中央的账上。”显然,他对罗明那兹的做法有意见,已迁怒共产国际。

瞿秋白、李维汉知道陈独秀的脾气,知道劝他也不会有效果,便握手告辞了。

◎“撒翁”与《布尔塞维克》

1927年9月20日后,瞿秋白、杨之华离开了汉口租界,乘一艘日本军舰去上海。武汉三镇渐渐消逝在远方,瞿秋白半晌没有吭声。昔日游黄鹤楼时,他曾发遐想,黄鹤楼名存实亡了,革命胜利后,一定照原样整修重建。

同船的郑超麟这时走过来问:“新刊物什么时候出来?”

7月15日之后,《向导》停刊,瞿秋白几次和郑超麟商量恢复《向导》。最后中央决定在上海办一个新刊物《布尔塞维克》。这会儿见郑超麟问,瞿秋白说:“这件事说办就办,至少要在下个

月出创刊号。”

“能否请陈独秀写稿？”

“可以呀。”瞿秋白想陈独秀应该有个适合的工作，办刊物正用得上陈独秀的一技之长。

“老头子怕要你亲自去请。”郑超麟提醒道。

“问题不大，我再和维汉商量一下。”陈独秀被免职以后，并未消极，常给中央写信提些建议，所以瞿秋白有把握。不管怎么说，陈独秀对宣传马克思主义还是有贡献的。

到上海后，瞿秋白、李维汉去酱园弄看陈独秀。陈独秀是9月15日乘船往上海的，比瞿秋白早到几天。

瞿秋白对陈独秀说：“我刚到上海几天，中央决定重新办一个机关刊物，还请你常写文章。”瞿秋白和李维汉商量，陈独秀不去莫斯科，要慢慢来，目前请他写文章是一个好办法。白色恐怖下，急需制造革命舆论。

陈独秀正寂寞得慌，满口答应了，说：“写文章我很乐意，只是文章写不长。”

李维汉笑着说：“有话则长，无话则短，现在形势紧，写短文更适合。”

“《布尔塞维克》设有‘寸铁’栏，专发短文章。”瞿秋白看了一眼李维汉，点头说。

陈独秀隐蔽在家，无事就翻看当天的报纸，一边消闲，一边搜集写文章的材料。双十节时，《申报》刊出汪精卫讲话，说：“从共产党与腐化分子的夹攻中，悉力奋斗，为国民革命求一出路。”陈独秀一气写了《汪精卫的出路在哪里？》、《斯文扫地民众爬上来》、《蒋介石的进步真快呀！》三篇杂谈，考虑到安全和自己眼下的处境，陈独秀取笔名为“撒翁”。

瞿秋白将陈独秀的三篇短文刊在《布尔塞维克》10月24日出版的创刊号上。“撤”和“撇”相近，瞿秋白当然看出深谙文字学的陈独秀的用心。

因为有事干，陈独秀在《布尔塞维克》上一气发了140多篇杂文。《布尔塞维克》办到1928年2月27日第十九期停刊，陈独秀除少数几期没有写文章外，其余大部分都有他的文章。一次，陈乔年来看父亲说，你还是少写一点，免得被人笑话。4月底，瞿秋白去莫斯科筹备六大。他和陈独秀办《布尔塞维克》这段历史也告结束。

◎似为瞿秋白说句公道话

1928年4月30日，瞿秋白离沪起程，半个月后到达莫斯科，住郊区兹维尼果罗德镇附近的一座乡间别墅。一个月后，中共中央在这里举行了六大。

在大会上，瞿秋白代表上一届中央委员会作报告，说：“关于过去的事，或者国焘是对的，秋白对的，独秀对的，这些问题讨论起来是有意义的，但不能同我们目前任务相比。”

瞿秋白的报告讲了很长时间，其中一个部分讲过去的教训。代表们在讨论报告时，批评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也批评了瞿秋白的盲动主义错误。

张国焘说话时对瞿秋白很不客气，说：“你一个人讲了几个钟头，七七八八讲了一大堆。”

参加会议的有瞿秋白、周恩来、蔡和森、李立三、王若飞、项英、关向应、向忠发、邓中夏、苏兆征、张国焘等人。不少代表问

陈独秀为什么没有来参加？3月，共产国际决定在莫斯科召开中共六大，点名要陈独秀、彭述之、张国焘参加。

张国焘临行前去做陈独秀的工作，陈独秀表示不参加六大，也不再参加中共中央的领导工作，不去为自己辩护，不去批评别人。张国焘问到对六大的态度，陈独秀表示，如六大成绩不错，自己将不持反对态度。陈独秀分析第六次代表大会将改正瞿秋白这种明显的盲动错误。

对于陈独秀不来参加会议，瞿秋白解释说，我们和共产国际一直劝陈独秀来莫斯科，罗明那兹也是这个意见，但陈始终不肯。至于大革命失败责任问题，中共中央应负责，而不能透过于共产国际，还是要怪我们自己。是否责任由陈独秀一人负呢？大家说不应该，又说他应多负一点。他的思想是成体系的。在武汉，他有机会主义政策，妨害甚至出卖了工人阶级，这是不错的，但当时的中央政治局是和他共同负责的。现在，只能说他个人犯了错误。在政治上，机会主义应由政治局负责。

六大结束后，政治局委员瞿秋白任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其他成员有张国焘、邓中夏、余飞、王若飞。

11月初，斯大林约瞿秋白、张国焘谈中国革命问题。谈话中提到宋庆龄和陈独秀，斯大林担心六大上排斥在中央委员会之外的陈独秀会反对共产国际，问他们：“陈独秀是否能找到必需的钱和获得其他的条件来办一张报纸？”

张国焘说：“陈独秀办不起一张有力量的报。”

陈独秀自六大后开始消极，逐渐走上托派道路，以共产党内反对派自居。1929年中东路事件期间，陈独秀给中共中央去信，攻击六大路线和共产国际。11月15日，中共中央经共产国际批准，将其开除出党。

这件事在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中引起了争论。王若飞不主张开除陈独秀党籍。在六大上,王若飞就不同意把错误推在陈独秀一人身上,提出应有党中央集体负责。选举中央委员会时,王若飞坚持提名陈独秀当候选人。

在是否开除陈独秀党籍问题上,李立三、瞿秋白和王若飞不同,10月9日,瞿秋白写长文《反对陈独秀机会主义》,主张开除陈独秀党籍。

王若飞不同意立即开除陈独秀党籍,他主张应先与陈独秀进行辩论,并向党内群众进行解释。王若飞的建议受到共产国际和瞿秋白等的批评,并停止他参加中共中央代表团和农民国际的工作。

瞿秋白不能容忍陈独秀分裂党的言行,尽管此时瞿秋白自己已开始受到米夫、王明的打击,其三弟瞿景白在莫斯科因退出联共(布)而“失踪”,瞿秋白还是写了批判陈独秀的文章,在俄文刊物《中国问题》上发表。

陈独秀于1929年12月10日即被开除党籍后不到一个月,写了《告全党同志书》。陈独秀用这个题目时联想到八七会议通过的罗明那兹和瞿秋白起草的《中共八七会议告全党党员书》的题目。

写《告全党同志书》时,陈独秀没有看到瞿秋白在莫斯科写的批判他的文章,但看到了瞿秋白在六大上的报告。再说,六大将他一抹到底,已说明了一切。六大以后,只保留了他的党员身份和每月30元的津贴。所以他在公开信中说:“我不能有瞿秋白李立三那样的自信力,我深切的认识,任何个人任何党派,想免除机会主义的错误,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关于大革命失败的责任,陈独秀在六大前表示不为自己辩

护,也不批评别人。被开除党籍后,陈独秀转了180度大弯,既为自己辩解,也批评别人了。记得陈独秀在武汉时就提到退出国民党问题,那时瞿秋白赞成共产国际的意见,说:“宁可让国民党开除我们,不可由自己退出。”八七会议后,中央宣传革命失败原因,说是机会主义不接受共产国际训令。陈独秀分辩说,自己在许多事情上被迫接受国际训令,“所谓机会主义者是指谁?”

陈独秀对李立三的意见更大,他在信中附注说,李立三辈“对盲动主义的宣传也是这样,只是瞿秋白造成盲动主义的象征,好把他们自己除外”。这段文字又似在给瞿秋白说句公道话。

◎应有香如故

开除陈独秀党籍后,加上自己也受到打击,瞿秋白对陈独秀的评价逐渐宽容。他后来著文说,对于陈独秀在中国革命历史上的功过,应该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力求公允。陈独秀的作用在中国革命中始终是伟大的。至于过去,从五四运动的《新青年》杂志以来,陈对中国革命有很大的功绩。

遗憾的是,陈独秀没有机会看到瞿秋白对他的新的评价了。1935年2月24日,瞿秋白在福建长汀县牛庄岭附近被俘。

夜色蒙蒙,牢笼的昏暗的灯光笼罩着瞿秋白的愁思。晚风裹挟着寒意时时袭来,往事如潮,不断拂拭着瞿秋白的心。尽管他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但他坚信北上的红军会走出重围。他所为之奋斗的事业包孕着勃勃生机,必将横卷太空……

在《卜算子》一词中,瞿秋白预言:“信是明年春再来,应有香

如故。”

1935年6月18日，蒋介石密令将拒降的瞿秋白处死。

一代风流人物从常州走到北京，从北京走到俄乡（莫斯科），最终倒在福建长汀的中山公园，走完了37个春夏秋冬，为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此时另一位蒋介石的阶下囚陈独秀，正关在国民党金陵狱中，7年后在江津溘然去世。

时势造英雄。20世纪初是一个时代更迭、英雄辈出的时代，中国共产党的这两位早期领导人都经历了讨教经籍和以“性灵”相尚的过程，在友谊结合的无形训育中，不期而然地“名士化”；在顺应历史的潮流中，都为中国的早期革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尽管他们在中国革命的一系列问题上有过很深的矛盾和很尖锐的斗争，但他们也曾经有过很深的个人友谊和共同的悲剧般的历史命运。土地革命时期，他们都遭到了共产国际的批判，都遭到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通缉和迫害；“文革”中，他们分别作为“汉奸”或“叛徒”都遭到了彻底的否定；新的思想解放运动开始后，他们已经或正在得到实事求是的评价……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的悲壮的历史命运是和中国人民的历史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第七章

党团书记之间

——陈独秀与任弼时

◎上海外国语学社的任培国

任弼时初次见到陈独秀是1920年夏天。

冬季的一日，陈独秀到上海外国语学社附近的贝勒路的宿舍和青年团员交谈。8月中旬，陈独秀和俞秀松等人说：“上海共产党小组成立了，你们尽快将青年团组织起来。”22日，俞秀松、罗亦农等人在陈独秀家中成立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然后以个人名义承租渔阳里6号楼房一幢，作为活动场所。

青年团成立后，俞秀松主持团的工作，陈独秀、李达、李汉俊、陈望道等上海党小组发起人也参加团组织活动。第一批团

员有任弼时、肖劲光、任作民、王一飞、柯庆施、刘少奇、卜士奇、彭述之等人。

任弼时浓眉大眼，四方脸庞，未脱一脸的稚气。陈独秀见任弼时年少，问他：“任培国，不想家吗？”

出生在湖南湘阴县唐家桥新屋的任弼时这年刚16岁。夏末秋初，他经毛泽东、何叔衡等人组织的俄罗斯研究会介绍，与肖劲光、堂兄任作民等人来到上海，准备赴俄罗斯留学。到上海后，外国语学社安排他们住到这里。教俄语的是俄籍华人杨明斋及刚从哈尔滨俄文学校学习毕业来上海的王元龄女士。王元龄19岁，年龄与学生相当，大家当面叫王老师，背后叫王小姐。

任弼时在1919年读长沙郡中学时，就知道了陈独秀和《新青年》，因此对这位比自己长二十六七岁的前辈很尊重。见陈独秀笑眯眯问他，立即回答说：“现今社会存亡，全赖青年努力，才有大家幸福，先生也是这样说的。既然专心求学，只有自己努力，断无变更，因此不想家。”

陈独秀满意地点点头说：“好！好！”他低头看了看任弼时帮助校对的《劳动界》文章，问：“习惯吗？”

“学社帮我们租地方住，提供饭菜，我们都很感激呢。”任弼时望着陈独秀说。当时学生睡地铺，吃包饭，生活条件简陋。

陈独秀听任弼时讲一口湖南话，想到了毛泽东，说：“毛润之来信，谈到在长沙成立青年团的事，你们湖南很出人呢。”

“先生有空去长沙吗？”提到老家，初离家门的任弼时顿生思念之情。

“本来是准备去的，怕去不了，我已决定去广州了。”陈独秀说。

这次见面不久，即12月17日晨，陈独秀乘船去广州任广东

省教育委员长。

1921年初复任弼时、肖劲光、刘少奇、蒋光赤、曹靖华、吴葆萼六人结伴，作为第三批留学生前往莫斯科，入东方劳动者大学读书。

◎中国的布林斯基

1922年11月上旬，陈独秀到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四大，这是他第二次见到任弼时。

陈独秀在大会空隙，邀请刘仁静、瞿秋白一起到东方大学中国班看望留学生。东方大学在莫斯科市区特维斯卡娅大街15号，与《真理报》社对门，是一幢五层楼的楼房。

在中国班宿舍，陈独秀见到了任弼时。瞿秋白说：“布林斯基身体不大好，学俄语却很快。”任弼时到莫斯科，根据保密原则，取了一个俄国人名字。

“还行吗？”陈独秀问。

穿着苏联红军军大衣的任弼时比几年前成熟多了，因为营养跟不上，加上苏联天气冷，经常患感冒，脸色泛白。他说：“开始不行，现在好多了。”

晚上，刘少奇、罗亦农、任弼时、肖劲光、蒋光慈、彭述之、卜士奇、曹靖华、任作民、王一飞等中国学生将临时增发的食品凑在一起，招待陈独秀和中国代表团其他人。东方大学名誉校长是斯大林，陈独秀以及朝鲜、蒙古、日本、印度等国共产党负责人到莫斯科，学校视为过节，额外给学员增发半磅大米、一磅土豆、半磅咸猪肉。

陈独秀见大家吃得很香,问罗亦农:“平常有猪肉、大米吗?”

罗亦农说:“没有,偶尔发一点白面包,现在苏联经济很困难。”当时东方大学每天发给学员黑面包一磅半,菜很少,主菜是土豆,午饭、晚饭每人给一勺子土豆汤,有时是海藻、咸鱼熬的汤。

陈独秀点点头。

12月7日,陈独秀到东方大学召开党员会议,瞿秋白、卜士奇、罗亦农、李人俊等几个党员都来了。陈独秀拿出党的二大文件说:“我们已经决定和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其中一个目的是发展共产党。”

罗亦农在介绍旅莫党组织情况时,谈到任弼时:“任培国是中国班团支部执行委员,今年初作为共青团代表,参加了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现在是候补党员。”

大家讨论了一会,同意将任弼时转为正式党员,同时转为正式党员的有王一飞和彭述之两人。旅莫支部根据陈独秀的意见分组讨论二大文件,任弼时参加讨论党章和党的策略组。12月底,陈独秀和瞿秋白返回国内。临走前,被学校聘为翻译和助教的瞿秋白请任弼时代替自己,担任西方革命史课堂翻译。

◎上海大学俄语教师

1925年1月11日,中共中央在上海闸北区横浜路6号召开四大,约有20人参加了会议。在团中央工作的任弼时和团中央执行局其他成员轮流出席会议。这是他第一次出席陈独秀主持的党中央会议。

1924年夏天,李大钊、张太雷到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五大。他们带去陈独秀及中央局的意见,说:“国共合作后,大批共产党人参加了国民党工作,共产党组织和训练工作受到削弱,党的刊物也不能按期出版。”旅莫支部常委决定,派彭述之、陈延年、红鸿、任弼时、尹宽、郑超麟回国。

1924年8月底9月初,旅莫的同志到达上海,陈独秀与中央局执委商量,让陈延年去广州,那里是国民革命中心。彭述之写文章快,留下来协助身体不好的蔡和森编《向导》。任弼时俄文好,陈独秀还有印象,最后决定他去上海大学教俄语。该校由孙中山资助,瞿秋白任校教务长兼社会学系主任,邓中夏任教务长。

四大开了11天。会议期间,陈独秀和中央执委听取了任弼时的意见,少年共产党在政治上要绝对受党的指导。任弼时说:“不应当成立新且独立的群众民族革命统一青年团。”

回到国内不久,特别是在共青团三大上选为团中央组织部主任以后,任弼时越来越感到,在莫斯科学的东西是远远不够的。1925年1月底,住在上海成都路福康一间亭子间的任弼时给在莫斯科的罗亦农、王一飞写了一封信:对于陈独秀领导的党中央和出版刊物,自己在莫斯科学的东西多是玄空的理论,写的东西对于我们的出版物也不是十分需要。当时孙中山在北京病危,他担心孙中山逝世后,“则国民党亦恐免不了要分裂”。

陈独秀对任弼时的俄文很满意,为了纪念列宁逝世一周年,约任弼时为《新青年》翻译了列宁的文章《中国的战争》。

◎团中央总书记

五卅运动期间,团中央总书记张太雷已去广州,给鲍罗廷当翻译。在陈独秀主持的中共中央和团中央联席会议上,决定林育南任团中央总书记,林育南未到任前由团中央组织部主任任弼时任代理团中央书记。

现在,中央局书记陈独秀和穿着学生装的年轻的团中央书记任弼时经常见面了。一次,任弼时一边啃大饼一边看报,陈独秀说:“想不到布林斯基不仅会写文章,还会画画。”五卅运动时,中共上海地委出特刊,任弼时画了不少讽刺漫画。当时为了安全,任弼时签发团中央通告,仍然署俄文名字。

“画得不好,小时候喜欢画。”

“不错,不错,现在派上用场了。”陈独秀对任弼时的讽刺画十分赞赏。任弼时写的《上海“五卅”惨案及中国青年的责任》也使陈独秀很满意,和自己写的《上海大屠杀与中国民族自由运动》相呼应。

共青团在五卅运动期间有了大的发展,配合党中央完成了空前规模的反帝斗争。7月21日,陈独秀同意团中央重新分工,任弼时任总书记。

五卅运动后,直系军阀孙传芳大肆搜捕共产党,上海的党团中央机关执委被迫隐蔽。任弼时请示党组织后,决定回长沙将未婚妻陈琮英接来组成家庭,便于隐蔽。自1920年夏离家后,任弼时已有六年未回家了。1924年底,父亲任裕道因病去世,刚从莫斯科回沪的任弼时因筹备共青团三大,未能奔丧,成了一

件憾事。

1926年2月10日,是农历腊月二十八日,任弼时买好船票,准备离沪回长沙,这时接到党中央通知,要他去北京出席中央特别会议。

堂兄任作民回国后,留在陈独秀身边任秘书。他对任弼时说:“陈独秀失踪了,张国焘从广州参加国民党‘二大’回来,一直和陈先生联系不上。”

任弼时大吃一惊,知道北京特别会议所以特别,与陈独秀失踪有关,只好放弃探亲。“陈先生最后一次见到你是什么时候?”当时在上海的瞿秋白、周恩来都分地隐蔽,中央执委之间通过助手联络,秘书任作民应该知道陈独秀的行踪。

“上月下旬,陈独秀告诉我几天不来办公,以后就没有再见到他。”

见任弼时沉默不语,任作民问:“不能回去了?”

“嗯。只能这样。”

1926年2月21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特别会议,即接到陈独秀从上海拍来的电报,说已经能扶病视事,大家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会议便集中讨论冯玉祥下野后北方出现的逆转形势。在会上,任弼时和李大钊、陈延年、谭平山、瞿秋白一样,主张发动群众斗争,支持国民党,挽留冯玉祥。

3月中旬,从北京回沪的任弼时见到了未婚妻陈琮英,大喜过望。原来在北京开会期间,任弼时请回湖南的王一飞去看看,如方便,顺便将陈琮英接来。

上过自治职业学校的陈琮英刚到上海,有很浓的湖南泥土气息,与旅莫四年的任弼时有些反差。任弼时乐呵呵的,认为这样倒好,便于掩护工作,传递情报。

4月，他们在—间亭子间式的寓室举行了简单的婚礼仪式，陈琼英正式成了党的交通员。

◎这样下去，会出事的

1926年夏天，北伐开始后，陈独秀于7月7日发表《论国民政府之北伐》，认为北伐时机尚未成熟，北伐只是“讨伐北洋军阀的一种军事行动，而不能代表中国民族革命之全部意义”。

见到登载此文的《向导》，任弼时浓眉紧锁，心中很不是滋味。半年来，接二连三发生了一些事情，使人不能不忧心。

春天，毛泽东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交《向导》彭述之，因为强调农民运动，实际上批评了陈独秀1923年12月发表的《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强调国民党力量的观点，陈独秀、彭述之不同意《向导》刊载。任弼时作为团中央总书记，他作主在《中国青年》上刊登了毛泽东的文章。这也是他第一次抵制陈独秀的错误。

中山舰事件后，陈独秀担心蒋介石走极端，影响国共统一合作，采取了退让政策。结果，5月发生了“整理党务案”，任弼时生气地说：“这样下去，会出事的！”

陈独秀反对北伐的文章发表后，约一个星期，陈独秀召开了四届三中扩大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任弼时对陈独秀的新的认识形成了：他怕国民革命军过早分化，怕资产阶级离开民众，怕引起蒋介石对我们的怀疑和不安，已是安心投降资产阶级，是十足的机会主义的见解。

任弼时在会上说，应当在军队中创造我们的力量，纵使蒋介

石将来反动,我们还可以争取一部分武装的兵士群众。

陈独秀否认了团中央的意见,认为在国民党的军队中不仅要禁止发展团的组织,也要禁止发展党的组织。

1926年10月底,在广州的任弼时接到通知,去莫斯科参加青年共产国际第六次执委会。他便乘“列宁号”邮轮经沪去莫斯科。妻子陈琼英随船前往,同船的还有去东方大学学习的广东团委的饶卫华、谭平山的妹妹谭竹仙等人。

这次去莫,推迟了任弼时与陈独秀的冲突。半年后,任弼时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回到国内,他对陈独秀的积怨终于抑制不住地爆发了。

◎当选中央委员

1927年4月,任弼时携陈琼英到上海时,正是上海最黑暗的时期,许多共产党人人头落地。任弼时迅速找到李求实、刘昌群等人了解情况,随即离开上海到达武汉。

在武昌都府堤41号,任弼时见到了毛泽东。因领导湖南农民运动,加上白色恐怖,毛泽东人瘦多了,但仍很有精神。他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小册子递给任弼时,说:仲甫、彭述之不让在《向导》上刊出,我在《民国日报》上刊了一部分,秋白把它印成了小册子。陈独秀路线出了毛病,秋白已提出党内有病,要求根治。

任弼时迅速地翻阅这本小册子,然后说:“我完全同意你的观点。”

4月27日至5月9日,中共中央在武昌高等师范第一附属

小学和市郊黄坡会馆举行五大。除了牺牲的同志及在上海与敌人周旋的周恩来、陈延年、赵世炎等领导人外，党的著名活动家都来了。

陈独秀主持了这次会议。会里会外，他从来未受到过如此次会议这样的抵制。80多人参加会议，有38人签名要求发言，而且都是批评他和彭述之的。只是批评彭述之是公开的、不留情的，批评他是间接的、含蓄的。

瞿秋白写了四万字的小册子，批评陈独秀路线；蔡和森、恽代英等人也激烈地批判了陈独秀的错误。

任弼时在大会上的发言引人注目。他说，陈独秀的政治路线是错误的，是自动放弃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对国民党不敢批评，处处退让，是毫无独立的阶级政策。陈独秀赞成“到西北去”的主张，是投降主义、逃跑主义。

五大闭幕后第二天，第一次被选为中央委员的任弼时在武昌第一小学礼堂主持召开了共青团四大，贯彻党的五大精神，批判陈独秀的错误。在这次大会上，24岁的任弼时再次当选为团中央总书记。

◎真理最终会胜利的

夏斗寅、许克祥叛变后，武汉形势恶化。1927年6月9日，中央举行政治局会议，讨论对汪精卫的态度。

罗易因将共产国际5月紧急指示拿给汪精卫看，自知不妙，态度上转了180度大弯，提出立即执行共产国际指示，讨伐朱培德，在北伐军凯旋回汉时实行总罢工。

五大后任中共中央代理秘书长的蔡和森赞成说：“今后我们的任务不是退让而是进攻。”

天气很热，任弼时穿着白色衬衫，拿着折扇，他吸了几口烟说：“我建议党中央发表宣言，揭破汪精卫假左派的面目，和他摊牌。”

谭平山有些担心，说：“我们没有力量和国民党决裂。”

陈独秀犹豫不决，说：“革命现阶段的问题，既不是退却也不是进攻。如果我们退却了，那就意味着我们失败；但如果我们只是进攻，这可能会使我们失败。”

任弼时望了一眼蔡和森，转向仍然对汪精卫抱有幻想的陈独秀问：“那到底取什么方针呢？”

“既然当前的形势是复杂的，那么我们必须有一种复杂的政策来对付，而不是简单地退却或简单地进攻。”陈独秀含含糊糊地说。到底是进攻还是退却，任弼时听不出来，看来老头子自己也不清楚。

6月下旬，任弼时起草了一份团中央致党中央的《政治意见书》，然后托人带信到汉口，请陈独秀出席团中央会议。当时传言何键要发动“武汉的马日事变”，团中央等一些中央机关搬到武昌，那里有叶挺的部队，相对安全些。

陈独秀和秘书黄文容隐居在汉口。任弼时弟弟任卓名、妹妹任秀兰也和陈独秀一起工作。接到任弼时来信后，陈独秀下午和黄文容一道过江去武昌。

共青团机关是一幢二楼二底的民房。陈独秀穿着长衫，摇着折扇进了团中央的门，任弼时请他们在厢房中坐。陈独秀近来情绪不好，进来后话也不多。他知道任弼时对自己有意见，便问：“团中央开什么会？”

任弼时拿出《政治意见书》递给陈独秀，说：“我们给党中央提了几点意见，请你来就是讨论这件事，大家在楼上等你。”

陈独秀接过《政治意见书》，一边摇扇子一边看，看了一会，脸色就变了，扇子也不摇了。《政治意见书》上有一句话，是质问的口气，问为什么党中央隐瞒斯大林的指示。

看到这句话，陈独秀再也坐不住了，他收起折扇站起来，在房间打转转，说：“你们晓得什么？我现在还是党中央的书记，究竟是党领导团呢还是团领导党？”陈独秀越说越生气，最后一把将《政治意见书》撕了。

陈独秀生气是预料之中的事，但任弼时没有料到老头子会大动肝火。任弼时想，请陈独秀来，不是他个人的意见，是团中央的意见，大家还在等陈独秀开会，便说：“当然是党领导团，我们请你来，就是当面听你的意见。”

陈独秀在年轻人面前发火，已是失态，任弼时这样说，他也再无话说，便随任弼时到楼上开会。大家见陈独秀光火，都沉默不语，等任弼时先讲话。

任弼时知道陈独秀听不进他们的建议，但事已至此，牺牲了那么多同志，李大钊、肖楚女、赵世炎等人牺牲了，许多同志被捕了，革命面临着惨痛的失败，再妥协退让，就没有退路了。想到这里，任弼时镇定了一下情绪说：“今天我们请总书记来，听听我们给中央写的意见书。我先将意见书读一下，然后再请同志们发言。”

听着任弼时读《政治意见书》，陈独秀心中有如翻江倒海，一点也听不进去。共产国际指示一方面叫通过推动国民革命与汪精卫合作对付蒋介石，一方面叫武装工农作为武汉政府可靠的近卫军。现在汪精卫反共在即，共产国际指示已难以执行，国际

代表之间意见也不一致。任弼时这班年轻人一旦提出责问,他确实难以回答。想到这里,陈独秀猝然起身,气呼呼地拂袖而去。

会是开不下去了,大家面面相觑。黄文容和任弼时的弟弟、妹妹是同事,他看了一眼任弼时,也没有办法,只好随陈独秀回汉口。

在路上,陈独秀还在埋怨任弼时,说:“我在会上讲过,不要自由行动,他们还在自由行动。”

陈独秀走后,团中央的同志十分生气。老头子把事情弄糟了,脾气还这么倔,家长制惯了。任弼时说:“既然已开了头,就一不做,二不休了。”他决定以书面形式报告党中央。

天空积着淡淡的云翳,太阳隐在后面,任弼时望着陈独秀远去的背影说:“真理最终会胜利的。”

◎面对面的斗争

6月30日晚,中共中央在武昌秘密办公处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鲍罗廷、陈独秀、张国焘、瞿秋白、蔡和森、周恩来等人参加了会议。中心议题是讨论陈独秀、鲍罗廷支持起草的国共两党决议“十一条政纲”。

陈独秀讲话之后,瞿秋白作了一些说明。这时送来一份文件,陈独秀漫不经心地翻了一下,见是任弼时起草的《政治意见书》,生气地说:“按他们的意见,只会给汪精卫制造借口。”说着又将《政治意见书》撕碎丢在地上。

陈独秀想以让步的方式拉住国民党,或许汪精卫国民党不

会叛变或推迟叛变。他当然听不进任弼时的关于进攻和土地革命的意见。

蔡和森反对“十一条政纲”，认为是让步政策之总结。经过争论，鲍罗廷、陈独秀的意见还是占了上风，政纲勉强通过了。

7月4日，陈独秀主持召开中共中央常委扩大会议，在武汉的中央委员、党的活动分子、国际代表、少共国际代表都参加了，任弼时也参加了会议。

谈到将来，陈独秀说：“对于将来，我们有三条道路：（一）脱离国民党并执行独立的政策。（二）实行退却，以便留在国民党内。（三）执行自己的政策，但留在国民党内。”

任弼时赞成第一种方法，他发言时仍然要求宣读共青团的《政治意见书》。

陈独秀说：“第一种方法是不正确的。青年团没有权利提出政治决议案。”会议像冷水进了热锅，出现一片嘈杂声。

任弼时也不示弱，他瞧了一眼坐在身边的青年团国际代表说：“青年团国际的这位代表可以说一说，青年团是否有这种权利。”

看得出，任弼时为争取在大会上宣读《政治意见书》，事前已和这位青年团共产国际代表讨论过。陈独秀正在气头上，见比乔年还小的任弼时在这么多人面前顶撞他，愣了一下，威信扫地的不满一下涌上心头。他想，拿青年团国际代表来压我么？我还是共产国际执委在华干事呢。但说话时，他改变了口气：“青年团的国际代表不应当参与，他在这里是客人，他不应当进行干预。”说完他朝鲍罗廷看了看。

鲍罗廷向陈独秀点了点头。

蔡和森、毛泽东等人都觉得老头子过分了，发言批评这种做

法。陈独秀只好自找台阶,说:“这个不包括在议事日程之内。”

会议于是又重新转入正题。陈独秀镇定了一下情绪,极力用平缓的语气说:“国民革命军招兵时,农民协会会员和自卫武装可以应征加入。”

蔡和森主张上山独立干,实际和任弼时一样,赞成第一种方案;采取共产党独立的政策。毛泽东支持蔡和森的意见,说:“不保存武力,将来一到事变,我们即无办法。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

再问到陈独秀,陈独秀心烦意乱,也同意上山。后来陈独秀才知道,就在这天,陈延年在上海被杀害了。他似乎找到了莫名烦躁的依据。

7月12日,即汪精卫分共前三天,陈独秀离开了中共中央总书记的位置。7月4日的争论成为任弼时和陈独秀最后一次正面斗争,此后两人各奔东西,再未见面。

◎老头子可去莫斯科

1927年8月7日是个星期天,党中央在汉口三教街41号一位俄国侨民的寓所里举行紧急会议。瞿秋白、李维汉、张国焘、苏兆征、毛泽东、蔡和森、李达、罗亦农、项英、向忠发、张太雷、卢福坦、顾顺章、王荷波、彭湃、邓中夏、彭公达、任弼时等20人参加了会议。新来的国际代表罗明那兹出席了会议。邓小平作为中共中央秘书,列席了会议。

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率领南昌起义被打散的部队在临川休整,没有出席会议。

临时中央常委张国焘想邀请陈独秀参加,因为陈独秀仍然是中央委员,人又在武昌,没有道理不来,但罗明那兹反对。

会议议程包括批判陈独秀错误,选举新的中央领导机构。临时中央常委有两人不在场,只有张国焘、李维汉、张太雷到会,会议便由李维汉主持。他说:“今天的会议为紧急讨论会。此会虽无权改组中央,但有权选举临时中央局。”

批判陈独秀错误路线时,在毛泽东、蔡和森、李达、罗亦农发言后,任弼时作了系统发言。这以前,任弼时采用当面、书面、会议三种方式向陈独秀提意见,都遭到了拒绝。

任弼时在罗明那兹传达共产国际指示后说:“共产国际对中央的批评,主要是中国共产党有机会主义的倾向。这完全是事实,其原因是……党无土地革命的决心,并造出一个理论说土地革命是很长很远的过程,不知这是目前的行动纲领。党不但无土地革命的决心并且还有与国民党组织土地委员会来解决土地问题的幻想。党无土地革命决心,未明白要土地革命才能引革命于新时期。”

说到这里,任弼时朝土地委员会委员毛泽东看了看。刚才毛泽东说,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人、农民,必须做统一战线的主人,必须没收地主土地,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听到任弼时强调土地革命,毛泽东连连点头。任弼时这里说的“党”,不用说明,大家都知道是指陈独秀。

任弼时喝了几口开水,开始讲第三个问题,说:“党怕群众……因此党处处迁就小资产阶级,使党失了独立的作用。”

关于组织问题,任弼时说:“现在党要改变过去的错误原则,要实行,非有新的领导机关不可,并须吸引下级做实际工作的工人同志来作领导。”任弼时提到工人同志作领导,是因为罗明那

兹带来莫斯科的意见：由于知识分子的动摇性，必须加强中共领导层工人阶级成分。

“老头子可去莫斯科。”对于陈独秀的去留，代表们也考虑到了。任弼时认为，陈独秀离职后不宜留在国内，宁汉都在通缉他；但他又不能继续在党内任领导，因此去莫斯科总结教训是最好的选择了。

选举政治局委员时，任弼时得 14 票，第一次当选为政治局委员。由于罗明那兹强调工人成分，工人出身的苏兆征、向忠发得满票 20 票。政治局委员又选举出瞿秋白、李维汉、苏兆征 3 人为政治局常委。

◎在历史的转折关头

1929 年 8 月 5 日，陈独秀给中央写信，指责六大以来的路线是“盲动主义和命令主义”。8 月 13 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中国党内反对派问题》的决议，号召各级党组织开会讨论，并须有决议回答，须将其活动的领袖毫不留情地开除出去。

任弼时没有参加六大，但仍当选为中央委员。1928 年 10 月他在安徽南陵县被捕，直到次年 3 月才放出。出狱后任弼时负责江苏省委工作。

8 月 22 日，任弼时在江苏省委联席会议上说：“对持有错误观点的人应该采取教育的方法，如果不觉悟，坚持错误，制造派别活动，对其中的领袖分子可以作进一步的解决。”

9 月 10 日，彭述之和恽代英在江苏省委会议上发生争论，彭述之为陈独秀的托派活动辩护；10 月 15 日，马玉夫在报馆支

部大会上攻击六大路线,当时任弼时也在场。江苏省委在听取任弼时向省委常委会议汇报后,作出了开除彭述之、汪泽凯、马玉夫、蔡振德党籍的决议。

1929年11月17日,即中央政治局作出开除陈独秀党籍的第三天,任弼时第二次被捕了。一个月后,12月25日,任弼时被中央特科营救出上海提篮桥监狱。

一年后,即1931年1月7日,在上海公共租界麦特赫斯脱路一幢西式楼房里,37人参加的六届四中全会正在秘密举行,继周恩来发言之后,作为5人主席团成员的任弼时说:“立三路线实质是托洛茨基主义、盲动主义及陈独秀的机会主义之混合物。”任弼时对陈独秀机会主义危害性的印象是太深了,他一刻没有忘记这次斗争的教训。

随着八一南昌起义的枪声和八七会议的召开,任弼时和陈独秀在历史转折关头的那场著名的斗争已见分晓,真理终于胜利。党团书记之间的个人交往、友谊及分歧也随着两人的先后去世而成为历史。但年轻的团中央总书记为着真理而斗争的精神却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书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多年来为人们所传颂……

第八章

总书记与大总统参议

——陈独秀与林伯渠

◎与君携手共芳辰

1920年12月上旬的一天,温暖的冬日阳光下,一位大个子客人仰头看了看渔阳里2号门楣上青砖砌成的A字形图案,确信是陈独秀的寓所后,便“咚咚咚”敲响了紧闭的木门。一阵风吹过,落尽树叶的枯枝发出“飒飒飒”的响声,仿佛是欢迎这位不速之客的到来。这位客人就是林伯渠。

“我叫林祖涵,是守常推荐我来找你的。”林伯渠是湖南临沅人,因位于湘西北,讲话带有湖北口音。说着,他从淡黄色的哗叽中山服口袋中拿出李大钊写的信递给了陈独秀。

“欢迎欢迎！”陈独秀忙请客人坐下，连声叫高君曼为客人沏茶。读完李大钊的信，陈独秀脸露喜色。李大钊在信中说，祖涵是老同盟会员，现在是孙中山大元帅参议，希望陈独秀和他本人作林伯渠的入党介绍人。

“早就听守常说你，好像他还给你寄过《新青年》？”陈独秀兴致很浓地点了一支烟。

“寄过。先生的大名，也是守常寄来《新青年》后知道的。”林伯渠像个军人一样挺胸坐着，讲话和气谦逊，年龄比陈独秀小六七岁，显得老成稳健。

“你和守常什么时候认识的？”陈独秀笑着问。

“民国四年春节前，我在日本参加乙卯学会，守常发起中华学会，那时我们就认识了。后来两个学会合并为神州学会时，守常任评议长，我任干事部干事，那时我们成了最好的朋友。”林伯渠的话音里充满了对李大钊的尊敬。

“守常交的朋友总是不差的，听说你们还结拜为兄弟？”陈独秀说。

“是这样。”林伯渠点了一下头。

“那年夏天我也在东京，帮行严编《甲寅》，认识了守常。”他示意林伯渠喝茶，因为说话投机，客厅里洋溢着令人愉快的气氛。

林伯渠伸手扶了一下眼镜，感叹地说：“那时我们身在咫尺，可惜失之交臂。”他是1904年春天第一次到日本留学的。

“好在我们还是到一起来了。”

“是啊。”林伯渠点点头。

“我们的组织刚刚成立，特别需要发展好的党员，你是孙先生身边多年的同志，能加入我们的共产党，这说明我们的事业是

有希望的。”说了一会闲话，陈独秀切入了正题。上海、北京共产党小组成立后，陈独秀希望加快吸收新党员的进度，守常介绍林伯渠入党，正是求之不得的。

“我常常苦恼，从同盟会成立到民国成立后十年中，我们受了这么多的挫折，流了这么多的血，政局澄清总是遥遥无期。从守常寄来的杂志中，我得到启示，欧美式议会政治不能完成这个任务，俄国十月革命能够成功，主要是靠无产阶级。”

林伯渠侃侃而谈，两眼放射出兴奋的光芒。记得1918年春天，李大钊在给他的信中谈到了十月革命的情况。林伯渠当时正在苦闷中，读完后，像阴云裂开了缝隙，透进了希望的阳光，他由衷地感到了冬去春回的喜悦。在1918年春写的《林衡道中》里，林伯渠表达了当时的愉悦心境：

春光作态已媚人，路引平沙履迹新。
垂柳如腰欲曼舞，碧桃有晕似轻颦。
恰从现象能摸底，免入歧途须趑行。
待到百花齐放日，与君携手共芳辰。

“去年夏天，谭延闿逼走程潜，接着我的堂兄林修梅也被挤出湘南，我的苦闷更强烈了。”林伯渠接着说。

“有你这些思想，足可加入共产党。”听到林伯渠一番诚恳交谈，陈独秀彻底打消了先前的顾虑。对于孙中山的追随者，陈独秀在日本即有一种成见，有好评的并不多。

林伯渠见陈独秀有兴趣，大有相见恨晚之感，说：“去年我在湘南驻军，曾和林修梅商量把湘南护法起义的军队变成俄国式的红军呢。”

“哦，林修梅也有这个意思？”陈独秀关切地问。

“他经常在我这里拿社会主义宣传品看，赞成俄国十月革命。谭延闿逼我们走，这就成了幻想了。”

“反动势力现在还很强大，我们要做的事还很多。你来得正好，陈炯明近日催我去广州搞教育，你怎么看？”

“好啊！孙先生叫我在上海开辟工作，但我在广州的时间更多，陈先生到广州搞教育，广东的社会主义宣传一定会发展得快些。”听说陈独秀要去广州，林伯渠高兴地说。

陈独秀点头说：“我也这么想。我走后，上海的工作由陈望道、李达、李汉俊负责，改日我们在一起讨论一下《共产党宣言》和共产国际的几个文件。你也来一下。”

“我还不是党员。”林伯渠提醒道。

“不要紧。你和守常熟悉，就由我和守常介绍你入党。我的意见，你若加入后，做一个秘密党员作用会更大些。”陈独秀说着注意了一下林伯渠的神色。

林伯渠似有准备，立即说：“我也这样想。”1905年林伯渠就由黄兴、宋教仁介绍加入了中国同盟会。1914年夏天，林伯渠参加中华革命党时，曾打手膜宣誓，其中有“服从命令”，“誓共生死”。林伯渠很佩服孙中山，认为他是中华民族杰出的代表，是世界上少有的伟人。现时中国革命力量弱小，敌人强大，必须联合孙中山代表的民族民主革命力量。但如果孙中山知道他现在加入了别的党，会怎么想呢？

陈独秀建议林伯渠做秘密党员，也是吸取戴季陶的教训。几个月前，戴季陶就以曾宣誓效忠孙中山为由，拒绝参加共产党。

说了一会话，陈独秀笑着问：“你的家是在水边吧？你的名

字都沾水：祖涵，伯渠。”林伯渠笑了一下，说：“小时候家父请瞎子给我算命，说我命中缺水。”

“难怪了。湖南是不缺水的，可见瞎子是瞎扯。”陈独秀说。两人哈哈大笑。

送林伯渠出门时，陈独秀问：“住在哪里？”

“和钟宽民住在霞飞路一家糖果店阁楼上。你来不方便，还是我来你这里。”林伯渠说，那儿是国民党的一个掩护机关。

“好，好。”陈独秀连声说。林伯渠既然作为一个秘密党员，还是不去的好。“生活还好吧？”陈独秀关心地问。

“还好，还好。”林伯渠忙说。其实，他的生活很艰苦，平时只买些大饼、油条或馒头等充饥，偶尔买一点雪里蕻咸菜泡饭。

◎ 运筹合作

1922年4月底，陈独秀、达林、张国焘、蔡和森赶到广州，参加第一次劳动大会和团中央一大，瞿秋白、张太雷已先期到达这里。

开干部会时，陈独秀请林伯渠也来参加。1921年夏天，孙中山在广州任中华民国非常大总统，林伯渠也回到广州工作。陈独秀建议林伯渠兼一点广州共产党小组的工作，林伯渠便做了广东共青团财政部审计股股长。这个工作不出头露面，适合隐蔽他的身份。

陈独秀向达林介绍林伯渠说：“祖涵是国民党中的共产党员，他的意见有特别的意义。”

“啊，早就听说了，欢迎你来。”听了张太雷的翻译，达林忙伸

手和林伯渠握手，林伯渠伸出左手，连忙又换了右手，他习惯用左手。达林是少共国际代表，马林去苏联汇报工作去了。1921年底，马林在张太雷陪同下，拜访了孙中山。事前，陈独秀向马林推荐了孙中山身边的林伯渠。李大钊也给林伯渠写了信。

林伯渠四方脸堂，头发后梳，戴着眼镜，蓄着长长的胡髭。他坐在湖南老乡蔡和森身边，挺胸拔背地坐着，比蔡和森高出半个头。

达林将马林建议作了一点修改，希望陈独秀等人接受，提出在保持共产党独立性的条件下，整个组织加入国民党。

大家发言时，多数反对达林提议。陈独秀建议休息，第二天再接着讨论。

散会后，陈独秀和林伯渠闲谈。自1921年9月陈独秀离开广州回上海任中央局书记后，两人已有半年未见面了。

“上次马林到桂林，和孙中山怎么谈的？”陈独秀对于马林见到孙中山以后，积极主张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感到纳闷，尽管张太雷及马林本人向他谈过他们见面的情况，陈独秀还想听听林伯渠的意见。马林拜见孙中山时，作为介绍人，林伯渠也在场。

马林、张太雷到桂林住了9天，与孙中山见了几次面，都是林伯渠约见的，他说：“马林对孙先生评价很高，称他是中国的民族英雄。但他对孙先生目前的方法不赞同。”

陈独秀打断了林伯渠的话，急忙问：“马林怎么说？”

“他直言说孙先生，你这个方法不行。”

陈独秀点点头，示意林伯渠往下说。

“马林给孙先生提出一个建议，说你应该有一个很好的、有纪律的、由各革命阶级各阶层联合的党。”

“嗯，孙先生怎么看？”

“孙先生很赞成这样做。”林伯渠说。

“哦？”

“马林建议开设军官学校，培养革命的军官干部。”林伯渠停顿了一下，看着陈独秀说，“从孙先生和马林谈话情况看，孙先生很高兴与马林交谈。”

陈独秀沉默了一会，说：“现在陈炯明与孙先生已公开对抗，你怎么看？”3月下旬，陈炯明乘北伐军过湘计划受阻之机，杀害了粤军第一师师长邓铿，与孙中山的矛盾公开化。一个月后，孙中山免去其广东省省长、粤军总司令、内务部长等职，仅保留其陆军部长职务，陈炯明当即退居惠州。

“以我之见，孙先生反军阀是坚决的，陈炯明拥兵自重，是不能与孙先生相提并论的。”林伯渠倾向孙中山的态度很坚决。

陈独秀表示赞成，问：“孙先生能否和劳动大会代表见面？”

“我把仲甫的意见告诉孙先生，因为是全国第一次劳动大会，我想孙先生会来的。他来了讲些什么呢？”

“要讲的话很多，赵恒惕是湖南省长，他杀害工人领袖黄爱、庞人铨。孙总统应该有个表态。此外，他也可以对劳动大会的代表提出希望。”陈独秀解释说。

5月1日，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开幕，陈独秀发表《劳动节由来与意义》演讲后，林伯渠告诉他，孙先生明天接见大会代表，并作简短讲话。

会议期间，陈炯明托秘书黄居素到广州，请陈独秀去惠州谈谈。当时孙中山正在派人做陈炯明的工作，请他回广州参加北伐。陈独秀想此行无大碍，加上旧情未断，自己1921年离开广州，人家还是极力挽留的，这样想着，便在陈公博陪同下去惠州。回来后，陈独秀和林伯渠说：“陈炯明难以与孙先生弥合，粤军警

备森严,久之怕有兵变。”

林伯渠点头,忧虑地说:“孙总统也有此担心,已成心腹之患。”

5月下旬,陈独秀离粤回沪。

◎入党:秘密的与公开的

1922年8月下旬,根据刚结束的西湖会议精神,李大钊、陈独秀准备拜见孙中山,谈谈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参加国民党、实现国共合作。

李大钊是因陈独秀被法租界逮捕,赶到上海来参与营救活动的。陈独秀8月9日被捕,就在同一天,南雄失守,孙中山不得不承认反击陈炯明叛乱失败,乘英国炮舰“摩轩号”离粤经港到沪。林伯渠此时也到了上海。

陈独秀约林伯渠到自己新居法租界环龙路铭德里2号和李大钊见面。两位老朋友已有很久未见了,这次在沪相见格外高兴。谈到西湖会议情况,李大钊说:“仲甫对孙先生入党方式打手膜有不同看法。我打算向孙先生建议,改进国民党的一些方法,你有什么看法?”

林伯渠赞成说:“孙先生组织中华革命党,提出宣誓和打手膜,当时克祥、兆铭是反对的,我和仲恺带头按了手膜。现在时过境迁,倘若向孙先生提出改进国民党,这一点都不愿改进,怎么改进一个党呢?”

陈独秀望了一眼李大钊,笑着点点头。他是向来反对国民党这些带封建色彩的入党仪式的,当年他不参加同盟会,就有这

方面的原因。西湖会议上,自己差一点为此事与马林再次闹翻脸,幸亏守常等人从中调停。

“陈炯明也是按手膜宣誓效忠孙中山的人,不还是叛变了吗?”林伯渠说着苦笑了一下。

“从上次马林和孙先生谈话看,孙先生虽然赞同马林建议,但并未采取具体步骤。这次请守常去谈,孙先生态度会怎样呢?”陈独秀想起初夏和林伯渠在广州的那次谈话。

林伯渠立即说:“现在和孙先生谈两党合作是最佳时机。孙先生离粤赴沪时说,今日中国之外交,以国土邻接,关系密切言之,则莫如苏维埃俄罗斯。”

“哦。”陈独秀看了一眼李大钊,满意地点点头。李大钊说:“现在和孙先生谈合作,的确正是时候。”

和陈独秀、李大钊交谈后,林伯渠直接去了孙中山寓所。在宋庆龄眼里,林伯渠是他们家最受欢迎的客人之一。打过招呼后,林伯渠直接上楼到孙中山的图书室。孙先生和家中人说,他和客人在图书室交谈时,其他人未得邀请,不能进入。

此刻孙中山避住上海,十分郁闷,很欢迎和各方人士交谈,以组织力量讨伐叛逆。听林伯渠说共产党领袖李大钊、陈独秀要见他,商讨加入国民党问题,如沉闷的夏日吹来一阵清风,脸露喜色地说:“好呀,你去安排一下时间,我随时欢迎他们来。”

林伯渠发现,孙先生好长时间没有这样露过笑脸了。

林伯渠、张继多次参加孙中山与李大钊、陈独秀等人会谈。孙中山急于寻找新的同盟军,每次谈话畅谈不倦,几达忘食地步。李大钊因赶回北京,由孙中山主盟,先加入了国民党。这次孙中山接受了陈独秀代表共产党提出的意见,取消了打手膜等仪式。对于孙中山来说,只要能振兴国民党,原来定下的框框条

条都是可以改变的。

其后陈独秀、张国焘也以个人身份加入了国民党。陈独秀和林伯渠开玩笑说：“我和守常介绍你入共产党，现在是你把我们介绍到国民党里来了。”

林伯渠也笑，说：“我加入共产党是秘密的，你们加入国民党是公开的，怕大不同呢。”

林伯渠引荐陈独秀、李大钊加入国民党后，更受到孙中山的倚重，1923年初委以国民党总务部副部长重任。

此后不久，林伯渠又介绍张太雷、夏曦、刘少奇、彭湃等人加入了国民党。

1923年2月下旬，孙中山在陈炯明兵败后抵达广州就任大元帅，林伯渠也到了广州。这期间陈独秀参加共产国际四大去了，回国不久决定将中央机关由北京迁到广州。不久前，即1月23日，孙中山以总理名义任命廖仲恺、陈独秀等21人为参议，陈独秀到广州身兼两职。他和林伯渠见面的机会更多了。

◎妥协退让的后果

陈独秀、李大钊等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后，林伯渠的共产党员身份同时公开化了。二七惨案发生时，林伯渠正在汉口。当时一家刊物说，二七京汉路之役，林在汉口颇出力，在施洋被捕前一小时，他还在施洋寓所。

由于林伯渠在国共两党之间斡旋得力，在1924年1月广州国民党“一大”上，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不久被孙中山指定为第一任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部长。

1926年中山舰事件后,5月15日,蒋介石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提出“整理党务案”,其中有共产党员不得担任各部部长职务。林伯渠参加了这次会议,由于陈独秀、张国焘等人及共产国际代表的妥协退让,左派力量在国民党“二大”上受到削弱,蒋介石削弱共产党的提案在大会上被通过。

当时任国民党部长的共产党员仅有组织部长谭平山、代理宣传部长毛泽东、农民部长林伯渠。5月28日,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常委会议照准谭平山、林祖涵、毛泽东三同志辞职。

在上海的陈独秀就此写了《给蒋介石的一封信》和《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说:“贵党‘整理党务案’原本关系贵党内部,无论如何决定,他党均无权赞否,凡为贵党党员者,当然有遵守之义务,而于党外之团体,则殊无所关涉。”

林伯渠对陈独秀、张国焘等人采取妥协退让政策使左派受挫,一想起来就感到痛心。此时见蒋介石阴谋得逞,林伯渠心中又蒙上了一层阴影。

陈独秀知道党内多数同志愤愤不平,提出了“包而不办,退而不出”八字政策。林伯渠便到程潜任军长的国民革命军第六军任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

陈独秀当时认为北伐时机不成熟,导致中共广东省委将林伯渠多建几个师的主张否定了。第六军北伐时兵力只有3000余人。和毛泽东、瞿秋白等同志一样,林伯渠越来越感到,陈独秀的妥协方针是错误的。

◎密议组建工农军

1926年7月,北伐军正式出师,林伯渠随第六军行动,于中秋节前夕在一、三、四军配合下攻克南昌。1927年3月24日,第六军和第二军配合,攻下南京。蒋介石知道第六军是林伯渠等共产党人控制的军队,一直想消灭它,以消除心头隐患。当时林伯渠任军委秘书长。蒋介石趁程潜、林伯渠不在南京之机,将这支军队骗上火车,然后予以解散。

4月26日是个晴天,早餐后,武汉的林伯渠约谭平山去陈独秀寓所谈话。月初陈独秀和汪精卫发表联合宣言后,即一同乘船到汉口。初十那天林伯渠在谭平山寓所见过汪精卫,当时蒋介石还未解散第六军。

谭平山说:“正好,我和仲甫去参加土地委员会会议。”土地委员会委员有邓演达、谭平山、顾孟余、毛泽东。

见到陈独秀,林伯渠说:“下午去长沙,来打个招呼。”

陈独秀10号到武汉,林伯渠因参加总理纪念周,处理第六军解散事宜等,一直没有机会和陈独秀单独谈谈。林伯渠当时除了任国民党军委秘书长外,在上月末九江二届三中全会上又担任政治委员。谭平山任政治主席团委员、国民政府委员。根据“整理党务案”,他们没再任部长,只有汪精卫外出时其组织部长职务由吴玉章代理。

“去几天?”陈独秀问。陈独秀穿着西装,看上去很疲倦,一个月里明显衰老了。

“下午渡江,两三天就回来。”林伯渠说。

“湖南农民运动有过火的地方，昨天我们决定请夏曦回湖南取缔过火行动，你去长沙看看也好。”陈独秀说着，朝满脸胡须的谭平山看了看。

谭平山点点头，说：“汪兆铭、唐生智质问仲甫群众污辱其家属事件。老鲍也主张以后群众运动要听国民党的命令和指挥。”

林伯渠打算下午走前把军委会的一些文件处理掉，说：“你们去开会，我回来再谈。”便匆匆告辞了。

5月27日，天气闷热，晚上，陈独秀应主人之约到汉口紫阳里52号林伯渠寓所。林伯渠上午开军委会，下午4时半又开了扩大会，只有晚上有时间。一个星期前，许克祥在长沙叛变，有很多事要单独和仲甫谈谈。

“让你跑路了。”陈独秀进屋后，林伯渠为他泡了一杯茶。

“没事。”陈独秀坐在靠椅上，仰头叹了一口气。“平山、老鲍去长沙，也不知情况怎样了。”头一天，国民党中央派谭平山、鲍罗廷去湖南查办许克祥。

“许克祥在湖南杀的都是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现在形势更加严重，你要有准备。”林伯渠忧虑地说。他请陈独秀来，想交换一下意见。

陈独秀接过林伯渠递来的香烟，停了半晌没有擦火柴。他也知道形势很坏，不久前，他已搬出中央机关61号，和秘书隐居起来。夏斗寅、许克祥相继叛变，武汉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

“你对和森提出的‘两湖决议案’怎么看？”蔡和森认为解决许克祥，要靠农民群众自己。提出发展农民军队五万以上，甚至提出推翻代表土豪劣绅的国民党中央。

犹豫了一下，林伯渠点头说：“共产党日前很困难，要反蒋就少不了武装。蒋介石解散第六军，我和程潜都感到有责任，这是

一个大教训。和森的发展军队计划,我在去年北伐前就提过建议。”

提到程潜,陈独秀眼睛一亮,问:“如果把第六军培养成中央工农军,程潜会同意吗?”蒋介石解散六军后,国民党中央决定重组第六军。

“这事怕要你当面和程潜谈。”林伯渠和程潜两人私交甚笃,而且有亲戚关系,林伯渠三弟林祖烈的妻子是程潜的女儿程博莲。但改变军队性质,非同小可,程潜是什么态度,林伯渠也没有把握。

1927年6月1日,共产国际“紧急指示”传到中国,其中有动员两万共产党员和五万工农革命军组成军队的内容。陈独秀和鲍罗廷认为,武汉形势不允许执行这个文件。

约在汪精卫分共前夕,一天在林伯渠家中,陈独秀提到上次谈到的话题,说:“能不能约程潜谈谈?”

林伯渠也感到这是最后的机会了,说:“好,我请李世璋找一个僻静地方,然后再约你。”李世璋是在1925年北京孙中山先生的追悼会上认识林伯渠的,1926年组建第六军,林伯渠任他为政治部秘书,重组第六军后,任军政治部代主任。

李世璋找来找去,最后还是认为汉口友谊街第六军办事处安全些。安排陈独秀与程潜见面那天,李世璋和林伯渠点点头,便退到外面布置警戒去了。

林伯渠已告知陈独秀来意,程潜先听陈独秀提具体想法,陈独秀说:“如将六军培养成工农军,须将六军中下层干部送海参崴培训。”

程潜说:“你的意见呢?”他知道林伯渠已有考虑。

林伯渠说:“做政治工作的人比较适合。”

“那就让李世璋去。”程潜说。

这个方案因汪精卫分共，陈独秀被免职而未能实施。此后林伯渠参加南昌起义，陈独秀隐居上海，两人再未见面。

◎ 倔脾气断送前程

抗战爆发后，由于林伯渠和国民党的特殊关系，被党中央派为谈判代表。1937年9月6日，林伯渠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约在8月底，林伯渠任刚刚改编为八路军的驻西安办事处党代表。

9月上旬，西安后宰门旁边的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来了两位南京客人，林伯渠想了一下才认出是罗汉和李侠公。

经过长征，林伯渠头发胡子几乎全白了，但身体很硬朗。罗汉见到林伯渠，拿出了叶剑英、李克农开的介绍信。

林伯渠看完介绍信，眯着眼笑了：“你还好吧？”罗汉在北伐时任四军政治部主任，打南昌时四军、六军曾配合过，因此彼此很熟悉。

提到过去的事，罗汉叹了一口气，将他和陈独秀组织托派，及陈独秀出狱后想回延安的事说了一遍。

提到陈独秀，林伯渠陷入了对往事的回忆，说：“和仲甫一晃有十年未见面了，他在文化史上有不可磨灭的功绩，在党的历史上，有过比别人不同的地位。”说到这里，林伯渠皱了皱眉头，说，“只是仲甫脾气太倔。”

罗汉听后问：“依林主席看，陈先生想回延安，能让他去么？”罗汉这次长途跋涉到西安，是因为陈独秀能回延安，他也能回延

安了。

“仲甫能否回延安,关键在他自己,倘能放弃某些成见,回到一条战线上来工作,于民族于社会都是极需要的。”林伯渠不久前随周恩来、秦邦宪在庐山和蒋介石、张冲、邵力子谈判,既然能和蒋介石一道抗日,当然也能和陈独秀一道抗日。

罗汉知道,林伯渠讲“某些成见”,是讲他们的托派活动。1929年他们因此被开除党籍,他担心的也是这个。“仲甫与党中央有过争论,我担心延安不让他回去。”罗汉吞吞吐吐地说。他希望林伯渠给他吃一粒定心丸。直到现在,他的一颗心还高高地悬着。林伯渠摇了摇头,说:“仲甫曾经站在时代前头,我希望他站在大时代的前面,过去的一切是是非非都无需再费笔墨唇舌去争辩。”

“听林主席这样一说,我就放心了。”罗汉绷紧的脸慢慢放松了些,偶尔露出笑容。“现在山洪爆发,我一时去不了延安,你看……”

林伯渠沉思了一下,说:“此事非同一般,须党中央拿意见,我即给延安拍电报,请示中央,你稍住几天。”

七贤庄以前是外国人经营的旅馆,有几座西式庭院,既宽敞又安静,罗汉便和李侠公住了下来,耐心等候延安回电。

林伯渠给延安拍电报的大意是:仲甫等已出狱,愿意回到党的领导下工作。弟意中央为集中整个力量着眼,可联合他们回党工作。

几天后,约在9月10日,毛泽东和当时中共中央总负责张闻天联名回电西安七贤庄林伯渠,让他转告罗汉党对陈独秀等托派分子的几条原则:

一、公开放弃并坚决反对托派的全部理论和行动,并公开声

明同托派组织脱离关系,承认自己过去加入托派之错误。

二、公开表示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三、在实际行动中表示这种拥护的诚意。

罗汉看了中共中央的电报,心情很沉重,说:“陈独秀的脾气和为人我是深知的,叫他悔过,十分困难。”

林伯渠叫罗汉劝劝陈独秀,说:“仲甫要回延安,须先实现这三个条件,你再多做做工作。若飞也希望仲甫回到党内来工作。”几天前,王若飞由太原到西安,也和林伯渠、罗汉谈到陈独秀的事。

见到中共中央电报后,罗汉感到不虚此行。事情总有了一个着落,虽没有明确同意仲甫去延安,但也没有完全拒绝,将来怎么发展,关键是仲甫自己了。这样想着,罗汉便打道回宁。他想尽快见到陈独秀,将这个不知是喜是忧的消息告诉他。不巧的是,抵达南京时,陈独秀刚去了武汉。

罗汉在傅家岗见到了博古、叶剑英。博古希望陈独秀和已去武汉的董必武谈谈,并说恩来不久将去武汉,也可以和陈独秀谈。

罗汉在南京没有多停留,心神不定地赶到武汉,在双柏庙后街26号找到了陈独秀。罗汉一边擦汗,一边把自己和林伯渠的谈话及前前后后的事说了一遍。原希望陈独秀接受毛泽东提出的三个条件,不料陈独秀说:“我愿意写声明,但不愿意写书面检讨。”后来他对上门做工作的董必武说:“回党工作固我所愿,唯书面检讨,碍难从命。”

不久,王明、康生从苏联回国,讲陈独秀是汉奸,彻底断了陈独秀去延安的念头。林伯渠为争取陈独秀回到党内的努力也付诸东流。

解放后，林伯渠因种种原因很少提到自己的入党介绍人陈独秀，但对他的另一位入党介绍人李大钊却难以忘怀。1958年，他在《题李大钊同志文集》时，赋诗表达了自己的感情：

登高一呼群山应，
从此神州不陆沉。
大智若愚能解惑，
微言如闪电传真。
特抒政理合南北，
未许主张混浊清。
尽要胸中无限事，
敢抛热血护新生。

第九章

同流不合污

——陈独秀与张国焘

◎最初的印象

陈独秀对张国焘的最初印象，是1919年9月16日他从狱中保释出来的那天。那一天，北大同学会为陈独秀出狱召开了一个欢迎会，作为北大学生会干事之一，张国焘在致欢迎辞时说：“我代表北大同学，热烈欢迎陈先生光荣出狱，并对陈先生在狱中所受的迫害表示深切的慰问。”张国焘是6月2日被捕的北大同学之一。

张国焘二十二三岁，江西萍乡上栗人。陈独秀见他方方脸盘，鼻梁眉阔，话虽不多，却很得体，对这位北大理学院的学生印

象不坏。

刚出狱的陈独秀作了简短的答辞,说:“此后无论是否在北大工作,都将和同学们一道,与恶势力作斗争。”

在陈独秀看来,作为北大学生会负责人,张国焘更像是文科学生。后来和邓中夏等人交谈,对张国焘有了更多的了解。1919年1月,北大学生邓中夏、黄日葵、高尚德、许德珩等人组织国民杂志社,张国焘也参加了,并与傅斯年、罗家伦等《新潮》社的人来往密切,所以也是《新青年》同人的外围力量。

“张特立怎么学了理科?”有一次,陈独秀问邓中夏。张国焘已表示要参加邓中夏组织的“曦园”。

邓中夏说:“1916年秋,他投考了北大理科,一直在预科班,今年才转入本科。他打算下学期转读哲学。”

1920年暑假,张国焘到上海法租界霞飞路渔阳里2号拜访陈独秀。他这次来上海,一则受学联之托和刘清扬到南洋去募捐,再则受李大钊委托,来上海了解一下上海发起组织共产党的情况。

张国焘来后,陈独秀留他住在自己家的楼下,和李达住在一起,自己和夫人高君曼住楼上。

张国焘和李达性格不一样,喜欢交际应酬,有时很晚才回来。高君曼以为他谈恋爱去了。有一天晚上,高君曼见他又回来晚了,开玩笑说:“张先生是轧马路去了吧?”

张国焘红了脸,连忙摇头,说:“哪里,哪里。”他确实没有去轧马路,不过心里已对刘清扬有了这个意思,刘清扬似乎没有看中他。

陈独秀仍旧很忙,除了编《新青年》,还到处和人谈话,研究成立共产主义小组的事。张国焘发现,陈先生尽管很忙,每天生

活很有规律,忙中不乱,井井有条。他上午写作,中午尽可能休息一会,下午应酬来人或出门参加各种社会活动,晚上再接着作文章。

“陈先生真是精力过人。”一次张国焘和陈独秀闲谈时佩服地说。

“完全是逼出来的。事情做不完,每天都有约稿,自己还有刊物,稍一懒惰,就欠债了。”陈独秀摇着芭蕉扇说。他感到人虽然累一点,但很充实,心情一舒畅,精力也就旺盛了。

8月中旬的一个晚上,维金斯基和杨明斋来访。张国焘见维金斯基是外国人,便知趣地走到李达房间去。“外面来了两个人,你认识吗?”张国焘轻声问埋头写作的李达。

杨明斋以前来过,李达走到门口看了一眼,说:“一位是共产国际代表,一位是俄籍华人,都是从苏俄来的。”

张国焘听说是共产国际代表,知道和发起组织共产党有关。大约是李大钊推荐来的俄国客人吧?这样想着,张国焘便将藤椅移到门边,听他们谈话。陈独秀正在谈俞秀松、罗亦农等人成立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事。

维金斯基、杨明斋走后,陈独秀兴趣正浓,他对张国焘说:“你回北京后,和守常、申府尽快把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立起来。”

张国焘情绪十分高涨,说:“我还不是共产党。”

“不要紧,李先生会考虑的。”

张国焘表示一回北京就和邓初、罗章龙、高尚德谈谈,先把北京的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起来。

1920年8月底,张国焘赶回北大上课。不久,张申府去上海接罗素,也和陈独秀谈到在北京建立党小组的事。9月下旬,

张申府和李大钊商量在北大建立共产主义小组,打算吸收刘清扬、张国焘为党员。吸收张国焘入党时,他二话没说,高兴地答应了。刘清扬却犹豫不决。

李大钊说:“此事勉强不得。”张申府不再劝刘清扬。刘清扬是天津巾幗领袖,张申府对她印象不坏,后来两人一起去法国,终成眷属。

◎一大前后

1921年夏天,张国焘加入共产党北京小组后不久,北京小组发生了一些变化,张申府出国去了,新发展了高君宇、刘仁静、邓中夏、罗章龙等北大学生。

6月初,李达从上海来信,要北京小组推荐两人出席上海的共产党一大。张国焘、刘仁静、罗章龙、李梅羹、邓中夏在西城租的一间房子里开会,讨论谁去上海参加会议。李大钊正忙于主持北大教师索薪工作,几天前在总统府被打伤,不能去了;邓中夏也说有事不能去,罗章龙当时往返于长辛店、南口之间,最后确定张国焘和刘仁静去。刘仁静赴南京参加少年中国会,正好去上海。

张国焘到上海后,见在广州的陈独秀没有消息,忙给陈独秀写信说,北京、上海、武汉、湖南、山东的代表来了一部分,有的在路上,唯有广东代表没有消息。

陈独秀在这以前已接到李大钊、李达来的信,这会见张国焘又来信催,急忙和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包惠僧等人商量,最后决定陈公博、包惠僧出席上海的会议。

包惠僧希望陈独秀去,说:“李先生不去,你再不去,会怎么开呢?”

陈独秀说:“没有关系,我写一封信给你带去,我要说的话,上面都说清楚了。”陈独秀在信中提出了四条意见:“一曰培植党员;二曰民权主义之指导;三曰纪律;四曰慎重进行征服群众政权问题。”

7月23日,共产党一大在上海召开。会议临时主席张国焘在开场白中代表北京共产主义小组作报告。他说:“同志们,北京共产主义组织仅仅是在十个月以前才产生。此外,加入这个年轻的组织的,只是为数不多的知识分子,他们多半缺乏革命经验,由于时局本身的变化,我们整个活动遇到了不少困难,所以,我们的工作成果是微不足道的。”

讨论党的基本任务和原则时,大会发生了分歧。

讨论到培植党员一条,大家感到党员不应担任政府官吏和议会会员。碍于陈独秀正担任政府教育委员长,写党纲时,加了句“已取得本党同意者除外”。

陈独秀提到民权主义之指导,是针对李汉俊的“地方分权”制有自由主义倾向来的,他主张集权。最后大家参照布尔什维克党,采取民主集中制的指导原则。陈独秀提出“纪律”一条,大会修改为遵守严格的组织纪律。

陈独秀提到“慎重进行征服群众政权问题”,代表们说有些含糊不清。大会则明确为“领导工人农民士兵进行社会革命,武装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废除资本家私有制,直到消灭阶级,实现共产主义”。

选举中央领导机关时,《新青年》主编陈独秀、东道主上海发起组的李达及一大临时主持人北京发起组的张国焘组成中央

局。陈独秀任总书记，张国焘管组织，李达管宣传，主编《共产党》月刊。

李汉俊在一大上落选，这一方面是陈独秀对李汉俊有意见，另一方面张国焘也压制李汉俊，说他的讲话“对资产阶级妥协，有改良主义的倾向”。张国焘对陈公博说：“李汉俊是有问题的，他的主张不是列宁理论，而是考茨基理论，他是黄色的，不是红色的，我们在他家内开会，他似乎有些恐慌。他愈恐慌，我们偏要在他那里开会。”按原计划，一大要经常更换开会地点，其中之一是安排在李汉俊家。

一大结束后，张国焘写了一封信，请包惠僧带给陈独秀。张国焘对包说：“一大情况我都写在上面了，党员不能做政府的官吏，代表的意见和共产国际代表的意见你都听到了，你尽量劝陈先生来上海。周佛海急着去日本，也希望陈先生早一点回来。”当时因陈独秀未到任，临时请周佛海任代理书记。

包惠僧连忙答应了。

等陈独秀回沪期间，按一大分工分管组织的张国焘想做点实际工作，他和李启汉、李震瀛等人商量，在北成都路设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一大以前，李启汉在沪西小沙渡办了“劳动补习学校”，此时又和李震瀛在叉袋角办了“工人夜校”。

一个月后，即1921年9月中旬，陈独秀和包惠僧到沪。张国焘谈到劳动组合书记部十几个人应发给薪金时，陈独秀不高兴了，他说：“这不是‘雇佣革命’么？中国革命一切要我们负责的，所有党员都应无报酬的为党服务，这是我们所要坚持的立场。”

陈独秀对此事生气，与李汉俊、马林也有关。李汉俊曾写信给在广州的陈独秀希望在《新青年》社中拨点钱给上海小组用，

陈独秀没有同意。李汉俊骂陈私心太重。陈独秀到上海后，去见了马林一面，发现马林高高在上，很不满意。而张国焘常用半生不熟的英语和马林交谈劳动组合书记部的事，并说党内有争论，要请马林过目后再作决定，陈独秀听了很不高兴。

其实李达、马林对张国焘的组织工作也不满。李达发现张国焘像个少爷，坐在办公室，一个星期接触不了两三个工人，一个多月来，一个工会也没有成立。马林对张国焘有好感，他将工作进展缓慢归咎于青红帮干扰和共产党组织的非法性。

◎陈家遇险

10月4日傍晚，张国焘神色不安地来到辅德里周佛海家。“你听说了吗？陈先生家出事了。”一进门张国焘就对周佛海说。

周佛海说：“知道了，陈望道刚才来说，陈先生夫妇、明斋、庆施、惠僧被巡捕房抓去了。”接着他将中午自己和扬明斋、柯庆施在陈独秀家陪高君曼打麻将，陈独秀在楼上休息，中间包惠僧来替了自己的情况说了一遍。

张国焘说：“难怪了。巡捕房的人什么时候来的？”

“我走后一会儿。”

这时，杨淑慧端上茶水，叫张国焘坐下慢慢说。

张国焘接着说：“晚饭后我去陈先生家，我从后门进，一个陌生大汉问我找谁。那样子一看就不是好人。我知道出事了，忙说：‘找陈太太。’那大汉问：‘找陈太太做什么？’我断定他是巡捕房的人，说‘收裁缝工钱’。那大汉对我上下打量了一番，说：‘你为什么不说上海话？’我说：‘我的老板是湖南人，我们在上海开

裁缝店’，我顺口问了一家裁缝店。那大汉又打量了我一番，说陈太太不在家，就把后门关上了。我就赶紧到你家来了。”说到这里，张国焘又补了一句：“还好，没有被他们扣住，真是万幸。”

“我刚才去陈先生家，也受到了盘问。”周佛海说。他下午从陈独秀家出来，和杨小姐去了法国公园，以后又去马林家。马林请他带封信给陈独秀，周佛海再去陈独秀家，已出过事了。“幸亏他们没有搜身，要是他们查出马林的信，那就惨了。”

“真的很危险。”听说周佛海身上有马林的信，刚搜过身的张国焘吃了一惊。

“现在怎么办呢？”周佛海问。

张国焘很相信马林，说：“我去马林那儿，请他想想办法。”租界抓人，外国人出面担保会更好。尽管陈独秀回上海后和马林一直闹别扭，但此时已顾不得了。”

马林很热心，出钱请了巴和律师。张国焘无钱，又不认得人，干着急，回到北成都路劳动组合书记部写了一张传单，介绍陈独秀生平，说陈独秀出了研究室就进牢房，出了牢房又进研究室，想到处散发。

从北京赶到上海的张太雷听到后，对李达等人说，这些传单还是不印的好，这样做是抱薪救火。

10月26日，在孙中山、马林等人的营救下，巡捕房将陈独秀释放。

陈独秀在家候审期间，张国焘前往苏俄出席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临行前，张国焘和陈独秀商量，请李启汉负责劳动组合书记部工作。

◎观点相左

1922年4月底,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到广州参加第一次劳动大会和共青团一大。广州会议的另一个话题,是讨论马林关于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建议。

张国焘是3月赶到上海汇报赴苏开会情况的。在莫斯科,列宁和张国焘谈到国民党和共产党是否可以合作的话题。陈独秀听说列宁强调国共合作,点了点头,说:“总觉得国民党有很多毛病,如注重上层,勾结土匪,投机取巧,易于妥协,内部分子复杂,明争暗斗等。”

在张国焘去莫斯科开会期间,马林在张太雷陪同下去了一趟桂林,回来后更坚信和孙中山的国民党联合是必要的。陈独秀同意联合,但在怎样合作上仍和马林有分歧。马林提出共产党加入国民党,陈独秀说:“先不忙着作决定,可以听听各区的意见。”

马林没有出席广州会议。为了得到共产国际的支持,这时回莫斯科汇报工作去了。马林不在,少共国际派代表达林出席共青团一大。

在陈独秀召集的干部会上,张国焘不同意加入国民党,说:“与国民党搞联合,我持保留态度。国民党是小资产阶级,共产党是无产阶级,那不成了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搞联合了吗?小资产阶级有很多消极性。”

陈独秀觉得张国焘走得太远,说:“我个人同意结成统一战线,但与国民党的关系,我主张党外的联合。”

张国焘不再吭声。

达林的态度比马林缓和了一点,加了一个前提,提出在保持共产党的政治独立性的条件下,整个组织加入国民党。他说:“我对陈先生党外联合的主张,保留个人意见。”

会议开不下去了,陈独秀说以后再讨论。散会后,陈独秀提笔给维金斯基写信,希望得到他的支持。

◎ 搞宗派初露端倪

张国焘从广州开会回上海后,去了一趟北京。

当时胡适公开谈论政治,并和蔡元培、李大钊等人发表“好人政府”主张。为了这件事,陈独秀大伤了一番脑筋。中央局的同志都不同意“好人政府”主张,但李大钊是党内同志,胡适、蔡元培又是陈独秀的老朋友,所以陈独秀请张国焘带上《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去北京作解释。张国焘是北大的学生,叫他去比较适合。

从北京回上海后,张国焘和陈独秀、蔡和森组成二大宣言起草委员会。当时张国焘、蔡和森在许多问题上看法不一致,蔡和森主张重建孙中山的广东革命政府,张国焘说:“在这样英日势力威压之下,如何能组织一个自由活动的革命政府,完成他为自由和独立而革命的任务呢?”宣言经过几次讨论,接受了蔡和森提出的许多修改意见,最后才定下了草案。

1922年7月13日,中共二大在上海成都路一所房子举行。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李达、高君宇、王尽美、向警予、施存统等12人参加了会议。

张国焘在二大之前进行小组织活动,引起党内许多同志不满和批评。对此,李达认识最深刻。在小组会上讨论时,张国焘也参加了,但他一言不发。李达到大会上介绍本组讨论情况时,张国焘首先发言批评。李达气不过,质问他:“昨天在小组会讨论时你为什么 not 提出你的意见,要留到今天才发挥?”李达认为这不是正派人所为。

张国焘说:“昨天没有仔细想到。”

李大钊对张国焘的派别活动也有看法。一大后,张国焘回到北京,将和他意见一致的人召集在一起开会。刘仁静也参加了会议。这个消息传出后,舆论大哗,说张国焘搞小组织,李大钊也反对张国焘这样做。

但陈独秀仍然信任张国焘,请他在大会上作报告,介绍参加远东大会情况和一大后工人运动情况及广州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的情况,所以选举时,张国焘又当选为中央局组织部长。

李达在会上受到张国焘的批评,选举时没有进入中央局。

是否加入国民党,二大仍没有形成决议。这时马林从苏俄带回共产国际的新训令,要共产党加入国民党。8月20日,根据马林建议,新中央执委在杭州西湖召开会议,专门讨论共产党加入国民党事。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国焘、高君宇及马林、张太雷参加了会议。

张国焘说:“党内联合,混合了阶级组织,会牵制我们独立的政治。”在张国焘看来,中国革命不是依靠资产阶级,也不是依靠工人、农民,而是依靠知识分子。“在素来缺乏政治活动的中国人民中间,那极少数的知识阶级是最彻底最有革命精神的部分,占政治上的重要地位。”

蔡和森不同意张国焘完全否定资产阶级的作用,说:“我主

张建立共产党和国民党的联合战线。”

陈独秀也认为张国焘走得太远，说：“不能因为国民党内包容了一些非资产阶级分子，便否认它的资产阶级的基本性质。”

马林提出要反对党内可能存在的政治派别倾向，他的矛头也是指向张国焘的。

会上争论十分激烈，因为马林以共产国际训令为由，坚持党内合作，陈独秀胳膊扭不过大腿，提出改变加入国民党的方式、改组国民党等，有条件地接受了马林的建议。

西湖会议结束后，李大钊、陈独秀去见孙中山。张国焘根据会议决定，到北京、武汉、长沙等地传达二大和西湖会议精神。

◎临阵脱逃

1923年1月下旬，张国焘以中央代表身份，到郑州参加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武汉、北京的劳动组合书记部的负责人罗章龙、史文彬、吴雨铭、陈潭秋、项英、林育南、李震瀛等人已到郑州。

几天前，吴佩孚突然下令禁止开会。1月31日夜里，京汉铁路总工会中共党团组织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按原计划第二天开工会成立大会。

2月1日，郑州普乐园大会会场气氛紧张，全副武装的警察包围了会场，混乱中，警察从工人手中夺走了“京汉铁路总工会”的牌子。

张国焘见郑州全城戒严，心里发慌，提出“为避免流血起见，总工会的成立仪式和全体大会可以改时改地举行，现在不必坚

持”。但此建议未被通过。在“劳动阶级胜利万岁”的口号声中，京汉铁路总工会宣告成立。

当天下午，军警捣毁工会驻地，占领工会会址。

2月4日，京汉铁路全线实行总罢工。罢工指挥机关由郑州移到江岸，领导成员有总工会委员长杨德甫、秘书李震瀛、法律顾问施洋、江岸分会委员长林祥谦、秘书项英。

2月7日下午，吴佩孚下令包围江岸总工会机关，枪杀工人30多人，伤200多人，施洋、林祥谦牺牲。这天早上，长辛店工人区也遭袭击，死30多人。

张国焘在军警包围江岸总工会前五分钟，躲入汉口法租界大智门熊秉坤家。当晚，张国焘、项英等人开会，经过争论，决定复工。

第二天夜里，张国焘匆匆离开汉口，绕开京汉线经南京赶到北京，向陈独秀和中央局汇报惨案经过。

陈独秀刚从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四大回国，因为事关重大，他请张国焘去一趟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

中国革命陷入低潮后，陈独秀对张国焘的能力和在党内的威信开始怀疑，两人的关系也陷入低谷。

◎栽了个大筋斗

陈独秀第一次点名批评张国焘，是在1923年6月12日中共中央三大上。陈独秀说：“张国焘同志，无疑地是忠于党的，但是思想非常狭隘，所以犯了很多的错误，他在党内组织小集团，是一个大错误。”

陈独秀讲张国焘搞小组织是有依据的。还在一大时,张国焘压制李汉俊,结果一大上李汉俊落选。二大时,张国焘又搞了李达,结果李达也落选了。

陈望道对张国焘也不满。1922年春,张国焘把李达、李汉俊、陈望道等人列为“消极分子”,并组织“活动分子”对付消极分子。

陈独秀点张国焘的名,还因为张国焘直接反对马林和自己。二大后,张国焘在小组会上反对共产党加入国民党事,陈独秀不听则已,一听火冒三丈,气得要向党中央辞职,说张国焘是建立另一个中心。

当时马林也劝张国焘改变反对陈独秀的倾向,不久,张国焘又因此和马林发生了顶撞。马林狠狠地讽刺他:“你的职工运动现在在哪里?吴佩孚已经把你的职工运动打垮了。”

尽管张国焘在西湖会议上同意陈独秀有条件、有限度地加入国民党政策,但思想上始终没有接受,内心里只主张国共两党形成联合战线。

马林提出职工运动只能到国民党工人部去做,陈独秀同意说:“中国无产阶级在数量上质量上都非常少,党又不能公开,故我们要做工人运动只有加入国民党,集中势力于国民党。”陈独秀、马林的观点是冲着张国焘来的。张国焘的思想也有反复,最后提出可以参加,但至少产业工人要留在外面。他认为,产业工人是共产党的基础,只有工人阶级才是革命的,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都是不革命的。要工人加入国民党,这是取消共产党的主张。

三大经过讨论,否定了张国焘的不加入国民党的意见,但也并没有接受马林、陈独秀“一切工作归国民党”的主张,强调加入国

民党,但仍旧保存和渐渐扩大党的组织。张国焘因二七惨案、宗派活动以及反对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政策,三大选举时落选。

三大后,张国焘参加了国民党“一大”,不久到北京全国铁路总工会任总干事。他感到自己“栽了个大筋斗”。后来他回忆这个时期时说:“我的人生观和革命观就在这种过程中逐渐起了变化。”

◎叛变

1925年1月11日,中共中央在上海闸北区横浜路6号召开四大。没有出席会议的张国焘意外地当选为中央局执委,当上了工农部主任。

对于张国焘重新进中央局,陈独秀经过了一番认真考虑。在三大上,陈独秀批评张国焘搞小组织,张国焘不服气,在一次小组会上,张国焘逼陈独秀表态,陈独秀说:“没有什么小组织,但张国焘有错误,以后不准再说什么小组织问题。”后来在1924年5月三届三中会议上,中央局在报告中说:“中央局现敢保证所谓小组织的结论,确已无此事实,今后同志间绝不可妄启猜疑,致碍党之进行。”

陈独秀转变对张国焘的看法,还在于张国焘接受了国共党内合作的主张。国民党“一大”前,张国焘在《新青年》上甚至提出极愿与无政府党合作,共同担负中国革命之事业。在国民党“一大”上,本来反对加入国民党的张国焘当上了国民党中央候补执委,用事实表明对国共党内合作的支持。

另一件使陈独秀转变对张国焘态度的事,是1924年5月

21日,张国焘在北京东四腊库胡同16号杏坛学社内和新婚妻子杨子烈一同被捕。上海《申报》1924年5月28日刊出张国焘在被捕后,每日遭拷打三四次之多,直到去年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张国焘才出狱。

陈独秀哪里知道,张国焘在狱中已叛变,并出卖了同志。

1924年5月13日,湖北督军派军警在汉口德润里23号和刘芬律师事务所逮捕了许日昊、刘芬、杨德甫等人。杨德甫是京汉铁路总工会委员长,叛变后供出张国焘在北京的地址。京师警察厅顺藤摸瓜在后门铁匠营21号逮捕了彭子均、李风林,在腊库胡同逮捕了张国焘、杨子烈。

陈独秀和中共中央开展了抗议运动,在《向导》周报发表抗议文章,并策动众议员李国珍等19人致函内务部总长,要求开释张国焘。

陈独秀化名“实庵”多次给张国焘去信,他担心京师警察会搜出党的文件和自己的信。他没有想到张国焘经不住拷打,叛变后交出北京共产党负责人和骨干名单:李大钊、张昆弟、黄日葵、李骏、范体仁、高君宇、刘仁静、范鸿劼、朱务善、陈佩兰、缪伯英等。同时交出全国铁路党员领导、工人项德隆、李震瀛等71人名单,包括全国铁路总工会委员长孙云鹏。

张国焘被捕后,北京风云突变。李大钊被迫避往昌黎五峰山,孙云鹏、范体仁等人被捕,另有40多人被捕或被通缉、开除。被通缉的人中有陈独秀、李大钊、谭平山、高君宇等。

军警包围东四腊库胡同16号时,住在门房和厨房之间的一间小房里的高君宇知道不妙,见敌人进院后直奔后房,马上将机密文件揉浸在脸盆里,然后倒入痰盂。此时敌人还在全力搜捕上房,机警的高君宇化妆成上街买菜的厨师,躲过了敌人的盘

查。脱险后，他在铁路工人的掩护下，乘火车离开北京。

张国焘老婆杨子烈在狱中向敌人讨饶，说：“我的丈夫张国焘因受人之愚迷而研究这种邪学说，而得像现在这种结果，我既是他的妻子是脱不了干系的。”张国焘叛变后，由死刑改为监禁，杨子烈和张国焘一起捡了一条命。

陈独秀只知道自己被通缉，并不知道张国焘已叛变并出卖了同志。加上孙中山北上后，刚出狱的张国焘工作特别卖力，所以顺顺当当选张国焘进中央局。

全国解放后，张国焘叛变革命的事实大白于天下，遗憾的是，当时的当事人——陈独秀及许多中国共产党四大代表早已作古了。

◎右倾投降政策的代表

1925年冬天，国民党“二大”将在广州举行。自孙中山去世后，这一年发生了刺杀廖仲恺和“西山会议”事件，国共合作出现了严重不利的势头。陈独秀决定派张国焘去广州任党团主席，贯彻中央局维护国共合作的意图。

不久前，陈独秀、张国焘、瞿秋白与孙科、叶楚傖、邵元冲作过一次交谈。陈独秀认为无论在党内或党外，即右派，亦应与之在每个行动上联合作战。基于这种考虑，陈独秀答应不排斥他们，表示共产党员在国民党领导机构中不会超过三分之一。

这年夏天，戴季陶出版攻击共产党的小册子《国民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成为新右派的代表。但陈独秀写信给广东区委，点名在选举时要选入戴季陶、孙科、蒋介石。这个意见遭到了在广

州的陈延年、周恩来、毛泽东等人的反对。陈独秀拍电报要“二大”等戴季陶等人到会再开，同时催促张国焘动身。陈独秀不是国民党中央执委，瞿秋白刚批判了戴季陶，不宜去开会，所以国民党候补中央执委张国焘是最合适人选。出狱后，张国焘庆幸自己叛变行为没有被发现，而且意外当上了新的中央执委，此时对陈独秀言听计从。

在传达陈独秀让步政策时，陈延年表示反对。张国焘说：“即使在国民党中央委员中，多占了一些席位，除了引起国民党人士的反感以外，我不信真能增强中共在国民革命中的领导地位。”张国焘甚至不赞成开除几个西山会议分子，尽管“西山会议”撤销了他的国民党中央候补委员。

大会选举前夕，汪精卫拿出名单给张国焘看，结果张国焘主动提出将瞿秋白和自己的名字勾去，在吴玉章、董必武、恽代英、杨鹤庵等人中酌减几个，并增加叶楚傖、邵元冲等右派。

选举结果，共产党员只有9人入选，国民党右派势力增大了。

张国焘回到上海，在环龙路铭德里2号没有见到陈独秀。因为陈独秀失踪，中央局在北京召开二月特别会议。会议不久即发生了中山舰事件。这次，陈独秀再次派张国焘到广州。

陈独秀很满意张国焘上次的广州之行。他们得出一致结论：“现在蒋介石已先发制人，我们舍妥协政策而外，实无他途可循。”

张国焘到广州召开了广东区委紧急会议。当时毛泽东、周恩来主张坚决反击，张国焘强调：“继续采取对蒋友好的态度，对蒋应表示让步，同志们对外的言论和行动不可再有参差。”事后，张国焘去看蒋介石，表示“中共始终支持他”。

中山舰事件后,张国焘留在广州开全国第三次劳动大会。这期间蒋介石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了“整理党务案”,对国民党中共产党员作了种种限制,引起了党内同志不满。

张国焘抽空去见了蒋介石,张国焘说:“中共始终维护国共合作,亦决不会作公开反对之举。”

在广州特委会上,张国焘明确表示接受“整理党务案”,他说:“如果大家没有意见,我看大家签字表态,这样就是一致意见了。”说完,他带头签字,强行通过了接受“整理党务案”的决定。

月底,张国焘到上海汇报情况,陈独秀十分赞同。他在《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中说:“贵党‘整理党务案’原本关系贵党内部问题,无论如何决定,他党均无权赞否。”这几件事又使陈独秀、张国焘两人关系密切了。但在毛泽东、瞿秋白、周恩来等人看来,张国焘成了陈独秀右倾投降政策的代表。

◎结束工作关系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从广州誓师北伐,苏俄顾问加伦请周恩来转问中央对北伐的态度。陈独秀说:“你们开个会商量商量好了。”陈独秀不想拿主意,因为他在7月7日《向导》上发表《论国民政府之北伐》反对现在北伐,结果引起非议。

张国焘主持会议,他也犹豫不决。上个月,陈独秀、瞿秋白、张国焘、彭述之开会讨论北伐,陈独秀、彭述之反对北伐,瞿秋白、张国焘赞成北伐,两票对两票,结果陈独秀对瞿、张拍了桌子。6月30日,张国焘在《向导》上发表《民众心目中的广东》一文,一方面主张北伐,另一方面又讲“没有一个充分训练和彻底

革命化的群众党”、广州内部不巩固等,说明北伐尚早。

周恩来是代表广东区委来听取北伐中对蒋介石的态度的,张国焘必须表态,他最后按陈独秀的意见,说了句模棱两可的话:“北伐中我们的方针就是:是反对蒋介石,也是不反对蒋介石”。周恩来不满意这个答复,但也没有办法。10月,北伐军占领武汉后,陈独秀派张国焘到武汉作党中央代表,12月任中共湖北省委书记。

在12月汉口特别会议上,陈独秀提出“反对党内的左倾”,主张把民众运动的领导权交给蒋介石、汪精卫。张国焘赞同陈独秀意见,认为湖南农民运动领导步骤不一致,运动开展以后,无力控制。后来他还说:“农民运动竟成了摧毁国共合作、瓦解武汉政权的一个主要因素。”

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前夕,陈独秀赶到汉口,1927年4月27日在武昌主持了中共中央五大,陈独秀的妥协退让政策在大会上虽受到批判,但仍当选为总书记。新的政治局常委为陈独秀、李维汉、张国焘。

这以后,陈独秀威信急剧下降。张国焘在妥协退让方面,仍与陈独秀保持一致。5月底,共产国际的两个紧急指示传到中国,张国焘和陈独秀一样“觉得莫斯科的调子唱得不合时宜”。共产国际指示中国共产党实行土地革命。6月上旬,北伐军与冯玉祥会师,张国焘赶到郑州企图游说汪精卫讨蒋,结果一无所获。

7月12日,中央成立了周恩来、李维汉、李立三、张太雷、张国焘五人临时政治局,接替了陈独秀的领导工作。陈独秀和张国焘的工作关系随之结束了。

◎图谋再立山头

汪精卫发动反革命政变后,陈独秀于1927年9月10日起程乘船去上海,住在老靶子路华洋交界的一个弄堂里。

1928年春的一天,张国焘到陈独秀处坐,讲了一会话就发起了牢骚。原来,张国焘参加了南昌起义,但他反对暴动。南昌起义部队被打散后,张国焘逃亡香港,于10月中旬跑到上海。临时中央政治局于11月上旬作出《关于处分张国焘的决议》,指出:“国焘同志应开除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资格”。

张国焘说:“为了有效的挽救中共,和抛弃以往纠纷以及开展以后的光辉前途,应另行组织一个工农党。”

陈独秀见张国焘讲得十分认真,不像是随便说说,便问:“工农党和共产党有什么不一样呢?”当时陈独秀虽停止工作,但仍给中央写信、给《布尔塞维克》写短文。

“这个党仍以原有的同志为基础,扩大其政纲要点,仍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实现土地革命,但不再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张国焘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摆脱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遥控。

陈独秀对张国焘的建议十分感兴趣,他当然听得出“原有的同志”是包括自己在内的。近半年来,他越来越感到共产国际把他看成大革命失败的主要责任者,这是他难以接受的。沉思了一下,他说:“这是合情合理的改变党内现状的好办法。但……”

“你担心什么?”张国焘知道陈独秀此时心情很悲观。

“这个计划实行起来很难。”

张国焘不甘心地问：“你认为有哪些困难？”

陈独秀望了一眼张国焘，不忍心给他泼冷水，但从内心讲，他认为这个计划行不通。他缓缓地说：“首先是共产国际会予我们无情的打击。同时西欧各国的共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不重视东方问题，自不会予我们以有力的支持。”

“但我们可以靠本国的力量啊。”

“就内部状况来说，即使多数同志同意我们的见解，经费问题也是难于解决的。”陈独秀感到，现在的经费来源比建党初期还要困难，作为蒋介石、汪精卫通缉的要犯，陈独秀已无公开谋职谋生的自由。他见张国焘情绪一落千丈，宽慰地说：“组织工农党的事可以暂时搁置一下，作为我们的最后步骤。”

1928年5月，共产国际点名让陈独秀、张国焘等人出席在莫斯科举行的中共中央六大。张国焘问陈独秀去不去，陈独秀说：“八七会议对我的批评如此严厉，足以证明共产国际早有牺牲我的决心，即使出席也势难挽回。”

张国焘也不想去，但陈独秀劝他说：“你和我毕竟不同。”

这次张国焘去莫斯科，因是陈独秀机会主义路线代表，在中共六大上受到了批评。但他转攻为守，批判瞿秋白盲动主义十分卖力，两人常大争特争。布哈林说：“就是你们这两个大知识分子在吵架，再吵就把工人干部提拔起来代替你们。”

张国焘对执行陈独秀机会主义作了检讨，因而被选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六大后留在苏联，成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此后，张国焘和陈独秀10余年没有再见面。

◎我没有这个能耐

1938年4月3日,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的张国焘借祭黄帝陵之机,经西安跑到武汉,后写信接受周恩来、博古提出的三条办法中的第三条办法:“自动声明脱离党,党宣布开除他的党籍。”

4月18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决定》,第二天,作出《关于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党内报告大纲》。其中讲到张国焘脱党前“曾见过陈独秀一次”,在党外寻找反党的同盟者。

陈独秀1932年被捕,直到1937年夏才出狱。当时希望回延安工作,后因不愿公开承认错误,滞住武汉。得知上述消息后,陈独秀给湖南长沙的贺松生去信说:“张特立到武汉事,想你们已在报上看见(今天的新华及大公)。我并未遇见他,有人造谣他已来见我,真可笑。”

陈独秀的信刚寄出,张国焘在汉口公安局长、老牌特务蔡孟坚的帮助下,找到了隐居汉口德润里的陈独秀。

两人10多年未见,又都是被中央开除党籍之人,见面时免不了唏嘘一番。但知道张国焘走老蒋的路子,陈独秀不高兴了,刚见面时的热情变得不冷不热起来。

张国焘捡起10年前的话题重弹,说:“我还是以前那个意见,成立一个第三党。”

陈独秀不久前写了《抗战中的党派问题》,发表在《血路》上。他对张国焘说:“我主张在野党派都有合法抗日的地位,国民党

应允许它们公开存在。同时共产党、在野其他党都应承认国民党一党政权及对抗日战争之军事最高统率权。”

“陈先生对自己出山再组织一个党怎么看？”见陈独秀没有提自己是否再干，张国焘一语点破。

陈独秀摇了摇头，说：“我以前就说过，你我都是亲身经历过的人。成立一个党不是容易的事，我们当时费了那么大的劲，现在看来，一个阶级只能有一个党，我们再搞，能搞得比毛泽东现在搞的要好？”

张国焘见陈独秀提到毛泽东，心里不好受。他发现，和10年前那次交谈相比，陈独秀更消极了，五四时期、创党时期的那种干劲消失了，“你好像没有信心？”

“没有信心也没有耐心。”

见话不投机，张国焘说了一会闲话，告辞了。

这是陈独秀和张国焘两人最后一次见面。陈独秀对包惠僧说：“张国焘想拉我，我对他说我没有这个能耐。”

◎黔驴技穷

张国焘在戴笠手下主持“特种问题研究室”时，并没有忘记利用陈独秀这张牌。一次他向蒋介石建议，由国民党知名人士公开访问陈独秀，将陈独秀的有关言论编辑成册，有利的就采取，扩大对付延安的宣传，是有力武器之一，比叶青等人所写的反共理论文章，分量要重得多。叶青即中央政治学校教官任卓宣。

蒋介石觉得有道理，命令戴笠、胡宗南专程去江津拜访陈独

秀。戴笠、胡宗南去时带了茅台酒。陈独秀见他们来，吃了一惊，他一点也没有想到是张国焘的主意。宾主客气了一番，提到攻击延安事，陈独秀知道了他们来的意图，不冷不热地说：“本人孤陋寡闻，唯不愿公开发表言论，致引起喋喋不休之争。”戴笠、胡宗南无功而返，气得戴笠在路上大骂张国焘黔驴技穷，在蒋介石面前搬出共产党开山祖师邀功。

1941年3月25日，郑学稼收到陈独秀的信，内有5000元支票，要他当面交张国焘。郑学稼赶到张家花园薛农山家，将支票和信交给了张国焘。张国焘说，钱是高层人士给的，请朱家骅赠陈，陈不收，又请我出面，陈仍不受，看到陈在信中说“却之不能，受之有愧，以后万为我辞”，张国焘说：“仲甫先生总是如此！”

这年11月23日，陈独秀在给郑学稼的信中说：“晤国焘、卓轩诸兄时均希致意。不祥之人，不欲以书信累朋友也，又及。”这是陈独秀在给友人信中最后一次提到张国焘。

1942年5月27日，64岁的陈独秀死于江津鹤山坪。这时在戴笠手下的张国焘日子已很不好过，在报上见到老先生的去世，也无心凭吊了。1979年12月3日，即陈独秀诞辰100周年之际，74岁的张国焘冻死于加拿大多伦多公立养老院。

陈独秀和张国焘既是师生又是战友，两人都是中国共产党一大中央局成员，都被开除党籍，不同的是，前者被开除党籍是因为犯了托派错误，后者是投靠蒋介石，自觉地叛离党中央。这种区别，最终导致两人同流但不合污。

第十章

著作家与出版者

——陈独秀与汪孟邹

◎凶耗传来忍泪看

1902年3月，陈独秀由日本回安庆，途经南京江南陆师学堂时，认识了安徽绩溪人汪希颜。

汪希颜是这月13日到南京的，因为是安徽老乡，两人一见如故。谈到教育话题，陈独秀说：“我的伯父到宁国开过蒙馆呢。”皖南的宁国离绩溪不远。

“那你算得上读书世家了。”

“算得上吧。现在开蒙学已不紧要了。”

“哦？”

“蒙学莫急于德育，而体育次之；若智育，则成童以后未晚也。诚以德为人道之本，无德无以立，智必不醇。”见汪希颜有兴趣，陈独秀把他在日本学习的感受大大地讲了一通。

这次见面，陈独秀给汪希颜留下很深印象。陈独秀走后，汪希颜将陈独秀的话记了下来。一个月后，汪希颜在给弟弟汪孟邹的信中说，程仲辅氏为“皖城志士”，“此君现游日本，兄未到堂时，蒙见来访”。

因是见面交谈，加上陈独秀的怀宁方言，汪希颜误把陈仲甫写成“程仲辅”了。从哥哥的信中，绩溪秀才汪孟邹第一次知道皖城有个志士——陈仲甫。

这次陈独秀回安庆，酝酿成立青年励志社。秋天，清廷安庆爪牙准备逮捕为首分子，陈独秀和葛襄被迫离开安庆再次去日本。

陈独秀途经南京时，和葛襄去江南陆师学堂拜访了汪希颜。经汪希颜、葛襄的介绍，陈独秀认识了正在陆师学堂读书的章士钊。

分手时，陈独秀告诉汪希颜，自己写了两卷《小学万国地理新编》，准备送到上海商务印书馆石印出版。

汪希颜说：“我有个弟弟叫汪孟邹，在芜湖搞图书馆发行，以后有什么出版发行的事可以找他帮忙。”

陈独秀点头称谢。他此时还没有想到，自己这一生会和汪希颜弟弟汪孟邹及汪希颜子汪原放有不解之缘。

临别，陈独秀说：“你要注意身体。”他发现汪希颜身体已大不如前。

1902年底，陈独秀听说汪希颜猝然去世，十分悲伤。汪希颜1873年出生，比自己大6岁，只活了30岁即去世，正是大千

一番事业的年龄，实在可惜。而自己只和他见了两面，悲伤之余，陈独秀写了《哭汪希颜》诗：

凶耗传来忍泪看，恸君薄命责君难。
英雄第一伤心事，不赴沙场为国亡。

一年后，即1903年8月9日的《国民日日报》刊登了这首悼亡诗，这也是陈独秀第一首公诸于世的古体诗。

◎脾气真古怪

1903年底，《国民日日报》因经费短缺及黑势力压迫而停办，陈独秀只得和章士钊等人分手离沪回到安庆。

陈独秀不甘寂寞，一日和房秩五、吴汝澄等人商议办《安徽俗话报》。谈到报纸发行，陈独秀想到刚到芜湖办新书店的汪孟邹，说：“我有一位朋友在芜湖搞图书发行，《安徽俗话报》可请他发行。”

回到家里，陈独秀给汪孟邹以及他的老师、绩溪人胡子承各写了一封信。

收到陈独秀的来信，胡子承立即给汪孟邹去信推荐。信中说：“陈君仲甫拟办《安徽俗话报》，其仁爱其群，至为可敬、可仰……此事应如何应付，本社诸同志与拣老会面时当可妥商也。”信中所提拣臣，与汪家是世交，后来其女周物婉与汪稀颜子汪原放定婚。

汪孟邹见是陈独秀的信，又有胡子承的话，一口应承。他回

信建议：“没有印刷条件，最好能在上海印出，再运回芜湖发行。”

接到汪孟邹来信，陈独秀给上海的章士钊去信，请他联系印刷所。不久，章士钊回信说：“已联系上海东大陆印刷所。”

1904年3月21日，《安徽俗话报》第一期刊世。夏天，吴守一随桐城学堂搬回桐城，房秩五去日本留学，陈独秀只好把《安徽俗话报》搬到芜湖一个人办。

陈独秀到了芜湖长街中段科学图书社，汪孟邹将他安顿到阁楼上。“仲甫，我这里清苦得很，每天只有两顿稀饭。”汪孟邹1878年生，算起来比陈独秀大一岁。

陈独秀说：“就两顿稀饭好了。”

陈独秀最关心的是报纸的发行情况。汪孟邹说：“省内各地都设了供销社，有希望超过3000份。”

陈独秀很高兴，他一边扇扇子，一边问：“安庆销多少？”

汪孟邹说：“不多，徽州、庐州、颍州发行好些。绩溪县还以官府名义号召大家订阅。”

陈独秀笑着说：“到底是你的老家。”以前是编在安庆、印在上海、发行在芜湖，现在编和发行在芜湖，印在上海，省了不少事。

一天，汪孟邹拿着几封信对陈独秀说：“我这里有几封信，都是希望把报纸办成日报的。”

陈独秀忙接过信看，得意地说：“他们哪里知道是我一个人在办报，即使有三头六臂，也办不成日报啊！”

汪孟邹说：“想不到读报人这样多，现在东到上海，南到广州，北到辽东，都有我们的订户呢。”

“好！好！有了订户比什么都好。”陈独秀连声说。

汪孟邹看陈独秀蓬头垢面，说：“我这里虱子多，洗澡又不

便，你的头发乱得快像街上的疯子了。”

陈独秀捋了捋头发，说：“顾不上了。去年在上海，我和行严住一屋，也是一身虱子。革新和虱子是一对难兄难弟。”

汪孟邹说：“这里还有一封你的信。”

陈独秀一看，是章士钊从上海寄来的，要他去上海参加暗杀团。汪孟邹胆小，陈独秀将信收起来，没让他看。

1905年春节前，汪孟邹接到胡子承来信，希望改良《安徽俗话报》。信上说：“鄙人甚敬此报，甚爱此报，而又不敢随声附和此报，意欲更图改良，立定宗旨，可乎？请与仲翁等商之。”

陈独秀见胡子承讲的宗旨是“辞旨务取平和，万勿激烈”，对汪孟邹说：“胡先生讲民智低下，胆子甚小，叫我不要惊破，这怎么行呢？我办《安徽俗话报》时就立下宗旨，让皖人通达时事，长点见识。胡先生连‘自由婚姻’都容不下，还不如不办的好。”

汪孟邹忙劝解说：“胡先生讲你‘血性过人’一点不假，他提出改良，并未叫你一定照他的意思办啦。”

夏天，陈独秀和友人到亳州等地跑了一趟，回来又不想办《安徽俗话报》了。吴越牺牲后，对陈独秀触动很大。吴越本来办《直隶白话报》，后来热心暗杀活动，不办报了，认为办报是远水解不了近渴。这件事也促使陈独秀早日停办报纸。

不久，《安徽俗话报》刊登了一则反英消息，触怒了英国驻芜湖领事，该领事胁迫清廷芜湖地方当局给陈独秀施加压力，陈独秀顺水推舟，对汪孟邹说：“我们停了吧。”

陈独秀脾气犟，他提出停办，汪孟邹也没有办法，只好说：“已办了二十三期，不如再办一期，凑成二十四期，双数吉利。”

陈独秀听不进去，说：“无所谓单数双数。”

汪孟邹后来在胡适面前嘀咕，说：“仲甫的脾气真古怪哩。”

◎穷得丁当响

1913年春天,汪孟邹接受陈独秀的建议,到上海四马路惠福里筹办亚东图书馆。秋天,即二次革命失败后,陈独秀也避难到上海。

陈独秀来上海后,汪孟邹请他起草了《亚东图书馆开幕宣言》。

冬天的一日,陈独秀扑在桌上拟《新体英文教科书》写作计划,看着窗外飘飘洒洒的雪花,一种前程灰暗的悲凉感袭上心头,禁不住放下手中的毛笔,叹了一口气。

高君曼问:“不舒服吗?”

陈独秀说:“革命真难啊,被人逼到上海,又过起穷得丁当响的生活了。”

“汪孟邹不是帮忙么?”

“亚东图书馆也不景气,汪孟邹能帮多大忙,主要看这本书的销路。”陈独秀看着桌上的一堆英文参考书,两眼失神地说。

家中揭不开锅时,陈独秀就去汪孟邹的亚东图书馆坐坐,只有汪孟邹能帮上忙。但陈独秀是条硬汉,轻易不张口借钱。汪孟邹见陈独秀生活困难,答应给陈独秀出一本英文教科书。

“汪孟邹人好,他春上搬来上海,还向你讨主意,总不会见死不救吧?”高君曼安慰说。

“嗯。”陈独秀是答非答。

一日,汪孟邹见陈独秀坐了很久,默默无语,知道他家又断炊了,说:“要拿一些钱吧?”陈独秀点点头。汪孟邹便拿钱给陈

独秀，他接过钱再坐了一会，回去了。

漫长的1913年冬季过去了，1914年的春天来临。一日，汪孟邹兴冲冲地来到陈独秀家。

“你听说了吧？仲甫，行严在日本办了《甲寅》杂志。”

“是么？”陈独秀推开桌上的《字义类例》手稿，用力搓了搓手：“这真是一件好事。你是怎么知道的？”

“行严请王先生在上海搞发行，王先生告诉我的。”汪孟邹接过高君曼递过来的茶水说道。高君曼穿着一件褪色的旧衣服，见汪孟邹来了，茫然失色的大眼睛又闪出了亲热的目光。

陈独秀指指高君曼说：“在她的心目中，你可是我们家的大施主呢！”

汪孟邹笑着摆摆手：“现在好了，有希望了。”

“孟邹，我先给行严去封信，如果有了着落，我便去日本，总比在这里等着饿死好。这一个冬天要是没有你，我们怕挨不到今日了。”因为有了新的希望，陈独秀点燃了一支香烟，脸上出现了笑容。

汪孟邹走后，陈独秀给章士钊写了一封短信。从日本来的消息并不好：章士钊计划去欧洲旅行，而且，《甲寅》能否办下去，尚属天命。

汪孟邹不能马上出版《字义类例》，他也希望陈独秀去日本，便问陈独秀：“行严怎么说？”

“《甲寅》前途未卜，行严也未提去日本事，以后再说吧。”陈独秀情绪又低落下来。

◎引荐胡适

1914年夏天,陈独秀到日本协助章士钊办《甲寅》。临行前,他请汪孟邹照顾高君曼及两个孩子。

一次,汪孟邹给高君曼送来陈独秀编的《新体英文教科书》的稿费,发现高君曼患了肺炎,病卧在床,脸色苍白。汪孟邹抱起哭作一团的小鹤年,连声说:“这怎么行,这怎么行,赶紧叫仲甫回来吧。”

高君曼连咳几声,用手帕捂住嘴,是殷红的一口血。汪孟邹赶紧倒了一碗开水让高君曼喝下,说:“我回去就给仲甫写信,血都咯出来了,还等什么。”

1915年初夏,接到汪孟邹来信的陈独秀急急回到上海。经友人帮忙,陈独秀一家人在法租界嵩山路吉谊里21号住了下来。

隔日,汪孟邹等人举行小宴为陈独秀洗尘。汪孟邹和陈独秀分手一年,此间帮了不少高君曼的忙。席间陈独秀谈到自己打算新办杂志,汪孟邹老老实实地说:“亚东图书馆已经担负了几家杂志的发行任务,怕无力接受新杂志的发行。”

汪孟邹知道新办杂志关系到陈独秀养家糊口,顿了一下,便试探地说:“我有两位朋友,是弟兄俩,叫陈子沛、陈子寿,开了一家群益书社。明天我同他们谈谈,看看他们能否承担发行。”

陈独秀提不起精神地说:“那就试试吧。”

第二天,汪孟邹带陈独秀到了群益书社。陈氏兄弟听了汪孟邹对陈独秀办《国民日报》、《安徽俗话报》、《甲寅》的介绍

后,陈独秀又将办新杂志的想法说了一遍,陈氏兄弟表示愿意承担新杂志的发行工作。

“陈先生以前和汪先生办《安徽俗话报》,我们都听说过,很敬佩先生的为人,愿意和先生合作。不过,编辑费、稿费只能定在200元,月出一本,不知陈先生能否接受?”陈子沛犹豫地说。

“因为是试办,不知销路怎么样。”陈子寿附和了一句。

陈独秀看了一眼汪孟邹,见汪孟邹点头,便说:“200元就200元吧。”陈独秀刚从日本回来,无生活来源,有200元固定收入已是很可观了。况且,新办刊物,确实不知道销路如何。

1915年9月15日,16开本的《青年杂志》创刊号问世,开始发行仅千册。

陈独秀信心十足地对汪孟邹和陈氏兄弟说:“开始有千册就不错了。有十年八年功夫,《青年杂志》一定有很大影响。”

《青年杂志》创刊号出来后,汪孟邹向陈独秀推荐在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学哲学的老乡胡适作撰稿人。陈独秀高兴地说,你的老乡如果很忙,一期来一篇也是好的。

回到四马路惠福里亚东图书馆,汪孟邹给胡适去信说:“今日邮呈群益出版青年杂志一册,乃炼友人皖城陈独秀君主撰,与秋桐亦是深交,曾为文载于甲寅者也;拟请吾兄于梭课之暇担任青年撰述,或论文,或小说戏曲均所欢迎。每期多因更佳,至少亦有一种。”

信中所说“炼”,即汪孟邹自称,“秋桐”指章士钊。

不料秋去冬来,胡适两个月没有回信,陈独秀见到汪孟邹总是催问:“您的美国朋友还没有消息呀?”

汪孟邹也有些丢面子,忙陪着笑脸说:“我再去看催。”

汪孟邹这回信上写得更急:“陈君望吾兄来文甚于望岁,见

面时即问吾兄有文来否,故不得不为再三转达。每期不过一篇,且短篇亦无不可,务求拨冗为之,以增该杂志光宠,至禱,至禱。否则,陈君见面必问,炼穷于应付也。”

直到1916年2月3日,胡适才给陈独秀来了一封信。陈独秀对汪孟邹说:“找你的朋友要文真难呀,要了半年,从去年到今年,才要来一个新年来稿的许诺。”

汪孟邹又给胡适去了一封信,说:“陈君盼吾兄文字有如大旱之望云霓,来函云新年中当有见赐,何以至今仍然寂寂,务请吾兄陆续撰寄。”

就在这时,发生了一件叫陈独秀头痛的事。当时上海青年会办了一个刊物,叫《上海青年杂志》,气冲冲地写了一封信到群益书社,认为《青年杂志》与《上海青年杂志》雷同,而《上海青年杂志》取名先于《青年杂志》,凡事都有个先来后到,因此奉劝《青年杂志》及早更名。

陈子沛、陈子寿兄弟两胆子小,他们一边把信交给陈独秀,一边劝陈独秀尽早改名,避免不必要的麻烦。

陈独秀点燃了一支烟,坐在椅子上思考了一会,咬着牙说:“暂时不改。”他是参加过暗杀团的人,还怕什么威胁不成?

上海青年会态度继续强硬,陈子沛、陈子寿畏畏缩缩,陈独秀执拗了几个月,没有办法,只好同意改名。

夏历三伏,是一年中最热的日子,上海法租界嵩山路南口吉谊里21号陈独秀寓所,主人正一手挥扇,一手执笔,加紧编排更名后的《新青年》。上门来访的汪孟邹点头说:“好!好!保留青年两个字,再加上一个‘新’字,比什么都好。”

一个多月后,陈独秀到汪孟邹亚东图书馆闲坐,说:“《新青年》现在国内已有发行处74处,国外已发行到新加坡,是当年

《安徽俗话报》不可比之数。如亚东愿意,我想撮合‘亚东’和‘群益’两书店合并成一家,那样《新青年》发行会更多。”与陈子沛、陈子寿兄弟比,陈独秀更愿意和汪孟邹合作。现在杂志销量好,他想提出这个问题。

汪孟邹低头沉思了一会说:“书店合并我不反对,只是合并要扩建规模,缺的是资金。”

陈独秀说:“资金可以去北京筹集。黎元洪当总统,总是能想到一些办法的。”

汪孟邹觉得有门:“如仲兄能去一趟北京,此事不难。”

“行。”陈独秀爽快地答应了,说,“先和子沛、子寿商量好,其他再议。”

11月上旬,陈独秀和汪孟邹、陈子沛、陈子寿开了几次会,讨论两书店合并的事。汪孟邹说:“内部组织、招股章程都没有问题,我最担心的是资金问题。”陈氏兄弟表示同意,他们也希望陈独秀去一趟北京。

陈独秀说:“烈武、行严在北京有许多朋友,改日可叫他们来吃饭,请他们帮忙。”柏文蔚、章士钊见是陈独秀邀请,满口答应了。

11月26日,陈独秀和汪孟邹同车离沪北上,27日到天津,到北京后住前门中西旅馆64号。

这次到北京,陈独秀邂逅了老朋友沈尹默。沈力荐陈独秀到北大任教。校长蔡元培也上门求贤,促使陈独秀下决心到北大任文科学长。

蔡元培走后,汪孟邹问:“真的来北京?”

陈独秀喜上眉梢,说:“来。和这位翰林共事,令人愉快。书局事不受影响,我在北京,只会有利于书局向北方发展。”

这次北上,书局招股 10 万余元,南方认股数万元,加上“亚东”、“群益”原有财产,共有 30 余万资金,因此书局成立在望,也不负汪孟邹此行。但陈独秀受聘北大,实属汪孟邹始料不及。陈独秀的个性他知道,向来说一不二,定下来的事儿头牛也拉不回。汪孟邹轻轻叹了口气说:“没有办法。”

陈独秀说:“叹什么气,你没有听蔡校长说,他不仅要聘我,连适之也一起聘了。这事你还要谢我呢。”

“聘适之的确是好事。”汪孟邹脸上也露出了笑容。蔡元培劝陈独秀到北大,自己一直在旁边,他对这位翰林印象极好。

陈独秀说:“回头我给适之去一封信,要不你回上海后先给这位老兄去个信,让他也高兴高兴。”陈独秀顿了一下,笑着补了一句:“你这位老乡,虽未见面,我已深尝他的慢性子之苦,你在信中要言重些,要不然,他又要拖了。”

“这回是他自己的事,我想他不会拖的。”汪孟邹应了一声。

◎一定要上马路

1918 年,陈独秀在北大任文科学长时,《新青年》改在北京编,在上海印刷。汪孟邹多了一事,经常帮陈独秀联系印刷。

陈独秀也时常挂记亚东图书馆,答应推荐亚东图书馆经营北大出版部的书籍。亚东图书馆在四马路惠福里,是一个小弄堂,陈独秀希望汪孟邹搬到街上来,说:“你要死,只管还缩在弄堂里;你要活,一定要上马路!”

1919 年年初,汪孟邹将亚东图书馆搬到五马路棋盘街,上了马路。

一次,胡适对陈独秀说:“孟邹来信了。”

汪孟邹很关心陈独秀在北京的情况。3月,陈独秀受恶势力攻击,蔡校长准备免去陈独秀文科学长职务。收到陈独秀来信后,汪孟邹给胡适去了一封信,说:“仲甫去职,已得他来讯。旧党当然以为得势,务望兄等继续进行,奋身苦战,不胜盼念之至。”

“噢。”陈独秀应了一声。

“你告诉他要离职?”胡适问。

“上月,蔡校长说撤销学长制,我就准备退路了。”陈独秀说。

“下一步怎么办?”胡适不知道陈独秀的“退路”指什么。

“没有想好,上海印刷困难,先把《新青年》移到北京来印刷。”

《新青年》较难印,上海印刷厂常常不能按时印出。当时民友印刷厂说《新青年》花头多,印起来费事,也不想印。联系新印刷厂,本来是群益的事,后来群益找了华丰印刷厂。但汪孟邹倾向民友印刷厂。陈子寿怕印刷拖得太久,也情愿给民友多一点钱,但民友不同意。秋天,汪孟邹给北大胡适去信诉苦。

陈独秀被免去职务后,时间充裕,决定集中精力办《新青年》。他写信告诉陈子沛和汪孟邹,干脆在北京印刷,省得印刷周期拖得太长。

陈独秀想在北京静心办《新青年》的愿望并没有实现。不久,北京爆发爱国五四运动,陈独秀被捕。秋天,陈独秀虽被放出,已失去社交自由。

1920年2月,陈独秀在李大钊帮助下逃出北京,回到上海定居。汪孟邹非常高兴,事隔三年,两人又走到一起来了。

◎ 奖掖后进

陈独秀回上海后，住法租界环龙路渔阳里2号。在这里，陈独秀一面继续编《新青年》，一面开始筹备上海共产党小组。

夏日的一天，汪孟邹拿着一本新标点的《水浒传》来到陈宅。高君曼见是汪孟邹，忙到街上去买西瓜。

“我不是来吃西瓜的，我是要仲甫写序的。”汪孟邹连忙说。

“不碍事的。只是天太热，不能多写。”陈独秀光着上身，摇着芭蕉扇笑着说。

“就写几句吧。”汪孟邹生怕他不写。

“写什么呢？”

“就写大家为什么喜欢读《水浒传》。”汪孟邹说。

“‘赤日炎炎似火烧，田中禾黍半枯焦。农夫心里如汤煮，公子王孙把扇摇。’我最欣赏《水浒传》里这首诗。施耐庵写《水浒传》，主旨尽在其中，所以《水浒传》大家都喜欢看。现在的富人，吃荷兰冰淇淋还嫌不凉，吃西瓜还嫌不甜。”陈独秀边吃西瓜边说。陈独秀说话时，汪孟邹一手托着西瓜，一手拿着扇子，半天没有咬一口。这些话，汪孟邹听了很新鲜，他当然不知道仲甫是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在讲阶级差别呢。

“《水浒传》描写人物个性很深刻，这也是大家喜欢看的原因，不像中国戏剧，人物脸谱化。”陈独秀言犹未尽。

汪孟邹满意地点点头，后面的话，他似乎更容易懂些。

11月中旬的一天，汪孟邹来访。

“原放写得不错，就这样吧。”陈独秀从书案上找出《儒林外

史)新叙》递给汪孟邹,上面改了几个字,结尾是陈独秀的签名。

“你是奖掖后进。我回去对原放说,‘仲叔叫你写’,他犹豫了半天才答应试试。为了写这篇序,原放看了不少你写的文章。”陈独秀叫汪原放代自己写,一则是没有时间,另外也是促使汪原放写点东西。

“看得出,看得出。有几处是用了我的原话的,但也有是原放的借题发挥。原放讲吴敬梓极不满意父母代定婚姻制,怕是有所指吧?”陈独秀笑着说。

“是么?”

汪孟邹一看,果然是有所指,愤愤地说:“卧闲草堂本点评《儒林外史》,偏要说‘娶进门来许多疙瘩事’,是引导青年不安分。”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原放争取自由婚姻是没有错的。”在汪氏叔侄婚姻争论中,每次他们都请仲甫仲裁,但每次陈独秀都袒护汪原放。

“我很赞成鲁迅的这些话,你看看,很适合原放现在的处境。”陈独秀将桌上的一叠稿纸递给汪孟邹。

汪孟邹一看,是鲁迅刚寄来的手稿《故乡》,在小说结尾处,陈独秀用毛笔画了几条杠杠,墨迹未干:“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周树人的话很对,路是人走出来的。原放想解除婚约,还是让他自己作主的好。适之娶江太太,虽然一时没有见到许多疙瘩事,但适之心中的疙瘩还是有的。”陈独秀见汪孟邹沉默不语,继续开导他,不料嘴一滑,滑到胡适头上去了。

“适之不是很好吗?”汪孟邹想起胡适说过的话:那时忍心毁

约使江冬秀痛苦,自己必然是良心终生受责备。

“适之是死要面子的人。你看他现在,太太丢在安徽老家,自己在北京害肺病,有什么好?将来还不知怎么样呢!”陈独秀说。

“在婚姻问题上我赞成适之。”一向老实的汪孟邹寸步不让,他想说:你不也是母亲作主么?忍了忍,没有说出口。高君曼就在隔壁呢。

“清官难断家务事。也罢,也罢。”陈独秀挂起了免战牌。

“和群益不能和好么?”见陈独秀改口,汪孟邹换了一个话题。

“无所谓了。现在《新青年》已成了上海党组织的机关刊物,不用群益发行了。”陈独秀一脸轻松地说。原来陈独秀编《新青年》八卷一号时,群益书社的陈氏兄弟请汪孟邹转告陈独秀,因五一劳动节专号太厚,这一期《新青年》要加价。

陈独秀一听,发了一顿火,说要自己发行。汪孟邹胆子小,怕合同没有到期,群益会诉讼。

“不怕!北京吴总监的牢都坐了,还怕他们诉讼,让他们诉讼好了。是他们先加价,先违背合约。”陈独秀大声说。

汪孟邹见陈独秀主意已定,又涉及到党事,一向胆小怕事的汪孟邹不再多问。

◎想什么就写什么

1920年12月17日,陈独秀接受广东省长陈炯明邀请,起程去广州任粤省教育委员长。陈独秀与汪孟邹、汪原放再次分

手。临行前,陈独秀说:“我在广州和在上海一样,有什么事,就给我写信。”

汪原放标点好《红楼梦》后,写信请陈独秀写序。

4月,住在广州回龙里九曲巷11号看云楼的陈独秀抽出时间重新浏览了一下《红楼梦》,他感到《红楼梦》有琐屑可厌的缺点,但原因是历史与小说未分工,他主张应专写人情,将写小说与写历史故事分开。“我们做小说的人,只应该做善写人情的小说,不应该作善述故事的小说。”这样想着,陈独秀写了《我以为用《石头记》好些》,作为《红楼梦》新序。

正在广州高等院校大谈婚姻自由、妇女解放的陈独秀,也反对把《红楼梦》看成诲淫诲色的小说,“什么诲淫不诲淫,固然不是文学的批评法,拿什么理想,什么主义,什么哲学思想来批评《石头记》,也失了批评文学作品底旨趣。”

但用什么方法呢?他希望有高手将《红楼梦》改一改,除去琐屑的故事,单留下善写人情的部分,这样可算是近代中国文学作品中的代表作。

汪原放见了陈独秀这样的评价,皱了皱眉头:“仲叔这样说,《红楼梦》若无高手动笔改,那就算不上近代中国文学作品中的代表作了吗?”但话是陈独秀自己说的,原汁原味,又从广州寄到上海,汪原放当然不好改动。

汪孟邹见汪原放皱眉头,劝他说:“仲甫想什么就写什么,不随人言,这样刊出来,引起一番议论,说不定更好哩!”

◎好孬未做丧失人格的事

陈独秀在广州任教育委员长期间，因宣传社会主义和反对封建思想受到广州保守势力攻击，加上7月份一大召开后被选上中国共产党总书记，于是托辞请病假从广州回到上海。

1921年12月的一天，汪孟邹、汪原放叔侄俩来看他。陈独秀9月回上海，10月就被法巡捕房逮去关了几天，这会刚安静下来。见到汪原放新标点的《西游记》，陈独秀说：“上回原放写的序不是挺好吗？”

汪原放说：“还是你写的好，我写得巴巴结结，又费事。”

陈独秀笑着说：“亚东请原放新标点了《水浒传》、《儒林外史》、《红楼梦》、《西游记》，去掉眉批夹注，让读者自己去读，做了一件好事。”

汪孟邹说：“亏你和适之的支持。”

提到胡适，陈独秀说：“回上海前，我给适之写了一封信，建议他到安徽任教育厅长。”

汪孟邹说：“适之8月初到安庆演讲教育，还讲了《对安徽教育的一点意见》，是否与此事有关？”

陈独秀说：“也许吧。”

陈独秀指了指茶杯，请汪孟邹和汪原放喝茶，说：“这是太湖碧螺春。”汪孟邹瞥了一眼陈独秀书案上圆筒形碧螺春茶筒上的藏茗图，端起茶杯啜了一口，说：“味道不错。”

“上次胡适替《水浒传》写了序，写得不错。胡老弟专攻史学，这《西游记》若得他写序最好。”陈独秀接着刚才的话说。

汪原放看了一眼汪孟邹，为难地说：“新书已排好，年内就要出来，怕是来不及了。”陈独秀“噢”了一声，拿起《西游记》翻了翻，说：“我对《西游记》没有什么研究。我的看法，《西游记》述妖至怪，很浅显。有儒家的礼教，有佛家的慈悲为怀，有道家的炼丹长寿。南北朝以来三教逐渐合流，形成了这种乌七八糟的错乱思想。我对《西游记》不敢欣赏，这样写下来恐怕于销书无益吧？”

汪孟邹忙说：“不要紧的，你怎么想就怎么写好了。说不定你这样一写，读者以为怪怪的，买书的反而多起来了。”

汪原放一听，也说：“只要有先生三个字，这书就另有了一番分量。况且，先生的话也是很有道理的。”

听了汪氏叔侄的话，陈独秀说：“东西就放在我这儿吧。去年我买烟把《水浒传》丢了一本，还记得吧？”

汪孟邹笑着说：“记得，记得，你第二天上楼就叫‘糟糕！糟糕！’”

陈独秀说：“这回你放心，我不会把《西游记》再丢到人家的柜台上，让它东游西游了。”说罢，三人一起笑了起来。

汪孟邹和汪原放走后，陈独秀点燃一支烟思考了一会，提笔写了《〈西游记〉新叙》，因为对《西游记》实在无所研究，朦朦胧胧只觉得文字还不错，便写道：“元、明间国语蔚然大起，《水浒传》、《金瓶梅》、《西游记》都是这时底代表著作，在研究这时代底语法上，我们不能不承认《西游记》和《水浒传》、《金瓶梅》有同样的价值。”

这篇“序”写得不长，不过 300 来字，就是这么个意思吧。汪孟邹已讲得明确，不在乎他写什么，而在于署他“陈独秀”三个字。

1922年4月初的一天,汪孟邹到渔阳里2号找陈独秀,请他为芜湖科学图书社20周年纪念册题词。陈独秀情绪低沉地说:“你不讲我都忘了,想不到一晃有20年了。那时我们才二十几岁,如今已是四十好几的人了。”

汪孟邹点了点头说:“章谷士、曹复生还记得么?都不在人世了。”章谷士毕业于南京路矿学堂,陈独秀办《安徽俗话报》时,章谷士也在芜湖,经常到科学图书社小楼上与陈独秀晤谈。

“记得、记得。”宣统二年,陈独秀蛰住杭州曾作《存歿六绝句》,其中第五首《歿》写的就是绩溪人章谷士,诗云:“谷士生前为诤友”、“冢中傲骨成枯骨”。陈独秀叹了一口气说:“这20年你办了个亚东图书馆,我办了个《新青年》,别无所获呀!”

“你和我不一样。”汪孟邹说。

陈独秀摇了摇头说:“好孬未做丧失人格的事,还对得起亡友。”

◎我的东西没有文学价值

1922年8月,陈独秀第二次被法巡捕房关押后放出,不久情绪开始好转。

初秋的一天,汪孟邹、汪原放和陈独秀谈到出版《独秀文存》的事。汪孟邹说:“《胡适文存》去年出了第一集,适之打算以后再出第二集、第三集,如此不断出下去。”

陈独秀笑了笑,说:“适之是教授,专门著书立说的,我的东西虽说不少,却没有文学价值,也没有著书传世的价值。”他知道,亚东图书馆是小本经营,出适之和自己的文集,对他们也算

是一种支持。

汪原放见陈独秀客气，插话道：“仲叔的文章谈的多是民主与科学的话题，青年喜欢看，同样有印行的价值。”

陈独秀点了点头问：“估计能印多少本？”

“印 3000 本如何？”汪孟邹反问了一句。

陈独秀吸了一口烟说：“就印 3000 本吧，也不知可好卖，好在这几十篇文章讲的都是我自己的心里话，不曾抄袭别人，没有公孙姪无病呻吟那一套。”

“有时间，仲叔写一篇自序如何？”汪原放性子急，道出了来意。

陈独秀答应写一篇《〈独秀文存〉自序》，说：“给你们写了《西游记》序、《红楼梦》序、《儒林外史》序，这回又为自己写序，是推不掉了的。下一回还不知道要写什么序呢。”

“将来也和适之一样，出《独秀文存》第二集，那时再为自己作序。”汪孟邹笑着说。

不久，陈独秀主持西湖会议，确定办《向导》周报，他给汪原放写信说：“用最好的纸印 4000 份，需款若干，请向各印局询明示知。”陈独秀不知道 4000 份《向导》要多少印刷费。

陈独秀请李达和汪原放商议，最后定下来《向导》周报和《新青年》一样，印成 16 开的。

去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四大之前，陈独秀将自己编辑的《独秀文存》三卷四册交给亚东图书馆，请他们代为校对。

◎一辈子不服输

1932年10月，陈独秀被捕。第二年5月，在南京老虎桥监狱服刑的陈独秀接到判决书，准备上诉。

一天，陈独秀写了一封信，想请汪氏叔侄来南京狱中探望他。此时汪孟邹在长沙，汪原放在上海。

典狱长不同意，说：“上方有命令，不准给犯人转信。”

陈独秀一听，大发脾气，说：“这是什么黑暗社会，连封建社会、奴隶社会也不如。”中午陈独秀没有吃饭，第二天一整天，陈独秀也没吃饭。

典狱长慌了，只好同意陈独秀写信。

一接到信，汪原放就来了。陈独秀判刑后，亚东图书馆从章士钊处拿到材料出了一本《陈案书状汇录》，汪原放带了一本给陈独秀，说：“叔叔在报上看到你吃了官司，他说这一回仲翁的性命一定难保了。还好，你的命大，总算捡了一条命。”陈独秀翻了翻小册子，见收进了《起诉书》、《辩诉状》、《辩护词》、《判决书》、《章士钊答中央日报记者》等材料，感激地说：“你们费了不少心事。”

汪原放说：“只印了1000本，没有想到不少人要，听说有几所教会学校打算收入课本，作法学课教材。”

“是么？报纸上怎么说？”陈独秀急忙问。

“国民党以不许为共产党‘张目’为名，禁止报纸刊登。听说天津《益世报》登了。”汪原放望了望门外，压低声音说。

陈独秀“嗯”了一声，突然想起什么，连忙翻了翻章士钊的

《辩护词》。见到“以共产党论,托洛茨基派多一人,即斯大林派少一人,斯大林派少一人,即江西红军少一人,如斯辗转,相辅为用……”这几句,陈独秀皱着眉头说:“行严真糟,你看罢!这成什么话。”

汪原放见陈独秀生气,说:“外间报纸评价章律师义务为你辩护,古道可风呢!”

“像这样给我辩护,我再也不要他替我辩了。”陈独秀依然生气地说。

“你改一改,我带回去给章律师看看。”汪原放说。

陈独秀“嗯”了一声,脸上慢慢恢复了平静。

“上次请高语罕代信给你叔叔,问能不能出版我的自传,你知道这事吗?”陈独秀突然又想起一件事。

“不知道。”汪原放说,“但叔叔想再出一版《独秀文存》。”

陈独秀叹了一口气,说:“我家中事情多,延年、乔年都用过亚东的钱,哲民读书和零花也用亚东的钱。”

“《独秀文存》得了一些钱,也抵掉不少了。”汪原放安慰他说。

“抵不掉的,我欠亚东的钱实在不少了,心里很难过,你把《独秀文存》尽快印出来,让我快快拿版税把亚东的账结清才好。”

汪原放临走时问:“回信寄到哪里?”

陈独秀想了一下,说:“寄给教育部政务处段锡朋收转。”

汪原放走后,陈独秀又想起柏文蔚、章士钊讲过,曾给钱托汪孟邹代转,以救济陈独秀在狱中的生活,潘兰珍已几次提到此事。6月中旬,陈独秀提笔给汪原放写信,说:“柏、章诸君曾有小款托尊处收转,不知全数若干?除以此扣还外,尚欠尊处若

干？务请抄一细账赐知。无论如何深交，账目必须清楚。令叔对此往往胡里胡涂，望兄一矫正之。”

此时陈独秀正在狱中，汪原放当然不能抄账让陈还钱。见到陈独秀来信，汪孟邹说：“仲甫还是那个脾气，坐牢还想到还账，一辈子不服输。”

◎不能写自传

1933年初夏，国民党政府最高法院终审判决陈独秀八年徒刑。陈独秀上诉无望，于是静下心来读书写文。

陈独秀想找些书来读，一连给汪原放开了几个书单子。汪原放见到这些书名，知道陈独秀还没有放弃政治。9月中旬，他对汪孟邹说：“仲叔上次打招呼除掉律师辩护词中‘清共而后……’的话，现在又专找马列的书看，怕他自己还在以前的境地里脱不开身。”

“适之讲得对，仲翁不如看些闲书，或研究他的文字学。”汪孟邹说。

“仲叔想选编、翻译日本出版的《史学杂志》、《满洲历史·地理》、《史林》呢。”汪原放提醒叔叔。

提到《满洲历史·地理》，汪孟邹皱了一下眉头说：“仲翁要我们与适之商量，我也赞同。适之情愿我们出这类历史书，不愿我们出政党书，大约他不会反对。”

陈独秀建议亚东图书馆代售北大的《国学际刊》、清华的《国学丛刊》、罗振玉著的《殷虚书契》，汪原放乐得做个顺水人情，说：“这都是学理刊物，不碍事。”

不久,陈独秀来信说,罗振玉的《殷虚书契》太贵,不能买,他已托人想法借阅去了。

这时一个叫赵健的熟人去南京,汪原放请他带书给陈独秀,有《马克思传》、《达尔文传》、《中国革命史》等11本。汪原放告诉赵健是给陈独秀的,尽管书很重,赵乐此不疲。

陈独秀接到书,给汪原放写信,还希望要《世界地理新字典》等书。陈独秀还要过英语、德语小词典,汪原放没有找到。

汪原放和汪孟邹商量,此时出陈独秀自传一定好卖。问陈独秀何时动手写自传?胡适在《自述》中也提到希望陈独秀写自传。

陈独秀入狱时间不长,还没有适应监狱生活,一天到晚昏昏然,靠读书打发时光,并不想写东西。但他何尝不想写自传,人在无聊时极易想起平生往事,但写什么呢?写少年、幼年事记得的已极少,而且也无意义;记得的事,都是党事,不是与国际争,就是与蒋介石之间的过节,此时也不能写,弄不好八年刑期之上还要加几年,那岂不是永无出头之日?

想来想去,陈独秀又回到中国文字音韵学上,这类东西看似枯燥无味,钻进去了,也很有滋味。寻探字的来源,从它在不同时代的变化、发展,以及向别的字的演化、转义等来看社会的发展,才使人忘却现实苦恼。看小说则常常发生联想,自然是想出一大堆令人不快的事来。

◎望勿告他人

深秋的一天,陈独秀遇到了一件生气的事,他听说胡适从国

外回到南京,竟然不来监狱看他。气头上,他给汪原放去信,将胡适大骂了一顿。

汪原放给陈独秀、胡适各写了一封信,两头劝解。给仲叔的信是替胡适辩护,说他太忙,叫陈独秀不要放在心上。给胡适的信,是叫他抽时间给仲翁写封信解释一下。

听汪原放说陈独秀对他有意见,胡适吃了一惊。本来过南京,时间确实不够,心想不去探望,陈独秀大约不会知道,没有想到报上把他到南京的官场应酬刊登了出来。他自知理亏,很快给陈独秀去信解释道:“此次过京,匆匆不能来省视吾兄,十分失望。两月后南下,当来奉看。”“两月后”是指寒假期间。

陈独秀看后,余气未消,于11月15日给汪原放写信说:“不错,他很忙,我知道他在此间即和一班达官贵人拜会吃酒,已经够忙了。弟前函及此所说老胡的事,望勿告他人,即令叔亦不令知之,君与之绝交,不出恶习声也,我和他仅仅友谊关系,其他一切不必谈,他现在既不以友谊态度待我,不过旧朋友,又失去一个,如此而已。”

汪原放见“老胡的事,望勿告他人”句,知道陈独秀留有余地,把这件事放了下来。陈独秀叫汪原放不要告诉别人,他自己却把胡适来信寄给李季。一则是因为胡适在信中提到《资本论》已请吴半农、千家驹合译,所以陈独秀曾推荐由李季译已办不到了。陈独秀让李季看信,自然比转话清爽。再则,胡适在信中向陈独秀道歉,陈有一种莫名的乐趣,免不了有与人分享的愿望。

◎社会每迫害天才

和胡适闹了一点不痛快,不久即被狱中生活冲淡了。在狱中呆了两年,陈独秀已能适应狱中的生活,有时闲情逸致上来,还给狱中牢卒提几句古诗。

1934年仲秋后的一天,陈独秀突然想找四个朋友各写一幅字,拼成一小屏挂在墙上,朝夕相对消愁解闷。自己是个名人,狱中雅观一点也适合身份。他最先想到的是章士钊。郑超麟妻子刘静贞(吴静如)到狱中探视陈独秀,陈独秀托她转信给汪原放,再请汪原放交给章士钊。

汪原放不时地将陈独秀的东西转交给章士钊。秋季,陈独秀完成了《老子考略》一文,也请汪原放交给章士钊。《老子考略》怎么处理,陈独秀没有数,或出版,或待价而沽,他请章士钊定。写完《老子考略》,陈独秀又想写一系列考证性文章,如《道家概况》、《孙子与儒家》、《古代的中国》等。他请汪原放告诉章士钊他的写作计划,因为出版一层,他还要靠章律师帮忙。

汪原放常在信中提醒陈独秀写回忆文章,陈也没有忘记,这回,他给回忆录起名《我的回忆录》。

年底,亚东图书馆想筹款,汪原放找到章士钊和胡适,但这几个人没有帮上忙。汪原放在给陈独秀信中提到此事,陈给柏文蔚去信,请他设法借款。

为了亚东图书馆的信用,汪原放打算改组亚东为集资合办。

陈独秀也觉得集资合办是个办法,他对章士钊及医生黄钟入股表示赞同,但对胡适入股表示怀疑,而且,胡适和章士钊也

有龃龉。

1935年2月,陈独秀在狱中给汪原放写信,说:“惟此事务必慎重,不可冒昧邀胡加入,是为至要。”

1937年6月底7月初,汪原放经南京去北平,到监狱看陈独秀。1936年5月初,汪原放受茅盾之托到南京向陈独秀约稿,两人见过一面,一晃已是一年多了。

天气太热,汪原放坐定下来后说:“陶亢德写了几封信找叔叔,希望你早日写出自传。”陶亢德是《宇宙风》杂志主编。

陈独秀摇着扇子说:“许多朋友要我写自传,那一年我在江宁候审,高语罕就写信叫我写,到底是你叔叔胆子小,不能及时印行。”

汪原放抱歉地笑了一下,说:“记得群益公司托曹聚仁找你要稿,你怎么没有答应呢?是不是稿酬低?”

“群益公司开出稿费每千字20元,每月付200元,条件优厚,但我没有答应。我对群益公司不放心。”陈独秀一副不屑的样子。十几年前,为了《新青年》加不加价,陈独秀和群益公司差点打官司。

“适之也望你写自传。”

陈独秀点了点头:“适之生活尚有东西可写,我的生活实在无文学性,枯燥得很。小时候事记不得,记得了也无大意思。记得的事情碍党禁,不能写。”

“能否就五四以前的事写一点?”汪原放还是希望陈独秀写。

“过几天我给陶先生去封信。”陈独秀答应了。

汪原放抬头看了看墙上挂的几幅字,说:“章律师讲你‘幽居著书,似忧得所’,果然不假,你的上海住处还比不上这里。”汪原放想起了陈独秀在上海被捕时居住的小房间。陈独秀笑了笑,

说：“成功愈慢，天才愈大。”

“此话怎讲？”汪原放有兴趣地问。

“一个人对社会贡献愈大，社会愈是要迫害他，所以社会发展慢。”

汪原放连连点头，说：“仲叔，你给别人题了那么多字，听说何应钦也要了你的字，你也给我题一幅吧。”汪原放感到以后找仲叔要字的机会已不多了。

“题什么呢？”陈独秀笑咪咪地问。

“就写你刚才说的那番话，如何？”

陈独秀想了一下，点点头，将毛笔放在水里发了一会，蘸上墨。见手臂上汗津津的，陈独秀便悬腕挥毫：“天才贡献于社会者甚大，而社会每迫害天才。成功愈缓愈少者，天才愈大；此人类进步之所以为蚁行而非龙飞，独秀书于金陵。”陈独秀放下笔，歪头看了看，从抽屉里拿出几个印章，找出一个用心盖了。

“好！好！”汪原放乐滋滋地说。

陈独秀观赏了几遍，余兴未了，说：“我再给你写一首古诗吧。”说着，陈独秀提笔写《古诗十九首》中《冉冉孤生竹》，诗中有“伤彼蕙兰花，含英扬光辉，过时而不采，将随秋草萎”句。

汪原放见了，揣度陈独秀是自比“孤生竹”，将潘兰珍比作“蕙兰花”。但毕竟是两辈人，不敢造次，嘴里只是说：“仲叔用笔，浆深色浓，肥瘦适中。”

陈独秀笑着说：“不行，不行。古人张芝、王羲之临池学书，才能到达书法妙境。”

说话工夫，墨迹已干。汪原放等陈独秀收好笔砚，又谈了一会，看天色已晚，欢欢喜喜地告辞出门。

陈独秀将汪原放送出牢门，神情有些黯淡，多少年后他们才

意识到,这是他们的最后一面。

◎“实庵”与“耕野”

1937年8月23日,陈独秀因抗战爆发被提前释放出狱。

9月8日,陈独秀托人买了到武昌的船票。临行前,他以“实庵”笔名给化名“耕野”的汪孟邹去信,告诉他到武昌后,通信由武汉大学王抚五校长收转。

陈独秀在战乱中保持给汪孟邹去信,除了两人是老友之外,还因为两人经济上的特别关系。当时一些稿费,陈独秀在狱中不便收,就托亚东图书馆代收。到了武汉,陈独秀对王抚五说,尚有《宇宙风》写自传的稿费,已请亚东老板寄武大收转,王抚五点头说:“此事放心,当请汪老板照寄不误。”

9月中旬,陈独秀在武昌城内双柏庙后街26号找到暂栖之地,潘兰珍催他给汪孟邹去信,说:“你快告诉汪孟邹这个地址,省得他来信找别人转,现在乱哄哄的,七转八转就转掉了。”

陈独秀说:“10天功夫,我已去了两封信,也不知收到没有,现在上海更乱,还不知孟邹他们可平安呢。”

汪孟邹为了解决陈独秀生计,写信和陈独秀商量,由亚东图书馆出《实庵自传》单行本,先将《宇宙风》刊出的前两章印出来,等陈独秀抓紧时间写出其余部分,再出全本。陈独秀一口答应了。

1938年3月7日,汪孟邹在《实庵自传刊者词》中说:“现在陈独秀先生正在完成其自传的全部,并已允许续成各章归我们刊印单行本,这当是读者所乐闻的。”

8月,陈独秀一家人经重庆到江津,住东门郭家公馆。入川以后,陈独秀胃病、高血压等老毛病又犯了,又加上连日颠簸操劳,身体越来越差。

10月的一日,陈独秀在上海的一个朋友找到汪孟邹,两人谈及陈时,这位朋友说:“胡适在美国任大使,能否请胡适在美国大学里谋一个客座教授职位,让陈独秀赴美讲学?”

汪孟邹每隔十天半个月就收到陈独秀来信,知道他生活很困难,主要靠给《时事新报》写文章的稿费。汪孟邹说:“陈独秀到美国能养活自己,陶行知靠演讲,陈先生靠讲课,一定没有问题,关键是胡适是否肯筹资,帮他联系学校。”

隔日,汪孟邹给在美国的胡适去信,说:“此事国内友人均无力量办到,不得不十二分仰望吾兄为此高龄老友竭力为之。如幸谓然,即请斟酌分别进行,感甚祷甚。”

陈独秀自己对去美国教书兴趣不大,他觉得血压太高,飞机不能坐,美国有钱也去不了。胡适也顾不上陈独秀,连汪孟邹的信也没有回。

1939年7月,陈独秀受不了江津城内高温,搬到江津大西门外30多里的鹤山坪施家大院居住。他给汪孟邹去信说,有条件时,他去芜湖重办科学图书馆。汪孟邹知道人老时易怀旧,去信劝他写自传后面的章节。他在广告中已许了愿,说陈独秀正在写自传。

陈独秀答应写完《小学识字教本》就动手写自传。

对于胡适不回信,汪孟邹并未计较,1939年春,汪孟邹又写了封信托友人带到香港,再航空寄往美国。遗憾的是,这次胡适还是没有回信。

直到1941年2月,汪孟邹还在信中间胡适,两年前的那封

信收到没有。这次,汪孟邹不再请胡适为陈独秀谋大学教课职务,只是告诉胡适,今年 63 岁的陈独秀老而多病,生活艰难。

陈独秀最终没有实现汪孟邹要求续写自传的愿望,甚至连《小学识字教本》也没写完,就于 1942 年 5 月去世了。

11 年后,即 1953 年,老一辈出版家汪孟邹逝世了。汪原放建国后继续在上海从事编译工作,1980 年逝世。值得欣慰的是,他是在仲叙诞辰 100 周年之后去世的,看到了新的思想解放运动的曙光。

第十一章

“畏友仲子”与“风流和尚”

——陈独秀与苏曼殊

◎由己不由人

1902年，陈独秀第二次去日本，深秋参加了中国青年会。这次陈独秀认识了冯自由、黄兴、陈天华、邹容，也认识了在东京成程学校读书的苏曼殊、刘三。苏曼殊才19岁，年龄虽不大，但生活经历曲折离奇，养成了生性放达、豪放不羁的性格。陈独秀和苏曼殊在一起，常常信马由缰，大谈特谈，两人遂引为知己。

苏曼殊也喜欢陈独秀由着性子来的性格。1903年4月初，陈独秀因执剪剪了中国留日学生学监姚文甫的辫子，和邹容、张继一起被日本当局遣送出境。此事在当时影响很大，一时搅得中国留日学生满城风雨。

9月的一天，上海新闻新马路梅初里《国民日报》社来了

一位脸形瘦削、身材单薄的客人，陈独秀一见是苏曼殊，大喜过望：“子谷，什么风把你吹来了呀？”

“你走时一阵雨，我也可以来一阵风呀。”苏曼殊双手合十，作了一个阿弥陀佛状。

陈独秀听了哈哈大笑。章士钊不认识苏曼殊，陈独秀忙介绍说：“这是行严。”

“啊，久慕大名。”苏曼殊忙上前施礼。

和章士钊说了一会闲话，苏曼殊转身问陈独秀，在安庆办安徽爱国会，为何到了上海？

陈独秀便将他在安庆办安徽爱国会，后遭清廷安庆地方当局追捕，逃往上海协助章炳麟、邹容办《苏报》的事前前后后说了一遍。“7月7日，《苏报》因刊登章炳麟为邹容写的《革命军》作的序被查封，章炳麟、邹容在此前已先后入狱，在这种情况下，我和行严、晓石等人办了《国民日报》。”

“说真话，我原来是打算去香港找陈少白的，听说你在办《国民日报》，便找到这里来了。”苏曼殊斜身靠到陈独秀床上说。

“陈少白和你熟？”陈独秀问。当时陈少白在香港主办《中国日报》。

“不熟。离开日本时，我请冯自由写了一封推荐信。”

陈独秀更高兴了：“子谷，若没有事，就和我们一起编稿子吧。”陈独秀知道苏曼殊性格不定，行于流水，所以说了这句话。

苏曼殊离开日本后，经上海去了一趟苏州，在吴中公学社当了几天英文教师，到上海是冲着陈独秀来的，心想，你撵我走我也不会走的。便说：“我正想把雨果的《悲惨世界》翻译出来，介绍给国人。”

陈独秀在日本读过此书，说：“是本好书，你翻出来，在《国民日报》译文栏上连登。”陈独秀和章士钊商量了一下，请苏曼殊任助理编辑兼英文翻译。晚上和陈独秀、章士钊、何梅士挤住一室。经陈独秀介绍，苏曼殊又认识了谢晓石、慕韩等人。翻译小说来得慢，受陈独秀、章士钊等人影响，苏曼殊也写些诗、短文在《国民日报》上发表。

一天，陈独秀见到苏曼殊的一首送别诗，禁不住读出声来，诗云：

蹈海鲁连不帝秦，茫茫烟水着浮身。
国民孤愤英雄泪，洒上鲛绡赠故人……

陈独秀笑着说：“你这个和尚，虽说革命，却脱不了和尚的风流。”

章士钊问：“何耶？”

“你说这鲛绡沾了泪水送人，除了还风流债，谁要这皱巴巴的手帕呢？”

章士钊听陈独秀这样一说，也大笑起来。苏曼殊见他们高兴，只好陪着一起笑。后来陈独秀还是将这首诗放在《国民日报》上刊登了。

一日，章士钊和陈独秀闲谈：“仲甫，《太平洋报》刊出曼殊要译《茶花女遗事》，怎么回事？”

“子谷做事，和小和尚念经一样，没有准头，别人不知道他，你也不知道他吗？”陈独秀说。

不一会，苏曼殊起床了。章士钊指着一叠稿子问：“子谷，你写的这些惨状是《悲惨世界》原来就有的么？”

苏曼殊伸过头来看,见走了原味,看了一眼陈独秀说:“这是仲甫加上去的。”这一段时间,苏曼殊已译好了几章《悲惨世界》,请陈独秀校,陈独秀也不客气,丢开原著,拿起笔就改,然后登在《国民日报》上。

章士钊摇头说:“不好。翻译要讲信、达、雅。”

陈独秀不以为然,说:“不要紧的,现在第一要紧的是把国人从睡梦中叫醒。信达雅的事,等以后没有事时,再坐下来慢慢做吧。”

章士钊无奈,只好听之任之。

陈独秀信马由缰地增删,苏曼殊倒无所谓。译完《悲惨世界》后,他请陈独秀再看一遍,陈独秀简单看了看,用毛笔勾了几个字,说:“就这样吧。”

“怎么样?”苏曼殊嘴里嚼着糖,问。

“怪僻字多了一些。”陈独秀漫不经心地说,“是受了章太炎的影响吧?”

“你帮助改一改。”

“生米煮熟了,怕不好改。”陈独秀说。

“加上你的名字吧。”苏曼殊想,既然仲甫拿笔改了,就不能说是自己一个人翻译的了。

陈独秀点了一下头,说:“可以。”用毛笔在“苏曼殊”三个字后加上了“陈由己”三个字。

“由己好,由己不由人。”苏曼殊发现陈独秀身上有不少佛性。

陈独秀听苏曼殊夸奖,说:“退出励志社,参加青年会,我自己作主,所以叫由己。其实,我哪里能自己作主。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我想在安庆多呆一天,也身不由己。”

“迟早要自己作主。”苏曼殊说了一句禅语。

1903年10月的一天,听章士钊说黄兴在长沙开展革命活动,苏曼殊便天天嚷着要离开上海。陈独秀不愿意他走,说:“到长沙找不到怎么办?”

“不要紧。我想先去长沙,找不到黄兴再去香港找陈少白。”说到这里,苏曼殊叹了一口气。

“为何心烦?”

“只是身上的钱用光了。”苏曼殊皱着眉头说。

“哈哈!”陈独秀一听乐了,说,“我不留你天留你。”

一天晚上,陈独秀和章士钊出门去了。苏曼殊对住在一室的何梅士说:“何不去看戏?”何梅士本不想去,经不住苏曼殊的劝,也上街去了。

夜晚,陈独秀和章士钊回来,不见了苏曼殊。正在奇怪,陈独秀发现一张纸条,问:“这是什么?”

章士钊忙过来看,原来是苏曼殊写的字迹潦草的纸条,上面说:“弟欲南行,苦无贷斧,特归取枕下30元,后当归还。”

章士钊大吃一惊,急步走到床前,翻开枕头一看,30元已不翼而飞。

“啊呀!这个子谷,这如何是好?”陈独秀也六神无主。

“我的钱放在枕下,是防小人不防君子的。”章士钊脸呈不悦之色。

陈独秀忙说:“曼殊早就想走,苦于无钱。他怕你不借,故采取此不得已之法。”

半夜,何梅士回来了。他把苏曼殊劝自己看戏的事说了一遍。章士钊也笑,说:“和尚用心良苦,像猫瞅老鼠,不知瞅了多少日子呢!”

陈独秀见章士钊开了笑脸，一颗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曼殊毕竟是自己介绍给行严的。

1903年12月，上海的黑势力因《国民日日报》有革命色彩，投诉上海清廷地方当局，指责《国民日日报》“扰害大局”。销售部经理李少东也以报纸卖不出去为由，停发大家薪水。章士钊气得要和李少东打官司。但打官司要钱，结果还不知谁败诉，没有办法，几个创办人一合计，停了吧。

大家情绪不好，陈独秀伤心说：“《国民日日报》命短，算起来，只办了两个月零23天。”

章士钊愁眉苦脸地说：“我是瞎忙一场，你和子谷还译了个《悲惨世界》。”

“这回真惨了。”陈独秀苦笑了一下说。

不久，陈独秀离开上海，回到安庆。

◎赭山弥月

陈独秀回安庆后，不奈寂寞，办了《安徽俗话报》。1904年夏，陈独秀将《安徽俗话报》搬到芜湖办。这年秋冬，在陈独秀影响下，桐城人李光炯、无为人卢仲农将安徽旅湘公学移到芜湖。

当时受聘在安徽公学讲课的有柏烈武、陶成章、张伯纯、刘师培、龚微生等人。陈独秀编《安徽俗话报》之余，兼任安徽公学国文教师。

1905年夏，陈独秀在上海遇到了苏曼殊。

“子谷，你干的好事。”一见到曼殊，陈独秀就想起苏曼殊上次拿章士钊的钱，匆匆离开的事。

“啊，抱歉得很。”苏曼殊自知理亏，忙合掌谢罪。

苏曼殊那个样子，叫陈独秀忍俊不禁。“怎么样？”

见陈独秀问，苏曼殊便把离开上海的事前前后后说了一遍。原来，苏曼殊经武昌去了长沙，与黄兴、张继、陈天华、宋教仁等人成立了华兴会，又与张继、谢晓石等人筹办湖南事业学堂。也就在这时，到安徽旅湘公学任教，结识了李光炯、卢仲农。

“原来是这样。这么说，你比我还先到旅湘公学呢。”陈独秀大声说。

“是这样。”

“后来呢？”

“后来奉华兴会委派去香港与陈少白的兴中会联系，不料因误会受到陈少白冷遇，一气之下，到雷峰寺受戒为僧，持度牒云游四方，做了行脚僧。”苏曼殊说。

这次见面，陈独秀发现苏曼殊精神焕发，说：“看你春风得意，近来一定吃了不少花酒吧？”

“偶尔为之。”苏曼殊迟钝了一下，笑着说。在长沙，自己过了一阵子苦日子，到上海索性放开来玩一玩。近来，常去江南春、海国春、一家春吃西餐，晚上坐马车兜风。因为和陈独秀无话不谈，也将自己叫局吃花酒的事说了。这事反正是瞒不掉他的。不过，自己眼下交的桃花运，对迎春坊的林某念念不忘之事，没有敢对陈独秀说，怕他取笑自己。

这次相聚时间不长，两人匆匆分手。临行前，陈独秀要苏曼殊为自己画一幅画，苏曼殊答应了，说：“此次去杭州，正好作几幅游西湖的图。”

秋天，苏曼殊果然给陈独秀寄来了《泛舟西湖图》，了了一桩心事。

1906年夏，苏曼殊突然来到芜湖。

“你怎么来了？”见到苏曼殊，陈独秀大喜过望。自上次分手，两人又有一年未见面了。

“和陶成章、龚微生在杭州，差一点被浙抚抓住。”苏曼殊将自己在杭州从事秘密活动遇险的事说了一遍。

“啊！晚上住到我那里去。”陈独秀邀苏曼殊到科学图书社住。

“申叔叫我住他那里。”

苏曼殊与刘师培是老熟人，这次到芜湖，就住到了刘家。刘师培有文采，字却不成样子，不讲笔画。其夫人何震见苏曼殊字画俱佳，三番五次要拜苏曼殊为师，苏曼殊没有办法，只好答应了。

苏曼殊作画不拘形式，且画且讲，且画且笑，顷刻即成。苏曼殊擅长画山水。画红叶，颜色在浅绛、绯红之间；画秋柳，枝软如丝、精美绝伦，学生极为仰慕。因为苏曼殊随身带有芒鞋破钵，陈独秀当面总以画僧相称，在背后夸他，说：“苏曼殊作画，叫人看了如咫尺千里，令人神往，不像庸俗画家浪费笔墨。”

皖江中学在芜湖赭山脚下。闲时，苏曼殊与怀宁人邓绳候常相过从。邓绳候名艺孙，当时在皖江中学做校监，是皖白山人邓石如重孙，诗文书法俱佳，两人“共晨夕者弥月”，游镜湖，爬赭山，度过了不少令人愉快的时光。

◎魂附东舟夕夕还

1906年暑假，在皖江中学教书的陈独秀和苏曼殊、邓以蜚相约去日本。在海船上，春天刚参加光复会的苏曼殊问陈独秀：“为什么不加入同盟会？”其时，陈独秀并不认识孙中山，他和章

士钊、徐锡麟、熊成基等人都未参加同盟会，在他看来，不入同盟会，照样也革命。

这会见苏曼殊问，陈独秀说：“同盟会鱼目混珠，泥沙俱下。我很佩服孙中山、廖仲恺、朱执信，但其他人就不好说了。”

苏曼殊偏要陈独秀说：“愿闻其详。”

陈独秀见拗不过去，说：“像汪精卫等人，纯属全躯保妻之徒；尽美、薄泉、师培与孙逸仙也常有摩擦。”

苏曼殊感叹道：“1903年办《国民日日报》时，行严说你是天生领袖，我看你是迟早要自立大旗的。”苏曼殊当然也记得章士钊还说陈独秀是天生乞丐，一身虱子。

陈独秀摇了摇头，说：“什么自立大旗，我不过是不愿意攀附别人，随波逐流罢了。”不久前，芜湖岳王会整个加入同盟会，陈独秀便不再直接参加岳王会的活动了。

“河合仙是什么人，以前没有听你说过？”陈独秀见苏曼殊兴致好，问了一下他的家事。他以前听说苏曼殊是广东香山人，1884年10月出生日本横滨，和陈独秀是一个月份出生。苏曼殊母亲是日本人河合若子，父亲苏杰生在苏曼殊出世前即丢弃河合若子而去。

苏曼殊沉吟了一下说：“我出生不久，母亲河合若子嫁给了一个海军军官。她把我交给了其姐河合仙。”

“这么说，你是大姨妈养大的了？”

“是的。她是我的义母。”苏曼殊说。

“这次到日本，可准备去看看？”邓以蛰问。

“去。”

这次去日本，苏曼殊虽没有见到河合仙，因结识了章太炎，也不虚此行。三人在日本呆的时间不长，苏曼殊要送小野氏南

归,便一起在大热之前离开日本回国。

航行数日,三人东拉西扯,唠叨了不少话题。一日,苏曼殊一时高兴,谈起自己在日本的女友如何漂亮如何多才多艺,使陈独秀、邓以蛰兴趣大增。陈独秀说:“日本漂亮有才华的女人固然不少,人家未必对你有意。我怕这事是你一个人的单相思。”说着,他对邓以蛰眨了一下眼睛。

邓以蛰会意,也说:“是啊,曼殊是个出家之人,那有这样的艳福呢?”

苏曼殊见他们不相信,急了,说:“你让我怎么说你们才相信呢。我现在真懊悔,已经上了船,不然,我一定带你们去看看,到底是谁单相思。”

陈独秀见苏曼殊发急,乐了,说:“是啊,已经上船了,昨天你怎么就想不起来带我们去饱饱眼福呢?”

邓以蛰说:“大约那女子非常漂亮,经不起外人看的。”说着和陈独秀大笑起来。

苏曼殊又急又气,脸一下红了,说:“等一下,我让你们看一件东西。”说着,转身进船舱去了。

陈独秀和邓以蛰面面相觑,说:“这和尚又不知发什么癡。”话没有说完,苏曼殊已经回来了。这次,他手里拿了一些东西,仔细一看,原来是女人的发饰、头巾一类的东西。见陈独秀、邓以蛰不作声,苏曼殊说:“这回你们该相信了吧?”说着,转身将这些东西抛到海里。

“这又是为何呢?”陈独秀发现苏曼殊往海里扔,想拉已经来不及了。

“可惜!可惜!”邓以蛰看着发饰、花色的头巾在绿色的海面上打了几个漩涡,渐渐地被海水吞没,惋惜地说。

苏曼殊见东西没有了，突然大哭起来。

“啊，啊，都怪我，都怪我。”陈独秀一时手足无措。

晚上，三人步出船舱赏月，大海的夜色十分美丽，明净深远，似乎比陆地的夜空更蓝更亮，白净的新月像银镰一样，给夜航中寂寞的行人带来了无穷的遐想。

想起白天的事，陈独秀仍然感到对不住苏曼殊，玩笑开过头了。苏曼殊能割舍日本的恋人，回国参加反清大业，实属不易呢。陈独秀说：“曼殊，今晚这么好的月色，怎么没有诗兴呢？”

“实在没有。”苏曼殊目中无物地看了一眼月亮，想到白天的事，气还没有全消。

“仲甫想必已经有了好诗？”邓以蛰凑兴说。

“何以见得？”陈独秀问。

“你忘了？‘罗袜玉阶前’……”邓以蛰提醒陈独秀。

“哦，你是讲曼上人送给你美女图？”陈独秀说着，看了苏曼殊一眼，三人一起笑了起来。

春天，邓以蛰请苏曼殊送他一幅画，苏曼殊在课余画了林黛玉葬花图。画好后，邓以蛰请陈独秀题一首诗。陈独秀见美女荷锄，双燕穿杨，十分清丽，题了一首诗：“罗袜玉阶前，东方杨柳烟。携锄何所事，双燕语便便。”

“今日良宵美景，曼殊不便作画，你是无论如何也要作首诗的。”邓以蛰说。

“凑了一首，是给曼殊陪不是的。”陈独秀说。

“念念。”邓以蛰急不可待地说。

见苏曼殊屏息静听，陈独秀脱口吟道：

身随番舶朝朝远，魂附东舟夕夕还；

收拾闲情沉逝水，恼人新月故弯弯。

邓以蛰说：“好诗！好诗！一个‘朝朝远’，一个‘夕夕还’，颇有禅机佛理。不知那‘恼人新月’何所指？”说话时，邓以蛰有意不看苏曼殊。

曼殊也不得不笑了起来，说：“谁恼啦？真把你们没办法。”

1906年7月5日，苏曼殊回芜湖后坐下来给刘三写信，刚写下“申江别后，弟即偕仲甫东游，至处署始抵皖江”几个字，陈独秀来坐。见苏曼殊给刘三写信，伸过头去看。苏曼殊的书信没有废话，陈独秀很喜欢看。读了信，陈独秀说：“季平是侠义之士，为救章太炎、邹容挥金如土，你们倒是同一类人。”

提到刘三挥金如土，苏曼殊想起一件事，说：“一次我去刘三家借钱，刘三不在，我拉开抽屉，拿了数十元走了。”

陈独秀问：“刘三知道么？”

苏曼殊说：“不知道。还是后来我去信对他说了。”

陈独秀记起上次在上海，苏曼殊拿了章士钊30元丢下条子的事，用手点着苏曼殊笑道：“这大约是出家人超凡脱俗之处，拿了人家的钱，写一封信就能了事。我幸亏没有钱，不然抽屉非上锁不可。”说罢，两人哈哈大笑。

苏曼殊说：“季平是南刘三，申叔是北刘三，两个刘三，最叫我相宜的还是季平。”刘季平生于1880年，与陈独秀年龄相仿。因为三人同在东京留学认识，所以提到刘三，两人有说不完的话。

陈独秀点头，说：“鄙人有同感。”

秋天，萍、浏、醴起义在即，革命党人受到怀疑，苏曼殊遂离开芜湖，避往上海。

◎千年绝学从今起

1907年春,陈独秀辞别家人,再次赴日。这次,陈独秀参加了亚洲和亲会,苏曼殊、章太炎、陶冶公、张继、刘师培及夫人何震、日本人幸得秋水都参加了这个组织。

苏曼殊是2月13日随刘师培及夫人何震到日本东京的,住牛込区新小川町二丁目番地民报社。陈独秀和章士钊在正则英语学校学习英语,同时到早稻田大学学习西欧文,三人又经常见面了。

春天,苏曼殊从陈独秀处得到了《梵文典》第一卷英文底本,自己正在自学梵文,便成天闷在寓所翻译。夏天,苏曼殊完成了《梵文典》的翻译,他将译稿递给陈独秀,说:“仲甫,提提意见。”

在日本,苏曼殊的第一号朋友是陈独秀,其次是章太炎,他佩服陈独秀的汉学,章太炎的诗。“若有兴致,或题几句贺我?”苏曼殊知道陈独秀不懂梵文,叫陈独秀评论《梵文典》是客气话。

过了几天,陈独秀写诗赞苏曼殊,诗题很长:《曼上人述梵文典成且将次西游命题数语爱奉一什丁未夏五》,诗曰:

千年绝学从今起,愿罄全功利有情。
罗典文章曾再世,悉昙天语竟销声。
众声茧缚乌难白,人性泥涂马不鸣。
本愿不随春梦去,雪山深处见先生。

“客气了。”苏曼殊接到贺诗,满面笑容。平常陈独秀叫苏曼殊“糖僧”、“革命和尚”,但题诗时,总客气地称为“曼上人”。

“仲兄诗有气势，明日我在《天义报》请人登了，你不会反对吧？”

“登吧。”陈独秀桌上放着英文版但丁、拜伦的诗集，手上捧着英语词典，说话漫不经心。

可惜，印度人要价太高，《梵文典》未能出版。

◎“风流和尚”

1909年1月2日，苏曼殊到了东京小石川智度寺。望着寺外皑皑雪山，想到自己形影孤独，又平添了几分思乡念友的忧愁，作诗曰：

寒禽衰草伴愁颜，驻马垂杨望雪山。
远远孤飞天际鹤，云峰珠海几时还？

春天，陈独秀到了日本，和苏曼殊、章士钊同住在东京神田区猿乐町二丁目一番地清寿馆，三人又度过了一段愉快的时光。

苏曼殊和陈独秀无话不谈，从不遮遮掩掩。春天的一日，自己和意中人去东京近郊上野公园游不忍池，回来送了一首诗《游不忍池示仲兄》给陈独秀，就是讲自己与日本女子百助相爱的事。诗云：

白沙轻罗薄几重，石栏桥畔小池东。
胡姬善解离人意，笑指芙蓉寂寞红。

陈独秀问他这“胡姬”是谁时，苏曼殊笑而不答。无聊时，陈

独秀翻陈年老账，将苏曼殊的事抖落出来笑话他。苏曼殊无奈，称他为“畏友仲子”。陈独秀脾气执拗，章士钊也视为难交之友。

讲归讲，苏曼殊仍然喜欢和陈独秀谈自己的隐私。又有一次，苏曼殊游若松町，写下了两首《过若松町有感示仲兄》。

其一云：

孤灯引梦记朦胧，风雨邻庵夜半钟。
我再来时人已去，涉江谁为采芙蓉？

其二云：

契阔生死君莫问，行云流水一孤僧。
无端狂笑无端哭，纵有欢肠已似冰。

章士钊、陈独秀、苏曼殊三人住一室，陈独秀年长，章士钊次之，苏曼殊最小，因此跑腿打杂的事，常常轮到苏曼殊。

一次，三人断炊，章士钊、陈独秀找了几件衣服，要苏曼殊去当铺当点钱买东西吃。苏曼殊答应了一声，出门去了。

谁知苏曼殊一走，半天不见人影。

“疯和尚！”“死和尚！”陈独秀、章士钊两人又饿又困，将苏曼殊大骂一顿，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陈独秀知道苏曼殊与雪鸿、菊子等女子相爱，所以骂他“风流和尚”。

半夜，苏曼殊回来了，手上的衣服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本书。

“吃的呢？”听到响声，陈独秀睁开眼睛，咽下了一口口水，困

意顿消。

“当了钱，正要买吃的，在夜市上见了这本书，因为遍地寻不着，便买下了。”说话时，苏曼殊慢慢往外吐字，像是平时闲谈。

章士钊、陈独秀见状，没有办法，又骂了几句，只好继续睡觉。

苏曼殊不管他们，一夜未睡饿着肚皮把新买的书看完了。第二天早上，陈独秀、章士钊起来接着骂，苏曼殊也不答，丢下书，一头倒下，不一会鼾声大作。

◎无量春愁无量恨

在日本出生的苏曼殊，日语讲得很地道，这次在日本，邂逅了当年的恋人菊子。菊子此时成了一名弹筝的艺妓，改名百助眉史。苏曼殊在陈独秀劝说下，决定作画卖钱，赎出百助眉史。不料艺妓老板用计奸污了百助眉史，迫使百助眉史蹈海自杀。

苏曼殊受了打击后，成天少言寡语，闷闷不乐。过了一时，苏曼殊写了10首怀念百助眉史的《本事诗》，请陈独秀过目。

其一云：

无量春愁无量恨，一时都向指间鸣。
我亦艰难多病日，那堪重听入云筝。

几年前，曼殊还向自己学作诗呢！那时连平仄对仗都不懂，真是大智大慧的和尚，如今已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见到“我亦艰难多病日”句，陈独秀被诗人的无限愁思紧紧抓住，眼睛也微微湿润了。是啊，一向体弱多病的子谷，哪堪受如此沉重的打

击呢？

陈独秀一口气读完 10 首《本事诗》，苏曼殊朝夕与自己所谈尽在眼前翻转，一时感慨万千，突然萌发了作诗的强烈愿望。曼殊的情意真切的诗和困境激发了他作诗的灵感。此外，内心深处似乎还潜流着一种责任意识：应该劝劝这位陷入红尘不能自拔的出家人。“子谷，改日我和你 10 首，如何？”

“啊，有仲甫和诗，最好。”苏曼殊高兴得苍白的脸上微微泛红。在他一生最痛苦的时候，知我者分忧者，唯仲甫啊。

隔日，陈独秀和诗已成，诗名也取《本事诗》。其一云：

双舒玉筒轻挑拨，鸟啄风铃珠碎鸣；
一柱一弦亲手抚，化身愿作乐中箏。

南汉黄捐词云：“愿作乐中箏，得近佳人纤手指。”陈独秀引用此句作注。“化身”句，颇有庄周化蝴蝶之韵，也合苏曼殊此时心境，子谷读了，微微点头。

苏曼殊诗其二云：

丈室番茶手自煎，语深香冷涕潸然，
生身阿母无情甚，为向摩耶问夙缘。

陈独秀知道苏曼殊感伤生世，自己长子谷五岁，却对此帮不上什么忙，大不了当时若知道，上苏宅一起饮茶，劝劝而已，所以陈独秀和诗二曰：

深夜沉香沃甲煎，隋皇风雅去茫然；

羊车我若过卿宅，细饮番茶话风缘。

苏曼殊读了，破涕一笑，说：“仲兄若有隋皇风雅，有精美的车子坐，恐怕是不肯到我家来饮茶的。”

陈独秀听了也笑，说：“那倒也是。”

苏曼殊诗其三云：

碧玉莫愁身世贱，同乡仙子独销魂。
袈裟点点疑樱瓣，半是脂痕半泪痕。

百助眉史住在横滨，这里也是苏曼殊的出生地，漂亮的百助眉史出身虽然卑微，但在苏曼殊心中，却是销魂酥骨的仙子。百助原叫菊子，这使苏曼殊想到日本横滨的樱花，由百助的死而想到“脂痕”、“泪痕”。

陈独秀见苏曼殊如此悲伤，实在可怜他。一个和尚如此痴情爱一个已死的心上人，本来就不好的身体会闹出大病的，所以他在诗三曰：

湘娥鼓瑟灵均泣，才子佳人共一魂；
誓忍悲酸争万劫，青衫不见有啼痕。

陈独秀将百助眉史比作湘君，将苏曼殊比屈原，都是才子哭佳人。所不同的是，一个鼓瑟，一个弹箏，一个古人，一个今人。“誓忍悲酸”二句，正是陈独秀平时劝苏曼殊的话，只是陈独秀不讲“袈裟”，而讲“青衣”，是不道明苏曼殊出家身份，以示尊重。苏曼殊当然看得出仲甫兄的良苦用心。

苏曼殊诗其四曰：

淡扫蛾眉朝画师，同心华髻结青丝；
一杯颜色和双泪，写就梨花付与谁？

陈独秀读诗注，知子谷曾为眉史绘相，因而从绘相事情中生出悲来。人到伤心处，不得不悲伤。见苏曼殊越陷越深，陈独秀只好细心相劝，其和诗四曰：

丹顿裴轮是我师，才如江海命如丝；
朱弦休为佳人绝，孤愤酸情欲语谁？

“丹顿”即写《神曲》的但丁，“裴轮”是写《唐璜》的拜伦，正在读《神曲》、《唐璜》的陈独秀正崇拜着他们，所以引为已师。此时的陈独秀相信天命，你苏曼殊纵才如江海，但在命运面前是无能为力的，所以还是不要太孤愤伤心，不能因为心爱的人的死而葬送自己的才华。

苏曼殊点头称是，说：“‘朱弦休为佳人绝’说得好，可我万事皆空，虽不‘绝’，却离绝不远了。”

苏曼殊诗其五是赞美百助眉史聪颖及与自己的感情融洽，这种两情间的心有灵犀，也是苏曼殊悲怆不能自己的原因，诗曰：

愧向尊前说报恩，香残缺黛浅含颦。
卿自无言侬已会，湘兰天女是前身。

因为此首诗写得轻松，一扫前诗之悲哀，陈独秀的和诗也写得愉快活泼。但毕竟是朋友的情人，因此，陈独秀在赞美中又保持局外人的分寸，其诗曰：

慵妆高阁鸣箏坐，羞为他人工笑攀；
尽日欢场忙不了，万家歌舞一闲身。

百助眉史身为艺妓，常出入各种欢娱场合，但眉史身在声色场，心是一闲人，所以与身在红尘、心在佛世的苏曼殊有同一归境。苏曼殊脸上有了一丝笑容，仲兄夸眉史出污泥而不染，既给了自己的面子，也是对已闭目的眉史的超度呢。

苏曼殊诗其六曰：

桃腮檀口坐吹笙，春水难量旧恨盈。
华严瀑布高千尺，未及卿卿爱我情。

“桃腮檀口”和“卿卿”都讲的是百助眉史，因写于春天，故有“春水”句。末联是点化李白诗“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用在这里虽不比李白来得豪放，但比喻两人感情，也有信手拈来的巧妙之处。陈独秀见苏曼殊思潮起伏难平，再次陷入追念中不能自拔，遂作诗六劝道：

少人行处独吹笙，思量往事泪盈盈；
缺憾若非容易补，报答娲皇炼石情。

女媧炼五色石补天，撑住塌下的天，止住洪水，普救众生。

陈独秀作为局外人，当知苏曼殊难以自拔，只好委婉劝他移情到事业上去，采取分心术来战胜自己，这是陈独秀高于苏曼殊的地方。苏曼殊见后联，自知仲甫用心良苦，但口上说：“谈何容易！”

苏曼殊诗其七曰：

乌舍凌波肌似雪，亲持红叶素题诗。

还卿一钵无情泪，恨不相逢未剃时！

当年菊子与苏曼殊是邻居，皮肤娇嫩而纯情的少女慕苏子谷的才华，曾携红叶请苏曼殊题诗，以表达爱意。苏曼殊担心自己身世和追求革命的风险，会给菊子带来伤害，谎称爱上一冯姓女子，出走香港，出家进庙。这段曲折，终于导致菊子堕入艺妓和自杀的结局。

这首诗用了不少前人的妙句，却十分得体，如同己出。“乌舍凌波肌似雪”用了梵典，“亲持红叶素题诗”引用古人笔记，“还卿一钵无情泪”是《红楼梦》中的话，“恨不相逢未剃时”化自唐诗。特别是后联，深深的表达了苏曼殊内心的自责和忏悔。

对这段变故，陈独秀有什么可说呢？已不能再刺激这个病弱和精神快崩溃的和尚了，他用了几个轻松的句子和了这首诗：

目断积成一钵泪，魂消赢得十篇诗；

相逢不及相思好，万境妍于未到时。

此和诗虽写得有哲理，然与苏曼殊心境相去甚远。“相思”有什么好，人一天到晚，总有个影子闪来闪去，叫人丢魂落魄，如今气喘吁吁，病魔附体。“相逢”已是生离死别，也无“好”可言

了。但毕竟是仲兄一番用意，苏曼殊自无话可说。

苏曼殊诗其八曰：

相怜病骨轻于蝶，梦入罗浮万里云。
赠尔多情书一卷，他年重检石榴裙。

苏曼殊因心上人去世，身心大伤，“病骨轻于蝶”，以后岁月只能跳出尘世，在佛世中游逛了，唯独要做的事是记下怀念情人的文字，将来重验眉史棺木时，将情书放进去。对苏曼殊的这首充满佛机的诗，陈独秀唱和得似乎不得要领，其诗曰：

多才天子神山女，未必高唐定雨云；
相见烦君惟一曲，不教红泪落湘裙。

陈独秀借楚怀王游高唐梦遇巫山女的典故，喻苏曼殊和百助眉史关系的清白。末联因恋人已去，“不教红泪落湘裙”已没有根底。心曲只为一入弹，陈独秀毕竟不是苏曼殊。

春雨楼头尽八箫，何时归看浙江潮？
芒鞋破钵无人识，踏过樱花第几桥。

这是苏曼殊诗九。诗人坐在春雨楼头，看着樱花坠落，浮想联翩。这是和前几首不同的，对眉史的追念变成对故国家园的怀念和出家人低人一等身世的伤感，末句有在异国盘桓过久的艰涩感。

陈独秀和诗云：

空劳秦女为吹箫，孤负天门上下潮；
周郎未遇春衫薄，沽酒无颜过二桥。

国人艺妓吹箫解闷，并未化去苏曼殊心头的惆怅。陈独秀借周瑜与二乔的悲剧，隐喻人生长有悲欢离合。

苏曼殊《本事诗》最后一首曰：

九年面壁成空相，持锡归来悔晤卿！
我本负人今已矣，任他人作乐中筝。

这首诗是苏曼殊与眉史交往的总的感受，追悔分别九年后，不该有后来的相遇，以至眉史婚事不成，反而丧了性命。此事使苏曼殊万念俱灰，自觉再与欢乐无缘。

陈独秀劝苏曼殊立志高远，不可一意消沉，其和诗之十曰：

昭王已死燕台废，珠玉无端尽属卿，
黄鹤孤飞千里志，不须悲愤托秦筝。

皇冠金殿、玉宝朱颜都是身外之物，不可沉溺专有。陈独秀劝苏曼殊以史为镜，立千里之志，千万不可孤愤弹筝，不能自拔。此诗末句与“化身愿作乐中筝”句正成首尾呼应，“一乐”“一悲”两字正代表了陈、苏两人的心态，前者望后者以乐代悲，后者则以悲怯乐，两组诗不离此调。

1909年夏初，苏曼殊患脑病，每日不能多用心，但还和陈独秀、章太炎议论建一个“梵文书藏”。不久，苏曼殊赴长崎看河合

仙,与陈独秀分手。

◎南国投荒期皓首

1909年年底,陈独秀与小姨妹高君曼结为伉俪,到杭州陆军小学任教。游山玩水之余,陈独秀常常陷入对老朋友的怀念。1910年春日的一天,陈独秀抚琴一曲,感慨万千。不少朋友如吴越已先逝去;还有不少朋友虽然健在,但都一一不在身边,如苏曼殊等人。想到这里,陈独秀铺纸醮墨,作《存歿六绝句》六首,每组写一生一死两友,共写六生六死十二位友人,其中第六首写苏曼殊和已故的葛循叔,诗曰:

曼殊善画工虚写,循叔耽玄有异闻;
南国投荒期皓首,东风吹泪落孤坟。

苏曼殊1909年夏和自己分手后,赴长崎辗转来到杭州,住韬光庵。11月去了南洋。苏曼殊到南洋还是去年到沈阳迎兄灵柩经上海时,听邓秋枚说的。

邓秋枚即邓实,1876年生,与曼殊都是广东人。1907年两人在上海认识后,一直书信来往。他只知苏曼殊是受好友陶成章的邀请,到南洋去教书,但在南洋什么地方,他不知道。

一天,陈独秀从朱少屏处看到苏曼殊信址,大喜过望。朱少屏和柳亚子都是南社组织者,也是苏曼殊的好友。朱说,苏曼殊在南洋爪哇中华学校教授中国文史,和他在一起的有黄水淇、许绍南、周施仁等。

从朱少屏处回来,陈独秀急忙给苏曼殊写了一信,说:“仲别

公后，胸中感愤极多，作诗亦不少……虽用度不丰，然‘侵晨不报当关客，新得佳人字莫愁’，公其有诗赞我乎？”

写毕，陈独秀匆匆将《述哀》、《存歿六绝句》等诗连信一起寄到了南洋。

1909年11月，苏曼殊经陶成章举荐到爪哇任教，途经新加坡生病，早年英语教师罗弼·庄湘的女儿、西班牙诗人雪鸿劝他多住几日。

逗留期间，苏曼殊躺在简易的折叠椅上，看雪鸿送的《拜伦遗集》，和雪鸿聊天。无事时，拿出雪鸿赠送的玉照仔细端详。雪鸿正是妙龄时期，见到苏曼殊，盈盈立于堂上，话语中别有万种风情。多愁善感的雪鸿向他示爱，加上雪鸿父母谈笑间也抑制不住欣喜之意，使苏曼殊不能自己。为防止雪鸿陷入日本恋人菊子的境地，苏曼殊决意离去。

一晃过了四天，临行前，曼殊穿上了雪鸿父母为他做的一套西服，雪鸿拿着曼陀罗共含羞草一束，依依不舍地与苏曼殊分手，使苏曼殊倍增思念之情。

到爪哇后，苏曼殊心情不好，常饮酒解愁。6月初的一天，在友人处喝酒夜归，竟醉卧路上。虽是仲夏时令，仍导致苏曼殊的咯血病复发，每日与药炉为伍。

同时，苏曼殊对雪鸿总有难忘的思念，在爪哇经常吟《桃花扇》名句“福王少小风流惯，不爱江山爱美人”。1911年暑假，他自爪哇经香港、广州、上海、东京等地去日本旧地重游，回到爪哇后，泗水的《汉文新报》主笔沈钧业邀他发表文艺作品，他便写了《断鸿零雁记》，怀念恋人雪鸿。文中有诗如：

白云深处拥雷峰，几树寒梅带雪红。

斋罢垂垂深入定，庵前潭影落疏钟。

诗中“雪红”两字，即嵌入“雪鸿”名字。因为是用浅近的文言文写的，又是专写自己的早年生活和切身感受，随写随登，写得从容愉快，读者看得也起劲。《汉文新报》停刊后，第二年春苏曼殊回到上海还继续写。后来结集出版，一时大为走俏，中学生几乎是人手一册。苏曼殊两年心血总算没有白费。

1911年10月，苏曼殊闻辛亥举事，欣喜若狂，立即典衣卖书，准备归国。好友许绍南见其困难，资助400元川资，不料在泗水买船票时被人偷去。

◎乍合仍离倍可哀

1912年春，对苏曼殊来说，正是杏花春雨、滴沥增悲的时节。就在这时，陈独秀来到上海。

辛亥革命后，陈独秀任安徽都督府秘书长，这次作为皖省代表，来参加吴禄贞烈士追悼会。吴烈士是清陆军第六镇统制，因密谋起义，1911年11月16日夜被袁世凯派人枪杀。

“我当你到那里去了，原来躲到爪哇国写小说去了。”陈独秀见到苏曼殊，只怪他一去无影，连个信也没有。

“我是精神上的，你可是实实在在的。”苏曼殊想起了陈独秀信中“新得佳人字莫愁”的话。

陈独秀知道是说他和高君曼的事，说：“你当然是精神上的，谁叫你出家呢？”

苏曼殊问：“嫂子现在哪里？”

“现在安庆。”陈独秀便从高君曼谈起，谈到西子湖畔与刘

三、沈二的过往相从，叫苏曼殊欣羨不已。

“季平数年不见，心向往之已久，听说也在上海。”苏曼殊见陈独秀提到刘三，突然想去拜访。

“我也好久不见，不如一起去看。”陈独秀说。

后来找了半天，未遇上，两人只好怏怏而归。

此次苏曼殊在上海，与柳亚子过从甚密。平时无事，常与南社诸子到岭南楼、粤华楼、杏花楼吃花酒，忙于声色场的应酬，不亦乐乎！

陈独秀见他愉快，回安徽前劝他注意身体。

苏曼殊虽花天酒地，但骨子里是淡薄利禄，不求闻达，所以孙中山称赞他“率真”。

1912年12月13日，苏曼殊应陈独秀之邀，到安庆安徽高等学堂任英文教员。当时陈独秀和安徽都督孙毓筠有矛盾，辞去都督秘书，任安徽高等学堂教务主任。和苏曼殊同来的有柳亚子内兄郑桐荪、沈燕谋。于是，陈、苏两人又同校共事。

苏曼殊在安庆人生地不熟，不像陈独秀老家新眷都在安庆，因此，苏曼殊呆了两个月，就十分无聊了。1913年初春一日，苏曼殊和陈独秀闲谈说：“安庆真无聊，无书可读，无花可观。”安庆菱湖的花要到夏天才开，春天无非有月季、迎春之类的花草。

陈独秀陪着笑脸说：“你和桐荪天天在房间里聊天，聊累了，绘山水立轴，画几幅小画，不也自在吗？”除了郑桐荪、沈燕谋，苏曼殊又结识了程演生、易白沙、周越然等人。

“此乃无奈之法。”

“明天我请你去吃小蓬莱的烧卖。”陈独秀说。蓬莱阁离安徽高等学堂不远，出门往东一拐即是。

“已吃腻了，每天都吃三四只，但总比不上上海小花园的八

宝饭好吃。”

“改日到我家吃八宝饭。”陈独秀知道这是苏曼殊所好之物。陈独秀和高君曼的家在市中心的宣家花园。

“免了吧，桐荪兄决定月底回上海，我也打算同去。”苏曼殊说。

郑桐荪也是苏曼殊的朋友，柳亚子说他“对于曼殊的性情和行事有很深刻的观察和很锐利的批评”。郑桐荪曾评价苏曼殊，他“的行为虽是落拓，却并非不羁，意志虽极冷，而心肠却是极热”。

见苏曼殊言走，陈独秀迟疑了一下，低声说：“我请你吃花酒，如何？”

苏曼殊摇头，说：“我已和桐荪约好了。”

陈独秀不好再劝，说：“回沪一趟也好，但愿早点回来。”

苏曼殊走后不久，安徽高等学堂闹学潮，学生归咎于陈独秀，陈独秀又回皖都督府任秘书长。

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时，陈独秀、苏曼殊分别逃亡到上海。

8月21日，苏曼殊起了个大早，一看天气阴沉沉的，更增添了不安全感。安庆高等学堂空荡荡的，学生都回乡下去了。经过大堂时，只有几个打工的聚集在一起，急躁不安。苏曼殊丢下书籍等行李，由西而东急步六七分钟，再折往小南门，加快步伐上了英国人的一条船。开船时，只听见城内炮声不断，回头看时，到处黑烟滚滚。苏曼殊心知不妙，念念有词，望佛主保佑平安。

这次安庆遇险，给苏曼殊留下深刻印象。在上海见到陈独秀时，苏曼殊仍叫苦不迭，说：“安庆童谣云：‘职方贱如狗，将军满街走’，我这次是饱尝了个中之苦。”

陈独秀苦笑，说：“老弟有释帝保佑，我比你更惨呢。”苏曼殊有个习惯，遇到危险，则闭起眼睛，双手合十，心中念道：“梵天帝释庇佑，平安到家。”

整个10月，苏曼殊又大吃花酒。钱花光了典衣服，衣服典光了，再向人借，直至裘敝金尽为止。

12月，苏曼殊去日本诊治肠胃病，与陈独秀分手。临行前，苏曼殊蘸墨作《东行别仲兄》诗一首赠陈独秀，诗云：

江城如画一倾杯，乍合仍离倍可哀。
此去孤舟明月夜，排云谁与望楼台。

送走苏曼殊，回到寓所的陈独秀看着苏曼殊墨迹未干的诗，沉吟了半晌。他对来访的汪孟邹说：“苏曼殊专四言绝句，发人深思，字里行间别有洞天。”

“听说苏曼殊向你学过诗？”汪孟邹问。

提到苏曼殊学诗，陈独秀笑了起来，说：“癸卯年在上海，他突然要学做诗，但平仄和押韵都不懂，常常要我教他。”提起收曼上人做自己的高足，陈独秀两瞳放光，兴趣大增：“子谷做了诗要我改，改了几次，便渐渐的能做了。”

见汪孟邹笑呵呵地洗耳恭听，陈独秀指着苏曼殊的诗说：“照曼殊的历史讲起来，能够成就到如此地步，真是不容易的。”

“在芜湖，我很爱曼殊的画，想不到画僧这么有才气。”汪孟邹点头称赞。

“他实在是一个天才。”陈独秀肯定地说。

◎老死缘于生，生缘于爱

苏曼殊去日本东京后，一度住在樱田本乡居觉生寓所。早上起来，洒水浇花，平时打坐念禅，往往一天，过了一段平静的日子。到了漫长的1914年的冬天，苏曼殊常常忆及生平哀怨之事，不时泪下，禁不住写了小说《绛纱记》。

1915年夏天，陈独秀也来到日本，协助章士钊办《甲寅》，陈、苏、章三人又到了一起。

一日，苏曼殊拿出《绛纱记》，说：“行严作《双桺记》，我与仲甫作序，今我作《绛纱记》，也望两位劳笔。”

陈独秀说：“烂柯山人是推不掉的，我却可以推辞。”

章士钊见陈独秀话中有话，说：“莫言推辞的话，昙鸾轻易是不请人作序的。”

“烂柯山人”是章士钊的笔名，“昙鸾”是苏曼殊的笔名。

“莫非仲甫怕吃亏，要三人各作一篇乎？”苏曼殊笑道。

“非也。余性懒惰，也不愿多事。视执笔为文，宁担大粪。”陈独秀说。

章士钊见陈独秀出语不恭，说：“我意先拿去看，然后再言是否作序，如何？”

陈独秀笑，说：“昙鸾的序我是一定要作的，只怕作不好。”

此事拖了一阵，陈独秀本想在日本把它写出来，不料汪孟邹来信说，高君曼生病，自己不得不离开日本回上海。临行前，陈独秀答应，一定在船上把“序”写出来，然后快件寄给行严。

这次陈独秀没有失约。夏日的阳光下，浩淼无垠的大海碧浪连天，随着海船激起的层层白浪，陈独秀思潮翻腾不息。他从苏曼殊的充满佛理的《绛纱记》小说，想到老死缘于生，生缘于

爱。关于生与爱，都是基督教和印度婆罗门教感兴趣的话题，两教都讲万物造于神复归于神，不过耶稣教不否认现实世界，叫人相爱以称神意，似乎比佛说妥帖些。

仔细看书中的昙鸾与友人梦珠，其实都是曼殊一个人的化身，两人行为性格有什么区别呢？境遇也相似。昙鸾存而五姑歿，梦珠歿而秋云存。真有点像庄生梦蝴蝶，蝴蝶梦庄周，我也没有时间分得清谁是谁。若曼殊在身边，是一定要问个清楚的。但不管曼殊承认不承认，这昙鸾与梦珠，一定都是讲他自己，这是没有疑义的。

后来，柳亚子专门考证了陈独秀的假设，昙鸾与友人梦珠，是不是曼殊一个人的化身。他说：“梦珠影射曼殊，在文字上是很明显的。薛梦珠和苏曼殊，都只是一音之转罢了。梦珠名瑛，正影射曼殊的名玄瑛；而且曼殊与友人书札，有时也只着一个瑛字。”柳亚子称赞说，陈独秀先生在序文中说得好。

1916年11月1日和12月1日，陈独秀在《新青年》二卷三、四号上连载了苏曼殊的《碎簪记》，这是两人最后一次文字合作。再后来，约在1917年冬天，程演生到北京，苏曼殊捎信给陈独秀和蔡元培，想要一个公费去意大利绘画的名额。

遗憾的是，苏曼殊时日已不多了。不到半年，即1918年5月3日，35岁的苏曼殊在上海广慈医院逝世。

临终前的苏曼殊还在柳亚子、包天笑面前提到陈独秀。当时陈独秀正在北大任文科学长，处在事业的巅峰时期。他内心里多么希望再有一段和这位昔日的畏友嬉笑怒骂的时光啊！

◎于人情世故十分透彻

苏曼殊去世后，活着的友人常常谈起他。

有一次，柳亚子问陈独秀：“仲甫，你和曼殊在一起呆的多，别人说他疯疯癫癫，你怎么看？”

陈独秀说：“苏曼殊于人情世故方面，其实十分透彻，不过他不肯随时俯仰，只装点做疯疯癫癫的样子，以佯狂免祸罢了。”

柳亚子说：“好像太炎先生也说他有点不解人事？”

陈独秀笑，说：“章太炎在文章中是说过，岂止是讲他不解人事，几乎说他是个傻子。这是埋怨他对刘申叔的和事老的态度。其实他住在日本的时候，太炎和刘申叔冲突的原因，他完全是明白的。他们都当他是傻子，什么事也不去回避他，而他也一声不响。”说到这里，陈独秀叹了一口气：“其实别人哪里知道，他当时只偷偷地来告诉我一个人。告诉我，不就等于告诉了革命党了吗？”

“我也这样看，苏曼殊虽是个出家人，在大节上，他并不糊涂。”柳亚子说。

“是啊，当曼殊是傻子的人，他们还在上曼殊的大当呢！”

“这么说，章太炎也上了曼殊的当了。”柳亚子说着，两人一起笑了起来。

柳亚子收住笑容说：“看得出，曼殊和你的感情非同一般。他在最后的日子，还和我谈起你们在日本的事。一个人在临死的时候还记得你，那是真的终生朋友了。”

提到曼殊之死，陈独秀有些伤感，说：“他住广慈医院，亏你和行严的资助。那时我正在北大忙《新青年》，和一班人斗，没有顾上他。”在北大，和陈独秀过不去的一班人里，有不少是苏曼殊

的故旧，如刘师培、黄季刚等。刘师培被视为旧派之首，全不顾当年陈独秀等人在辛亥革命后为他担保，极力反对新派。黄季刚仍然刚愎不减当年，除了《毛诗》、《左传》、《周礼》、《说文解字》、《广韵》、《史记》、《汉书》、《文选》等古文经典，一概瞧不起。人称他“八部书外皆狗屁”。

“我去看他，似乎还见他的书案边放有《新青年》。”柳亚子说。

“新出一期《新青年》，都是刘半农寄给他。我最后一次收到他的信，是他去世的头一年冬天，与他的死不过半年。听说那时他应蒋介石的邀请，住在蒋的家中？”

“是的，蒋那时住在白尔部路新民里11号，宋美龄对他很照顾。”柳亚子也去蒋家看过苏曼殊。

“曼殊托程演生带信给我和蔡校长，想要一个公费去意大利绘画的名额。”

“这事我听曼殊说了。”

“那时他也没有想到死。现在想来，我还不舒服。要一个公费去意大利习画的名额，并非难事。但哪里想到，他的病情恶化得那么快。”

两人说到这些，无不悲戚。柳亚子说：“曼殊死得太年轻了，才35岁。医生说他是糖吃多了。”

“曼殊的贪吃，不了解的也引为笑柄，其实这正是他的自杀政策。他眼见举世污浊，厌世的心肠很热烈，但又找不到其他的出路，于是便乱吃乱喝起来，以求速死……”陈独秀说着声音又低了下来。

“对于曼殊的狂吸雪茄，滥食饼糖，不少人都劝过，他总是不听，还以为是他出家人的癖好。你说得对，曼殊最后死于肠胃

病,是他的自杀政策造成的。”柳亚子说可惜了一个奇才。

“我赞赏的是他的不同污浊社会合污。在我的许多朋友中间,像曼殊这样清白的人,真是不可多得的了。”陈独秀感叹道。

陈独秀和苏曼殊的友谊,柳亚子一直没有忘怀。1935年,陈独秀被蒋介石关在南京狱中,柳亚子赋诗还提到当年旧友章士钊、章炳麟、陈独秀、苏曼殊四人。其诗曰:

名扬画虎惜行严,孤愤佯犯有太炎,
要忆囹圄陈仲子,曼殊朋友定谁贤?

柳亚子问苏曼殊最好的三位朋友中谁最“贤”,一个“惜”,一个“孤”已排掉了两“章”,一个“忆”字表明,在柳亚子看来,曼殊最贤的朋友是被国民党关在狱中的陈独秀。

一个旷古奇才,沉沦得毕竟太早太年轻,为活着的人留下了不尽的遗憾;一个开天辟地的斧手,活得毕竟太累太艰难,给后人留下了无穷的思索。但苏曼殊与陈独秀的爱国情谊,他们对新文化的共同追求和历史奉献,确为中国现代文化史添上了绚丽多彩的一笔。青山恒立,逝水东流,值得追念……